

● (美) 托马斯·伯恩斯坦 著  
李 枫 等译 夏 潮 校

# 上山下乡

一个美国人眼中的  
中国知青运动



警官教育出版社

D652  
15

85693

# 上山下乡

李 枫 罗 燕 明  
何 吉 贤 周 欣  
姚 文 娟 王 南  
等 译  
夏 潮 校

(美)托马斯·伯恩斯坦著

警官教育出版社

## 译者的话

245069  
将托马斯·伯恩斯坦教授的这部书译成中文出版的想法，已经有好几年了。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亲历者，对于这场耗去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热血乃至生命的运动，有着一一种极复杂的情感。随着人生步入中年，越来越多的老知青已开始从对那逝去岁月的追悔和诅咒中转入对这场运动整体的理性的反思。显然，这一任务是“知青文学”或者其它什么文学形式所无法完成的。故而，伯恩斯坦教授这本书，作为海内外第一本、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本研究上山下乡运动的学术专著，在我们以及一切正在或希望对那场运动作出严肃思考的人们眼中，自然便具有了特定的价值。

托马斯·伯恩斯坦教授是将中国知青运动作为在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社会政治体系支撑下所展开的一场空前规模的社会实践来研究的。正是在这场运动所蓬勃展开的年代中，他广泛而细致地收集了一切可能得到的材料，以不带任何政治偏见的客观态度，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源、目的、政策、过程、结果以及这场运动所体现的政治色彩、社会冲突和价值观念作了精细的分析和精辟的议论。通览全书，我们不能不为一位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性的准确把握而折服。当然，正如作者本人在写给译者信中所说，这本书毕竟是在十多年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写的，有些结论显然是过时了。”譬如，作者虽然剖析了上山下乡运动中种种无法解开的矛盾结症，但却始终未能象其夫人

苏道锐教授今天这样，对运动作出“失败的实验”的断定。但是，这丝毫并不妨碍我们称这本书为一本严肃的、有相当学术价值的、可读性强的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学和政治社会学著作，故我们愿意将它翻译介绍给一切对当代中国史有兴趣的研究者和千千万万的老知青以及这些知青的家长 and 子女们。

一九九二年十月



## 写在本书中文本出版前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着源于无法遏止的城市人口膨胀和城市失业率日渐高涨的社会压力。它们的政府在向城市移民的浪潮及因就业能力要求而与日俱增的教育的压力面前束手无策。相对这种一般的状况而言，中国曾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在这个国家曾实行的一系列的控制城市膨胀、促进农村发展以及使教育与经济发展实际相适应的措施中，一个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将城市中学毕业生送到农村和边疆去安家落户。在1968到1975年间就有1200万城市中学毕业生被送到了农村，这无疑是本世纪任何一个国家中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这一实验得到了毛泽东的强有力的支持，他的后继者华国锋1977年前后亦在继续这一事业。

本书所从事的研究涉及到城市知青下乡动员、知青在农民中生活所产生的适应方面的问题、知青对农村发展的贡献以及贯穿上山下乡运动始终的政策方面的争议等一系列问题。伯恩斯坦教授引用的资料取自于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报道材料、到中国访问过的外国人的报告以及在香港对有关知青的数次采访。这些，使一位局外人能得到丰富的关于中国大众的态度及动机的资料。他特别注意这一运动的革命的价值观念与为许多中国知青所认可的传统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对立。

从中国改革时期的观点来看，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失败的试验。它所曾否定的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一些准则，今天的中国都给予了肯定。那些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现在通常认为，除了

他们了解了一些中国农民的真正的生活状况这样一个事实之外，他们在农村度过的时间是一种浪费。了解中国农民的真实生活状况亦是一种重要的学习，这可能就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最有价值和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方面。

苏道锐

一九九二年七月

\* 苏道锐(*Dorothy J.Solinger*): 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社会科学学院政治、社会系教授，作者的夫人。

## 致 谢

本项研究得到了许多单位和个人的帮助。该项研究最早是1971年夏由耶鲁大学国际、地区问题研究委员会倡议的。在耶鲁大学青年研究基金社会科学理事会和美国理事会当代中国研究委员会及国家科学基金所提供的支助下，1972——1973年，我在香港作了一年的研究工作。后来，该项研究又得到了耶鲁的东亚理事会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资助。

一些助理研究人员为这项研究作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我特别感谢我在香港工作时的两位助手 *H·P·K* 和 *Y·S·C*。*H·P·K* 是1968年下乡插队的广州知青，他所提供的情况是这本书的主题，他收集了1968年——1972年间报刊公开发表的大量的统计数据，同时他还按本书要讨论的不同主题对公开发表的文章进行了编辑和分类，因此，我可以根据主题的需要方便地运用大量的材料。*Y·S·C*也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他利用文革期间的材料从事着中国的教育的研究。这两位先生所提供的材料均使我得到了大量的关于中国的知识。此外，我还想感谢弗里卡·詹、朱迪思·切恩·艾达·洛和南希·罗思·雷明顿，因为他们在1973年到1975年间在不同时间里为本课题所做的研究工作。

有数位教授阅读了该书全部或部分的手稿并提出了详细的意见。安德鲁·内森和马丁·K·怀特对整个手稿进行了评阅，米切尔·奥克森伯格和埃兹拉·沃格尔阅读了前四章，威廉·帕

里什对后三章，杰纳特·萨拉弗对第四章进行了评阅，他们的批评和建议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此外，涉及到本书所使用材料的一些学术讨论会以及讨论会的参加者亦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这些讨论会包括新英格兰中国问题学术讨论会、耶鲁的东亚研究学术讨论会以及亚州研究协会所召开的讨论会，还有一个以中国为主题的现代东亚研究讨论会以及哥伦比亚埃德温·温克勒所召集的讨论会。我还想感谢那些提供了一些数据及翻译整理了这些数据的人员，他们包括罗伊·霍夫海因茨、尼科拉斯·拉蒂、威廉·帕里什、比莱狄克斯·史塔文斯、林·怀特和马丁·怀特。还有哈兰·克莱文兰德和约翰·路易斯给我提供了他们在中国的旅行报告，我还从其它许多到过中国的参观者的旅行报告中得到了许多材料。

我还想向帮助打印了本书书稿的耶鲁大学的罗斯·欧文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苏扎内·内菲多文以及耶鲁大学出版社的两位编辑玛丽安·阿什和贝思·科达玛表示感谢。

最后，我想感谢我的妻子埃伦，没有她的支持，本书便不可能撰写，还有我的女儿埃亚和玛亚，她们贡献出了周末的许多时间，本书献给她们。



# 目 录

<b>第一章 综述 —— 一场中国式的 社会大试验 .....</b>	<b>(1)</b>
1. 资料与信息：对新闻材料的分析和对“逃亡” 知青的采访 .....	(11)
2. 定义和数据：寻求一般性结论的桥梁 .....	(20)
<b>第二章 为什么要下乡？ .....</b>	<b>(42)</b>
1. 对城市就业大军拧亮的绿灯 .....	(42)
2. “再教育”——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工程 .....	(53)
3. “彻底消灭城乡差别” .....	(68)
4. 决策——无法消弭的矛盾与斗争 .....	(78)
<b>第三章 动员 —— 城市的躁动 .....</b>	<b>(106)</b>
1. 社会组织、学校、家庭——压力种种 .....	(106)
2. 观念的反叛与冲突 .....	(117)
3. 什么人可以留下来？ .....	(125)
4. 下到哪里去？ .....	(133)
5. 一场远未结束的“战斗” .....	(138)

## 第四章 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民”

### 的艰辛之路 ..... (151)

1.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 (153)
  - A. 义务、责任与指导、管理 ..... (153)
  - B. 农民与知青——传统与现代角色的碰撞  
与交融 ..... (162)
2. “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 (171)
  - A. 改善领导——“书记挂帅”与“带队干部”  
..... (173)
  - B. 集中安置——“株州模式”的推广 ..... (176)
  - C. 安“居”才能乐“业” ..... (180)
  - D. “该杀就杀、该判就判”——对知青冤情  
的解救 ..... (183)
  - E. 婚姻与“扎根” ..... (187)
  - F. 不断强化的约束机制——“政治教育”  
..... (192)

## 第五章 “广阔天地”是可以

### “大有作为”的 ..... (210)

1. 对下乡知青的任用 ..... (211)
  - A. 趋势和概况 ..... (217)
  - B. 理不清的情结——农村干部和农民的态度  
..... (235)
  - C. 知青的心态种种 ..... (243)
  - D. 再教育与再学习 ..... (248)

2.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力军” .....	(256)
A.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	(257)
B. 农业技术“革新” .....	(266)
C. 乡村知青教师 .....	(273)
D. 是“变相劳改”吗? .....	(277)
E. 现实与可能之间的巨大差别 .....	(282)

## 第六章 对运动的稳定性、 权威性的挑战 ..... (301)

1. 生活的转机——招工、招生、征兵 .....	(301)
A. 得以离开乡村的诸因素 .....	(308)
B. 破坏剂还是安全阀? .....	(317)
2. 不当“被遗弃的人” .....	(321)
A. 文革中回城“闹革命” .....	(326)
B. 巨大的后遗症 .....	(339)

## 第七章 是第三世界的榜样吗? ..... (362)

## 第一章 综述——一场中国式的社会大试验

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使人们的期望和这种期望的满足之间出现了差距。现代化，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一个与大众的期待和选择之变化密切相关的过程。这些变化来源于文化的普及，信息量的增大以及各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出现。现代化促使人们产生流动的欲望并对流动感到习惯。这种流动既是横向的，又是纵向的。农民想要离开他们的村庄流动到城市以寻求更好的生活，干体力活的人渴望从事白领工作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并增加工资收入。受教育的要求也增加了，因为能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是争取得到受人尊敬的职业的主要途径。然而，人们期望值的增长速度比经济发展的速度快。其结果是，许多流动到城市的人找不到工作，许多的学校毕业生不能为城市的工业和政府部门所聘用。城市的基础结构所受到的压力增加了，而由于需要和期望得不到满足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似乎在受过教育的失业者中特别严重。社会问题历来是导致政治不稳定的强有力因素。政府面临着“城市人口过于集中”的问题，既不愿意、又没有能力去调节从乡村流向城市的移民，或者使教育的发展与城市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协调一致。这是一种涉及面很广、有必要正面应付的压力。近年来，由这种压力所产生的城市危机的潜在威胁，日益严峻地困扰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



长期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直是那种政府在这种危机面前束手无策的一般模式中的突出例外。多年来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便一直在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并力图使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的经济现实协调一致，即与在社会不断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农业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特点一致。中国领导人采取了一些措施控制、缩减甚至杜绝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并经常性的将已流往城市的乡村人口送回其家乡。他们鼓励并要求到城镇高中读书的农村青年毕业后回乡务农而不是留在城里寻求在工业或商业部门的就业机会。他们尝试着教导城市和农村的青年学生树立当工农兵而不是成为白领的政府工作人员的理想。他们实施了大规模地将城里人送到农村去的计划：“中国是第一个策划了人口倒流去乡村的社会”，这就是所谓“下放”。这种下放既有临时性的，又有长期性的；既包括了城里的干部、城里的整个的家庭到农村或象新疆这样的边远省份重新安家落户，又包括了将大学毕业生分配到乡村去工作。

本书的研究涉及到这类重新分配的一个方面，即将城里的中学毕业生送到农村和边疆去的运动。这场长期以来被称作“上山下乡”的运动，首先是大跃进之前在小范围内实施，60年代初继续展开，1968年文化大革命后急剧展开，此后，这场运动以各种不同的层次继续发展。根据中国官方透露的统计数字累计，1956年至1966年间，有120万城市青年被送到了农村。1968年至1975年的城市下乡青年是1200万。尽管同期中国城市人口的官方统计数字不详，但将1970年中国城市人口的总数估计为125,000,000是合理的，这就意味着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在这场上山下乡运动中，已有10%的城市人口被送到了农村。大约自1964年以来，城市中学毕业生的“上山下乡”原则上是号召终身落户，即“一辈子”。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相当比例的下乡青年后来都被安置回了城里，主要是进了工厂。然而，从目前

所收集到的材料来看（详见第6章），对于大部分城市青年来说，这种迁移意味着生活从城市到农村的永久性改变。因此，这场运动与在军事性的“和平军团”里服务，或在第三帝国那种通常是无限期的青年义务劳动军（Arbeitstjenst）里供职有着显著的区别。这一种下放，对部分人来说意味着两年的义务，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则是一种长期的或永久性的事业，因为，这项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将城里人转变为“有文化的新农民”。

在中国的报刊上，“上山下乡”被明确解释为是一场“革命的运动”，是青年与工农相结合、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必由之路。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略措施，是意识形态领域里一场深刻的革命。“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主要途径之一。

“从根本上说，培养怎样的青年一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否后继有人的问题；……是我们的子孙后代是否能继续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成功地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上山下乡）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运动绝不简单地是一个安排劳动力的临时性措施，也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们党的一项长期的战略方针。这场运动缩小着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它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场运动之所以具有革命性，是因为它含有永久性的插队落户的指导思想，含有受过教育的城市人也能当农民的思想。这场运动的革命性也体现在它与带有发展中国家共同特征的思想观念、期望和要求背道而驰。大卫·阿普特在他的《选择和分配的

政治性》一书中指出：“资产阶级化”是现代化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也就是说，大众化的流动方式都是以争先恐后向上爬和满足自己的经济利益为中心。“如果一个社会处于现代化阶段，那么公认的平等原则或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价值，都将是物质利益及其分配为核心，即使这个社会的政权是革命的也不例外。”“在中国，历史上就存有个人在城市里寻求发展的传统，目前，一些城里人仍然有着这样的志趣和理想。本书阐述的事实为这一现象提供了例证。中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发动一场彻底的革命来反对这种思想观念，这也证明了这种思想确实存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因为是新生事物，不仅阶级敌人反对她，暗中破坏她，旧的社会意识和传统观念也阻碍着她的发展。我们是应该与旧的传统观念作斗争，坚决地抵制这些腐朽落后的思想倾向呢？还是向旧的习惯势力妥协或投降呢？”

在中国的民众中，广泛存在着与上山下乡运动的指导思想截然相反的三种价值观。第一种是，基于仍然存在着的城乡差别这一客观现实，人们宁愿选择在城市而不是乡村生活。由于缺乏综合性的数据，我们很难对诸如城乡收入的差别这类问题作出概括性的分类，但通过对社会各部分成员收入情况的具体分析，也使我们研究这类问题。富裕的郊区公社里农民的收入或许会高于城里人，特别是那些在合作性质的街道工厂里工作的城里人。另外，自 50 年代以来，国家就在尽量增加农业人口的收入，使其增长率快于城里人的工资收入，故城里人的工资收入自 1957 年以来基本保持未动，而农民们则受益于政府对农产品补贴的增加和税务负担的削减。”然而，尽管如此，城乡显而易见的收入差别依然存在。社会学家马丁·K·怀特研究得出，农民的平均收入大约是城里人的平均收入的一半。”明显的差别还存在于工人和农民收入的可靠性方面。在国营工厂工作的工人有固定的工资收入，人民公社农民的收入则依据每年庄稼的收成而变化；”

工人们享受着由国家提供的劳保福利，农民则必须依靠合作医疗，虽然国家也会有些补贴，但这种合作医疗的效益主要还是随着公社的财富而变化。”公平地说，某些商品在城市里更容易得到，城市居民在肉类等消费品方面能得到更好的供应。”通常农民的劳动时间比工人的长且更加辛苦。乡村里的文化体育活动设施及娱乐休息的场所也都比城市里少。所以，乡村生活比城市生活单调乏味。”中国的宣传机构坦率地承认，到农村去意味着艰苦、牺牲和享乐的丧失，这被认为是这场运动的意义之一。”

第二，给人提供往高处走的可能性的国民教育之目的性与上山下乡运动相抵触。青年人从学校毕业后应进入政府部门从事某种工作而不是成为体力劳动者，更理想的是，中学毕业后应进入大学深造尔后进入科技或国家机构的上层领域，这种观念并不只是现代化的产物。传统的中国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能够通过进入国家政府部门及上流社会所需的国家考试的考生。今天，“读书做官”的观念在中国受到了猛烈抨击，这也正意味这一观念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仍旧根深蒂固。”事实上，上山下乡运动被认为是对这种观念，即认为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高贵的一种冲击。

第三，上山下乡与地位世袭的愿望也背道而驰。上山下乡运动旨在控制或者革除那些在中国政界和其它社会行业中位居要职的父母们将他们的种种优势及利益传给其子孙后代的现象。所谓优势，首先意味着政治上的优势，包括在党政军内担任着重要职务的老一代革命者，他们的权力、声望和影响使他们能够为其子女提供优越的受教育的机会，他们还拥有使其后代出人头地所必需的各种关系。为了使那些出身于上层社会的“革命家庭”的子女们从头做起，上山下乡运动成为防止出现新的特权阶层的一种探索。这是毛泽东的中国所尝试的防止苏式“修正主义”复辟的一种方法。”至于这个目的是否能达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详见



第3和第6章)。

同样，父辈的优势也适用于那些由解放前培养出来的专家们组成的“无权的上流人物”，这些人包括学者、教授、工商界管理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些人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在政治上却不受信任，常常被认为是需要进行思想改造的对象。他们希望留给后代的优势是家庭的文化背景以及为进入大学深造而在学业上有成就并以此作为进入上流社会途径的强烈愿望。这些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的文化差别是1966年之前大学的学生中，知识分子的子女大大多于工农子弟的一个原因。最后，这一点也适用于“剥削阶级”，譬如资本家和地主。这些人所能传给子女的唯一优势就是不断帮助他们树立在学术上取得成功的强烈愿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以及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锐减，使这样几类家庭失去了优势。

因为上山下乡运动与人们的理想和期望完全相反，所以为这场运动所触及到的人或许会认为这是将他们引向下坡路。他们中有人会产生一种深刻的相对失落感，也就是说，人们的期待（期待值）与他们所能得到的（能力值）之间出现差距。一些理论家认为，相对失落感是触发暴力和革命的一个前提。在上山下乡运动进程中这种可以为人利用的潜在的暴力因素，不是一个可以等闲视之的问题。在中国，也确实有过因理想受挫而引发的暴力事件。例如，1957年武汉地区就曾发生过一次骚乱，有关当局明确地解释说这次骚乱就是青年人不合时宜地要求进一步接受教育所产生的愤怒的结果。同样，不止一个观察家发现，文化大革命中青年人的暴力事件也有与此相同的因素。即使暴力事件不曾泛滥，人们也应估计到上山下乡运动将会引起信念、生计以及法律等方面的问题。

不过，观察上山下乡运动所潜在的危险因素时也应考虑到这项政策的制定者们所处的中国的政治体系这一因素。中国的政治

体系有着有力对策来对付由于失落感所带来的问题。这些对策包括理想教育、强大的组织体系和社会动员能力以及事先做好上山下乡运动各项准备工作等。中国的政治体系可以运用对策疏通由于失落感而产生的情绪，减轻这种情绪带来的危害性并给予一定的安抚，最终可以防止社会问题的集中反应。简而言之，这种政治体系有能力采取步骤“疏导”人们由于走下坡路所极易产生巨大失落的情绪。

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并不满足于只是控制由于上山下乡运动所引起的社会不安全因素。他们最远大的目标是消除这类消极的东西，使人民树立革命理想从而不断社会主义化。一个革命者不应当将上山下乡看成是走下坡路的形式，而应看作是为国家尽力、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机会。中国的领导人精心改变着大众的价值观，重新评价社会成员的政治地位，高度赞扬城里人当农民的新风尚并教育青年一代树立个人服从集体、国家和革命的道德观。许多机构，诸如学校、青年组织，在可能的条件下甚至家庭都被调动起来作这种改变价值观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上山下乡运动本身被认为是使人得到更新从而为新社会所接纳的一个主要措施。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彻底改变城市青年的思想和价值观。这些青年到农村去通过和农民打成一片，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sup>22</sup>换句话说，城市青年的下乡并不是因为城里人出现了思想观念上的进步，而是因为城市青年仍然受着“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侵袭。

上山下乡运动成功地实现了使年轻的城里人社会主义化的目标了吗？我在本书中所提出的论据表明，表面上可以说是实现了，但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或许是绝大部分情况下，答案是：没有。这并不是说“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有为广大青年所接受，而是有必要将为人民服务的方式途径与一个人的个人志趣的吻合

结合起来分析。50年代，当大学招生时，人们可以以成为专业科学工作者的方式来为人民服务，这样，个人的理想就和服务的道德相结合了。然而，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城里的各种发展机会受到限制（参见第2章），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标准要求城里人变成农民，并号召个人无条件地服从。可以确认，前一种为人民服务的方式比后一种更容易实现。因为，在完全不利于个人利益的条件下具有高度的革命奉献精神 and 完全无私精神的新价值观的青年看起来似乎是少数。这样一个事实旁证了这一点，即：中国的宣传机构认为城市青年的革命化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是几代人的事业，而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任务。”

在城市青年彻底社会主义化以前，需要对上山下乡运动进行适当“管理”。中国的政府是怎样对付在贯彻执行上山下乡的方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青年们表现出的被剥夺的情绪的呢？措施有如下几点：第一，既在城市又在乡村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教育，即使政治教育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态度，至少也有助于创造一种让人们理解上山下乡运动的社会气氛，让人们不要将此作为一种非常而视为一种正常现象予以接受，并逐步与青年及他们家庭的理想、前途观相吻合。第二，全面动员联系着国家和社会的基层组织，通过他们的工作，努力使涉及到这一运动的城市和乡村公社的各阶层群众保持安定。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创造一个正面对待这一运动的社会环境，但组织渗透则给家庭和个人参与运动提供方便并对有抵触情绪者施加社会压力。第三，采取各种刺激性措施，使乡村生活对城市青年更具有吸引力，譬如提供通过乡村政治部门进入社会的领导层的机会，以及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贡献的机会。这两种办法都有助于正面引导及消除不安定因素。本书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从发挥实际效益、减少不满情绪的角度描述和分析在这场运动中所贯彻执行的各项政策措施以及实施效果。

必须从政治体制的力量，包括强制的力量这样广泛的角度来观察上山下乡运动及城市青年在农村插队落户的全过程。但是，这种力量是在幕后。中国领导人不愿使用明显、直接的强制手段来巩固上山下乡运动。他们更愿意通过严肃认真的、使人们在客观上改变态度的方法来让人们自觉接受新的价值观。正如艾米塔·埃茨欧尼所指出的那样：采用直接强制会导致产生对抗情绪而不是自觉投入。<sup>11</sup>然而，强制是隐在幕后的。在评价劝说和“有效的”社会压力对城市青年保证服从国家安排的效应时，必须考虑中国政治制度的强制力。<sup>12</sup>例如，明显的强制出现在政治教育中，这种教育强调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如何对待上山下乡运动被明确指出是区分革命者和修正主义者的根本标准。最终，这种分野使“无产阶级专政”对那些顽固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人的镇压具有了合法性。不过，仍然极少动用明显的武力。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知青下乡这一运动，一方面将它作为一个运动着的过程来研究，另一方面将它看作是一个非凡的发展项目来评价。因为上山下乡是那样一个了不起的伟大的事业——力求让城里人转变为农民，并深刻地改变其价值观，研究这一运动的过程——它的管理方法及人们的反应——这是一个理性的有趣的任务。但这一运动还有着为国家的发展建设作贡献的目的，这目的有两个：第一，如前所述，这个运动是解决发展中国家所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城市人口过于集中”或城市里人对机遇的寻求与可得到的机会不成比例的一个措施。（见第2章）这里，将青年送到农村去的价值直接体现在减轻城市各部门的负担。第二，将城市青年送到农村去可望为解决中国最大的问题，即对乡村的发展作出贡献。据陈丕朝说，城市青年“在成为普通劳动者的同时，也在促进乡村现代意识的发展、技术和知识的传播以及建立乡村中的现代社会结构方面起着作用，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建设和改造农村。”<sup>13</sup>所以下乡知青或许能以与农民



打成一片，沟通城里人和农民在文化及思维方式上的隔阂的方式来促进农村的变化。城市青年到边远、人烟稀少的边疆地区去，或许也能对国家的民族融合起到重要作用。不过，城市下乡青年是否确实对农村的发展作出了这样一些贡献，这些贡献的作用和意义该怎样评价，这是一个难以准确作答的问题，因为缺乏恰如其份的方法手段来分析研究。在第2章，特别是第5章里，我们将尝试着对这一问题作出评估。

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既有促进发展与建设的目的，又有改造思想的目的。后一目的就是要创造新人，反对特权，缩小“三大差别”——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改造思想的目的不仅是基于毛泽东在60年代开始对防止苏式的“修正主义”复辟的方法的探索，还基于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经验。例如，填平知识分子和农民之间的鸿沟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20年代早期李大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詹姆斯C·廷这样的乡村重建主义者身上。“知识分子及干部到农村去的实践活动，在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延安时期也曾广泛开展。”那时，开展这一活动的前提之一是，城市是异己和充满敌意的地方。如莫里斯·迈斯纳所分析的那样：

“对毛来说，城市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是现代革命的舞台，而是由外国势力占据的场所。这就培养了一种对城市的强烈的偏见情绪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强烈的农民意识：城市意味着异己势力，而农村则意味着家乡。这种观念导致了一种普遍的疑虑，即城市是外国资产阶级思想道德以及社会腐化现象的来源和泛滥场所，即使外国人从这座城市里移居出去了，这种疑虑也还长期存在。”

有了这种意识，城市青年必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的想法似

乎就不那么离谱了。毛泽东的思想里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另一个指导原则是，书本知识不是真正的知识，只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能学到真正的知识。

上山下乡运动既要达到促进建设发展的目的，又要达到思想改造目的的双重目标，引起了一个共产主义的研究者们所熟悉的问题，即这两个目的相辅相成呢还是互相对立？追求其中一个目的是否要以另一目标为代价呢？理查德·罗文撒尔在他的著名文章《发展与共产主义方针政策中的乌托邦》中指出，在“某些方面”，二者能协调一致，但本质上，二者“完完全全、毫不妥协地相互对立”，“因为，为了最终目标的实现，共产主义的政体应当以培养‘新人’为目的，这是一种完全脱离了个人志向和阶级社会特有的个人欲望的人。然而，如果要加速社会的发展进程就必须注重发展教育和训练‘经济的人’……以谋取个人利益为激励手段来创造一种现代的工业社会。”<sup>11</sup>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是本书自始至终要研究的另一个问题。

## 1. 资料与信息——对新闻材料的 的分析和对“逃亡”知青的采访

本书的研究基于三个方面的资料来源：中国新闻传播媒介所披露的材料；对那些曾经当过知青的城市青年的采访以及到中国参观旅游的外国人的访华报告。中国的报纸和电台近年来对于上山下乡运动予以了大量的关注，就国家一级的新闻机构来说，主要有两个主要的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此外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红旗》杂志。应指出一点，本书中所涉及到的中国报刊上登载的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大量文章主要来源于近五年期间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这两种中国的主要

报纸，这是因为自大跃进以来，中国省一级和地方的报纸就被禁止向外国输出，但可以得到的为数不多的地方报纸上的有些材料，对于我们弄清中央级报纸上没有阐明的一些问题是有价值的。”在缺乏地方报纸的条件下，省一级广播电台的广播材料就成了一个主要的资料来源。有关各省的城市下乡知青的统计数字、加入中国共产党及被推荐做了乡村教师或技术人员的知青的统计数据均来自于这些电台的广播。

表1 两种主要报纸刊载的有关上山下乡运动新闻报道的情况\*

年 代	《光明日报》	《人民日报》	总 计
1968年	88	99	187
1969年	190	195	385
1970年	134	105	239
1971年	57	55	108
1972年	125	87	212

中国的新闻媒介从来不会“发表所有应当发表的消息报道”。例如，极少有关于上山下乡运动一些基本的政策性法规的报道，极少让人们知道这一运动的规划过程。尽管上山下乡运动是一项复杂的行政事业，但对于这场运动的各项规章制度既没有公开也没有在报刊上展开如何把握它们的讨论。相反，人们只能从报刊杂志上不完全的、模模糊糊的叙述中作出一些大致的推断。发表与上山下乡运动有关的文章的目的主要是鼓励青年人“下乡”并在农村扎根，所以读这类文章时需要从字里行间寻找其它意思。这类文章充满了让青年们羡慕并竭力仿效的正面模范人物的事迹，城市青年在农村及边疆地区的生活被刻划得具有英雄主义色彩和强烈的政治色彩，出现的问题通常通过艰苦奋斗和政治教育便可

---

\* 在两种报纸上同时出现的内容完全相同的文章只以一篇计。

获解决。然而，这些文章通常也含有能帮助我们了解上山下乡运动进行方式的大量具体信息。

值得指出的是，在分析官方新闻媒介的有效信息时，我们也得益于他们偶然表现出的了不起的坦率。例如，1973年夏，政策制定者们开始关心城市青年在农村生活中所碰到的困难。接着报纸发表了与以前的文章内容不同的文章，这些文章直截了当地详叙了产生这些困难的原因（见第4章）。再例如，报纸还透露了象高级干部们通过各种关系对这场运动的非正常影响这样一类问题。通常，报纸极少提到某些干部试图为他们下乡的子女谋取利益的事，只是介绍那些坚决抵制这类不正之风的事迹。但是在1973年底、1974年初，报纸披露的下乡知青靠走“后门”进入大学的事例突然的多了起来（见第6章）。三年后，毛主席去世，“四人帮”被粉碎，中国的报纸指责这四个人曾企图用公开这类案例的方法，使“中央的领导同志”，其中包括周恩来总理陷入困境。这意味着在互相对立的政治派别中，控制着报纸的那一方也利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数据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不过，谈到“后门”，问题确实存在，对于这种事实本身的真实性并没有争议。因此，尽管这类数据带有明显偏见，除非与其它论据相互矛盾，本书仍将使用这类数据中所包含的信息。

还必须提到，文化革命期间，一些非官方的红卫兵主办的出版物也披露了许多上山下乡运动的消息。这类小报常常谴责一些高级领导人干扰上山下乡运动，并揭露他们在运动中循私舞弊。这些材料对于研究上山下乡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是很有价值的。但这些材料也都受到了官方报刊的否认，认为这些报道夸大了上山下乡运动的阴暗面。到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观考察者们所写的报告对来自于上述新闻媒介的材料作了重要补充。一批批学者参观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察了乡村企业、高等教育以及绿色革命。他们的报告有助于了解上山下乡运动发展的各个方

面。这些参观考察者会见了城市里的官员，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一些不易得到的统计数据资料。他们核实了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非正式渠道的一些信息，例如，具有特殊才能的青年所能得到的脱离农业劳动的机会。他们还考察了农民及下放青年的双亲对这场运动的反应。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就这些参观者的报告的价值而言，因为他们在中国收集材料的活动不可能构成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研究项目所必需的调研机会，所以，它的可信程度是要打折扣的。例如，与城市青年的会见都被限定在特定的政治氛围之内，这种政治氛围要求青年只能表示他们为国家服务，服从党和国家需要的愿望，而不能承认个人的志向和抱负。如果一个青年在事实上违反了这些原则，他（她）就会被认为在接待外宾时“表现不好”。除非在说明他们是怎样抵制个人主义思想对他们的诱惑和腐蚀时，他们才可以批判地暴露个人的志趣和爱好。“表现好”的记录对于个人的前途，如提干、上大学等，是事关重大的。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下，即使得到了一个在农村会见城市下乡青年的典型人物的机会，也不可能得到报纸所刊登的这位典型的事迹之外的任何材料。但是，这也并不说明这样的会见机会就不受欢迎，这种机会常常能提供比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情况更为丰富的图象。

由于不可能进行恰如其分的现场调查研究，对曾是下乡知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采访就成了一个主要的信息来源。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上山下乡运动高潮时期，大量由广州到广东省农村插队的知青逃往香港，具体数字不详，但可以确信，香港警方每查获一个非法移民，那么，就意味着有三个或四个偷渡成功。下放青年只是这些难民中的一类，而且公布的数字也没有将他们单独分类，譬如说与当地的青年农民相区别。据官方统计，1973年有6139名非法移民进入了香港这块殖民地。<sup>11</sup>而从1968年至1973年，广东省的城市青年在这个省插队的有45万人。<sup>12</sup>如果

说非法移民中有半数在城市下乡知青，那么，可以说，仅 1973 年，45 万人中就有 0.7% 的人逃走了。然而，如果我们将 1: 3 或 4 这一因素考虑进去，实际逃走的人数便大大超过了官方的统计，1973 年逃走的知青数，仍以 45 万为基数的话，其比例就将是 2——2.7%。值得注意的是，70 年代查出的非法移民人数呈上升趋势，即：1970 年 1700 人，1971 年 3060 人，1972 年 5100 人，1973 年 6139 人，1974 年 7121 人。„这种不断增加的大量非法移民使本来就困扰着香港的各种社会问题更加严重，因此，1974 年下半年，港英政府制定了将非法移民遣返回中国大陆的政策。„

观察家们一致认为知青逃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原因是留在农村过乡村生活不满。在这个问题上，与其说是出于政治自由的考虑，不如说理想的破灭及找不到远大的个人进取的出路是更主要的因素。„如此大量的逃亡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企图逃亡的人的惩罚通常不严厉。显然，下乡知青的偷渡活动被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反革命罪行来对待。有关资料表明，惩罚的程度依据其偷渡的规模次数而有所不同，第一次偷渡判 1.5 至 3 个月的拘留，然后遣送回原公社。屡犯者会受到更严重的惩罚——几个月的劳动改造。„然而，尽管惩罚轻，但观察家们确信，如果一次偷渡行为被记入了个人档案之中，那么这人就将失去所有发展进取的机会，并且再试一次的机会也会更难得到。\* 如果偷

---

\* 据报道说：对干部、教师、党员或共青团员这类受到重用的人的惩罚要更严重些。同样，来自不同地区的人所受到的惩罚程度也不同：企图偷渡出境的上海青年要判三年徒刑，而对广东青年的惩罚则要宽厚得多，这似乎与中国政府对香港的特别态度有关——在中国政府看来，香港应附属于广东。无论怎样，逃往香港不象逃往苏联那样被认为是叛国，逃往苏联的人将受到严厉惩罚。

渡失败，他们在国内的前途就会有毁灭的危险。此外，偷渡者在遇到边防巡逻队及游向香港时还要冒生命危险。

1971年夏，我会见了11位下过乡的广州青年，在1972年至1973年，我会见了22位这样的青年。这种会见开始每次2至3小时，接着，这类会见被排入日程表，因为它常常超过3至4个小时，有时甚至延续6个星期。这种会见是没有止境的，其主要目的是了解有关上山下乡运动中一些个人的经历，同时也可从这些亲身参加过这场运动的人那里取得一些关于知青生活的环境和条件的具体的数据资料。这些采访对象提供了有关城市里的动员过程中的数据资料，有关乡村生活的情况资料，包括与农民及干部的关系，城市青年所能得到的各种机会等等。总之，他们提供了知青在这场运动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各种数据资料。我的目的是，从确定这场运动所涉及到的范围以及城市青年对运动的反应的角度，结合宣传媒介及参观访问者所提供的材料来评估这些数据资料。

当然，对待采访材料应持谨慎态度，特别是当这些材料超出了个人经历的范围，当被采访者对整个知青群体的期望和态度发表广义的评论时更应当如此。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被采访者就能代表其它更多的人，如在香港的所有知青移民，或整个广东省的下乡知青，更不能代表一个整体的全国的下乡知青。确定合适的采访对象是很难的，因此，我寻找那些在农村呆过较长时间以及那些在作出冒险逃往香港的“选择”之前曾在农村对存在的各种进取机会及可能性作过严肃的努力的人们。我在1972——1973年采访过的那22位下乡知青，他们从下农村到逃往香港，平均在乡下度过了34.4个月，其中最短的7个月，最长的6年。这22人中有几位确实为适应乡村生活而作出过严肃努力，他们在农村呆了4至6年，只是在他们逐渐清楚地意识到了前途渺茫时才离



开中国。\* 这些被采访者与那些下乡插队前在广州就已拿定主意离开中国以及那些刚到农村不久就因“偷渡风”影响而决定外逃的下乡青年形成了对照。还有其它一类情况，即：在下乡到偷渡之间经历了几年的时间，这期间，被采访者或多或少在广州居住过一段时间，或反复试图偷渡，而不是在农村安家并努力使自己适应乡村生活。尽管一些“短期”插队者也提供了一些有关城市青年在乡村的有用的资料，但最有价值的还是那些在农村呆过较长时间并曾尝试过适应乡村生活的青年提供的资料，他们的经历及看法或许更接近中国那些不具有广州这个有着特殊条件影响的地区的城市下乡知青的经历及看法。

这些被采访者的不典型还在于他们大都出生于“成份不好”的家庭，也就是说，他们的家庭有着不利的阶级出身，譬如基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前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划定的资本家、地主或富农等。这意味着这类家庭户主的政治立场是“反动”的。又如“反革命”、“右派”、“坏份子”。据一些被采访者说，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怀疑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是资产阶级的，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也常常被认为出身不好。在1972年——1973年所采访的22人中，10人成份不好，其中包括资本家、反革命（国民党的军官或政府官员）、地主以及知识分子。6人来自于被采访者称之为“一般”的家庭，即象职员及小商贩这样一类既无好处也没什么坏处的家庭。还有6人出身于成份好的家庭，即工人、革命干部（“最好的成份”）以及革命知识分子。

如何对待成份不好的家庭的后代是中国政治中长期以来存有争议的问题。一个基本前提是，受到这类家庭直接影响和教育的

---

\* 这些被采访者中的大部分人是在1970年至1973年初离开中国的。在农村中呆过5或6年的人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前下乡的，曾返回广州呆过1年甚至2年，然后在1968年再返回在农村的所在单位的。

孩子不能自然而然地象出生在工人和贫下中农家庭的孩子一样受到信任并享有同等待遇。原则上，毛的理论坚持认为，人能够通过思想改造和好的表现来改变自己的阶级出身。„对于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来说，“好品行”就意味着拿出“与家庭划清界限”的实际行动。因此，报刊上就出现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范例，这些人获得了干部的职务甚至上大学的机会（见第 5、6 章）。但这类情况确实很少，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里十分强调阶级性及与之相连的政治倾向性。毛泽东思想里蕴含着这样一个原理，即在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阶级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也依然存在。„毛的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实践结果之一就是使那些出身不好的人成了“新的嫌疑者（受怀疑的对象）”，进一步说，就是党的官员对于社会中那些成份不好的人一直很注意，并将促使这些人转变立场作为一个职责。因为在毛看来，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威胁不仅来自于旧的剥削阶级的残余，还来自于在政治上层建筑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或许会变成“特权阶层”，象在苏联曾发生过的那样走资本主义道路。„例如，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高干的后代们为维护其特权而提出了“血统论”，这是划分阶级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新分类法。根据“血统论”，只有出身好的人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毛否定了血统论，因为他注意到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老一辈领袖们的上层阶级的家庭出身。„然而，尽管提倡根据表现来划分其阶级立场，但据被采访者说，事实上决定他们命运的多半还是他们的坏成份而不是他们的品行。对他们的怀疑造成了普遍、系统的歧视，特别在参军、入党、入团时更是如此。文化大革命时期采取的保证工人和农民在大学占据领导地位的方针便是他们处于这种不利情形的象征之一。

对出身不好的人的歧视导致了这些人中的有机会者不顾风险的偷渡。歧视自然影响着他们对这个社会制度的态度，许多被采

访者就对由于父母的过错而惩罚孩子这一不公正的现象表示了不满。成份不好还影响了对乡村生活的适应。在这些被采访者中，成份不好的人打算留在乡村的时间比那些成份一般和成份好的人要短些。”

对这些成份不好的人的采访有助于我们掌握有关他们自身情况的一些材料，但显然，就上山下乡运动的一般情况来说，对他们的这种特殊情形的分析判断应谨慎小心。当然，一般来说，我相信这些被采访者的报告是不带偏见的，他们在谈论他们当年的那些经历时的态度是理智冷静的。

对在香港的出逃知青的采访材料也得到了中国新闻媒介的验证。总的来说，这些被采访者提供的一切情况都以这样或那样、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通过中国的新闻媒介得到了进一步证实，例如，被采访者对乡村的生活条件的困难作了描述，他们描述的比新闻媒介报道的一般还要困难些，但和 1973 年夏一个帮助知青解决在落户过程中碰到的困难的运动兴起时所透露的一些情况相似（见第 4 章）。被采访者提供的几个实例中所提供的数据甚至比新闻媒介的一些有关知青下乡的报道更具正面意义。他们说，国家给每位下乡知青拨了一笔钱作为他们在农村落户的费用，而新闻媒介却几乎从不提及这一重要情况。”另一个例子涉及到红卫兵小报所载的揭露农村中腐化情况的报道，几个在文化大革命前下过乡的被采访者说，这些关于城市青年在农村受到地方当权人士迫害的报道是夸张的。”另一方面，他们也进一步证实了红卫兵报纸的判断，即：知青父母的工作单位有时也起到了推动上山下乡运动的作用。”或许报纸广播的报道和会见采访所获信息之间最大差异是关于知青进入领导层方面的情况。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第 5 章中所看到的那样，报纸报道了大量有关城市知青在农村的基层领导岗位上起积极、正面作用的事例。被采访者不知道这些情况，相反，他们强调了和农民相处的困难性。这些知青提

供的能够获得的任何一种通过征招离开农村的机会也比报纸报道的要少得多，不论是他们本身的情况还是他们所知道的农村中其他知青的情况都是如此。毫无疑问，阶级出身在这里起了作用，而且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大量的招工、征兵、提干、上大学的机会到来之前就离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报纸和被采访者提到同样的事实时，其内涵也有不同，知青和农民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报上很可能会刊登一篇文章，报道一位城里下乡的青年步行数里到附近的镇子上去为一位生病的农民买药的事迹，当然，这位农民不会是任何一个农民，而一定是贫下中农。我们通过读这样的文章可了解到，这青年的先进事迹为青年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人民服务作出了表率。一个读了类似文章的被采访者解释这类事时却说，想要搞好同农民的私人关系，就必然会对农民施以小恩小惠。报纸在报道这类事迹时赞扬了其政治意义，而被采访者则认为知青干这类事与政治无关，它反映了在表面上试图与农民搞好关系的重重困难，这些困难是处于农民社会中的知青们所熟悉的。当然，在这一点上，也不能夸大报纸报道和被采访者之间看法的差别。报纸所报道的大量事迹中也涉及到一些考虑个人利益及不关心政治这样的情况，尽管它们是作为批判和要抛弃的东西提出来的，但这类事实总是使人能将报纸的报道与被采访者的报告联系起来，让人更加相信这些知青所说的话的合理性。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资料来源是不完全的，错误的材料及错误的判断也一定会存在。

## 2. 定义和数据——寻求 一般性结论的桥梁

为了展开以下各章，我们有必要更详细地讨论“上山下乡”运

动中的统计数据。然而，由于已公布的统计数据的覆盖面不全面，也由于对人口的分类总是比较含糊，所以很难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统计数据进行准确的勾画。<sup>„</sup>我们所讨论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是指初、高中毕业生下农村，而在文化大革命前，上山下乡还包括将年满 16 岁、没能继续上普通中学或职业学校又找不到工作的小学毕业生送到农村去。文化大革命以来，随着初级中学在城市的普及，很少听说小学毕业生上山下乡的事了。<sup>\*</sup>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即使没被国家按分配制度吸收为干部，一般也不列入城市下乡知青一类。不过，在 1968 年和 1969 年，当城市中学不能继续因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停止的正常的学校教育并将学生送往农村时，许多大学生也和中学生一样在国家的分配制度之外被送到了农村。极有可能这些大学生中的一些人也被列入了城市下乡知青的统计数据之中，更近些，特别是 1975 年以来，大学毕业生也有作为普通农民被送往农村的，但没办法弄清他们的态度是否和其它城市下乡知青一样，也不清楚他们是否包括在了下乡知青的统计数据内。<sup>„</sup>还有一些类型的城里人也曾在农村插队，特别是大跃进时期是如此，不过其它时期也有这样的情况。例如，在安徽，1968 年至 1973 年有 40 万城市青年下

---

\* 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学水平以下的学制包括小学六年，初中和高中各三年。另外，还有区别于初、高中体系的一套中等职业学校和技术学校的制度。保证儿童在 7 岁时开始受小学教育，他（她）就将在 15 岁时初中毕业，18 岁高中毕业。文化大革命以来，学制被缩短了，但这种缩短了的学制被认为是国家所作的一种试验且极不稳定。一些地方建立了一种初、高中合为 4 年的中学，另一些地方则保留了旧的分初、高中的形式。中等教育要用 5 年甚至 6 年时间。文化大革命以来所作的一项重要努力就是使中等学校的全部课程更加职业化，但另外的一套技术学校制度仍然继续存在。小学的学制一般被缩短成了 5 年。（见第 2 章）

乡，但同时也有 60 万干部、医务人员和城市居民下乡。”在大批下放城里人的时期，统计报告往往将这些类型的人相提并论，所以城市下乡青年并不总是能被清楚的区别开来。”

最易混淆而又最重要的是城市知青和回乡知青的区别。“受过教育的”或“知识青年”这样的术语既用来指家在城市并在城里上过学的青年，又用来指来自于农民家庭、离开所居住的村庄到公社的中心集镇或县城读书后毕业回到家乡的青年。报纸为了表达得更精确，用“下乡知识青年”这样的术语来特指城市青年，用“回乡知识青年”来指受过教育的农民青年。这两类青年的区分之所以重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回乡知青返回农村后，在生活方面也有一个重新适应的问题，但这一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他们本以为受了教育就应在政府部门获得职位而没想到又回到了乡村。城市青年则不同，他们在乡村落户既得不到家庭的资助，在农村也没有其它的社会关系可以依靠，因此更为艰难。确实，中国的有关领导人也逐渐注意到了这一区别，因此允许城市青年到他们确有亲戚的地方插队落户（见第 3 章）。

区别回乡和下乡知青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准确运用上山下乡运动的统计数据。例如，1957 年曾有一篇题为“两百多万中小学毕业生奔赴农村”的文章。<sup>\*</sup>表面读来，这都是指城里人，但仔细研究就会清楚，尽管有一些城市青年，但二百万中的大部分是回乡农村青年。”从 1963 年到 1965 年，各报发表的文章宣称有 4000 万知青去了农村，但我们不难弄清，这是一个完全无用的统计数据。因为这个数字实质上包括了农村中每一个曾经上过学的人，包括农民青年，在农村服务的大学毕业生和下乡知青。”

---

<sup>\*</sup> 统计数据前的“将近”、“超过”、“大大超过”这样一些修饰词带有典型性，只是由于难以用数字将这类词的涵义表达出来，故在绝大部分表格中，这些词被省略了。

不过，4000 万这一数字也有助于我们对主题的辅助性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至少在一些报道中，报纸也没有清楚区分这两类下乡青年。1973 年一则来自陕西的报道指出，在这个省插队的知识青年有将近 100 万。然而，一年后，《人民日报》的一则报道指出，从陕西城镇到本省农村插队的知青是 16 万人。陕西不大可能接受 80 多万外省的城市青年到本省插队。确切地说，是有一些其它省市的青年到陕西插队，如北京就有 26,000 名城市青年到延安插队落户。战争时期，延安是毛泽东的指挥部所在地，延安是具有伟大的象征意义的重要地方。但没有关于其它城市也送了大量知青到陕西的报道。所以，100 万这个数字可能包括了回乡的农民青年。”

如前所述，回乡知青比下乡知青要多得多。例如，至 1962 年，已有 11 万农村青年回到了他们的家乡——属北京市政府管辖的一些县的乡村里，但只有 3000 名青年从北京城下放到了这些地区。”表 2 显示了到农村去的城市青年和回乡青年在数字上的区别。

表 2 下乡知青和回乡青年的比较\*

省 份	统计日期	下乡知青人数	回乡知青人数
甘 肃	1973 年 12 月	66,000	270,000
河 南	1975 年 1 月	360,000	5,000,000
福 建	1975 年 12 月	240,000	1,000,000

\*资料来源：兰州广播电台1973年12月22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12月27日第249期；郑州广播电台1975年1月15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1月16日第11期；福建广播电台1975年12月23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6年1月6日第3期。象500万这样一个关于乡村受教育者的统计数据是不准确的。



1975年12月发表的两个统计数字为我们比较文化大革命前后上山下乡运动的规模提供了方便：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10年内有120万城市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紧接着那次动荡后的7年内，也就是从1968年到1975年末，有10倍多，或者说是1200万青年被送到了农村。<sup>①</sup>据文化大革命前的统计数据，似乎绝大多数城市青年都是在大跃进之后，从1962年起被送往农村的，在那以前只见到极少的关于城市青年到农村去的单独的报道。例如，1960年一则来自辽宁沈阳的消息报道了有1万名来自工厂的青年准备离开工厂奔赴农村。<sup>②</sup>1966年9月，有报道说：“1962年以来，有100多万决心走革命化道路、成为劳动者的中国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生活和工作。”<sup>③</sup>这些年份的不完全的统计数字显示了1964年到1965年间上山下乡运动的蓬勃展开（见表3）。

也有必要验证关于文化大革命以来有1200万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报道。中国的报道通常以1968年12月23日毛泽东主席发表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号召的那一天作为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的标志。这是否意味着不包括1968年夏季和秋季下乡的那数万名青年呢？<sup>④</sup>应该是包括了他们，但又不能肯定。同

表3 1962年——1965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规模\*

时 期	上山下乡的人数
1.1962年春至1964年初	292,000
2.1964年	300,000 — 400,000
3.1965年元月至8月	250,000

\*资料来源：1.1964年3月22日《工人日报》。2.1965年2月19日《人民日报》；1965年2月19日香港《大公报》。3.1965年9月25日《人民日报》。

样，文化大革命前下乡的那120万城市青年是否也包括在以文化大革命为标志的统计数字内呢？1968年以来许多报纸报道了1966年以前城市青年下乡的情况，但有一些省的统计数字很明显将1966年以前的下乡知青也包括在了目前下乡知青的统计总数之中。<sup>20</sup>因此，看来并不能单独列出一个1966年以前下乡知青的人数来，但同样不能肯定的且更重要的是，这1200万中包括还是除掉了那些陆续回城参加了工作的下乡青年呢？报纸和被采访者一致认为相当一部分下乡青年返城参加了工作；也有人不肯肯定地估计说或许有1/4的城市青年返回了城镇（见第6章）。如果这些返城的知青不包括在那1200万内，那么，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人的总数就要多得多；而如果这些人包括在内，那1975年在农村的下乡知青的实际数量就要少得多。

得到1200万这个统计数字的一个方法是将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省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统计数字加起来，表4就是试图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29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数字分列相加的结果。这里包括了北京、上海、天津这三个主要城市，这三个城市所辖的乡村地区都有知青插队落户。然而，由于缺少5个省级单位的数据，这就影响了这份知青数据统计表的价值。（见表4）

这个表虽不能说是很准确，但1230万这个总数与国家在1975年12月公布的1200万这个数字基本相符。不过，24个省的材料只有15个省是在1975年这一年发表的，其余的都是在1973年、1974年或1976年发表的，而上山下乡运动是在1974年和1975年迅猛发展的（见表7），故1975年前的报道不可能反应出这一年下乡的知青数，所以表4中的总数实际上应低于1200万，特别是还缺少5个省级单位的数据。另一方面，1976年报道的统计数据中涉及的这一年下乡的城市青年也不会包括在那1200万之内，所以这份表格并没有反映出上山下乡运动的真实规模。但尽管如此，它也确实透露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

表4 下乡知青分省统计表\*

(A) 省 份	(B) 报告日期	(C) 在该省 的下乡 知青数	(D) 来自省 内的下 乡知青	(E) 来自省 外的下 乡知青	(F) 省外下 乡知青 的原籍
东北地区					
1.黑龙江	1974 年 12 月	1,200,000	710,000	490,000	北京、天津 上海、杭州 上 海
2.吉 林	1975 年 12 月	800,000	缺	缺	
3.辽 宁	1975 年 8 月	1,240,000	1,240,000	无	

\* 资料来源及注释:

1. 1973年12月21日哈尔滨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1月4日第3期,哈尔滨广播电台1974年12月21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12月24日第248期。
2. 1975年12月27日成都人民广播电台消息,《世界广播综览——远东篇》1976年1月10日第5104期。
3. 1974年12月23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12月26日第249期;1975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后者报道1975年有24万毕业生到农村插队落户。
4. 1975年12月29日石家庄广播电台消息,《世界广播综览——远东篇》1976年1月10日第5104期,10多年来,也就是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以来有4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5.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1975年9月15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9月29日第189期,为C栏提供了信息来源,北京新华社早在两年前一1973年7月20日就报道了E栏的内容。
6. 关于北京下乡知青总数的报道见下表5,但没有透露这其中有多少人在北京郊县插队。
7. 1976年6月22日《人民日报》。

下乡知青分省统计表续表\*

(A) 省 份	(B) 报告日期	(C) 在该省 的下乡 知青数	(D) 来自省 内的下 乡知青	(E) 来自省 外的下 乡知青	(F) 省外下 乡知青 的原籍
华北地区					
4.河 北	1975 年 12 月	400,000	缺	缺	北京、天津 北京、天津 上海、南京 浙 江
5.内 蒙	1975 年 9 月	210,000	缺	110,000 <sup>+</sup>	
6.北京(9 县)		缺	缺	缺	
7.山 西	1976 年 6 月	230,000	缺	50,000	
8.天津(5 县)		缺	缺	缺	北京、天津

\* 8. 1973年以来，天津管辖了以前属于河北的5个县，因此，表中一些列入了河北的下乡知青或许事实上是在天津的辖区内。

9. 1975年10月28日合肥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11月4日第213期。

10. 杭州广播电台1973年12月23日消息，1973年10月30日，根据报道，浙江省城镇下乡知青的总数是438,000人，其中80,000下到了省外的指定地区。

11. 1973年12月23日福州人民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6年1月6日第3期。

12. 1973年12月21日南昌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12月27日第249期。

13. 1975年3月6日南京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3月7日第46期。另据1973年4月5日南京广播电台消息，《世界广播综览——远东篇》1973年4月10日第4267期，在1973年4月，江苏已有100万青年上山下乡，没有因指定下乡地点而出现障碍。

下乡知青分省统计续表 \*

(A) 省 份	(B) 报告日期	(C) 在该省 的下乡 知青数	(D) 来自省 内的下 乡知青	(E) 来自省 外的下 乡知青	(F) 省外下 乡知青 的原籍
华东地区					
9.安 徽	1975 年 10 月	500,000	缺	缺	上 海
10.浙 江	1973 年 12 月	358,000	358,000	无	
11.福 建	1975 年 12 月	240,000	240,000	无	
12.江 西	1973 年 12 月	430,000	缺	缺	上 海
13.江 苏	1975 年 3 月	500,000	500,000	无	
14.上海(10 县)	1973 年 12 月	400,000	400,000	无	
15.山 东	1976 年 6 月	300,000	300,000	无	

- \* 14. 上海的下乡知青有100万左右，其中400,000在上海郊县插队。  
1973 年 12 月 21 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  
1973 年 12 月 28 日第 250 期。1974 年 5 月 4 日《人民日报》。
15. 1976 年 6 月 22 日《人民日报》。
16. 1975 年 4 月 10 日《人民日报》。
17. 1975 年 5 月 7 日长沙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 年 5 月 9 日第 91 期。
18. 1973 年 5 月 11 日武汉广播电台消息，《世界广播综览——远东篇》1973 年 5 月 17 日第 4297 期；1974 年 7 月 29 日武汉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 年 7 月 31 日第 148 期。第一则消息说，文化大革命以来，有 60 万青年上山下乡，第二则消息说 1974 年全年将有 21 万青年上山下乡。
19. 1975 年 12 月 21 日南宁广播电台消息，《世界广播综览——远东篇》1975 年 12 月 30 日第 5095 期。

下乡知青分省统计续表\*

(A) 省 份	(B) 报告日期	(C) 在该省 的下乡 知青数	(D) 来自省 内的下 乡知青	(E) 来自省 外的下 乡知青	(F) 省外下 乡知青 的原籍
中南地区					
16.河 南	1975 年 4 月	360,000	360,000	无	上 海
17.湖 南	1975 年 5 月	450,000	450,000	无	
18.湖 北	1974 年下半年	810,000	810,000	无	
19.广 西	1975 年 12 月	334,000	缺	缺	
20.广 东	1975 年 12 月	700,000	700,000	无	

\* 20. 1975年12月20日广州广播电台消息,《世界广播综览——远东篇》1975年12月30日第5095期。

21. 没有全面的数据。

22. 1975年11月15日成都人民广播电台,《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11月20日第225期。

23. 1976年7月8日新华社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6年7月8日第132期。

24. 1975年2月11日《光明日报》。

25. 1975年2月17日兰州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2月21日第36期。

26. 1976年2月5日《人民日报》。

27. C栏的依据是1975年12月2日的《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该文特别谈到了近11年来,也就是包括文化大革命前一段时间在内的在本区内或区外下乡的城市青年数。E栏的资料来源是1975年5月9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报道,《世界广播综览——远东篇》1973年5月23日第4302。这篇报道谈到了在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的城市知青。1976年3月12日第19期《北京周报》第3页有一则报道谈到了有45万城市青年。

下乡知青分省统计续表 \*

(A) 省 份	(B) 报告日期	(C) 在该省 的下乡 知青数	(D) 来自省 内的下 乡知青	(E) 来自省 外的下 乡知青	(F) 省外下 乡知青 的原籍
西南地区					
21.贵 州		缺	缺	缺	上 海
22.四 川	1975 年 11 月	1,200,000	1,200,000	无	
23.云 南	1976 年 7 月	800,000	500,000	300,000	上海 北京 成都 重庆
24.西 藏	1975 年 2 月	500	500	无	上 海
西北地区					
25.甘 肃	1975 年 2 月	100,000	缺	缺	天津 上海
26.陕 西	1976 年 2 月	330,000	缺	26,000 <sup>+</sup>	北京 南京
27.新 疆	1975 年 12 月	450,000	缺	100,000 <sup>+</sup>	上海 浙江 武汉 天津
28.青 海		缺	缺	缺	
29.宁 夏		缺	缺	缺	浙 江
C 栏 总 计 数:			12,342,500		

\* 28. 29.没有得到全面数据。

F 栏的资料来自于以上各消息来源及以下各报刊及电台报道:

关于上海下乡知青: 1971 年 12 月 23 日《人民日报》; 1974 年 12 月 9 日兰州人民广播电台消息, 1976 年 3 月 30 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 年 12 月 23 日第 241 期, 1976 年 4 月 1 日第 64 期。

关于天津下乡知青: 1969 年 5 月 6 日《光明日报》; 1975 年 7 月 24 日乌鲁木齐广播电台消息, 1975 年 6 月 20 日兰州人民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 年 7 月 28 日第 145 期, 1975 年 6 月 24 日第 124 期。

关于武汉下乡知青: 1973 年 5 月 9 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 年 5 月 14 日第 93 期。



如，这份表格表明，大部分下乡青年都下放在家乡所在的本省内，但 8 个主要城市——上海、北京、天津、杭州、南京、武汉、成都和重庆的知识青年则可被下放到省外。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许是大部分都被送到了边远省份，如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和云南。

掌握上山下乡运动统计数据的一个办法是核查城镇中下乡知青所占该城市青年总数的比例情况。因为缺乏相关年龄组的数据，故也难以作出精确的计算。对许多城市，甚至缺乏最一般的人口统计数据。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实行的是大都市政府管理体制，即，这些大城市管辖着一些农村地区。例如，大城市上海有 1060 万人口，其中 560 万居住在城市里，另外 500 万居住在隶属上海市的 10 个郊县，这些县里也有小城镇，居住着城市人口。1974 年统计，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市有 100 万青年上山下乡，其中 40 万下到了这 10 个郊县，60 万下到了其它的省份。表 5 列出了 16 个城市的数据，试图尽可能地将一个城市的青年总数（D 栏）从这个城市的人口总数（F 栏）中区分出来。这样我们就能得到城市下乡青年在城市人口总数中的两个百分比，但两个百分比中第一个似乎更有意义些。（见表 5）

这份表格显示出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各地到农村去的青年占该地城市青年人数的百分比有很大差距。在 E 栏，这一差距是从天津的 3.5% 到上海的 17.8%。D 栏中，有 13 个城市共送了 2,396,000 城市青年下乡，这个数字是这些城市人口总数 21,514,000 的 11%。这 13 个城市的数据为评估全国城市上山下乡运动的规模提供了基础。如果我们接受利奥·奥林斯的判断，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城市人口是 125,000,000 人，减去那 13 个城市的 21,514,000 人，即是 103,486,000，同样按 11% 计算，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除去那 13 个城市之外的中国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是 11,486,046 人，加上那 13 个城市的 2,390,000

表5 下乡知青所占城市人口比例表\*

A	B	C	D	E	F	G
城 市	报道的 日 期	知 青 人 数	城市育 人口数	C与D 的百 分 比	含郊县 的城市 人口数	D与F 的百 分 比
1.上海	1974.5	1,000,000	5,600,000	17.9	10,600,000	9.4
2.北京	1973.1	300,000	4,000,000	7.5	7,000,000	4.3
3.天津	1973.4	250,000	缺		4,000,000	6.3
4.武汉	1974.7	230,000	1,900,000	12.1	2,500,000	9.2
5.重庆	1974.4	370,000	缺		6,000,000	6.2
6.成都						
7.广州	1974.3	200,000	2,200,000	9.1	3,000,000	6.7
8.大连*	1973.夏	130,000	1,100,000	11.8	4,200,00	3.1

\*资料来源: C栏: (1)1974年5月4日《人民日报》。(2)1973年1月26日《北京周报》第4页。(3)1973年4月19日《人民日报》。(4)1974年7月11日武汉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7月12日第135期。(5)(6)1974年4月21日《人民日报》。(7)1974年3月26日《人民日报》。(8)罗斯·特里尔:《铁树开花》第121页。(9)1973年4月10日哈尔滨广播电台消息,《全球广播综览——远东篇》1973年5月1日第4283期。(10)1974年4月21日《人民日报》。(11)1975年12月29日杭州广播电台消息,《全球广播综览——远东篇》1976年1月10日第5104期。(12)1974年7月6日福州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7月8日第131期。(13)南宁广播电台消息1973年4月6日消息,《世界广播综览——远东篇》1973年4月12日第4269期。(14)1974年8月16日济南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8月19日第164期。(15)1974年1月17日呼和浩特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1月25日第18期。(16)北京人民广播电台1974年7月6日消息,《国外

下乡知青所占城市人口比例表续表\*

A 城 市	B 报道的 日 期	C 知 青 人 数	D 城市青 人口数	E C与D 的百 分 比	F 含郊县 的城市 人口数	G D与F 的百 分 比
9.哈尔滨	1973.4	127,000	1,552,000	8.2	缺	
10.南京	1974.4	120,000	1,700,000	7.1	3,000,000	4.0
11.杭州	1975.12	120,000	900,000	13.3	缺	
12.福州	1974.7	60,000	800,000	7.5	缺	
13.南宁	1973.4	30,000	400,000	7.5	缺	
14.济南	1974.8	30,000	862,000	3.5	缺	
15.呼和 浩特	1974.1	29,000	300,000	9.7	缺	
16.厦门	1974.7	20,000	200,000	10.1	缺	
总 计		2,396,200*	21,514,000			

\* 广播信息社》1974年7月18日第139期。

D 栏和 F 栏: (1)哈伦·克利夫兰《中国日记》第 45 页; (2)约克大学伯纳德·M·佛罗利克教授; (3)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简介——天津》1975 年 7 月; (4)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简介——武汉》, 1975 年 7 月; 特里尔的著作第 235 页说 1973 年武汉市的人口是 270 万; (5)(6)1973 年《中共年报》[中国共产主义年鉴 1973](台北、中共年报摘选, 1973), 第 192 页; (7)美中央情报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简介——广州》1975 年 7 月; (8)特里尔著作第 121 页; (9)《中共年报》1973 年第 192 页; (10)1975 年 11 月世界事务代表团; (11)特里尔著作第 157 页; (12)(13)(14)(15)(16)1973 年《中共年报》; 不清楚这些城市及哈尔滨的统计数字是否将乡村人口也包括在了人口总数之中。

\* 包括旅顺市在内。

△ 因为D栏的数据有丢失, 故天津、重庆和成都三市的数据空缺。

人，其城市下乡知青的总人数应为 13,883,146 人。由于从 1973 年至 1974 年报道的下乡知青的总数应该低于而不是高于 12,000,000，那么这样一个计算结果可以简单地归于统计数字的出错和失真。但同时，这也意味着漏掉的下乡知识青年数是极少的。

表 6 文化大革命以来下乡知青人数分期统计情况 \*

报 告 日 期	知 青 人 数
1. 1970 年 5 月	5,000,000
2. 1973 年 3 月	7,000,000
3. 1973 年 12 月	8,000,000
4. 1975 年元月	10,000,000
5. 1975 年 12 月	12,000,000

\* 资料索引:

1. 1970年5月3日新华社消息 (1975年5月13日《中国大陆新闻综述》称，自 1968 年下半年以来到农村插队的中学毕业生是文化大革命前 5 年间下乡的中学生的 5 倍，而 1962——1966 年下乡的人数“大大超过一百万”，即使不考虑“大大超过”这一因素，该年下乡知青数字以 5 倍计也达到了 500 万。
2. 1973年3月4日合肥广播电台消息，《世界广播综览——远东篇》1973 年 3 月 13 日第 4243 期，这篇报道说，“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已有“多于”700 万的青年下乡。
3. 1973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说，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已有“多于”800 万的青年下乡。
4. 1975年1月18日新华社消息说“几乎”有1000万青年下乡，《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 年 1 月 21 日第 14 期。
5. 1975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表 7 全国分年度下乡知青数一览表 \*

年 度	公开宣布的数字	推算出来的数字	总 数
1968 年		1,725,000	
1969 年	270,000		1,725,000
1970 年		头 4 个月 575,000 后 8 个月 492,000	2,700,000  1,067,000
1971 年		738,000	738,000
1972 年	头 8 个月 400,000	后 4 个月 246,000	646,000
1973 年		头 2 个月 123,000 后 10 个月 1,000,000	1,123,000
1974 年	头 4 个月 400,000	后 8 个月 1,600,000	2,000,000
1975 年	2,000,000		2,000,000
总 计			11,999,000

\* 资料来源及注释: 1. 公开宣布的数字:

1969 年: 1975 年 12 月 23 日《人民日报》。

1972 年: 1972 年 9 月 10 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2 年 9 月 13 日第 179 期。

1974 年: 1974 年 5 月 10 日《北京周报》第 19 期; 1974 年 5 月 5 日《光明日报》。

1975 年: 1975 年 12 月 23 日《人民日报》。(接下页注)

从1968年到1975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迭起，每年都有大约150万青年下乡。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后期上山下乡人数众多，而1971年和1972年上山下乡的人数则少一些。上山下乡的重新兴起波澜是在1973年，迅猛发展是在1974年和1975年。表6显示了不同时期知青上山下乡的情况，表7显示了1968年至1975年间每年度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状况。根据1976年9月份发表的一份谈到有140万知青于该年度下乡的报告分析，1976年与1975年的高潮其相比，上山下乡运动显然受到了控制。”

本节展示的各类统计数据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只有很少一些主要城市将青年人送到本省以外的农村插队落户？怎样解释各城市间上山下乡人数的明显差距？为什么这场运动的高潮期变化这样大？下一章里我们要探讨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各种因素或许有助于我们分析和回答这些问题。

## 2. 推算出来的数字：

- a. 1968年的数据和1970年头4个月的数字取自表6第1行。该行中500万减去1969年的270万，剩下的230万知青应该是在1968年的12个月内和1970年的头4个月中下乡的，或每月下乡了143750人，由此便得出了总数。
- b. 1973年后10个月和1974年后8个月的数字取自表6第2、3、4行。
- c. 将已公开发表的全部数据和以上a、b各部分的数据相加，得出的数字是1040万，若用下乡知青总人数1200万减去1040万，剩下的160万应与1970年后8个月下乡的人数、1971年全年的下乡人数、1972年后4个月以及1973年头2个月的下乡人数，也就是总共26个月的下乡人数相等。这样，160万由26个月来分，每月就是61539人。这些数字毫无疑问是不精确的，例如，1975年12月有报道说：“今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比往年任何一年的人数都多。”因此，1974年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似乎就应该少于200万这个数字。

## 注释

- 1 参见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2——59页，耶鲁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
- 2 同上。第47——48、54——59页。
- 3 陈毕潮（音译）：《城市人口过剩，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以及农村改革的政策方针》，载《比较政治学》第3期（1972年4月）。
- 4 俄国和日本的政府也都曾这样做过，参见西里尔·B·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第214——216页。《比较研究》，纽约自由出版社，1975年版。
- 5 可参见查尔斯·P·里德利：《共产主义中国里模范公民的形成》第195页，斯坦福，胡佛协会出版社，1971年版。
- 6 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第215页。
- 7 “1200万中学毕业生在农村落户”见1976年1月9日的《北京周报》第19期第11——13页。
- 8 参见利奥·奥林斯：《每五个孩子中的一个》第70页，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
- 9 参见1975年5月12日《人民日报》。
- 10 太原广播电台1973年4月22日消息，《世界广播综览——远东篇》第4283期，1973年5月1日。
- 11 舒闻：《坚持毛主席指引的青年运动的革命方向》，《光明日报》1972年5月4日。
- 12 大卫·阿普特：《选择和分配的政治性》第37页，耶鲁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
- 13 河南人民广播电台1973年3月10日消息，载《国外广播信息社》第50期，1973年3月14日；亦可参见约翰·W·刘易斯：《中国城市发展中流动状况的政治因素》，载《美国政治科学周报》第4期（1966年12月）。
- 14 尼古拉斯·R·拉蒂：《中国的计划经济及收入分配状况》第4——6页，载《当代背景》14第11期，（1976年11月）。



- 15 马丁·K·怀特：《中国的不平等及等级制度》第68——89页。载《中国季刊》第64期（1975年12月）。
- 16 威廉·L·巴瑞席爵士：《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农民家庭》。载《亚洲研究》第3期（1975年5月）。
- 17 大卫·M·兰普敦：《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其实行状况》。
- 18 见H·原田：《中国的人口战》，哥伦比亚俄亥俄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93页。谈到城乡消费问题时所提供的数据。这些数据显示出了五十年代时极大的城乡差别。自那以后，情况有所改进，但差别依然存在。还可参见杰克·陈：《幸运的一年》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73年版第50——52页。
- 19 这一观点是我在香港会见被采访者时得来的，本章的下一节将讨论这个观点的来源。
- 2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1968年12月24日消息，《世界广播综览——远东篇》第2960期，1968年12月30日。
- 21 可参见史林的文章《坚持青年同工农相结合的正确路线》，载《红旗》1975年第12期第29页。
- 22 见齐格蒙特·鲍曼：《第二代社会主义》，纽约，约翰·威利出版公司1972年版。
- 23 埃兹拉·F·沃格尔：《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第193页。纽约，哈珀火炬丛书1971年版。
- 24 约翰·加德纳：《知识青年和城乡差别1958——1966》第265——267页。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
- 25 泰德·R·盖尔在《为什么人会反抗》（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一书第二章分析了这些观念。
- 26 新华社1957年8月5日消息：“汉阳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反革命集团怂恿学生罢课”。载《中国大陆新闻综述》第1589期，1957年8月12日。
- 27 参见米切尔·奥克森伯格《中国社会中的职业分类和文化大革命》一书中有关学生的章节第14——23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
- 28 1968年毛泽东第一次用了这个词，参见以下第2章。

- 29 参见1976年5月4日《人民日报》。
- 30 参见艾米泰·埃茨歇尼：《积极的社会》纽约，自由出版社1968年版第14章“权力、异化和社会目标”。
- 31 埃兹拉·F·沃格尔：《志愿主义和社会控制》是对这一问题的最佳阐述。载唐纳德·W·特雷得戈尔德编辑《论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共同点和不同点》，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 32 陈：《全面都市化》第377—378页。载《比较政治学》第3期（1972年4月）。
- 33 参见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74—75页；查尔斯·海福特1972年元月27日在歌伦比亚大学召开的“现代东亚：中国问题”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农村的再建设运动》及詹姆斯·C·托马森：《当中国面对西方时》第48—50页。
- 34 马克·赛尔登：《延安精神》第121—130页。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
- 35 莫里斯·迈斯纳《毛主义中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主题》第240页。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
- 36 理查德·罗文撒尔：《发展与共产主义方针政策中的乌托邦》第50—51页。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
- 37 香港的美国总领事馆出版了一套《中国大陆报刊综览——增刊》，这套资料收集翻译了各省报刊的一些文章。
- 38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1976年11月16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226期，1976年11月22日。
- 39 已发表的参加者的报告中的两个例子可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厂研究》及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文化大革命前后》，《中国季刊》1975年4、5月号。
- 40 德里克·戴维斯：《歌剧二重唱》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载1973年5月7日《远东经济周报》第18期。
- 41 《纽约时代周刊》1974年12月1日，第3页。
- 42 广东人民广播电台1973年5月3日报道，《世界广播综览——远东篇》第4304

期。1973年5月25日。

- 43 1972年12月13日的《南华早报》(香港)报道了1972年的数据,但只限于这一年的头11个月,12月份的流动售货员数剧减。因此,“早报”报道的数字基本符合这一年的情况。1970年和1971年的数据也取自于“早报”。1973年和1974年的数据见《纽约时代周刊》,1974年12月1日第3页。
- 44 1974年12月1日《纽约时代周刊》第3页。
- 45 参见约瑟夫·列里文德:《大跃进》,1974年7月28日《纽约时代周刊》。
- 46 被采访者有时将这种惩罚称为“劳改”(“劳动改造”的简称)。但叛逃未遂的人受到的惩罚显然要轻一些。这种形式被称为“劳动教养”。
- 47 在香港时,我也曾会见过一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住过一段时间的退休干部、教师和华侨。1975年夏,我以前的助手会见过4位刚从大陆逃来香港的人。另外,我还有机会阅读了其他研究人员采集的这方面的资料,特别是约克大学的伯纳德·M·弗罗里克教授的资料。不过,除了那些已经标明了是引用他人采访的资料之外,文中所指的被采访者提供的参考资料都是我自己采访所得。
- 48 作为一般分析,可参见理查德·克鲁斯:《解放后中国阶级观念的变化》,取自于未公开发表的文章。
- 49 见多克·巴尼特:《毛以后的中国》中《论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对全世界的历史教训》。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 50 同上;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 51 毛泽东:《1966年10月24日在大会上的讲话》,载斯图尔特·施拉姆:《毛主席对人民的谈话》第268页。纽约《潘西伦丛书》1974年版。
- 52 我1972—1973年会见的10位出身不好的知青中有6位在农村呆了两年或者不到两年;6位出身好的知青中有4位在农村呆了两年以上的时间;另有6位出身既不好也不坏的知青也呆了两年以上。
- 53 1973年以前总数是230元。1973年间据报道增加到了480元。参见第4章。1元人民币等于0.55美元。
- 54 不过,一位被采访者在回忆红卫兵报纸所刊载过的一些往事时,确实描述了她所在的国营农场的干部腐化堕落的一些情况。

- 55 广州《支农红旗》1967年11月1日第3期。载《联合出版物研究处》第44052期。1968年1月17日；《共产主义中国译文选：政治和社会》第436页。
- 56 1972年11月2日《光明日报》。
- 57 关于中国统计数据的讨论。见利奥·A·奥林斯：《中国的统计数字：不切实际的梦幻》。载1974年5月出版《美国统计学家》第2期。
- 58 参见1976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及本书第6章。
- 59 1973年3月4日合肥广播电台消息，《世界广播综览——远东篇》第4243期，1973年3月13日。
- 60 1968年12月22日南昌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国外广播信息社》第2期。1969年1月3日。有60万干部、教师、医务工作者和城市居民最近去了农村。
- 61 1957年9月22日《光明日报》。
- 62 见1963年12月10日香港《文汇报》，1964年8月28日香港《大公报》及1965年12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
- 63 加德纳：《知识青年和城乡差别》第268页。
- 64 西安广播电台1973年4月29日报道，《世界广播综览——远东篇》第4286期，1973年5月4日。另见1974年4月24日人民日报。还可参见表4。同样，甘肃的一条广播消息报道有30万知识青年去了农村，后来有一条消息表明，事实上其中大部分是回乡青年。兰州广播电台1973年5月3日消息，《世界广播综览——远东篇》第4290期。1973年5月9日；兰州广播电台1973年12月22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249期，1973年12月27日。
- 65 1963年4月25日《北京日报》社论。
- 66 参见注7。
- 67 1960年10月27日《辽宁日报》。
- 68 新华社北京1966年9月27日电。
- 69 1968年10月中旬至12月中旬，广东省有9万2千名青年下乡。参见1969年1月18日《南方日报》。
- 70 1975年12月2日《人民日报》有关新疆下乡知青的报道。

## 第二章 为什么要下乡

送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决策是解决三个特殊性问题的一项措施。第一是城市的失业状况的存在及失业率的增长。第二是那些中学毕业后既不能继续升学又不能从事白领工作的城市知识青年的安置困难。第三个是乡村建设发展的需要。我们需要从这每一个问题本身来探讨上山下乡的合理性，这样，才能对复杂的、具有多重目的的上山下乡政策的制定作出一个准确的评价。

### 1. 对城市就业大军拧亮的绿灯

对城市失业率与城市青年到农村去之间的关系作出评价是困难的，因为官方不愿谈论这一问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要目的被公开解释为革命理想主义原则和乡村建设发展的需要。类似于下面这一段公开发表的论述是十分少见的：

“在城市里，每年的大专院校、职业技术学校及正规中学的毕业生都应得到工作，因为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教育部门根据国家计划招收学生，大学及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将根据国家计划及毕业生的专长在国家经济领域的各部门安排工作。至于城镇的中学毕业生，他们中的一些人可在工业、基本建设、交通及商业等部门安排工作以扩大其就业范围，而另一些人则到农村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很清楚，中学毕业生的上山下乡和城市的就业状况有着某种关系，然而，特别是 70 年代，由于有关城市青年每年就业人数的统计及就业率的不准确，大大妨碍了我们对这种关

系的强度作透彻的分析。以下试对 50 年代到 70 年代中期这方面情况作一简述：

在 50 年代，由于国内战争后的经济刚复苏，新的庞大的政府机构的建立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 年至 1957 年）期间工业以年 18% 这样不同寻常的比例增长，城市就业率迅速增加，但几年后，确切地说是到 1957 年，城里的就业状况已是供大于求。据估算，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劳动大军中平均每年要增加 140 万新职工，其中有 100 万是从所居住的城市进入劳动市场的年轻人，，然而，据估计，每年仍有 100 万人需要参加工作。这些人中有些是解放前留下来的，有些则是从乡村迁移进城的。在 1949 年到 1957 年间，城市人口从 5800 万猛增到 9200 万。增加的人数当中，将近一半是乡村移民，其余的则是因超过了 3% 的人口出生率所致。，早在 1953 年，中国就实行了对移民的控制，并在一个时期内开展过将“盲流”进城的，也就是没有得到就业保证就进入城市的农民送回原籍的运动。，但是，移民所造成的影响却是普遍而深入的。例如，1954 年被雇佣的 245 万人中就有 70% 是农民；1956 年被雇佣的人数是 224 万，其中 1/3 是农民；，其结果是，早在 1955 年，城市青年的就业就遇到了困难。，如以上数字所显示的那样，在 1953 年到 1957 年这几年内，就业的人数大大超过了估算的平均每年增加 140 万这个数字。1956 年，国家计划只增加 84 万新工人，但由于被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激发起来的盲目的乐观主义已形成，招工人数超过了 200 万。，1957 年削减了招工人数，新进入劳动市场的就业者们的机会减少了。采用将干部下放到下级单位、包括农村的方式减少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政策和措施，证实了这种需求量的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让既不能继续学业又不能在城市就业的城市青年到农村去的思想产生了。不过，这一想法也是犹犹豫豫形成的，因为号召城市青年争先恐后去当农民似乎还不合时宜。研究

城市青年就业问题的评论家们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几种方案，包括留在家里学习或做家务、或自谋职业。此外，他们也呼吁有关机构调查农业合作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并认真作出计划，“劝说和安排”，以让城市青年“尽可能”参加农业生产。这样，上山下乡开始作为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一种方式提了出来，但这时还不是一种主要的措施。查看一下统计数据，1956年至1966年间有120万青年到农村插队，他们当中“100多万”是在1962年——1966年间下放的，只有少数可能是在1957年下放的。事实上，这些年的主要注意力不在城市青年，而在那些到城里上过学的青年农民身上，在于号召这些人毕业后回到家乡去，成为“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

到1957年，中国的高层决策者们认识到了他们国家的城乡关系与苏联的城乡关系有着重大区别。这就是，中国的农业将难以负担迅速发展的城市各产业部门，因此，应在一定时期内严格控制城市的发展。或许不仅有必要将农村迁往城市的人送回农村，也还有必要让城里人也到农村去。然而，大跃进（1958年至1960年）打乱了这些设想。大跃进试图用全面而高涨的大众热情来完全打破经济规律，造成工业的各方面，包括无数小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迅速发展。这样，就不必因缺乏工作而将城市人送到农村去了。相反，大约有1000万农民在城里找到了工作，如当上了新工人。包括家庭妇女在内，雇佣人数比1956年大了许多。但在1960年，这一个气泡破灭了，紧接着是城市发展的严重滞缓和就业的萧条，一些没有完工的工程项目被放弃，雇佣状况不稳，上百万近期进城的移民不得不返回农村。大跃进之后，正式的城市居民，包括整个家庭和个人，也被送往农村，但由于缺乏详细的统计数据，因此很难说出这些人中有多少是城市的一般青年，有多少是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的中学毕业生。不管怎样，这一大跃进时期的结束，使人们又重新想起了

1957年，正如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薄一波在1963年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从农村吸收了太多的人力到城市，自然灾害表明，我们的城市人口超出了我们农村可以负担的程度。我们的工业正在实现现代化，而农业则还没有实现机械化。在实现农业机械化之前，我们的城市人口必须从130,000,000减少到110,000,000。”<sup>11</sup>

大跃进之后，中国的领导人决定在经济发展方针上作重要的改变，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口号。与50年代相比，农业的发展被提到了更高的地位，而工业部门则被重新安排为实现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服务。这种新策略并不意味着要停止工业的增长，因为从大跃进的复苏中，工业的年增长率或许仍达到10%的速度。<sup>12</sup>工业的继续发展意味着一批城市部门就业机会的增加。但因为工业发展的速度较50年代慢，就业的机会也必然会相应减少。由于缺乏数据，所以难以对此作出精确评价。只有一份有关1966年至1970年间工业部门的就业计划。1964年，领导着国家农林部并负责国家劳动计划安排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预计，在这5年的时间内，将有可能为500万城里人提供在工业部门里工作的机会。<sup>13</sup>在大跃进期间的那些年内，平均每年有140万人参加工作；然而，到了60年代的下半期，这个比例减少了40%。

如果工业部门的就业机会减少了，待业的人数就增加了。谭震林还预计说在1966年至1970年间将有1100万人进入城市的劳动市场，也就是说，每年将有220万，即比1953年至1957年多两倍的人进入城市劳动市场。城市人口高出生率是进入城市劳动市场的人数增加的原因，这一情况早在1957年就引起了关注：

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年至1962年）到达工作年龄的人出生于1937年至1946年，……这一时期城



市人口的出生率很低，但现在人口出生率以年平均 2.2%、在城市是 3.9% 的速度增长，-----这些孩子将在第三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1963 年至 1972 年)到达工作年龄。而到那时，寻找就业机会的人的数量将比现在多得多。”

50 年代的高出生率是国内和平环境、经济复苏、农村地区的年轻人向城里移居以及缺乏有力的计划生育措施的产物。在 50 年代，计划生育这一问题已经提出来并引起了争议，到 1957 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但到大跃进期间又放弃了这一措施的实施。大跃进之后的粮食短缺显然对人口的出生率起到了抑制作用，但困难刚过去，人口出生率又开始增长。„60 年代，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就控制人口出生率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但文化大革命（1966 年至 1968 年）破坏了这一规划的正常实施。„自那场动乱以后，在农村和城市又实行了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措施。在几个主要城市，参观访问者得到的有关计划生育结果的情况报告确实富有戏剧性：1956 年，上海的人口出生率是 40.3%，到 1974 年，这个大都市的市区人口出生率降到了 6.2%。„这不能不使人对这类报道的精确性和普遍性产生疑问。并且，完全不清楚，小城镇的人口出生率是否也下降了。„计划生育措施的注重实施，似乎能使城市人口出生率有效地减少。但毫无疑问，1968 年以来 1200 万青年人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实际上也有助于城市人口的减少。

如果城市人口出生率确实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才得到控制，那么，或许直到 80 年代中期，每年达到 16 岁这个年龄的城市青年的总数，虽然不那么稳定，但将会保持在一个高水准上。那么，是否能够以此为基础来推测出每年需在城里就业的城市青年数呢？从 1972 年提供给美国的参观者们的一份学校学生统计数字里可以找到一种线索。一个数字是，1972 年到 1973 年，中学注

册学生的总数是 1200 万。„假定 5 个年级学生人数一样多且没有退学者，那么，从 1972——1973 到 1976——1977 学年间，1200 万学生中每年就有 240 万毕业生。然而，虽然报道说“几乎所有的城镇”都普及了初级中学，但因高中只是在大城市里“基本普及”，„这样，1200 万中学生进入劳动市场的速度要比一年 240 万这个速度快得多。\* 这批访问者还被告知，1972——1973 学年，城市小学在册学生的总数是 2200 万，这与 50 年代中期相比增长了 66%，因为 1955 年城市普及小学教育时，城市在册小学生的总数是 1320 万。„假定各年级学生人数一样，且没有退学者，那么 1972——1973 学年到 1978——1979 学年间，2200 万小学生中每年就有 440 万毕业生。如上所述，这些孩子中有一些人是在上了初中 2、3 年后就进入劳动市场。虽然，上述这些数字是粗略的，不完全的，如，特殊的职业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安排到了那里？但它们意味着，70 年代城市需要参加工作的青年人数似乎远比谭震林在 1964 年预计的 1966——1970 年间每年就业人数将达 220 万这个数字大得多。

这些数据和 60 年代及 70 年代城市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有什么关系呢？从 1962 年到 1966 年，大量的材料表明，中国官员将上山下乡作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一种方式。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昔日的接班人、红卫兵的主要靶子刘少奇被指控为“企图为那些在旧教育制度下出来的人寻找就业机会而规划和加强‘上山下乡’。”„同样，1964 年，上海劳动人事部的负责人王戈说：“我们认为，继续让上海的知识青年去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是给上海的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的一个好途径。”„然而，1962 年到 1966 年却只有“100 多万”青年在农村插队落户，那么，上山

---

\* 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学毕业生除了少数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外，都被在农村或城市安排了工作。

下乡运动看来并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主要措施，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实际的就业人数是多少。或许，由于文化大革命前官僚主义的原因，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才那样少。确实，文化大革命以来，知青下农村的运动比以往开展得更成功。事实上的官僚主义或许正迎合了那些不欣赏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政策制定者们的思想倾向。虽然刘少奇已经被指责为将上山下乡运动和就业问题联系起来，上山下乡的低速度还是被归罪于他的“破坏”。1966年谭震林在受到红卫兵批判时曾说：“如果在上山下乡工作中有修正主义路线，那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阻挠更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相反，他们愿意建立街道工厂，让人在那里工作。”<sup>2</sup>换句话说，这些在文化大革命前制定上山下乡政策的人或许并没有将上山下乡运动看作是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一项主要措施，相反，他们宁愿在城里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本章最后一部分将对此作进一步讨论）。

如果1962—1966年上山下乡不是解决就业机会不足的一项主要措施，那1966—1970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则与之形成鲜明对照。1964年谭震林预计说这一时期工业部门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只有500万人，剩下的600万需要参加工作的人只能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山下乡运动曾受影响，一度停止。但从1968年到1970年，正如表7所示，大约540万知青离开了城市，这个数字与谭所估计的600万十分接近。这一数字也意味着，用安置就业为理由来解释上山下乡运动的真实目的比那种将1968、1969年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主要目的说成是清除城里的红卫兵捣乱者的看法要实际得多。

上山下乡运动的规模在70年代上半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70年有70万知青被送往农村，1972年是65万，1973年130万，1974年到1975年每年大约是200万（见表7）。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回顾一下前面关于人口统计数据的讨论，可以断

定，1971年至1972年间进入16岁以上年龄的青年人数并不可能减少。或许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学招生数的增加暂时减少了需安排就业人员的数量。事实上，1971年至1972年下乡人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国家制定计划时过高地增大了城市劳动力的补充量，这就导致了1971年至1972年间雇佣就业人数的增加。一份题为《教育纲要》的专门文件证实了这一点，这份文件是1973年4月昆明军区政治部为了宣传目的而印发的：

由于对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缺乏正确理解，也由于玩忽职守和粗心大意，在计划工作方面出现了‘三种超常’和‘两个漏洞’，即：工人及被雇佣者的人数超过了千分之十，工资总额超过了数亿元，商品粮的数量超过了数亿斤；在粮食和棉花方面出现了短缺。”

我在香港会见的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说，根据1972年末给广州的工厂里的工人传达的一份文件，当时负责经济计划的副总理在作自我批评时表示对这些错误负责。”

如果许多中学毕业生滞留在城里是由于计划失误，那么改正这些错误意味着加快上山下乡运动的速度，1973年上山下乡运动确实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了。正如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在1973年4月所指出的那样，“目前，与工农相结合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到农村去插队落户。”这意味着，至少在他的省里，大部分城市中学毕业生将会被送到乡村去。”国家和省一级制定政策的人们密切地关注着1973年的上山下乡运动，这显然是为1973年以后（紧接着1973年的）那些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作准备。政府还采纳了一些促进上山下乡运动的补救措施，并宣布上山下乡运动将毫无疑问地继续下去。”一些专门计划被制定出来，如湖北省的领导人“制定出了1973年至1980年本省知识青

年上山下乡的规划。”这些计划及时而明确地对上山下乡运动再次予以肯定，这毫无疑问反映了制定政策的人们意识到了，至少到 80 年代，离开中学的城市青年的数目和能够在城市里安排工作的城市青年的数目之间的差别都将继续存在。

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总是使都市的消费水平保持在低水准，这一至今尚琢磨不透的考虑使上山下乡运动和城市青年就业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中国的发展战略一直是尽可能节省城市服务设施，包括住房和交通投入以及减少工资总额。”或许这一原因也导致了将城市青年送到农村去，尽管他们也许能够在城里安排工作。普遍提高城市人口的就业率，特别是让家庭妇女参加工作，已部分取代并迎合了由于工业发展而增加的对劳动力的需求。到中国城市的参观访问者对就业者中，特别是近年发展起来的小规模的街办工厂里女工的高比例有很深的印象。而 1957 年，家务劳动的重要性曾被认真宣传，以劝阻妇女出去寻找工作。随后，特别是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强调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的重要性。”在上海，1957 年劳动大军中 35.8% 是家庭妇女；1975 年，这个百分比上升到了 50%。不过，这或许反映了人口结构中年龄的变化，已婚妇女就业的人数无疑是增加了。”另外，自 60 年代以来，招收农民到城市企业从事临时性工作也部分满足了城市工作的需要。这些农民在一段时期内为工厂或商业部门工作，但不是正式工人，他们的家仍在农村，他们的身份仍是农民。”

这两类实践都是出于经济的考虑。让已婚妇女参加工作不需要另外提供住房和其它设施（除了日托机构），而年轻人在一定时期内则需要建立自己的家庭并养育孩子。鼓励已婚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工作还可以增加家庭收入，这样或许有助于国家使个人的工资收入一直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同样，农民在城里工作所得到的报酬也比正式工人低且不享受国家提供的福利，不拖家带

口，这样对国家显然就要合算些。尽管我们无法说 1200 万到农村去的知青中有多少是因为农村生活费用更低的原因，但上山下乡运动之所以为中国的发展建设作出了贡献，确实不仅在于它有助于解决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也有助于减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交通、通讯及生活等设施）的投入。

在城市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同样也达到了减少城市人口的目的。例如，到上海去的访问者了解到，增加产值、减少城市人口不仅得力于让妇女参加工作，也得力于采用自动化技术。<sup>\*</sup>一个研究中国乡村工业的美国代表团发现，甚至在县一级的企业也强调节省人力。<sup>\*</sup>按照以色列经济学家格尔·奥费尔的说法，信奉马列主义的国家一般都在城市运用资本密集型方法而在农村运用劳动密集型的方法来节省城市建设的投资，故而，在发展的相对水平上，与其它类型的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国家倾向于在农业方面投入更多的劳动力。<sup>\*</sup>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亦不例外，这方面，或许印度支那的某些共产主义国家除外，而中国作出了非同寻常的努力，不仅使农民留在农村，还将城里人也送到了农村。

将不同类型的城市看作是一个毫无差别整体，显然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多年来，中国的工业化战略方针不仅关注位于东北的辽宁或上海等一些已有的工业中心，还特别关注那些在内地的、以前没有或很少有现代工业的城镇。与这战略措施相一致的是，制定政策的人们努力限制甚至减小大城市的规模，然而却允许一些中小城市扩大自己的规模。例如，当上海的人口从 50 年代的 640 万降到 560 万时，河南新乡的人口却从 1949 年的 5.7 万增加到 1965 年的 32 万，1975 年又增至 42 万。<sup>\*</sup>仅在河南，

---

<sup>\*</sup> 不太清楚上海的城市人口是仅仅指上海市区的人口还是包括上海所管辖的 10 个郊区的人口。在上海周围的许多地区遍布着大量的工业企业，所以上海这个城市的实际人口数很可能更大。

就有六、七个类似的城市象这样在发展。„1974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提供了另一个例子，这天的报纸在题为《三明——一个繁荣昌盛的新型工业城市》的文章中，报道了位于福建西部的一个小城三明市，由于1958年到1973年工业产值增加了65%，从而也导致了这一地区人口增加的事实。„

象三明这样工业繁荣的城镇需要增加劳力，但不清楚这种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如何得到满足的。已经提到过两种可能性——提高本地城市居民的就业率及从附近农村招收临时工。在那些工业发展迅猛，但落后的生活服务设施拖着工业发展后腿的城镇，或许特别希望采用这后一种措施。另一个途径是让大城市的工人或职员支援内地小城镇，就象上海有许多工人和职员分布在内地一些小城镇一样。„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将那些在农村已服务了几年的下乡知识青年招收为县城里的工人（见第6章）。并且，很可能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被留在这类发展着的城镇，这就改变了那人所共知的自大跃进以来不许农民向一切城市移民的设想。„以上清楚地表明，因为城市工业发展速度极大的不一致，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会因缺少工作位置而不得不将青年送到农村去。这样，就能解释表5中下乡青年与城市人口总数的比例上，从济南的3.5%到上海的17.9%这样大的跨度了。„因此，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形势是基于与城市的经济和发展有关的综合原因形成的。无力给城市青年提供工作只是一个方面的解释，事实上这项规划的制定者们考虑到了城市的发展、新工业点的建立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等多种原因。

## 2.“再教育”——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工程

将城市青年送到农村去，不仅是因为城市的经济状况不能接受这些人，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还在于改变城市青年人的观念，这样，上山下乡运动就是大规模地改造中国青年价值观念和理想前途观的一种方式。这个运动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改变努力往上层爬、弃体力劳动于不顾，拼命想获得体面工作的状况。上山下乡的理想的目标模式是，知识青年不应只想进入上流社会，而应有志于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普通工人和农民。这一目的既植根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理想标准，又植根于中国式的强调群众的主动性和群众创造性的发展道路。

为了弄清楚上山下乡运动是怎样被看作是使城市青年革命化的一种方式的，有必要研究一下中国教育制度的发展，特别是有关受教育的机会以及由这些机会所导致的个人前途问题。自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学教育发展迅速，但如表8所清楚显示的那样，也只停留在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这张表显示了小学层次的在校学生数在真正的大量增加以及中学水平的人数比小学增长得快这样一个事实。这两种教育层次的发展与文化大革命以来高等教育的明显衰落形成了鲜明对照。1970年，大专院校恢复招生，学生人数开始增长，但直到1974年还未达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

从机会的角度看，这一状况表明，从小学升入中学逐渐变得容易了。1949年，每29个小學生中有1人可进入中学，1957年，这个比例是13:1，1965年是9:1，到了1974年，小学毕业生能够继续接受中等教育的比例是7:1。另一方面，从初中



进入高中的学生人数的比例却拉开了，从 1949 年的 4: 1 到 1957 年的 5.8: 1，再到 1965 年的 5.7: 1。以后，机会似乎大大增加，因为据一份报道说，有 40% 的初中毕业生进入了高中。„在高等教育方面，文化大革命前高中毕业生入大学的人数比例也拉大了，即从 1949 年的 1.8: 1 到 1957 年的 2: 1、1965 年的 3:1。而自那以后，情况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即每 91 个中学毕业生中只有 1 人能进入大学，此时高等学校甚至招收初中毕业生，而且，大学录取新生都是本着推荐的原则，还得保证这些学生全部达到毕业的所有标准。

详细解释这一发展趋势已超出了我们这本书所研究的范围，有几点或许是应注意的，制定政策的人们，在 50 年代，不仅仅倾力于普及小学教育，也要普及中学教育，甚至说要普及高等教育。„据报道，1974 年，95% 的学龄儿童都入了学，因此基本达到了普及基础教育的目的。„初级中学教育的发展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尽管到 1974 年，初级中学教育还只普及到了“几乎所有的城镇。”„相较而言，高中和大学教育的发展就要慢一些。这是因为它的发展受到了三方面原因的限制。第一，高等学校及中等专业技术学校要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对专业人材的需求来有计划地招生。与之相反，小学及普及中学的招生则不受劳动计划的限制。扩大中小学招生被明确看作是提高整个社会的一般文化水平。„第二，国家财力的不足在许多方面限制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教育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尽量增加大众受教育的各种途径，譬如开办业余学校或动员社会力量办学，但对高等教育来说，经费成为一个障碍。195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均收入是 183 元，而一个中学生一年所需费用是 360 元，大学生所需费用是 1200 元。„第三，文化大革命以来，高等教育的发展还受到了政治原因的影响，如，领导人要寻求一种革命的高等学校教育，以满足训练社会主义者而不是产生特权人物的需要。

表 8 1949——1975 年小学、中学、大学学生人数\*

	高等院校	高 中	初 中	小 学
1949— 1950 年度	117,000	207,000	832,000	24,391,000
1957— 1958 年度	441,000	835,000	4,851,000	64,279,000
自 49 / 50 年 度以来增长%	277	303	483	164
1965— 1966 年度	695,000	(2,100,000)	14,000,000 (11,900,000)	110,000,000
自 57 / 58 年度以来 增长%	58	(151)	146 (145)	71
1974— 1975 年度	400,000	36,500,000		145,000,000
自 65 / 66 年 度以来百 分比变化	-42	+161		+32

\* 资料来源及注释：1949——1950年度和1957——1958年度各类学校学生数以及1965——1966年度高等院校学生数均据约翰·P·埃默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技术和管理力量》第95页。(接下页注)

想继续学业的中学生因升学无门而理想破灭的问题最早产生于 1957 年，表 8 透露了这一年的高水准教育的招生中所存在的明显收缩状况。1957 年以前，高中及同类学校的招生人数每年都在上升，同样，低水准的毕业生进入高一级学校继续求学的人数的百分比只在 1955 年下降过一次，但在 1957 年，这个数字急剧下降。表 9 描述了这些变化。1957 年入学机会的减少特别表现在高等教育方面。在此之前，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数增加得如此之快，以致于高中毕业生不足以满足大学招生的计划而不得不从中学以外，特别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工人中招收大学生。\*

1957 年这种下降趋势引起了公众舆论的极大关注。受到了减少招生人数影响的学生和他们的家庭被告之，1956 年的招生人数过多，所以不得不在第二年削减人数以弥补已造成的过失。„1956 年，同样的乐观和加速发展的情绪也导致了招工人数

---

\* 1965——1966 年度中学生 1400 万和小学生 1 亿 1 千万两个数字据刘爱芬（音译）《在毛主席指引下坚定不移地搞好中小学教育革命》第 8——11 页；1965——1966 年度高中学生 210 万这一数字系从 1964——1965 年度高中在册学生数 210 万（埃里森书第 95 页）推算而来，而这一年度初中人数 1190 万则是由 1400 万减去 210 万得来的。

1974——1975 年度高中学生数来源于《高等院校院校长代表团访华报告》（未出版）。该年度其它数据则源自丛朴（音译）《中国普通教育状况》第 9 页。

1965——1966 年度的小学生数可能太低了，埃默森引据一位访华者的报告说，1964 年小学生就有 1 亿 3 千万人（第 95 页）。相反，1974——1975 年度的数字可能过高，据院校长访华团报告说是 1 亿 3 千万。此外，1974——1975 年度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不包括 1970 年代普遍建立的县办、社办、厂办大学的学生。

表9 1953—1957年学生继续受教育机会一览\*

(1) 年 度	1953 年	1954 年	1955 年	1956 年	1957 年
(2)小 学 毕业生数	9,945,000	10,136,000	10,254,000	12,287,000	12,307,000
(3)初 中 招生数	818,000	1,236,000	1,282,000	1,969,000	1,603,000
(4) (3)与(2)的%	8.2	12.2	12.5	16.0	13.0
(5)初 中 毕业生数	395,000	571,000	863,000	783,000	1,094,000
(6)高 中 招生数	161,000	195,000	221,000	374,000	241,000
(7) (6)与 (5)的%	40.8	34.2	25.6	47.8	22.0
(8)高 中 毕业生数	58,400	72,100	106,000	156,000	202,000
(9)大 学 招生数	71,400	94,000	96,200	165,000	107,000
(10) (9)与 (8)的%	122.3	130.4	90.8	106.2	52.8

\*资料来源：第(2)、(5)、(8)、(9)项据利奥·奥林斯：《共产主义中国的专业人才和教育》第32、38、61页。第(3)、(6)项据《我国中小学教育的规划和发展》，《新华文摘》1957年10月9日第10期第20—22页。

过多，换句话说，也就是导致了没有真正受到国家财力保证的受教育机会的进一步扩展。官方舆论及象教育部长张奚若这类政策制定者们强调，因为小学及初中毕业人数的增加，人们继续受教育的机会仍将受到限制。那么如何安置那些不能继续学业的人呢？有关方面提出的一个主要解决办法就是：他们应参加生产劳动。这样就产生了如何为他们安置的问题，因为受教育机会的减少与城市就业机会的减少有一致性，同时也产生了对待体力劳动的态度问题。

由于对体力劳动的厌恶，无法继续自己学业的学生们往往要经历一次精神危机。1957年以前这一问题就已出现在宣传媒介中，但此时，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很清楚，青年人都有进入社会上层的意愿，而最好的途径是继续学业。对青年来说，理想的选择首先是上大学；如果进不了大学，其次是从事白领工作；再次，是在城市里从事蓝领工作；最后才是干农业劳动。如一篇评论文章所说，当工程师、科学家或干部被认为是“前程远大”，当农民则被认为是“前程暗淡。”有人指出，青年人在家庭和学校里所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在家庭中，革命的结果是将传统观念和远大志向揉合在一起了，按照以往的传统，这种学术上的成功能为整个家庭带来荣誉和利益。那些在旧社会没能得到受教育机会的父母们，现在要求他们的子女在新社会里能得到这样的机会。父母们给子女施加压力，要他们在入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考试成绩不好被认为是丢面子的事。家庭的这种态度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曾明确提到，“舆论”是改变轻视体力劳动态度的一个障碍。

50年代的学校教育制度助长了而不是抵制了这种轻视体力劳动的风气。中国人采用了苏联的教育模式，或者，更确切些，是苏联30年代早期的教育模式。这种模式旨在培养工业化的经济所需要的技术人材。例如，中学教育的目的就是为高等教育作

准备。”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取得成功的主要标志就是学术成就：学术水平高就被认为有出息，水平低则被认为是没出息。尽管就规范的官方的价值观来看，工人阶级是第一位的，但人们还是普遍认为，脑力劳动者高贵，体力劳动者低贱。在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的教育方针本来就强调学术能力的培养，而对苏联模式的教育制度的采纳又与这一方针十分一致。正如约翰·W·刘易斯所指出的那样，“在整个学校教育中，全部课程都着重于培养各个领域、特别是在技术科学和数学方面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教育学生们懂得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政治学习，或许能够消除一些学生们在学校培养出来的优越感，但这种政治学习及学生参加体力劳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被削弱了。这就毫不奇怪，1957年官方要批判学校对政治及劳动教育的忽视，指责说许多学生对劳动的光荣本质缺乏正确认识。”有趣的是，同时期尼克塔·克鲁斯奇维在苏联也提出了同样的批评，而且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即苏联的高等教育此期也不再能够吸收所有的中学毕业生，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将不得不参加体力劳动。”

自5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领导人一直关注着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改变人们在体力劳动者面前的那种优越感以及怎样用新的革命的价值观来代替这种优越感。他们作出了多种努力来改变人们的观念，将城市青年送到农村去，只是这多种努力中的一种。事实上，从前而几段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教育制度的改革将是这种努力的中心点。

大跃进期间出现了改革教育体制的最早的一个明显步骤。在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下，有关当局着手打破了教育部门与生产劳动之间的隔阂，中学和大学开办了小型工厂，或者学生们到工厂或公社去参加短期劳动。不论参加劳动是怎样一种形式，其目的都是让学生们去进行生产“实践”，去面向社会、面向工人和农民。书本学习、死记硬背及纯理论的重要性下降，同

时，强调政治学习。专家们被要求不仅要在其专业领域里专，还必须恰如其分的“红”。学生们的职业理想应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中学生要参加生产劳动，积累经验、掌握技能，以便为毕业后参加工作做准备。高等学校招生中对政治觉悟和阶级成分的重视，导致了工农子弟的大量入学，这对那种瞧不起工农的优越感是一种冲击。教育改革中，业余教育形式的出现，使工农特别是农民受教育机会增加了，同时，业余学校的开办，也使国家在教育方面的开支大大减少，因为学生可以无偿提供自己的劳力以资助学校。并且，地方人民公社也建立起自己的学校。在大跃进的高潮期，这些做法以不同的方式被广泛地实践着。\*

此期，有一与1957年的形势相反的现象，即高等学校的招生人数急剧上升。中国大专院校的在校学生数在1957——1958学年是441,000人，1958——1959学年是660,000人，„1960——1961学年是950,000人。1958年计划招生数是152,000人，实际上，这年高等院校招生达300,000人：„有关方面事实上是在鼓励高中生申请进大学。“今年，从全国性的大跃进需要来看，高等学校需要招收更多的学生。因为仍然缺乏生源，所以要求（着重号为作者所加）所有于今年（1958年）毕业、并能够继续学习的中学生都积极申请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如果1957年的高中毕业生中53%的人能够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话，那么，这一百分比在1958年则升至135%，1959年是112%。因此，这一跃进产生了一个自相矛盾的效果：一方面，有关当局在竭力改变青年学生对做工务农的轻视态度，但另一方面，上大学的机会倍增这一事实又与这一努力背道而驰。\*

大跃进之后，经济的不景气影响了教育。许多由地方资助的

---

\* 人民大众在大跃进的第一阶段迸发出来的热情至少部分是出于城市就业机会及受教育机会的增加。

学校因财力不足而关闭，而预算经费的不足又要求高等学校削减招生人数。如利奥·奥林斯所指出的那样：“数十万完成了各种不同程度学校学习的城市青年无法继续他们的学业。”<sup>11</sup>甚至在大跃进的恢复期之后，继续初中以上学业的机会亦比 50 年代要少得多。（见表 8）<sup>12</sup>此外，许多在 1958 年和 1959 年间兴起的教育革新项目被削减或干脆放弃。这种不景气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一些有背景的教育学家们认为，那些新改革方法影响了教育质量，即影响了培养学业上合格的毕业生。换句话说，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培养国家需要的高级专业人材上。60 年代初期，减少参加生产劳动和政治学习时间最初尝试的结果是，基本上恢复了全日制的专业学习和研究，关闭了许多新的业余学校。陈毅等中央领导人并为专家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条件。<sup>13</sup>中等教育方面，大跃进后，教育的方针政策在恢复中学教育的传统功能上发挥作用，即主要为高等学校培养学生。1964 年，刘少奇（他本人在两年后受到了批判）在一次报告中对这种培养目标所产生的后果作了讽刺性评论：“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们怎么样呢？一般的情况是，初中毕业的学生瞧不起农民，高中毕业的学生瞧不起工人，大学毕业生既瞧不起工人，又瞧不起农民。”<sup>14</sup>

个人理想和成功机会之间的不均衡状况导致的结果之一是中学生中的竞争意识增强了，尽管当时教育制度正面提倡团结互助。<sup>15</sup>由于一个人中学阶段所受教育的质量对其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竞争能力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因此，将子女送进好的中学也变得重要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严厉批判这种重点中学培养“精神贵族”以符合官员、教授及有背景的父母们利益的现象。<sup>16</sup>北京和广州这样的城市有几所这样的学校，其声望在某些方面可追溯到民国时期。这类学校通常与某一所附近的大学有直接关系，并拥有优良的设施和教职员。这类学校的成功之处在于向高等学校、特别是一些重点大学输送了大量的毕业生。广东的



一所重点中学意图想成为毕业生中进入大学所占比例最大的学校。据报道，这所学校 1963 年所定的目标是 60%，1964 年 70%，1965 年，当全国的高中毕业生升学率达到 30% 时，这所学校的升学率是 80%。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发表的数据资料表明，事实上，进入这类学校的学生中，几乎没有工人的子女。红卫兵批判说，党的高级领导人对这些学校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提供特别经费，指示这些学校为大学教育及将来的各级领导岗位培养优秀青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童大林（音译）在对北京景山学校的报道中提出：“我们的毕业生不能都成为董加根（一个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全国闻名的人物）那样的人。我们的学校应当培养县委书记、宣传部长、妇联主席、中央委员、总理、国家领导人及将军。”红卫兵们还揭露出，除了对培养和训练特殊人物的特别关注之外，特权阶层的父母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为使他们的子女也保留特权身份，对这类学校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异己分子蒋南翔（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部长）曾通过一个电话和一张纸条将他那‘与众不同’的儿子安排进了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这个男孩曾在几次留级后被他原来所在学校开除。北大附中的教师们被毫无顾忌地告之要将教育这个学生作为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来完成’。”

文化大革命前，人们就已经普遍认识到了有必要进行另一种教育改革。这就是一方面发展中等教育，另一方面要承认不能使学生具备从事生产劳动所需要的技术和能力的中等教育是需要改革的。中国领导人在这方面有很多不同意见。我们知道，他们的争议主要来自于文化大革命所产生的两大阵营的论战，这场大革命将教育的目的分成了革命的和修正主义的两种，这样就证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例如，刘少奇的观点是，在职业技术学校，主要培养能够从事工农业生产的合格毕业生，不仅要使这些学校的学生们少一些幻想，还应允许实行半工

半读，以减少这类学校的经费开支。这类学校甚至也可进行较高层次的教育，以便更专门地培养掌握不同技能的学生。然而，同时，刘少奇也明显赞成保留全日制普通中学，以便为高等院校输送人材，以适应国家对合格的专家学者及技术权威的需要。因此，刘赞成一部分优秀的青年人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刘要保护这部分人材。刘确实赞成和鼓励发展教育的两种方案，即工农子弟似乎只能就读于中等职业学校，而那些全日制的学术性学校则是为杰出人物的孩子们准备的。

大跃进中，毛泽东曾发动了一场教育革命，试图以此来纠正这类学校为特权阶层服务的倾向。毛或许十分赞同有关中等职业学校的想法，但他反对所谓为了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搞全日制和长期正规的课堂教学的意见。他讨厌经院式教学，因为他认为这样只会导致学究主义并危害学生们的健康。他认为只有直接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才能产生出真正有用的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从毛所倡导的改革目标来看，已经在尝试着完全改变中等教育的传统角色：“中学毕业以后，应当首先从事一点实际工作。中学毕业生不仅应当到农村去，还应当到工厂、商店以及其它一些单位去，从事几年实际工作后，再读两年书就够了。”这些考虑在文化大革命后被付诸了实践：现在，一个青年一般都需要有两年从事生产劳动或在部队服役的经历才能获准进入高等学校学习。这是促进落实上山下乡政策的措施之一。以前的中学是建立在使自己的毕业生直接进入大学学习这样一种传统的前提以及价值观念之上的。对教师和教育部门的管理者来说，学生们在升入大学的入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证明他们作为教育者付出的努力收到了好效果；对学生们来说，高考中取得的好成绩便是对他们几年刻苦学习的奖励。学生们在高考中的表现明显地、公开地将成功者和失败者区别开来。在文化大革命前，有关方面也在不断采取措施鼓励那些中学毕业后就在工厂、农村工作、务农的青

年，使他们感受到做工务农是光荣的。但这类政治教育并没有使这类青年摆脱低人一等的感觉：文化大革命中，下乡青年们一种最普遍的怨言，就是他们被广泛地认为是失败者或被抛弃者。<sup>\*</sup>文化大革命以来这种成功和失败之间的区别被彻底消除了，中学毕业生在毕业之后在被安排进的所在生产单位的表现，成了能否进入高等院校学习的一个主要标准。这种使中学阶段的学习和表现与上大学绝然无关的作法，对于人们从观念上将中学学习是为上大学作准备转变为中学阶段是为参加生产劳动作准备起了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前，教育制度便是毛泽东主席所关心的中国社会发展方向中的一个部分。60年代初期，毛夸大了他对由官僚集团统治的苏联堕落后修正主义的深恶痛绝，渴望维护自己纯洁的政权和统治。如何防止在中国发生类似的演变成了他脑子里考虑的中心问题。自然，青年人在他心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思考着他们能否成为维护无产阶级制度的“革命接班人。”<sup>①</sup>由于毛努力使自己所关心的问题成为思想政治领域里的中心问题，阶级斗争和“革命化”这样的主题开始渗透到了公众舆论和宣传媒介的各个方面。越来越多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开始被以革命的标尺来加以甄别和衡量，上山下乡这一运动自然也不例外。1964年和1965年扩大下放城市人口的规模时，大部分公开的宣传都是在详细论述“上山下乡”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继续革命的必要性。正如上海的一家报纸所指出的那样：“应当通过普通的生产劳动，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sup>②</sup>同时，一份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主

---

\* 显然，学业上失败的唯一解释被认为是社会地位低下。文化大革命前的那几年，大学招生就越来越强调阶级出身，很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因此被送到了农村，而这些青年很可能有较好的专业基础，适合进大专院校深造。

办的报纸“中国青年报”也指出：

参加农业劳动是……革命的知识青年所应走的一条重要道路。……农村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的一个主要中心，那里各种斗争最尖锐最复杂。通过到农村去接受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考验，知识青年可以创造出促进自身思想革命化的极好条件。……知识青年必须首先使自己成为普通劳动者，才能实现自身的思想革命化。在农村中和劳动群众同甘共苦的生活可以使知识青年逐步培养起参加体力劳动的热情，端正对体力劳动的态度，并且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是永远防止他们蜕化变质的一条重要措施。”

这段论述归纳了城市青年下农村所可能引起的再社会化进程的任何一个方面。

尽管革命的豪言壮语已渗透了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但在学校及文化宣传部门这类上层建筑领域中改变态度和信念的实际进程还是远不能适应毛主席所要求的迫切性。他意识到他的许多同事是在阴谋破坏他防止产生修正主义的努力。因此，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就是毛坚信有必要清理由资产阶级把持和影响着的政治、文化及教育系统等上层建筑领域。中国城市中的初、高中毕业生成了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工具。同时，毛很清楚，将这些青年人动员起来造那些被定为资产阶级权威们的反还具有仅将他们作为斗争工具以外的意义。在造反的过程中，这些学生们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学校里所形成的价值观也将发生根本改变，因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只能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但结果是，毛在这方面的希望没能实现。红卫兵们没有成为忠诚的革命者，而是在自己内部产生了争斗，并且这种争斗在许多城

市导致了暴力活动和混乱。派系斗争的原因之一是要满足拥有权力的欲望，特别是担任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政治组织的领导职务的欲望，而革命的愿望似乎已经消失了。„1967年和1968年发生在中国一些城市里的武斗使毛主席感到希望破灭了。1968年夏天，毛在以个人身份接见红卫兵负责人时表达了他这种失望的心情。„

随着革命的再社会化实验的夭折，向农村迁移在形式上成了一种激烈的群众运动。1968年12月，毛泽东针对这一运动发表了他那广为人知的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应当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将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在那之后的两年，向农村迁移实际上成了这种再教育的一种形式。这种再教育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既改造学生们在由资产阶级统治的学校里所形成的世界观，又改变在文化大革命中导致了武斗的一些思想意识。

显然，将好斗易争吵的红卫兵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以维护城市的秩序与安定也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主要目的。官方的宣传舆论认为这一目的是附属于再教育这一理想主义目的的。但在中国也有一些人将这种到农村去安家与司法机关对政治犯和刑事犯所进行的劳改联系起来。据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毛的接班人但在1971年被清除的林彪曾“诽谤”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然而，如果文化大革命后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对青年进行再教育和恢复秩序，那么这场运动的规模就会因经济人力等因素而受到控制。情况正是如此，根据前而提到的材料，1968年至1970年间的下乡青年大约是540万人，这与谭震林在1964年所提出的1966年——1970年将会有600万青年在城里找不到工作的估算近似。而在1966年秋，红卫兵的数字就大大超过了600万，因为有1100万红卫兵曾在北京受到毛

主席检阅——因此，没有理由认为所有的红卫兵都无罪地被从中国的城镇清除出去。”

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机构总是变革的主要场所，这些变革所期望得到的效果之一，就是培养“革命接班人”。大跃进中尝试过的一些方式又被付诸实践，特别是定期参加体力劳动和集中政治学习。为了使学能学到实践知识，对中学的课程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学生们不再学习和掌握抽象的化学，而是学习怎样运用化肥，这也是为他们适应乡村生活作准备。（不过，也仍然能就城市学校原有教学内容如何适应农业生产技能的需要提出问题，参见第5章）从到中国的观光者的谈论及报刊杂志报道判断，不论是在初中还是高中，目前都比过去更加强调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重要性。适应城乡生产劳动成了青少年接受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如前所述，青年学生现在一般不可能直接从中学升入高等院校，同时，高等教育机构也要清除高高在上的旧习，这样高等教育才能被鼓励得到发展。”

应当强调指出，新的教育制度仍然处在一种试验阶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教育制度还没有能成功地培养出“有文化的工人和农民”，还不能满足培养国家对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需要，故而，新的政治斗争又以“否定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展开。这种否定表现在更加强调学术经历，恢复入学考试制度或者允许特别优秀的青年省略参加生产劳动的经历直接进入大学学习。<sup>100</sup>

除了“教育革命”，“上山下乡”的另一个有效目的是让城市青年继续接受“再教育”。事实上，自70年代初以来，上山下乡运动还有了其它一些意义，其中特别强调的是对乡村的发展建设具有促进作用。但各宣传媒介所围绕的中心仍然是城市青年必须“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问题是，为什么要如此呢？<sup>101</sup>不断提再教育只是为了做表面文章吗（达到一些冠冕堂皇的目的）？

或者是要更加强调获得乡村中的劳动生产技能，将价值观的改变移到了次要地位？其实，必须继续接受再教育是因为新的教育制度事实上还未能成功地向人们全面灌输新的思想观念。或许因为旧的中等教育无论怎样受到了政治教育和体力劳动以及其它一些生产实践活动的冲击，但还是顽固地激发着人们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志向。进一步说，正如在这一节开始时提到的那样，在家庭这样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之中，有关理想前途的那些错误观念仍然存在。下一章是有关城市中上山下乡的动员的，在那一章中，我们将简述一些城市的家庭仍固执地恪守旧的思想观念的事实，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这意味着有必要进一步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因此，也有必要继续执行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

### 3. “彻底消灭城乡差别”

1964年《中国青年报》的一篇评论文章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种着眼于发展农业的人力转移计划的一部分：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彻底改革我们的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我们党和国家目前正集中精力支援农业。成千上万的干部、技术人员和知识青年正一批接一批地到农村去，到边疆和山区去。知识青年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发挥着聪明才智……在农村……有必要……进行技术革新……以实现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以及建设在未来20或25年所需要的农田水利基本设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急需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青年。 1964

近年来，中国的宣传媒介一遍又一遍地在强调着这样一些同样的主题，即农村需要“有文化和科学知识”的青年，这些青年将在农村普及文化、科学和现代体育活动，这些青年将帮助改变“旧的传统观念”，将给农村带来“一种鼓舞人心的新气象。”<sup>101</sup>这种宣传的意图是明确的，即：城市青年应当为乡村的发展建设事业作出贡献。这个运动的目的是要消灭城乡差别。这就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下乡知青对乡村发展建设事业究竟起到了怎样的重要作用？上山下乡运动展开的中心意图是什么？

当制定政策的人们考虑如何使受过教育的青年适应农村建设的需要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似乎不是城市青年而是农村青年，也就是说那些走出村庄，受过中学教育，然后又回到村子里的青年。正如前一章所提到的，回乡知识青年比下乡知识青年要多得多。1975年在福建，有24万下乡知青，100万回乡知青在农村服务。近年来，乡村青年上中学的机会在大量增加。据报道，1972年全国3600万中学生中有2/3在农村。这意味着仅这一年，上中学的农村青年的人数是1968——1975年间下乡青年人数的两倍（2400万：1200万）。

早在城市青年的上山下乡成为一个主要争端之前，中国的领导人就意识到了对乡村中受过教育的农民进行再教育（培训）的极端重要性。50年代中央委员会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邓子恢在1954年就曾写文章谈论过这一问题。一年后，毛泽东联系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指出：“如果有机会，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应高兴地到农村去工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sup>102</sup>这两句话后来成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流传最为广泛的语录。然而，毛在1955年所写下的这条语录不是针对城里人而是针对那些上过学、而后又选择留在农村，用所学的知识来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担任会计和记工员等的青年农民的。



由于有可能从农村移居到城市，受过教育的青年农民倾向于离开乡村，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在完成学业后不愿回到农村。这与一般人的普遍观念，即读书人应向往高层次的城市生活是吻合的。1962年，邓子恢在一篇文章中写到：1949年以来，山西省山阴县有9975人高小毕业，只有9人留在农村。在同一时期内，这个县有1554人初中毕业，但无一个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sup>100</sup>1957年，一个人民日报的编辑埋怨说，农村中的初中毕业生太少，并且几乎没有高中毕业生。上过中学的农民几乎全部留在了城市——不是继续学业，便是在工厂里找到了工作。<sup>101</sup>所以，毫不奇怪，让受过教育的农民回乡参加建设，被看成了一个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问题。

象要求城市青年上山下乡需要青年们改变一些理想前途观念一样，动员受过教育的农民留在农村也需要帮助他们树立起新的理想前途观。农民对待上学读书的传统观念是，读书是一条逃脱农业劳动的途径。“种田不读书，读书不种田。”<sup>102</sup>上学读书被认为是一条脱离种田而进入上流社会的必由之路。<sup>103</sup>城市是具有高的生活水准及高收入的地方这一事实，使这一观念更加根深蒂固。确实，正如在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正是上学读书这一种经历使农民意识到了城市生活所具有的吸引力。<sup>104</sup>改变这样的观念需要乡村公社进行有效的政治教育。许多报纸刊有这样的报道，即一个农民从学校毕业之后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时如何受到嘲笑和轻视，因为他没能进入政府部门或留在城市，故而他的这种回乡之举很难较快地为家乡所接受。<sup>105</sup>这样的报道事实上意味着城市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是试图向乡村青年显示这样的效应，即：如果采取有力措施将城里人动员到农村去是正常的事，那么，乡下人又怎么能总期望离开农村呢？

当然，下乡知青对乡村建设发展所起的作用并不仅仅是象征性的。首先，下乡知青的数量虽然少于回乡青年，但他们的总人

数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再者，尽管农村青年有比下乡知青对乡村环境更为熟悉的优势，但下乡青年所受教育的质量却可能高过回乡青年。再更进一步说，动员城市青年到农村去也比动员乡村青年留在农村要更困难些（见第5章）。综合起来，作出这样的结论似乎是合理的，即，在乡村发展建设中，回乡青年所起的作用最为重要，下乡青年作用的重要性次之。

上山下乡运动中，还有一个问题涉及到该运动与乡村发展建设目的的关系。分析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是观察插队落户的形势。一般说来，在安置上，下乡知青比回乡知青占优势，他们可以被安排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而回乡青年则不考虑国家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都被指定回到自己的家乡。<sup>100</sup>那么，实际上下乡青年的安排充分体现了他们的优势吗？一般说来，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是这个国家最不发达、最穷、最落后的地区，也就是说是在西部和边疆的省份或者在那些偏僻多山的省份而不是在平原地区那些较为富裕和发达的地方。然而，有资料数据表明，安置在这两类地区的下乡知青都有，也就是说，一部分青年确实被安排到了落后、偏僻、贫穷的地区，但也有更大量的青年被安排到了更现代化、更发达、更繁荣的地区。上海地区的青年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有60万知青到上海以外插队落户，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被安置到了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和云南这样一些边远省份；但是，有40万被安置到了上海周围的10个郊县，这些地区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都受到现代化的影响，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上海郊区难道是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吗？是否上山下乡除了发挥知青在乡村发展建设中的作用之外还有其它目的呢？

除了上海以外，也还有其它例子，虽不准确，但仍可以看出有许多知青被送到了较为发达的地区。1968年至1972年两份国家级的报纸《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都刊载了不少有关知青下乡的文章，虽然文章中通常没有下乡知青的确切数据，但一共

提到了有 312 个县安排有插队知青。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中国郊县资料库的资料将这 312 个县与其它一些没提到的县进行比较，<sup>100</sup> 比较结果表明与知青下放有关的那些县似乎比文章中没有提到的县离省会城市更近，这意味着知青插队落户的地方不仅不那么偏僻，而且是较发达一些的地区。<sup>101</sup> 同样，文章中提到的那些县在地势上似乎低于那些没有提到的县，这也就是说，有关方面倾向于将知青安置在平原地区，而不是更偏僻落后的山区。<sup>102</sup> 最后，这些文章中提到的那些县比那些没有提到的县稍早有铁路贯穿其中，这也意味着较早受现代化影响。<sup>103</sup> 如果仅因为报纸的报道还不足以确切地反映插队落户形势的话，那么，上述发现可以不作为结论性的论断。此外，各县之间的情况也不尽相同，这些，在比较中也都没有反映出来。

来自广东省的有关资料还表明，下乡知青不一定愿意到那些“可能最需要他们”的最穷困地方去，而是愿意到富裕些的地方。<sup>104</sup> 据被采访者提供的材料，在广东省的山区农村，一般年景下，一个成年男子每天 10 分的工分值只有 3 角或 4 角钱。与此相对照的是，在富饶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村里，10 分大约是 1.2 元至 1.5 元，每天收入 7 角至 1 元钱被认为是中等水平。在我所采访的青年插队的生产队，工分值是 10 分工从 4 角至 1 元 2 角不等，但一般情况下是 8 角至 1 元，这样就是中等水平的收入。威廉·帕里什和马丁·怀特这两位社会学家收集到的资料表明，广东的下乡知青参差不齐地被安排在富庶及较发达些的乡村里。帕里什和怀特分别对不同的村庄进行了调查。在这些村庄里，下乡知青占成年人口总数的 3% 左右，他们还统计了家庭拥有的财产的状况，其中包括农民家庭所拥有的收音机和自行车以及生产队所拥有的机械。表 10 显示了对 36 个村庄的统计调查所得出的数据，调查数据清楚地表明，只有少数知青愿意在平均生活水平水准较低的村庄安家。同时，帕里什和怀特还统计了 39 个村

庄的粮食产量、工分值和生产队拥有的机械状况，利用有关数据，他们推算出了集体的经济标准，39个村庄中有23个处于低水准，16个处于高水准。在3/4（74%）低水准的村子里，下乡知青所占成年人比例数均少于3%，而集体经济的状况较好的那16个村子里，却只有一半村子里的知青人数少于成年人总数的3%。

表10 下乡知青在广东农村贫穷和富裕地区安家的情况\*

下乡知青 所占成年人数	贫 困 村庄数      %	富 裕 村庄数      %
低 于 3%	14      82%	9      47%
高 于 3%	3      18%	10      53%
总 计	17      100%	19      100%

虽然这些数据不一定确切，但大量的下乡知青都被安置在较富裕、较发达的村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一种解释可能是认为笼统地提农村需要知青的理由并不确切，而应当说只有那些已经相对现代化一些的村子里才需要下乡知青，因为现代化使分工更细，这样，这些地方才需要教师、医护人员或农业技术人员。但从我们所得到的资料看，又只有很少的事实能说明那些更现代化的村子需要下乡知青服务。事实上这些地区也确实不那么需要下乡知青，因为这些地区受过中学教育的农民比那些贫困、边远地区受过中学教育的农民多一些。

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解释这种状况，就是这种现象反映了中

---

\*资料来源：威廉·帕里什爵士和马丁·K·怀特为他们即将出版的著作《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所收集的资料。

国发展乡村建设的一个显著特色，即强调劳动力之重要性的特色。在城市里，中国人千方百计寻找经济地使用劳动力的途径；在农村，人们重视的也是对劳动力的需求。双季及三季稻的发明，对发展副业的鼓励，社办企业的建立以及集中人力建设一些农业基础设施，如筑梯田、修建排灌设施等，都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即使在人口密集的村子里，多季稻也常常导致农忙季节劳动力的短缺，一些农用机械，如插秧机等便被用来弥补这种不足。<sup>122</sup>在这种情形之下，不难设想，下乡知青可以在农忙季节满足对额外劳动力的需要。或许城市郊区农村的分工更细，因而更需要下乡知青，这一假想的前提或许有助于说明为什么那里的下乡知青很多。到知青人数占总人口 82000 人的 3% 的北京郊区红星人民公社参观的美国客人被告知，在这里，下乡知青是受欢迎的，因为这里劳动力“非常紧张”。<sup>123</sup>不过，象这样较坦率地肯定知青下乡与劳力紧张有关的回答是非常少的。

那些较为发达繁荣的农村地区，人口密集度也很高，并且人均耕地很少。这些村庄很可能即使在最需要劳动力时也无法安置新来的城市青年。从被采访者及参观者双方提供的信息来分析，人口的密集度及土地和劳动力的比例关系确实也限制了对下乡知青的安置，实际上也只有很少的知青被安置到了劳动力的边际价值几乎等于零的地区。<sup>124</sup>尽管帕里什和怀特通过研究发现，在人口密集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落户的知青比在珠江三角洲以外村庄里落户的要多，他们同时也发现，知青占总人口数的比例是受到人均占有土地比例的影响的。他们将每个劳力占有 3 亩以下耕地的 12 个村庄与人均拥有耕地较多的村庄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前者只有 2 个村的知青人数超过了 3%，而人均耕地数较多的那 19 个村庄中，知青人数超过总人口 3% 的则有 9 个。<sup>125</sup>

上面的解释并没有清楚地回答出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究竟为什么更需要下乡知青——不论是作为劳动力还是象教师这

样的“现代化的促进者”。那么，就有了对知青在较发达地区落户原因的第三种解释：决定将知青安排在何处的主要标准或许根本不是建设发展的需要，而是一个村庄安置新移民的能力大小。<sup>124</sup>换句话说，村庄的富裕程度成了决定性因素，那些穷困的村庄没有能力吸收新移民。因此，考虑到给城市青年提供用武之地的可能，上山下乡运动的领导者们更愿意选择那些富裕些的村子来安置知青。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种现象也就意味着安置知青的方式是受到一些落后生活方式制约的。之所以作出将知青送到能够接收他们的村子去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让知青能尽快适应乡村生活的目的，因为与贫困地区相比较，知青似乎更容易适应繁荣些的乡村生活。<sup>125</sup>如果将知青安置到离家近的地方，譬如郊区公社或知青的家所在县市境内的公社等地，或者到在方言、气候、饮食及风俗习惯差别不太大的地区，知青对乡村生活也更能适应一些。<sup>126</sup>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可能影响到知青的安置，那就是再教育问题：原则上，只要有贫下中农的地方，不论是否存在着发展建设事业的需要，都可以对知青进行再教育。但也要考虑到减少管理方面的麻烦这一因素。表4表明，除了来自8个城市的知青外，其余的知青都是安排在本省。将跨省的上山下乡限制在少数几个城市的做法，与中国健全的地方行政区域管理体系是一致的。绝大多数省都要过问和解决本省知青的问题，而不是将包袱甩给中央。应当强调的是，即使有了以上这些因素，也没有影响下乡知青对乡村的建设发展事业作出重要贡献（详见第5章）。或者说，知识青年在农村所作的贡献也是官方所期待这场运动应取得的成果。不过，也应承认，这诸多其它因素的存在，也确实是与上山下乡的主要目的——为乡村发展建设事业作贡献相矛盾的。

实际上，对安置工作中的一些具体规定，我们一无所知，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城市和乡村间、省里或全国的官员们是怎样

互相配合着作出这些规定的，有时，因过多地考虑了其它一些因素而作出的决策，甚至对乡村建设发展起了阻碍作用。1968年至1969年间的情形或许可以作为一个例子。那时，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受到了文化革命的冲击，将数百万红卫兵送到农村去，部分原因是考虑到恢复城市里的秩序。可能那时，还没有仔细计划在农村中该如何安排。被采访者说许多广州青年被安排到了人口密集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但在1968年——1969年的上山下乡高潮之后，这种情况就再没有发生了。从那以后，作出安置知青决定的过程走上了程序化，不过对于究竟该怎样考虑到乡村发展的需要还是不很清楚。

本书以后的讨论仅以一类下乡知青为主要对象，即那些在较为发达和进步的地方插队的知青。如前所述，也有许多知青被送到了贫困、不发达的地方，这些地方有些在他们家乡的所在省，也有些在较远的边疆地区。已有材料表明，除了用于帮助知识青年安家落户、适应新环境的那笔安家费之外，国家不再对有知青落户的公社提供任何帮助。一旦这笔钱用光了，知识青年就必须依靠当地的经济收入生活。在贫困地区安置知青需要更多的外援，国家显然不情愿、也没有能力提供足够的资金以便能够在贫困地区安置知青——这些地区很可能是最需要下乡知识青年的地方。国家的资金分配主要流向国营单位，也就是说流向了由国家、省或县有关部门管理的国营农场，或由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管理的农场。按规定，国营或部队管理的农场应当争取自给自足，但他们的建设投资来自于国家，如果他们的工资低到不足以给工人发固定工资时，国家预算就将补足其不足部分。因此，在那些靠自己地方的财政难以维持下乡知青基本生活的贫困地区，国营农场及部队农场显然就成了安置下乡知青的主要场所。还应当注意的是，一些较早的数据如广东所提供的数据，多只涉及到安置在人民公社及其它自负盈亏的生产单位里知青的情况，同

样，涉及到县级行政区域内知青状况研究的材料也只是主要反映了安置在该县人民公社里的知青的状况，因为报刊公开刊登文章提到部队农场的时候并不会提到该农场位于哪一县，涉及到国营农场的时候也很少提到。此外，这两类数据也都取自于 60 年代末或 70 年代初，那以后，有关方面曾制定了增加给公社以资助的政策，这样就使贫困地区的公社有可能安置更多的下乡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后几年，知青主要以青年队和青年场的形式安置在人民公社内，但一般都是独立于公社的大队和生产队之外，安置在待开垦的边缘地带。国家给这些知青组成的生产单位提供各种物资援助。在江西，有 1400 个这样的青年队。在 1974 年至 1975 年间，国家给这些知青点提供了 600 万元的贷款以供他们购买化肥、耕牛、种子和农具。<sup>100</sup>这种做法给在贫困边远地区大量安置下乡知青创造了条件，也调动了青年为这些地区的发展建设作贡献的积极性。

中国的绝大部分省都建有国营农场和部队农场。<sup>101</sup>这些农场的建场目的，从种植一些有特色的作物，如水果、甘蔗（如广东附近的一些地区）到饲养牲畜和管理培育森林。这类农场的首要任务是开垦荒地。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那些长期荒芜的地方，知青队的垦荒成就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上海郊区的 40 万下乡知青中，有 15 万是在国营农场服务；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包括“挖出了数千条灌溉渠并开垦了千万亩良田。”<sup>102</sup>不过，许多国营农场和部队农场建在更偏僻的地区。例如在广东，一些国营农场建在人烟稀少的北部，而部队农场则建在海南，一个适合于种植橡胶的地方。尽管我们收集的数据不够全面，但看来国营和部队农场大都还是集中在一些边疆省份。譬如黑龙江省，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开垦大片的可耕荒地，在这个省的 120 万下乡知青中，就有 40 万在部队农场服务。<sup>103</sup>另外一份材料也谈到在这个省的北部、北纬 50° 的地方，有 15 万下乡知青在 8 个国营农场里参加垦荒的



事；或许在这个省还不仅只有国营农场。<sup>131</sup>1972年，在内蒙古，18万知识青年中有10万人在部队农场服务，在新疆，45万知青中至少有10万在部队农场，而在国营农场的知青则可能更多。<sup>132</sup>1975年，云南的40万下乡青年中有“将近10万”在省内“农垦系统”内的国营农场服务；在部队农场服务的知青的数字尚未发表。<sup>133</sup>

促成知识青年在边远省份插队落户的因素有如下几点。首先，象黑龙江和新疆自治区这些地方人烟稀少，这些地区对劳力的需求十分明显。因此长期以来，这些地方不仅是安置下乡知青的场所，也是移民的好去处。<sup>134</sup>正如新疆的党委第一书记赛福鼎在1975年所指出的，内地提供的援助，“特别在劳动力方面”是过去“形成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局面的一个重要条件……将来还需要这样做。”<sup>135</sup>其次，在内蒙、新疆、云南和海南的一些地区，居住着少数民族，汉族人口的增加，促进了这些地区的民族大融合。第三，在边疆省份，特别是在与苏联和外蒙古接壤的一些省份建立国营农场，至少对国防建设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有建立屯垦戍边的移民兵团的传统做法。这些部队农场的建立使新疆、内蒙这样一些少数民族为主的边境地区的汉族人多了起来。生产建设兵团的建立与军事需要有关，它的目的不仅是开垦荒地，也为了建设国防。部队农场的职工有正在服役的战士，也有复员军人，而知识青年则在这样的农场里接受一些军事训练，成为“战士”。<sup>136</sup>

#### 4. 决策——无法消弭的矛盾与斗争

制定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是一桩错综复杂的事，因为，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展开这场运动的原因并不只是一个，而是好几个，因此，涉及到政策制定的人也相应的复杂。1976

年的一条广播消息表明，许多部门和单位都卷入了这场运动：“从中央到地方党的委员会都建立了各种专门的小组和办公室来研究和解决知青下乡运动中所产生的问题。有关的政府部门进行了适当的安排并找出了全面解决问题的办法。”<sup>100</sup>1964年中央委员会成立了“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还成立了安置办公室，国务院和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也设立了作用相同的组织。一篇红卫兵写的文章将这两个办公室合称为“中央安办”。“中央安办”由谭震林和周荣鑫领导。1965年，“中央安办”负责起草了一份有关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安排的联合决议草案，<sup>101</sup>这份决议草案是以党和政府里的其它有关机构投入的资金及物资为基础的，这些机构和部门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劳动部、教育部、农业部、国家农垦局以及国防部。文化大革命以来，有一些部委被取消了，而另一些，如教育部，只是在1975年进行了重新组阁，有些部委的作用已被中央的其它一些单位承担，如劳动部，成为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内的一个劳动局。这个局的工作人员写有关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文章。<sup>102</sup>1976年，一条广播消息涉及到了国务院的“知识青年工作安排办公室”，这条消息暗示，这一组织与文化大革命前一段时期内存在过的类似组织有着延续性，很可能其具体组成人员也有其连续性。<sup>103</sup>

中国的政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权力分散，因此，政策的制定就不仅仅是北京方面的事情。在北京方面提出的基本方针的指导下，各省在上山下乡工作中执行这些政策时，毫无疑问要行使一定的自主权力，因为，如前所述，大部分城市青年都是下在本省内的乡村。<sup>104</sup>故而，省以下的行政组织及官员，如农村的：地区、县及公社；城市的：市政府以及街道组织甚至居民委员会，都会参与有关政策的制定。确切地说，他们的任务是做一些促进上山下乡运动的具体工作，但这些基层干部的工作方法亦影响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因为，如果只有高级干部来制定政策的话，

这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便会因为引起问题而受到阻碍。最后，群众的态度、倾向性及反应程度也影响到政策的制定并成为修改和补充政策的依据。群众能够接受什么，不能接受什么，或经过引导能接受什么等等因素，均对政策的制定者产生影响。

政策制定者同管理和实施人员及其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政策制定的结果无疑也会产生作用。由于材料的缺乏，对于这类问题我们必须注意仔细观察。譬如，我们不知道，将部分下乡知青安置在相对富裕地区或他们家乡的省份这样的做法，是否反映出了来自公众的压力，是否是决策者们出于对群众的要求、资源限制、行政管理的便利等诸因素的综合考虑而采取的措施。<sup>\*</sup>我们对参与决策的有关部门在决策过程中的情况知之甚少，但可以肯定地说，在行政方面负责实施这场运动的机构对这场运动的开展会产生影响。因此，红卫兵们冲击中央安置办的官员以及象广东省知青办主任丛明（音译）这样一些地方负责人，指责他们歪曲了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路线。据说，这些官员们更关心的是解决在安置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而不是这场运动所要达到的理想主义的目标。<sup>100</sup>但我们并不能断定，这些管理干部在这场运动中有无既得利益及是否因此而对自己所做的工作尽了最大的努力。

中国的领导人是怎样支持和领导这场运动的呢？在最上层的领导人中，毛泽东毫无疑问给了这场运动以强有力的支持，因为

---

\* 谈到公众的态度问题，应当重申的是，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不相容的革命运动。因此，如果政策的制定者仅仅只是迎合公众的感情或者迎合他们在这场运动刚刚开始时所持的态度，那么上山下乡运动就根本无法开展。因此，政策制定者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制定出既能减少甚至消除人们的不满情绪，又能在客观上促进这场运动开展的具体政策。

这场运动所强调的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以及建设发展的方法、途径都与他的名字紧密相联。毛泽东有时以一些特殊的方式介入这场运动。如1968年他发表那篇关于知识青年应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著名演说，1973年4月给福建的一位教师就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所遇到的困难而发出呼吁的回答，这个回答主要是在物资上给予救济补助（见第4章）。周恩来总理也发表过支持这场运动的讲话。1968年初，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上山下乡运动受到下乡知青的冲击时，周恩来精力充沛地捍卫说：“青年到山区和农村去是毛主席的号召，其目的是要我们关注乡村建设，改变半殖民地经济所遗留的畸形发展状况，促进社会主义经济产生，以在更加平衡的发展中取得更大的成就。”<sup>100</sup> 华国锋在1976年10月接替毛泽东当上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后不久，便公开表示要持续开展上山下乡运动。<sup>101</sup> 因此，正是由于有了中国这些关键性领导人的支持，上山下乡运动才得以持久进行。

然而，根据中国的宣传媒介对待这场运动的态度来分析，事实上高层领导人中的分歧也一直存在。据有关资料，那些“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路线的人”“几乎在连续不断地攻击这场运动”。

千百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一场深入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场革命不可避免地将会遭到党内资产阶级的疯狂抵制。从刘少奇的下乡镀金论到林彪的变相劳改论……1975年夏，当右倾翻案风席卷全国的时候，邓小平右倾机会主义者又疯狂地攻击和反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革命。<sup>102</sup>

这些争论中有许多尚未得出结论的问题：刘少奇到底是在提出上山下乡是成名升官的一个途径时被批判的，还是他倒台后这种观点才受到批判？林彪将上山下乡运动与劳改联系起来，是一

句随便的议论还是强调应提倡让青年们能有更多的选择？邓小平是主张完全取消这场运动还是仅仅只对这场运动的原则及实施措施进行某些修改完善？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是复杂的，因为中国高级领导人的命运变化很快。上引的这篇文章只是 1976 年春那场批判邓小平的政治运动中的一个反映。文化大革命中被清除出党的邓，1973 年恢复了名誉，1976 年 4 月周恩来去世后再次倒台。他的被打倒是由一组左倾的政治局委员操纵的。1976 年 9 月毛主席去世后不久，那一伙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被清除出党并被定为“四人帮”。他们被谴责为资产阶级阴谋家和可耻的极左分子。报纸上详细列举了他们的许多“罪行”。其中“阴谋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便是他们的罪行之一。<sup>100</sup> 这一系列事件表明，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种种争议似乎仅仅只是某种权力之争的产物，对这场运动所起的影响并不重要。

不过，将对被清除的一些党的领导人的某些特别指控作一些仔细的分析，便可以看出，一些政策的制定者对于这场运动的利弊确实存在着不同看法，也就是说，对这场运动的展开存有矛盾的心态，或许甚至是真正的反对。牵涉到邓小平的一个问题是，上山下乡的展开影响了培养国家建设需要的受过良好训练和教育的人才。1976 年，邓被指责为“认为上山下乡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障碍。”<sup>101</sup> 1975 年元月，周恩来给全国人民提出了“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sup>102</sup> 在教育界的一些官员，其中包括新任命的教育部长周荣鑫等看来，由于缺乏受过良好训练的科学技术人才，要实现这一远大目标还是困难重重。他们批评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低以及过于重视讲授应用性知识和普通常识。他们强调说，为了将来能不仅在工业方面，也在农业方面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学校教育应当更加重视科学研究。<sup>103</sup> 邓小平显然支持了这些批评性的观点，就象后来对他的谴责和批判所指控的

那样：是以“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向无产阶级教育方针提出挑战的形式支持了这些观点。

邓小平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导致高等教育质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中学生从中学毕业到升入高等院校之间有一个较长的停顿时间，故高等院校不得不对招进来的学生进行补习性教学。为了提高新生的质量，邓对中学毕业生必须先参加生产劳动然后才能进入大专院校学习的原则提出了改进的措施。由于恢复优秀的中学毕业生都应直接进入大学接受教育的做法，邓否定了由“教育革命”所带来的一个最基本的变化，而这个变化正是上山下乡运动之所以得以展开的一个主要前提。在邓的敌人们看来，他的这个建议以及在教育领域里的其他一些建议威胁了基本的政治原则。在邓受到冲击之后，他关于使有才能中学生不必上山下乡或去工厂做工、去部队服役就可直接上大学的想法，被指责为复辟资本主义阴谋的一部分而受到了尖锐的批判。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 1975 年至 1976 年有关教育革命和上山下乡方针政策的是非之争的详情。可能邓再次反对使教育革命激进化并将上山下乡扩展到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做法。1975 年夏，报纸上发表了将大学毕业生当成普通农民而不是国家干部而送到农村去的消息，这样便降低了这些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并引起了有关他们的前途的一些问题。邓小平因为“恶毒攻击……大学生当农民是‘极左’”而受到了批判。这里的所谓“极左”，也就是说超前采取了只适合于完全的共产主义阶段的做法。<sup>100</sup> 无论当时情形如何，邓及一些教育官员提出了一些关于上山下乡运动对高等教育质量所产生的不良影响的问题。显然，高等院校不仅因承担对被选送进来的知青进行实习性训练以使具备攻读大学课程的能力而浪费时间，而且，由于上山下乡制度本身的原因，事实上绝大多数优秀青年不可能被选派进大学深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问题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被粉碎及 1976 年秋的继续批邓

运动而得到解决。“四人帮”因为公然迫害知识分子、反对学术研究而受到了谴责。<sup>109</sup>但是，据被采访者告知，直到1977年初，在教育 and 上山下乡运动的方针政策上均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问题是否能得到解决，将如何得到解决，还有待于进一步观望。

如果上山下乡运动是由于其对高等教育产生了不良作用而受到质疑，那么，同样也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即上山下乡是否还因为冲击了国家建设优先权而受到非难。上山下乡运动意味着特别重视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事实上也可看作是以城市的人力物力支援农村建设的一个试验，有人则质疑这样做是忽略了中国加速城市现代化步伐的潜力和城市发展的战略地位。他们或许认为，如果中国接受国外的长期贷款，并大量引进日本及西方的技术，那么现代化的进程就会大大加快，那样就没有必要将这样多的城市青年送到农村去。对这些人来说，上山下乡或许仅仅只被看作是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一项应急措施，随着工业发展的优先安排和外资引进限制的放宽，这场运动就会消失。在中国的政治争论中，这些分歧意见确实一直存在。不过，又几乎没有事实证明，知青下乡运动因为这些争论的原因而受到干扰和冲击。<sup>110</sup>或许，反复强调这场运动对于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性，正是为了驳斥这样一个观点，即青年人，或至少某些青年人，若在城里工作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样，对于这种农村确实需要城市知青的断言，也会有人提出疑问：下乡知青究竟对乡村的建设事业起到了怎样的重要作用？正如在前面的章节里所提到的那样，农村对知青服务的需要也如同知青们贡献的价值一样，是变化不定的，并且，对于如何充分发挥知青在农村中的作用，也一直存在着大量的意见分歧，这些意见分歧是否也导致了决策层在制定政策时的不同指导思想，我们现在尚不得知。<sup>111</sup>

另一项争议涉及到这场运动的社会消耗。在城市里，每年都

必须有许多机构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做下乡知青及家庭的动员工作，以确保运动的顺利进行。大量家庭因对运动的不理解而感到不高兴，动员这些家长不仅支持这场运动同时也配合完成其它一些与运动有关的工作会使事情变得复杂。另外，一些下乡青年倒流回到城市，他们的有些行为会引起犯罪问题（参见第3章和第6章）。在农村，干部和农民也不得不应付那些不能顺利适应乡村生活的下乡青年。农村中的一些干部抱怨说上山下乡运动给他们带来了“额外的包袱”。这种观念十分普遍，以致于《红旗》杂志都对此发表了评论。<sup>136</sup>尤其是当下乡知青对农村的建设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一点也不明显时，乡下人没有理由不这样看。下乡知青“难管教”的情形或许很特别，但至少有一些例子证明确有其事（参见第4章）。说上山下乡运动有可能缩小城乡差别而不是扩大它，这也是官方的意图。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在批判修正主义时指控说，一些上层的制定政策的人及地方管理干部认为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就是清除城市中的游手好闲者、竞争中遭淘汰的人以及阶级成分不好的人，也就是说，清除那些不够格上大学或安排进工厂的人。他们指出谭震林在1963年曾经说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根除青少年犯罪和城市流氓团伙、灭绝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支援农业建设等方面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就业本身。”<sup>\*</sup><sup>137</sup>红卫兵们指控说，乡村干部和农民知道了这些说法之后，便将农村看成了接受城市遣散人口的收购站，因此，也就瞧不起下乡知青并虐待他们。<sup>138</sup>

没有明显的证据可以说明这些与上山下乡有关的城乡不利因

---

\* 红卫兵报纸指出谭错误地理解了“就业本身”。可以认为这里所指的就业本身，正象在本章第一节所提到的一些政策决策者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对就业的一种选择，譬如，可以选择被安排进街道工厂工作。



素对有关政策的制定产生过重要影响，不过这些因素或许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所指控那样，成了促使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提倡青年可以在街道工厂就业以对上山上乡运动作出选择的因素。这些因素或许同样也使得制定政策的人们考虑是否应对下乡的青年作出最终安排他们返城的保证。下乡又返城这样一个循环或许会消除许多由这场运动所带来的不满情绪，但同时也使这场运动丧失革命意义。政策制定者确实认真考虑过有关下乡回城的循环往复问题。到1964年，国务院明确地显示了对持久的上山下乡运动的介入。<sup>133</sup> 据被采访者说，60年代初，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曾对下乡知识青年许诺说保证他们三年之后返城。文化大革命中，这一许诺被严厉批判为修正主义。1976年，邓小平也因为提倡“在农村锻炼两年后就返城”的方针而受到批判。<sup>134</sup> 此外，还有一些支持这一想法的“领导同志”也受到了谴责。<sup>135</sup> 这些材料反映出这样两方面的信息，即，一方面，制定政策的人受到了社会上对上山下乡持不同意见的人们的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一些政策制定者也确实考虑过给下乡知青在城里安排工作。

对这场运动的不满情绪之产生极可能是因为对中央发动这场运动的动机的怀疑，也就是说人们有可能重新判定发动这场运动的人的动机。除非制定政策的人们也持有与运动发动者一样的理想主义信念，否则，他们也会从各个方面对这场运动产生怀疑。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指控证明了这一点。譬如，刘少奇认为教育方针应该鼓励青年人树立进入上流社会的雄心壮志，而谭震林则根本怀疑城里人是否能变成真正的农民：

现存的生产方式就是这样，谁愿意到农村去呢？人人都想到城市里来，在城里扫大街，每月可赚30—40元，而在农村，一年的收入也难超过200—300元。参加这次会议的各位代表中，谁愿意当农民？即使有人举手表示他愿意当农

民，内心也不是情愿的，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sup>102</sup>

谭认为只有当农村的建设发展达到了城市的水平，消灭了城乡差别之后，城里人才会愿意接受乡村生活：“许多人不愿在农村地区工作，想回到城里。将来等农村建设好了之后，他们是会愿意留在农村的，因为乡村里空气清新，亦可能有电灯、沥青铺的马路以及现代化建筑。”<sup>103</sup>

谭的批评者将他的这种看法比作是赫鲁晓夫式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sup>104</sup>这些人认为在革命的现时代里，一个革命者就应相信城市人也可以成为农民，而且只有修正主义者才怀疑这一点。其实，没有理由认为不同意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修正主义，以谭震林为例，他以前也十分赞成将城市青年送到农村去。<sup>105</sup>不过，普遍的怀疑主义情绪或许确实促使政策制定者们考虑过，怎样让人们在这场运动拥有部分选择的权利，或寻找增加知青返城机会的途径。

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反对修正主义怀疑论者的悲观主义，被后者认为是问题的东西，前者便视为一种挑战：“我们是应当同旧的传统观念作斗争还是屈服于旧的传统观念呢？”<sup>106</sup>革命者珍视上山下乡运动，是因为这场运动的开展要求人们为创建一个新世界而努力奋斗：

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鼓舞着我们前进，革命的青年人应当同资产阶级思想彻底决裂，在农村扎根，终身务农，将我们幅员辽阔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许多优秀的青年已经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们胸怀远大的革命理想，投身于当前这场斗争。他们将所做的每一工作都看成是在为创造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环境条件而作的不懈努力。<sup>107</sup>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左派们之所以支持这场运动，或许不仅因为这场运动可以对人们世界观的改造产生作用，还因为这场运动与在全社会展开的与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事业紧密相联。上山下乡是一场彻底的革命运动，因此应当创造彻底革命的环境，以便这场运动能蓬勃展开。例如，愈依靠物质刺激、愈提高城里人的工资及地位，下乡知青与在城里参加了工作的青年之间的鸿沟就会越大。相反，进一步限制“资产阶级特权”，则可以缩小差别，减少隔阂，以使人们更加能够接受上山下乡运动。同样，大学毕业生的身份越高，他们与到农村当了农民的中学毕业生之间的差别也会越大。1975年那场将大学毕业生也送到农村去当普通农民的运动的目的一就是为了缩小这两类青年之间“差别”。<sup>100</sup> 还有一些其它类似的措施，也是出于这一需要，或许，用这样的说理方法可以引导那些出于支援国家建设目的支持这场运动的人支持左派的方针政策。

在“四人帮”倒台之后的那几个月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理想主义目的得到重新强调。上山下乡继续被认为对于缩小“三大差别”（即城乡、工农、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sup>101</sup> 这种连续性或许意味着四人帮垮台后当政的领导人仍崇尚着平等的社会和社会主义新人的理想。这些领导人或许认为，为了继续开展这场运动，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是最重要的。这种教育有助于使上山下乡运动继续合法化，同时也是对持不同意见者或者反对者施加压力的一种形式。因为，四人帮倒台后对左派分子的批判使对上山下乡持怀疑态度的官员们受到了鼓舞，同时也可能使广大公众产生了这样一种期望：即上山下乡运动可能就此会结束了。针对这种状况，加强对思想意识领域里的控制，有助于使全国人民注意到，反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路线方针的行为是不会被容忍的。正如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 1977 年 1 月在一次下乡

青年的集会上所提出的那样：“以坚持将知识青年送到农村的行动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就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怀疑这一点，谁就是怀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谁对此缺乏信心，谁就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缺乏信心；谁反对这一点，谁就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sup>176</sup>

如果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压力确实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起着重要作用，那么就能够分析这种压力是否对这场运动的进行和管理产生了影响。在中国，对规范化行为的强调常常伴随着对个人物质利益的激烈反对，因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有损于培养无私新人的目标。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使人们能接受上山下乡，一些决策者和管理者们确实因强调个人利益而受到过激烈批判。特别是刘少奇因主张给青年提供继续学业、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以便有更好的前程而遭到谴责：

如果只是要求高中毕业生到农村去当农民，他们可能会不愿意去。如果到农村去了之后……他们能够去上学，也就是说去上半工半读或者半农半读的学校，他们或许就愿意去了。<sup>177</sup>

在农村种了三至五年地之后……取得了三种资格之后，你或许会成为县级干部、省级干部，并且还有可能会进入中央委员会。<sup>178</sup>

同样，中央安置办的官员们也因为没有严肃地执行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打成一片，创造出“最适合于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环境和条件”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是陷于操心同工同酬、减轻负担、提供住房以及知青的婚姻等私生活琐事而受到谴责。<sup>179</sup>

强调思想意识方面的革命化和对物质利益的排斥，给运动的正常进行带来了困难。因为要有效地开展这场运动就要与社会上实实在在的人打交道，而不是与可能存在的那一类人打交道。文化大革命后，曾一度忽视了对个人的鼓励及物质刺激，结果表明在处理说服动员工作中的问题时，单靠政治教育是不能奏效的。因此，在70年代便又重新强调上山下乡工作中的物质条件。1973年，有一篇文章宣称：“青年人首先要能安于清贫的生活，然后才能有平静的心情。”<sup>100</sup>这一年，有关方面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来弥补和纠正这场运动中的不足之处。这些补救措施与中央安办曾经采取过而在文革中被谴责为修正主义的那些措施十分相似（详见第4章）。

这期间，一方面继续强调上山下乡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并没有受到公众的批判，另一方面还出现了这样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在重申上山下乡运动的革命目的的同时，也考虑到了解决下乡知青一些具体困难的必要性。<sup>101</sup>这种宽容精神来自毛主席本人。前面已经提到，1972年10月，福建的一位小学教师给毛主席写信描述了他的儿子的困境，他儿子在本省农村插队，但无力养活自己。因此，这位父亲不得不资助他。出于对自己死后儿子将要面临的一切的耽心，他给毛主席写信请求帮助。1973年4月，毛主席给他回了信并附上了300元钱。毛主席在信中允诺将会针对这种情形采取相应措施，因为这样的例子很普遍。<sup>102</sup>可以肯定是毛推动了改善知青插队落户的生活条件的车轮。1973年由华国锋主持召开了一个以这个问题为中心议题的全国性会议。<sup>103</sup>

因此，在中国人看来，将城市青年送到“山区和农村去”的方针，对于将国家建成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或缺的。同时，有关方面又是在以一种可以变通又能产生实效的方法执行这一方针。一篇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很好地表达了这种理想主

义的革命原则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工作方法：

周总理认为将知识青年送到农村去，是培养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缩小三大差别的一项战略措施……他无微不至地关心着青年人，他亲自组织知识青年开座谈会，倾听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并对他们的成长与进步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怀。<sup>178</sup>

只有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所开展的各项工作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才能弄清楚事实上中国的领导人是否令人满意地进行了这场运动中的各项工作。

注释：

- 1 新华社北京1974年8月24日电，《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66期，1974年8月26日。
- 2 约翰·P·埃默生：《大陆中国的劳动就业》，第419页；另见宋平：《谈劳动就业问题》。
- 3 埃默生：《大陆中国的劳动就业》第418页；侯启明（音译）：《人力·就业及失业》第370—375页。参见以下注18。
- 4 同上，第421页；另见克里斯托夫·豪：《中国城市的劳动就业与经济发展（1949—1957）》第36—37页、116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
- 5 约翰·P·埃默生：《人力训练及特殊管理人员的利用（1949—1968）》第190页，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
- 6 乔尔·格拉斯曼：《中国的教育改革和人力政策（1955—1958）》。
- 7 同上，第29页。
- 8 《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社论，1957年5月12日社论，1957年7月11日和8月22日社论。
- 9 如第1章中提到的，1957年9月，一篇题为《两百多万中小学毕业生上山下乡》的文章（载1957年9月22日《光明日报》）就象同时发表的社论一样，提到城

市青年，但很清楚两百万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回乡青年。值得提出的是，在那之前曾有数批城市青年下乡，譬如1955年，就有91位上海青年去了江西的农场，见1955年4月23日《解放日报》。

- 10 1957年8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亦可参见以下有关《乡村和边疆地区的发展建设》一节，以便进一步讨论农村回乡知识青年的问题。
- 11 豪：《劳动就业与经济发展》第130—131页。
- 12 埃默生：《劳动力的训练》第190页，华盛顿，美国商务部1974年版。埃默生将工人和职员人数综合增加到了2100万。他还提到（第192页）大跃进中一些城里人在一段时期内居然流动到了农村，从事乡村的建设项目。
- 13 埃默生（同上，第192页）引证的报告表明1961年3月至1961年10月有“一千多万农民”回乡。
- 14 参见第一章注67。另有一些文章既描述了年青人又描述了中年人到新疆这样的省插队的状况。见1960年12月29日《新疆日报》。
- 15 1964年1月15日香港《大公报》。
- 16 见中央情报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指南手册》。
- 17 见1967年11月1日《红旗》第3期及《共产主义中国译文：政治和社会》第436页。
- 18 宋平：《劳动就业问题》，《劳动》第21期（1957年10月4日），克莱斯曼《教育改革》第28页。
- 19 约翰·S·艾尔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政策和人口统计展望》第302—304页，华盛顿，美国商务部1974年版。
- 20 罗斯·特里尔在武汉被告知，文化革命期间计划生育放松了，出生率再次上升，达到15%。见特里尔：《铁树开花》第295页，波士顿，小布朗1975年版。
- 21 1956年的数据取自艾尔德：《人口政策》第272—273页，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物，1972年。1975年的数据取自哈伦·克利夫兰：《中国日记》第47页，乔治敦大学1976年版。
- 22 对人口统计学家艾尔德来说，这样低的出生率“除了是不完善的人口出生登记

制度的产物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意义”。参见艾尔德《人口政策》第316页。至于小一些的城镇请参见本章以下部分。

- 23 约翰·W·刘易斯：《中国旅行笔记》第164页，未公开发表的手稿。
- 24 丛朴：《中国怎样普及教育》第9页。
- 25 埃默森在《劳动力的训练》第193页报道：1955年，小学在册学生的总数是5300万，其中有25%的学生来自于城市家庭。见利奥·A·奥林斯：《共产主义中国的职业劳动力与教育》第32页，美国政府出版物1967年印行。
- 26 《愤怒声讨刘少奇》，载1967年11月10日《革命青年》（长沙）。见《中国大陆新闻综述》第4093期，1968年1月5日。
- 27 1964年2月27日《解放日报》。
- 28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1975年12月22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248期，1975年12月14日。
- 29 《谭震林关于知青安置工作的讲话》，广州《支农红旗》第7期，1968年1月，载《中国大陆新闻综述》第4123期，1968年2月21日。
- 30 昆明军区政治部宣传处编《连队形势教育大纲（第五课）》1973年4月6日，第99~104页，译文措词有所修饰。
- 31 在中国，有关方面经常通过召集会议或组织学习小组的形式向群众传达不公开发表的文件。见米切尔·奥克森伯克：《中国官僚政治中的信息传播方式》第1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
- 32 1973年4月28日的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消息，《世界广播综览——远东篇》第4286期，1973年5月4日。
- 33 见第4章，关于补救措施的讨论；还可参见1973年5月4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 34 1973年9月25日长沙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92期，1973年10月3日。
- 35 我很感谢耶鲁大学经济系的尼古拉斯·拉蒂教授，他提出的这一论点引起了我的注意。
- 36 大连有这样的例子，参见特里尔：《铁树开花》第132页。



- 37 豪：《劳动就业与经济发展》第127页。
- 38 同上。第43页；克利夫兰：《中国日记》第146页。
- 39 1972年下半年，上海的官员们对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派出的一个代表团说了这些话。参见刘易斯：《中国旅行笔记》第307页。
- 40 关于临时工人，参见评论员文章《中国劳动者不满的根源：工农制度》第3-7页及1975年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一个美国代表团提供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小型工业》第3章。
- 41 刘易斯：《中国旅行笔记》第307页。
- 42 《乡村小型工业》第九章。
- 43 格·奥费：《工业结构、城市比及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战略》，我感谢尼古拉斯·拉蒂教授向我推荐了这一资料。
- 44 有关上海的资料是由刘易斯的《中国旅行笔记》第307页及克利夫兰：《中国日记》第45页提供的；关于新乡的数据取自《乡村小型工业》第9章。
- 45 《乡村小型工业》第9章，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 46 1974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 47 关于三明市的这篇文章提到了这类工人移民，参见1974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还可参见豪：《劳动就业与经济发展》第36-37页。
- 48 经济学家德怀特·珀金斯估计说：“尽管有下放运动，可能还是有一些人移民到城市。”参见德怀特·珀金斯：《紧张状态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第354页，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物1975年印行。
- 49 不过，似乎得不到能证明这一前提的有关济南方面的数据。
- 50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 51 刘易斯：《中国旅行笔记》第170页。
- 52 刘维生：《谈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就业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4月5日。在刘看来，普及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还是较为遥远的事，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事。1960年，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提出了一个普及教育的基本目标，即在1962年普及小学教育，1966年普及高中教育。见陆定一：《我们的教育工作必须改革》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文件》第 137 页。

- 53 丛朴 (音译):《中国怎样普及教育》第9页。然而,正如第5章将要提到的,乡村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的下降或许是真的。
- 54 同上。
- 55 给小学毕业生提供更多机会的中等专业学校1957年招生77万零8千人,这个数字几乎等同于当年进入调遣的毕业生人数。参见约翰·P·埃默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力的管理和技术培训》第91页。涉及到规划方面的问题,请参见《中国怎样普及教育》第76—77页。不过,计划通常是千变万化的。参见埃默生:《劳动力的训练》第195—213页。
- 56 陆定一:《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第8页。
- 57 刘维生:《谈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就业问题》,载1957年4月5日《人民日报》。
- 58 埃默生:《劳动力的训练》第199页。
- 59 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 60 张翼若:《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就业和学龄儿童入学问题》载1957年3月19日《人民日报》。
- 61 入学受教育机会的减少对城乡青年都有影响,但城市青年受到的影响要大一些。因为高中学生大部分都来自城市,1955年有50%中学生、75%高中生来自城市。参见埃默生《劳动力的训练》第193页。
- 62 评论员文章:《就关于如何看待子女的前途问题向家长们进一言》,载《中国青年》总第14期(1954年)第1—3页。
- 63 1957年8月22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 64 1957年4月8日、1957年5月12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 65 1957年5月9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 66 见奥斯卡·安威勒:《苏联的教育方针和社会结构》。
- 67 约翰·W·刘易斯:《共产主义中国的党的干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427页。前共产主义教育制度与新共产主义教育制度的不同之处在于不那么强烈地强调学习科学和技术。
- 68 参见上注60。

- 69 1958年赫鲁晓夫提倡一种偏激的教育制度的改革措施。这种改革的目的是采用在课程表中设体力劳动课及要求学生在中学毕业之后进入高等院校之前要有一段工作经历。赫鲁晓夫的这些改革建议甚至在1958年12月被采纳之前就不那么受欢迎，后来便基本取消了。观察家们认为赫鲁晓夫改革失败的原因是传统的习惯势力及地位较高的家长们的影响所产生的压力。见乔尔·S·斯瓦茨和W·R·克奇：《苏联的集团影响及政策实施》（达姆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及菲力蒲·D·斯图尔特：《苏维埃利益集团及政策的实施》。
- 70 见唐纳德·J·芒罗：《共产主义中国的平等理想和教育现状》第256—304页，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
- 71 埃默生：《技术人员的管理》第95页。
- 72 埃默生：《劳动力的训练》第2201页。
- 73 引自奥林斯：《职业劳动力》第63—64页，1974年5月《美国统计学家》第2期。
- 74 以埃默生：《劳动力的训练》一书中第201页提供的数字以及奥林斯《职业劳动力》第38页和61页提供的数据为基础。
- 75 利奥·A·奥林斯：《共产主义中国的教育》第516页，美国政府出版物1975年印行。
- 76 表8表明1965年高中学生和高等院校学生的比例大约是8：1。由于得不到毕业人数和入学人数的数据，所以无法使比例更精确。据一个观光者提供的信息，1964年实际上只有25%的高中毕业生进入了高等院校，而从另一官方渠道得到的信息则表明，那一年进入高等院校的学生人数是12万到15万，这便意味着进入高等院校的毕业生的比例还要低，即实际上只有17%至21%，而那时210万初中生中只有1/3的人升入高中。见巴里·M·里奇曼：《共产主义中国的工业社会》第142页。（纽约，葡萄丛书1969年版）及斯图尔特·施拉姆：《春节的评论——要点记录1964年2月13日》及《毛主席对人民的谈话》第202页。
- 77 加德纳：《知识青年与城乡差别，1958—1966》第253—268页。芒罗：《平等的理想》第268页及苏珊·舍克：《1963年全日制中小学的临时工作规划》等著作均讨论了大跃进之后的教育的变化。

- 78 南开大学1967年4月编：《刘少奇反革命罪行选编》，载《中国大陆期刊文稿》第653期，1969年5月5日，第22页。
- 79 苏珊·舍克：《在中国的中学经历》（1975年，旧金山，第27届亚州问题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亦可参见米切尔·奥克森伯格《在共产主义中国进步成长》，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
- 80 见加德纳：《知识青年和城乡差别》第253页。
- 81 1967年12月24日《小兵》（广州）第20期。值得指出的是，早在文化革命前，将“升学率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的管理人员和教师就受到了批判，见1964年7月4日上海《文汇报》。
- 82 1967年5月10日出版的《教育革命》第5期载有关于北京景山学校文章。
- 83 《文化革命通讯》第12期，北京1967年5月出版，《中国大陆新闻综述》增刊第200期，1967年8月31日关于基金见《中学斗批改》1967年6月19日（北京）第一期所载文章《这类学校意味着什么？》《中国大陆新闻综述》增刊第200期，1967年8月31日。
- 84 1967年6月19日北京《中学斗批改》第一期所载文章《粉碎“附属中学”这一修正主义制度》《中国大陆新闻综述》增刊第200期，1967年8月31日。
- 85 《刘少奇反革命罪行选编》第26—27页。
- 86 见196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载施廷红的长篇文章《打倒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主要支持者》。
- 87 斯图尔特·施拉姆：《引论：历史地看待文化大革命》，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7—58页，82—85页，它们简明地概括了毛的观点。
- 88 《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书所载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见1969年10月8日《时代背景》第891期。
- 89 可参见1967年11月10日出《革命青年》第2期，这一期杂志的一篇文章提到城市下乡青年称他们自己为“学校不要，工厂不收的社会渣滓。”
- 90 见A·多克·巴尼特：《毛以后的中国》第192—194页。
- 91 1965年1月16日《新民晚报》。
- 92 1964年9月8日《中国青年报》。

- 93 《论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第194页。
- 94 参见埃兹拉·F·沃格尔：《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第337页。
- 95 约翰·吉延斯：《窒息学生》第377—378页。（《远东经济周刊》1968年8月25日，第35期）他引用了毛主席的这样一段话：“你们使我失望……但更重要的是，你们使中国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失望。”
- 96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消息1968年12月23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68年12月24日第250期。
- 97 据估计他是在他那次企图推翻毛主席的《‘571工程’纪要》中这样说的。参见迈克尔·Y·M·考尔：《林彪事件》第84页，国际艺术和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 98 基辛的研究报告：《中国的文化革命》第20页，纽约，查尔斯·斯雷伯勒父子公司1967年版。
- 99 约翰·加德纳和威尔特·艾德玛：《中国的教育革命》（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概括了这方面的主要变化，还可参见由威廉·克森执笔的一个考察中国早期儿童教育的美国代表团提供的报告《中国的儿童》。
- 100 教育方针的问题是导致1976年4月邓小平倒台的那场斗争的中心问题。可参见1976年2月23日《光明日报》文章《应当培养怎样的高级科研人才？》。
- 101 1974年10月14日济南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服务》1974年10月22日第205期，还可参见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 102 1964年9月8日《中国青年报》。
- 103 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及1973年《红旗》杂志第11期的文章《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促进派》。
- 104 刘易斯：《中国旅行笔记》第164页，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大队所办的高中越来越多，这样学生们就不怎么有必要离开村子了。见1976年6月1日《人民日报》。
- 105 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378、383页，还可参见1954年4月1日《中国青年报》上邓子恢的文章《动员全体农民和乡村青年为农业合作化而奋斗》。
- 106 邓子恢：《关于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的某些问题》，1962年7月4日《光明日

报》。

- 107 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 108 同106。
- 109 M·C·杨在研究1949年前的乡村状况时，描述了乡下人这样一种有趣的态度：“杨氏家族的一位青年在镇上学校里读书时名声极好，集镇附近的全体老师及当地的头面人物和家族的成员们都对他称赞不已，因此，族中所有的人都对他寄予了厚望。……这个年青人是反传统的，即使是在成为大学生之后，暑假里他也回乡到他父亲的农场参加劳动，他的穿着打扮也象个农民，他的亲友及乡村于是得出了这样的印象，即：他不会成为学者、绅士或官员了，于是他们便渐渐对他冷淡了。”
- 110 见H·原田：《中国的人口战》第326~327页。
- 111 1964年2月8日《中国青年报》文章《知识青年应当让牛粪弄脏双手吗？》，1962年6月7日《北京日报》也刊载了类似的文章，文化大革命以来关于农村青年回乡参加农业劳动的优越性的争议一直在继续。参见1975年4月16日《光明日报》刊登的一篇来自河北丰润县的消息以及1975年第五期《红旗》杂志刊登的大寨大队团支部的文章《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青年》。
- 112 报纸常报道这样一些满怀豪情的城市青年，他们“要求到最困难的地方去……那里党和人民最需要我们”广东人民广播电台1976年5月29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08期，1976年6月3日。
- 113 我感谢罗伊·霍夫海因茨教授提供了这些县的清单。
- 114 有1870个没有被提到过的县和299个曾提到过的县可以利用这些有变化的资料数据。那1870个县平均距离省城248公里，299个县平均距省城217公里。 $F=6.73574$   $P<0.01$ 。
- 115 采用这样的计算方法，即1=海平面 11=海拔6000米计算，结果是，1675个没有被提到过的县在海拔高度比例上平均是3.028（3=海拔250~500米），275个提到过的县平均是2.356（2=海拔50~250米），这样 $F=32.4725$ ， $P<0.001$ 。
- 116 按照1949年以后修筑的铁路为1，1903年时修筑的铁路为5的时间概率排列，

- 可以得以这样的结果，即 477 个没有被提及的县平均列为 2.817，而 100 个提到过的县则平均达 3.170，这样  $F = 5.30228$ ， $P < 0.025$ 。
- 117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在中国农村各生产单位之间的收入有着极大差别。马丁·K·怀特：《中国的不平等和等级制》一文中对这类状况进行了简要概括，见《中国季刊》第 64 期，1975 年 12 月。
- 118  $\chi^2 = 2.3448$   $DF = 1$ ；在 10% 的水准线上不显著。
- 119 然而，帕里什·怀特还有一个发现说明城市青年并不都倾向于到更现代化的村子里插队。一份对 35 个村庄的调查使我们得到了有关小学生入学率，广播网的类型及电影队放电影的次数等几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表明，在那些生活水准高于平均水平的村子里插队的知青并不多。 $\chi^2 = 2.9132$ ， $DF = 1$ ； $P < 0.10$ 。综合这一调查所得出的资料，还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城里下来的知识青年更愿意到离他们的省会城市近些的村子里去插队。如在广东省的两个主要城市广州和汕头近郊农村大队里，下乡知青的人数占总人口比例都超过了 3%， $\chi^2 = 3.6728$ ， $DF = 2.0$ ，10% 的水准线是不显著的。
- 120 参见德怀特·帕金斯：《农业的发展》第 61—64 页。（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物 1975 年印行）。让劳动力去从事非农业的企业经营的做法引起了争议，因为从事非农业性的企业经营通常获利更多。有关方面对劳动力的数量的使用采取了一些限制性措施。见 1974 年 10 月 1 日《中国新闻摘要》第 500 期。
- 121 《乡村小型工业》第 10 章。
- 122 据被采访者告知，城市青年不愿到人口密集的村子里去插队。一位被访者在广东东莞的一个生产队插队，这个生产队有 4000 人，其中只有 25 位知青（占 0.6%），另一位在东莞通过队的被采访者所呆过的那个生产队有 1600 人，却有 69 位知青（知青占人口数的 4.3%）。到河南的人民公社去参观的美国旅游者也被告知，因为人均拥有的土地太少，他们养不起知青。见《乡村小型工业》。
- 123  $\chi^2 = 3.0283$ ， $DF = 1$ ， $P < 0.10$ 。
- 124 马丁·K·怀特收集的一些个人的信息。
- 125 被采访者提出了这一点，就象报纸亦阐述过这一观点一样，参见 1974 年 1 月 16

日《光明日报》。

- 126 《乡村小型工业》一书中第10章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一节谈到了这一观点。
- 127 被采访者只知道他们的学校都有指定的下乡地点。他们一般只能到这些地方去。见第3章。
- 128 1975年12月29日南昌广播电台消息，《世界广播综览——远东篇》第5104期，1976年10月1日；《中国新闻分析》第1031期，1976年2月20日；齐秦：（音译）《巩固和发展上山下乡的成果》第8页。报纸有时也报道知青到粮食不足的地区插队的消息。但没说明他们是怎样处理这一问题的。例如，1974年1月3日《光明日报》就曾报道过一则来自黑龙江爱辉县的这类消息。
- 129 文化革命期间及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管理过的许多农场渐渐划归给了农垦局管理，成了农业部门或农垦部门的附属单位或农林部门管理的国营农场。关于国营农场的讨论参见奥德丽·多里索普：《中国的经济制度》第4章（纽约，布莱格出版社1967年版）；关于部队农场的讨论见张永田（音译）：《共产主义中国的“生产建设兵团”的建立和发展》。
- 13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1974年1月21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7期，1974年1月24日。
- 131 哈尔滨广播电台1975年9月18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83期，1975年9月19日。但，另有一篇报道说这一数字是“30多万”。新华社北京1975年9月10日消息，载《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83期，1975年9月19日。
- 132 新华社北京1974年6月14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16期，1974年6月14日。
- 133 1972年12月22日呼和浩特人民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251期，1972年12月29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1973年9月5日消息，《世界广播综览——远东篇》第4302期，1973年5月23日，1976年2月17日乌鲁木齐人民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服务》第34期，1976年2月19日。另见乔治·莫斯利：《中苏文化领域》。
- 134 1975年12月21日昆明人民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6期，1976年1月9日。



- 135 利奥·奥林斯：《每五个孩子中的一个》第4章。
- 136 赛福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胜利前进》。关于云南，也有劳动力不足的消息报道。另见1969年2月17日上海《文汇报》。
- 137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编《知识青年在北大荒》第132页描述了知识青年的一些军事活动。
- 138 新华社北京1976年5月3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88期。1976年5月8日。
- 139 《谭震林关于安置工作的讲话》及1968年1月印行《中央安办文件采编》第7期。1975年周荣鑫成了教育部长，但1976年又垮台了（参见以下注释）。1977年1月31日新华社北京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21期。1977年2月1日。
- 140 见1972年6月6日《光明日报》。
- 141 1976年6月29日长沙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27期。1976年6月30日。这条消息报道证实当时是俞秋清（音译）在负责中央安办的工作。用英文播出的这条广播消息中的姓名译音或许是错的。1966年，谭震林提到俞秋清是周恩来指定的负责安置办公室的两位干部中的一个。见《谭震林关于安置工作的讲话》。如果这两个名字指的是同一个人，那就意味着对上山下乡工作的管理具有连续性。
- 142 关于文中所提到的省级干部。可参见1970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1976年3月4日哈尔滨广播电台的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46期。1976年3月8日。
- 143 《愤怒声讨刘少奇》（同上，注26）及《中央安办文件采编》。《旅游者的报告、中国专题》第465期。1968年2月26日。
- 144 《周总理的重要讲话》1968年2月17日。《小兵》（广州）第22期。载1968年3月8日《中国大陆期刊综览》第4134期。1977年发表的一篇纪念周恩来的文章，描述了周从1962年以来即亲自关怀上山下乡运动的几件事。见1977年1月31日北京新华社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21期。1977年2月1日。
- 145 1976年11月23日和1976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
- 146 谭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站在反修防修第一线》。刘少奇的“为了出名

而下乡”通常被译为“下乡镀金论”。

- 147 1977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及1977年1月10日南昌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0期。1977年1月14日。1976年12月4日南昌人民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238期。1976年12月9日。
- 148 1976年5月3日《人民日报》。
- 149 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第23页。
- 150 关于这些大批判的概要。参看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关于高等教育的斗争：革命和发展》；关于那些特别的材料，参见上注100。还可参见1975年12月17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245期。1975年12月19日。
- 151 1976年5月3日和1976年5月10日《人民日报》。
- 152 1976年6月20日沈阳人民广播电台消息。载《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21期。1976年6月22日。还可参见第6章。
- 153 1976年12月12日《光明日报》。
- 154 对有促进意义的有关分析讨论，参见米切尔·奥克森伯格和史蒂文·哥尔斯坦：《中国的政治范畴》，《共产主义问题》第23期，1974年3—4月。关于对国外贸易及自力更生的分析，参见亚力山大·爱克斯坦：《中国的贸易政策和中美关系》，《外国问题》第54期，1975年10月。
- 155 文化革命期间，一篇红卫兵写的文章曾提到谭震林尽管违背毛主席关于整个农村都是知识青年的“广阔天地”的教导，但还是试图将城市青年送到边疆和山区去，因为他认为这些地方需要他们。这是极少见到的上层关于安置知青的分歧意见线索之一。见《谭震林关于安置工作的讲话》。
- 156 齐秦：《巩固和发展上山下乡的成果》第7页和第9页。
- 157 《黑帮的黑话》，载1967年11月1日《支农红旗》（广州）第3期。《联合出版物研究处》第44052期。1968年1月17日。
- 158 见加德纳：《知识青年和城乡差别》第269页。
- 159 北京大字报选，载1967年1月25日《日本报刊每日要闻》。
- 160 1976年6月20日沈阳广播电台消息。载《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21期。1976年6

月 22 日。另见 1976 年 7 月 14 日《人民日报》。

- 161 1976 年 7 月 14 日《人民日报》。
- 162 见《谭震林反对毛泽东思想罪行举例》载 1967 年 5 月 8 日《中国大陆新闻综述》增刊，第 181 期；关于刘的观点，参见《刘少奇反革命罪行选编》第 29—30 页。
- 163 《谭震林关于安置工作的讲话》。
- 164 同上。
- 165 构成了谭罪行的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发言是 1963 年和 1964 年发表的。他对变成农民持怀疑态度的发言是 1966 年发表的。没有足够的资料说明谭是否说过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 166 1973 年 3 月 10 日郑州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 50 期，1973 年 3 月 14 日。
- 167 谭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 168 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关于高等教育的斗争》，《问题与研究》第 7 期第 9 页，1976 年 7 月。
- 169 1977 年 1 月 15 日南昌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 11 期，1977 年 1 月 17 日，1977 年 1 月 4 日《人民日报》。
- 170 1977 年 1 月 15 日南昌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 11 期，1977 年 1 月 17 日。
- 171 1967 年 2 月 1 日和 2 月 8 日《井冈山》（北京）载《刘少奇反毛泽东思想议论一百例》，《中国大陆新闻综述》第 173 期第 12 页，1967 年 4 月 4 日。
- 172 1967 年 10 月 25 日，《农村青年》第 20 期，《中国大陆期刊文摘》第 612 期，1968 年 1 月 29 日。
- 173 《愤怒声讨刘少奇》，《中央安办文件采编》。
- 174 郭庆：《应当关心知识青年的生活》，1973 年 6 月 22 日《光明日报》。
- 175 见 1974 年 8 月 8 日《光明日报》及 1976 年 6 月 4 日合肥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 110 期，1976 年 6 月 7 日。
- 176 弗诺利克教授和我的助手在 1975 年采访过的人员都说曾听传达过毛的信，报

紙上也提到过这封信。

177 1977年1月15日兰州人民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1期,1977年1月17日。

178 国务院办公厅理论组的文章,《纪念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第15页。

### 第三章 动员——城市的躁动

本书的下面四章涉及到上山下乡运动的各个方面。这一章主要阐述城市里上山下乡动员的过程，其目的在于弄清青年们是如何响应下乡号召的。首先，我们需讨论在上山下乡运动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呼声和压力。其次，本章将对城市居民对这一运动所持的态度作一评估。因为事实上上山下乡不断地引起个人意愿和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所以我还试图剖析一下那些为这场运动所波及的人们对这场运动中某些方针政策的产生所可能起到的作用。这一些问题的之所以能成立，是基于这场运动的许多可变因素的存在。如，虽然也有中学的全班学生都到农村去的现象（无选择性存在），但更具共性的现象是一个中学毕业班只有部分学生下乡，对于许多人来讲，选择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为这一些因素，就产生了城市青年下乡动员工作中一系列课题。

#### 1. 社会组织、学校、家庭——压力种种

将城市青年“送到农村去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任务”，这项任务是那样的重要，以致于不能简单地依靠某一个特别的行政机构如城市的毕业生分配办公室，或劳动局、教育局等来完成。这是一项必须由城市的主要负责人来主管的一项任务。正象广东一家宣传机构所宣称的那样：“目前，各级党组织都应加强领导，继续推动知识青年在农村安家落户这一生机勃勃的群众运动向前

发展。有必要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列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党的第一、二把手应亲自抓这项工作，并抓好典型榜样。有关负责干部应集中时间和精力抓好这项工作。”，下乡动员工作使城市的政治和行政组织机构异常活跃，特别是那些工作重点在政府和民众之间起勾通和桥梁作用的组织更是如此。除了工会、妇联、共青团这类群众组织以外，在上山下乡动员中起着最重要作用的三种组织是学校、政府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以及应下乡知青的父母所在的单位：

所有居民都应……热情支持学校、街道居委会以及家长们所在单位的工作。学校、居委会和家长应密切保持联系。学校有责任教育学生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动员他们自愿报名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居委会及知青家长所在单位应协助学校做好知青家长方面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城市中学所录取的学生已基本上全是适龄青年，学校便成了上山下乡动员工作的中心。在学校里每一届应届毕业生都被指派到工业、农业或人民解放军的某一生产单位。文化大革命前，当离开了学校又没能在城市找到工作的“社会青年”为上山下乡的主要对象时，街道组织曾直接地起着安排工作的作用。那以后，他们在动员青年下乡的工作中继续起着重要作用。户籍管理单位因为了解他们辖区内的家庭，故在这些家庭内的中学生从离开学校到确实下到农村去之前，他们都一直与之保持联系。由于学制的缩短，一些青年人初中毕业时只有15岁或者更小，他们显然能被允许留在家里，直到过完16岁生日再下乡。那些年长些的青年，从毕业到下乡也有几个月的空隙时间，一般是从7月到10月。在这段时期内，户籍管理部门便负责青年下乡前的准备工作，并督促他们在指定时期内出发。而家

长所在的工作单位也一直被认为在动员工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家长的态度也对上山下乡运动的顺利进行起着保证作用。

在动员工作中，最重要的是使知青和他们的家庭明确上山下乡运动的意义，并创造出一种整个社会都在热情支持这一事业的气氛。宣传媒介对这场运动给予了极大关注，学校里的学生被组织起来重点学习模范下乡知青的“先进事迹”，率先申请下乡的青年也得到了宣传（引起了公众的注意），特别是近年来一些高级干部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农村去的例子被广泛宣传，各种集会和游行将这一宣传活动不断推向高潮。在这些集会上讲话的城市的领导人反复强调上山下乡运动对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革命的重要性，并将这一运动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其它政治运动联系起来，譬如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在这类集会上发言的还可能有来自郊区公社的农民干部，他们报告自己对下乡知青进行再教育的经历。返城探亲的下乡知青则在会上报告他们的乡村生活，“慰问团”里的家长和干部则谈他们在边远的乡村参观知青点之后的感想，这些报告和发言一般是在赞成和支持这场运动的前提下给听众描绘出一幅上山下乡运动具体的景象。这类报告会之后，上述三个主要单位一般会以帮助知青及家庭正确理解上山下乡运动为目的组织一些集中的学习和讨论。

上山下乡的宣传活动既有通过宣传媒介、集会、群众游行等形式进行的声势浩大的宣传浪潮，也有小型会议、个别谈话等具体的动员工作。正式的大规模的宣传动员是以革命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支持国家建设为中心内容的。首先，舆论号召青年成为勇于与错误观念作斗争、树立革命理想、摒弃剥削阶级追逐名利的思想，以实现革命的伟大目标为己任的合格的革命接班人，“有志气的革命青年应该目光远大，应胸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将个人前途与国家的前途和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样便会前程无量。”，同时，关于青年要投身国家建设的爱国主义教育则

通常与边疆及内陆那些偏僻、多山、不发达地区的建设需要联系在一起。舆论呼吁，青年人应当到这些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种号召是以国家“富强”这样一个老的主题为中心的。“应当使我们所有的青年人懂得，我们的国家仍然是一个十分贫穷的国家，我们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只有通过我们的青年一代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用我们的双手辛勤的工作，中国才有可能在几十年内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上述两种号召通常是互相交融在一起的。青年们被告之，应当“放眼未来，肩负重任，准备付出一定的代价，为改变我们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而进行长期、艰苦的奋斗。”，

这两种号召都动员青年作出牺牲，自愿忍受艰难困苦。不过，革命理想主义的号召倾向于强调克服困难这一行为本身的正面价值，强调人人都应该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价值观。相反，关于投身于建设事业的号召却含有一种个人可以获得好处的许诺，特别是当这种号召与乡村的现代化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更是如此。60年代初，这种允诺十分明显：到农村去贡献自己的科学知识是“一条可获得荣誉和地位的革命的、光荣的道路。”，文化大革命后，为革命的崇高目标而忍受困苦的克己思想占了上风，但在70年代，随着知识青年应“继续为乡村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的宣传占据了突出地位，一种遮遮掩掩的取得名利和社会地位的允诺也随之而来：

韩志刚……是一位城里下来的知识青年，经过10多年的艰苦奋斗之后，和贫下中农一起成功地将贫穷落后的北马大队建成了一个繁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后来，他被提拔为中共兴平县委副书记，在这个岗位上他又做出了更加突出的成绩，今年5月（1973年）他当选为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



一般来说，各个方面的说服动员工作要贯彻正式文件的精神，同时，也十分注意有针对性的宣传。文化大革命前，宣传动员者有时会是来广东招聘待业青年的国营农场干部，他们会对青年人描绘出一幅有吸引力的乡村生活图景并细数去农场安家的知青可望获得的种种机会，尤其是象海南这样边远的地区更是如此。„知青们对我说，对于那些只是在暑假到过富饶的郊区公社帮忙收割过庄稼的年青人来说，这些描述是可信的。然而，文化大革命后，一般不再进行这样的宣传动员了，原因很简单，文化大革命期间，下乡知青在农场及公社自下而上的困难已逐渐公开化，因此，宣传动员的可信性受到了怀疑。故文化大革命后，正式的文件精神与非正式的信息交流有了吻合，两者都强调起艰苦奋斗的精神来。

谋求个人利益的意见表达通常并不是非得经过普通干部和教师主动、正式的要求才得以体现，它们很可能在正式但不公开的文件或者下级对上级领导人意图的领会中表露出来。据文化大革命中的有关资料，象谭震林、中央安置办以及一些省的党委对知青快速提拔的许诺这类物质刺激的情况，或许就能在上述渠道中传送出来。„当然，报纸上也会提到一点这类物质刺激的情况，地方报纸或许也会发表一点有关的指示，但外界所了解的只会是这些指示的一部分。

知青返城的问题在正式的宣传动员与非正式的说服动员工作之间的区别十分明显。知青及其家庭从正式渠道得到的信息是：上山下乡是一辈子的事，青年人对上山下乡不应持短期应付的态度：

每一个知青都应决定到农村是真扎根还是假扎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应树立扎根农村的思想，做铁心务农的革命者。下乡知青应当明确，不应有在农村当过客的想法。到农

村呆上二、三年是十分容易的，难的是一辈子扎根农村。”

革命理想主义的目标意味着在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中谈论返城是完全不合法的。然而，事实上，知青及其家庭成员已通过非正式的渠道了解了返城的可能性。这并不妨碍上山下乡的政策的推行，实际上，这种政策通常比其暗示的所谓“终身”更具有伸缩性。正如在第2章里所提到的，到1964年，广东的知青返城有了保证，因为，他们的户口被留在了城里。据笔者所知，在文革之前和文革之后两年时间里，虽没有给下乡知青在城里安排工作，但尽管如此，对“扎根”农村，人们在非正式的信息交流途径之中仍然是有怀疑的。有一个文革前的例子，一位被采访者曾被一位教师告知，他在下乡后的第二年便可以参加大学的招生考试。虽说事实上他所在的生产队那一年没有允许他这样做。1968年，一些有着良好的阶级背景和好的政治表现的下乡知青也曾被告知，他们不必长期留在农村。70年代以来，一小部分下乡知青被允许返城。政府管理部门的指令特别强调返城的合适人选应具备的条件，譬如：要表现好等。但是，在60年代初却完全没有返城的允诺和保障。这些指令通过中国的内部文件精神传达给城里人，也就是通过口头或笔头传达给群众，而不在报刊上发表。”教师们也向他们的学生透露了可返城重新安排工作的信息。”有关报刊虽然从不直接提及返城与下乡之间的联系，但也刊载了涉及到下乡知青又重新在城里安排了工作的文章。（见第6章）因此，知青及其家长通过各种渠道意识到，不必将“扎根农村”的宣传与现实生活互相联系。毫无疑问，这种意识促进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因为上山下乡的一个主要障碍就是终身留在农村这样一条原则。然而，不能夸大这一因素，对大部分人来说，“扎根农村”是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现实主义的描绘，因为返城重新安排了工作的毕竟只是一小部分人，相信在农村生活只是暂

时的这一信念使上山下乡的说服动员工作变得容易，但对这一信念的失望却又会在农村引起长期困扰的问题。因此，不能摒弃长期坚持乡村的宣传教育。

有一些城市青年完全是为了响应有关上山下乡的号召而到农村去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这项事业是由于真心实意地相信了那种革命的英雄主义的宣传教育。被采访者证实说，在他们学校确有一些青年完全是出于单纯的政治信仰志愿到农村去的，这类青年是怀着愉快的心情离开城市的。但被采访者估计说这类青年至多只占下乡青年的百分之十五。另外，还有一些青年是由于其它原因而到农村去的，譬如，为了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对伴随着到边远地区旅行的兴奋和冒险意识的向往，希望继续和学校小组的同学呆在一起，以及意识到了志愿下乡所能带来的种种实惠等。事实上，最早志愿上山下乡的知青的事迹已记录在他们的档案里，这对他们的个人前途是会带来好处的，譬如，在当地农村担任某种职务或返城。同样，志愿下乡者还可以在学校对口的几个下乡地点之间进行选择。据被采访者判断，志愿下乡者在这些点中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地方是十分普遍的事。这种现象表明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既然上山下乡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人人都应该争取一个最佳方案。在某些情况下，下乡青年的各种动机会混淆在一起。有两位被采访者曾是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积极的红卫兵战士，1968年，他们坚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知识分子的神圣职责，因而志愿下乡了。他们中的一个放弃了留在广州他所在的中学当政治辅导员的机会。然而，他们二位都说，1968年他们并没有真正打算“扎根”农村。当形势要求他们真正“扎根”时，他们逃到了香港。

绝大部分被采访者都强调他们及他们的同学中的大多数都是不愿下乡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城市生活及工作在物质方面的吸引力；不愿与家人分开以及认为上大学或去工厂工作比下乡当

农民更能有效地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祖国服务。但这些想法都不能使被采访者逃避上山下乡。因为报刊一直在公开批评这些观点。例如，就以上提到的第三种想法而言，就有这样一个例子。据报道，辽宁丹东有一个叫杨新关的学生说：“反正是要下乡的，读书也没有什么用。”结果他在班里学习成绩不好。这份报纸及其它一些报刊上刊载的政治教育性的报道都在批评和引导改变这种读书无用的观念。”

由上山下乡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所产生的动员效应并不足以保证有足够的志愿者上山下乡。因此，对应下乡的知青及其家庭所做的工作还是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如前所述，负责做“透彻思想教育”工作的有学校、父母所在单位和户籍管理部门这样三类组织。在学校里，教师中的权威人士可以和共青团的干部联合起来，因为这样可以使同龄人给同龄人施加压力。十多岁的青年人最易受同龄人的影响。居民委员会的成员则可以家访形式进行友好的谈话或“交心谈心”，这类家访可以天天进行，直到被访者最终离开城市下乡。这类家庭的成员通常会被邀请去参加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班。”大型厂矿企业或许会专门设立上山下乡办公室，组织家长小组，发动一场以上山下乡为目的的教育运动（在上海的一家工厂里，1973年至1975年间一共成立了135个这样的小组）。”这些活动有时是在不能容忍落后的思想和行为的气氛中产生的，这样的气氛有助于提高群众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的警惕性及开展对上山下乡运动“错误”思想的“革命大批判”。上山下乡的动员活动还涉及到“打击一小撮试图破坏和干扰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的任务得以完成的阶级敌人”。”当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与其它一些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时，各方面的压力就更集中了，譬如，在1968至1969年间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能否自觉走上上山下乡的道路至少是一条暗指是否能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的标准。”

在这样一种运动中，某种心理压力和行政部门采取的高压政策之间的界限是不易分清的。因此，尽管从国家的观点来看是不合情理的，但如果子女不服从政策安排下乡，其父母的工作就会受到直接威胁。文化革命期间，广东的陶铸曾因这种威胁而受到批判：“如果你的儿女不申请支援农业，你的工作也危险。”“如果你的子女不务农，那么一切政治后果都由你负责。”<sup>11</sup>几位被采访者说他们之所以服从政策安排下乡，事实上是出于对父母失去工作这一问题的担忧。几位被采访者还说，事实上解雇家长的威胁并没有得以实施（尽管有这样一个例子，当一位被采访者逃避上山下乡运动时，他的双亲便被通知去参加不付工资的学习班）。但这种威胁对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来说是特别有效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有些情况下，青年上山下乡之后可以减少家庭困难。

从上山下乡的动员的目的出发，对心理压力和强制性措施的区分不是毫无意义的语义上的区别。几位被采访者都区别了这二者的不同。他们认为，伴随着耐心细致的解释，政策学习和朋友式劝说的动员比简单地命令离开城市或将青年的户口强行转到农村某公社更易让人接受。1966年9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大批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在没有进行说服教育的情况下被强制到农村，这件事被认为是不合法和不妥当的。妥当的做法应当是进行有效动员，引导青年从正面作出响应。

动员工作中的号召和施加压力这两种办法使大部分抵制这场运动的青年服从了政策安排。然而，即使是报纸上所显示出的资料数据也表明，这种服从不是十分普遍的。例如，在安徽省的合肥市，1968年冬至1969年春，有15000名知青被送到农村插队：这是应当下乡的知青的90%。对比之下，1973年上半年，当4000名青年被送到农村时，服从安排的人数比例提高到了97%。<sup>12</sup>同样，1968年到1973年上半年，天津一家企业1444名工人家庭子弟被安排去农村时，服从安排的比例是97%。<sup>13</sup>1974

年春，在一个动员城市知青下乡的讨论会上，有人指出“还有必须做好前几年应当下乡而还没有去的中学毕业生的动员工作。”一年后，一家电台就报道成都有 6000 名“1974 年或更早几年毕业的青年离城下乡”了。<sup>\*</sup>如果抵制上山下乡运动的人为 3% 这个比例是有代表性的，那就意味着 1200 万中的 3% 即 36 万青年曾成功地抵制了这场运动。至少是暂时如此。<sup>\*</sup>另外，还有大量知青违反政策回到了城镇。这两种类型的青年给政府引起了很多社会问题。（见第 6 章）。

青年们如何抵制上山下乡运动呢？一种方法是作为没有户口的“黑人”留在城市。这类人没粮食之类的供应证，也无固定工作。一些人靠朋友和亲戚的帮助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还有一些人参与小偷小摸或黑市活动。不过，也有一些人成功地留在城里而没有参与非法活动，但或多或少得忍受居委会组织的动员说服工作。原则上，居委会应和学校密切配合共同督促知青按时离开城市去指定的乡村落户。然而，事实上据几位被采访者说，有一些街道办事处对那些没能在指定时间内按时离开城市的青年并不那么严厉，他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控制人口增长率上。一位被采访者在没有及时下乡之后，在广州度过了三年时间。这期间，不仅街道办事处对他听之任之，他母亲的所在单位也是如此。（他说，最后，为了能逃往香港，他还是离开了广州）。街道组织的严格态度还会随着运动的开展而有所变化。在每次学生毕业时的动员高潮中，要抵制是非常困难的，但，一旦风头过去，知青便可以各种方式成功地逃避上山下乡，譬如“生病”等，这样，街道干部就能容忍他们不下乡的行为。<sup>\*</sup>几位被采访者说，他们曾

---

<sup>\*</sup> 住在上海的一位被采访者说，每当有重要人物，譬如，某国首脑人物来访时，有关部门就会查一次户口，但通常查户口的工作做得总是不那么彻底。

采用在家中生病或者干脆就告诉街道干部说那时离城“不方便”等借口，成功地逃避过下乡，在家中呆了一年以上的时间。一位被采访者认识的一位青年，没有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农村去，最终被允许留在了城里。施加压力和说服教育都没收到效果，街道干部便放弃了努力，认为形势“松了”，便将这位青年安排到街道服务站工作。这是一种集体所有制单位，其工作人员的工资比国营单位工作人员的低，且不享受国营单位工作人员所应该享受的福利待遇。这位被采访者总结说，由于采用武力的手段强迫青年服从安排下乡是不妥的，街道组织除了同意这位青年留下来之外，别无选择。当然，这位被采访者补充说，这位青年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抵制行为将被载入档案，他将永远不能获得在国营工厂工作以得到较高工资的机会，也不能成为国家干部。

这些抵制上山下乡运动的例子表明城市居民委员会在上山下乡动员工作中所显示出的力量是很薄弱的。知青及其家属们一直在努力高度评价居委会的工作。但即使街道组织作出特别的努力劝说青年下乡，也常常收效甚微。例如，1975年，广州一个街区的党组织为了教育“130名左右居住在这一地区的知识青年”，建立了一所政治学校。这130名左右青年大多是赖在城里不下乡或非法返城的人。学习的目的是“针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些青年人不完全理解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安家落户的伟大意义。”教员们也和知青及其家长“交心谈心”，在两个月内，130名知青中便有“七名知识青年”“自觉……到农村去干革命了。”

针对居委会组织力量的薄弱所采取的一个相应措施是加强工厂企业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作用。1973年，有关方面规定，企业负责督促本单位职工子女中应下乡的人员切实到农村去，这样就分担了居委会的一部分工作。另一项措施是组织城市民兵。城市民兵组织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加强街道管理的力量。譬如，1975年，在哈尔滨，三分之一的民兵小组担任巡逻任务，三分

之二的人起着居委会的“坚强后盾”的作用。参与街道组织活动的民兵战士仍花了大量时间做青年的工作，组织校外的政治和娱乐活动。据报道，在哈尔滨的居委会，民兵们通过引导青年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腐朽思想。”使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变”。许多关于民兵组织活动的描述都不直接提及上山下乡运动，而是指出，民兵为这场运动的顺利进行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以“处理违法乱纪者”和保卫社会安定为职责的民兵，被认为应为纠正在某种程度上由上山下乡引起的一些错误行为而做些工作，因为人们意识到，抵制上山下乡运动或非法返城的人有可能走向犯罪，还由于考虑到青年人在被送往农村这样的前景下有可能增加犯罪率。

值得指出的是，城市民兵组织的建立与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之后被清除出党的那四位重要领导人有直接联系。据说，“四人帮”认为，民兵作为一种武装力量是正规部队，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军。这极可能是“四人帮”看重民兵的意向所在。但城市民兵组织的广泛建立也可能是基于社会的无秩序状态这样的事实，而这种无秩序至少部分是由于上山下乡运动引起的。

一些城市青年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抵制行为意味着动员过程中正常的鼓励性刺激不足以引导他们服从政策安排。绝大部分服从了安排的也不是怀着极大的支持，而是怀着一种顺应潮流下乡去等待以后所可能带来的机遇总比赖在城里要好一些的心态而走的。正如一位被采访者所指出的那样：“随大流是中国人的一个特点。”不过，就如同只有一小部分人热情支持这场运动一样，真正顽固抵制这场运动的人也只是一小部分。

## 2. 观念的反叛与冲突

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之所以是一项充满了艰辛的事业，其主



要原因在于上山下乡的目的与许多城市居民的价值观是相互冲突的。许多城里人还是继续恪守着争取在个人所感兴趣的职业上取得成功比成为一个农民更有价值这样一种更传统的观念。这种观念上的冲突在文化革命前十分普遍，但文革以来，也有事实证明，这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依然存在。在文化革命以前，城市社会里十分普遍地存在着与上山下乡运动相抵触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不仅反映在家庭中，也反映在邻居及朋友们之间。‘当一些年青的知识分子准备到乡村或山区去的时候，他们的邻居及亲朋好友往往会嘲笑，甚至阻拦他们说：‘你这些年的书白读了，’‘年青的女孩到农村去耕地是一种遗憾。’”以下从《中国青年报》刊登的一位没考上大学的女孩写给编辑的信中摘录的一段话，亦可说明这一问题：

现在我正站在生活的十字路口，不知是否应当到农村去，尽管党给青年知识分子指出了明确方向——到农村去，并且有象邢燕子、王培成、董加根、侯隽这样青年知识分子的榜样，但在决定走这条路之前，我还是有许多实际问题需要解决。

我父亲在南京，我母亲是一名商店营业员，我哥哥是一位大学生。我母亲希望我在南京找一份轻松的工作，嫁给一位有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至少是一名大学生。我哥哥给我介绍了一位大学助教。许多亲戚都常常赞扬我母亲将孩子教育得很好，并常在她面前有目的发表议论说：‘别让你们的这颗珍珠掉进了灰堆里。’我们的邻居们都非常势利，那些日子过得还不错的人来拜访我们时，总是表现出极大的羡慕并恭维我母亲说：‘你女儿不愁找不到一个既有才干又富有的丈夫。’

这位姑娘接着说她的一位同班同学鼓励她到农村去，但“如

果我坚持去农村……我妈会不同意，我哥也会发脾气。”她请教编辑该怎么办。„另外还有这样一个例子，当一个政治积极分子、一位小学教师鼓励他的孩子到农村去时，这位教师受到了来自他的亲朋好友的非议。他们说他是“铁石心肠”，不爱自己的孩子。这些非议使这位教师的信念产生过动摇。虽说这种动摇是暂时的。„正如 1962 年一家报纸的报道中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大部分家长都怀有盼望子女“成名成家的梦想”，„故他们给子女施加压力，让他们刻苦学习以便能够通过大学的入学考试：“如果考不上，就要到农村去干苦力活。”„因为“考上大学就能成为一条龙，考不上就只能成为一条虫。”家长们受到了教育部门强调入学考试的准备工作所产生的“公众压力”，„造成这些想法的教师们有时也不动员学生志愿上山下乡，而是鼓励他们努力争取上大学。„教师们之所以也敢于表现出与旧的价值观念一致的想法，或许与 60 年代初期，新闻媒介对新的价值观念所表现出的矛盾心理和谨慎态度有关。尽管到了 1965 或 1966 年，这种现象有所改变。因此，在 1964 年，《中国青年报》展开了一场持续很长时间的争论，让上山下乡的反对者也能发表他们的意见。他们认为，上山下乡是浪费人的聪明才智，浪费一个人所受过的教育，因而不利于国家利益，他们意见的主题一般是“上大学比做农活前途更远大”或“将优等生送到农村去是一种浪费。”\*„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特别是文化革命以后，新闻媒介一改过去那种对新的价值观念的犹犹豫豫的肯定态度，开始全心全意、毫不妥协地赞成新的价值观念。进一步说，也就是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变得更加彻底，更加集中，乃至于成了城市生活中的一个中心部分。因为，来自于权威人士方面对旧的价值观念的坚

---

\* 不恰当地集中讨论上山下乡的利弊，或许就是文革中《中国青年报》被撤销的一个原因。

持已不象文革前那么普遍。然而，尽管有这样一些变化，那些担任了一定职务的人们对这些新的思想观念所表现出的态度却仍不容乐观。如前所述，城市街道组织对这场运动的配合管理也不是无懈可击。或许其原因在于街道干部们自己对这些新的价值观也持怀疑态度，因此，当来自上面的压力放松了时，他们便更易接受来自下面的压力，这样，对促进上山下乡运动就减少了热情。

毫无疑问，学校的教师们和教育部门的官员们对待上山下乡运动的态度都要比文革前的态度积极些。但是，一旦政治形势允许，一些教师便又倾向于赞同旧的观念，表示他们还不能接受这场教育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针对他们职业角色的重新要求。1973年上半年，教育方面的方针政策自文革以来首次转向赞成强调学术水平。上大学必须通过入学考试这样的做法使人回想起1966年以前的管理方式。这种在1973年秋批林批孔运动中遭到了批判的变化，曾使辽宁丹东第六中学的老师感到欣慰。“他们中有一些人兴高采烈地说：‘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教书就有意义了。’”于是他们挤出时间备课，鼓励下乡知识青年准备功课参加考试。在黑龙江的一个名叫鸡西的城市里，就有一位教师利用这样的形势，公开发表了一些抵制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下面这段话记述了这一状况。

不久前，我的同学们撰写批判文章，在文章中，为了表示以实际行动与孔丘“只有卑贱者才务农”的谬论划清界限，他们表示了毕业后到农村去的决心。但在一次班会上，主持会议的老师对我们说：“你们全都说毕业后打算到农村去。现在，有人能肯定地说到时一定会这样做吗？如果有，便站起来让我看看。”我感到这是对青年一代的挑战，便站起来，坚定地宣布：“我决心在毕业后，自愿到农村去。”他说：“你并不典型，你的家在郊区，你是吃农村口粮的，即使不愿意，你

毕业后也只能回去。”我问他：“你举这样的例子就是想证明没有人愿意走毛主席指引的这条光明大道吗？”他夸张地说：“事实是这样的——除了走这条路，我们没有其它路可走哇。”他不仅在理论上反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他甚至对那些要离开学校去找工作的学生热情鼓励。”

更甚的是，学校方面懂得在心照不宣地承认高干子弟的真正意愿的前提下，给他们在城里安排工作。《报上刊登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干部子弟，本身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他放弃了给他安排的到工厂工作的位置。这篇文章说：“一些人认为他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是‘傻瓜’。”事实上，报纸上经常提到“一些人”抵制官方的指示精神的言论，最典型的是，“一些人”或许会劝某位干部采取某些措施将他的后代安置在城里，或至少下到条件相对好一些的农村去。《这些例子表明，上山下乡的宣传动员在减少某些部门乃至全社会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抵触情绪方面确实有成效，但不同程度地与官方的指示精神唱反调的消息仍时有所闻。》

报纸上报道的这些事实表明，即使在进行了深入持久的努力来改变公众的价值观念的文化大革命中以及文化革命之后，在城市里的许多家庭里，仍然存在着不愿执行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的现象。例如，1971年，上海的“上山下乡办公室”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将城市家庭中的家长们分成了两种类型：第一种家长是“要我送”的家长，这类家长认为上山下乡是党和政府提出的一个额外要求，不得不照办；第二种家长是“我要送”的家长，这类家长自己主动将子女送到农村去。文章认为，前一类家长将子女看成了“私有财产”而不是“人民的财富”。他们从个人利益出发，希望将子女留在身边，或者，如果做不到这点，就将他们送到近一些的乡村，或者至少是到一个条件好一些地方去。这样的家长对

待上山下乡运动的态度是被动的，他们是“重工轻农”的个人主义者。第二类家长认为他们的孩子是由党和毛主席哺育成长的，应当成为革命接班人，如果不将孩子送到农村去就是对毛主席不忠的表现。因此，他们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起到了带头作用。不过，这篇文章的作者只是暗示了第一类家长为数不少，并未估算出每一类具体规模有多大。„

家长们表现出的担心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上山下乡运动可能给下乡知青本人及其家庭所带来的困难。报纸报道了家长们对他们的孩子下乡后即将碰到的艰难困苦所表现出的担心。特别是当他们的子女下乡时年龄很小，只有 16、17 岁，或是女性，或者被送到了家中及亲朋好友完全无法照料的地方时，这种担心尤其强烈。在北京，有一位父亲说：“我从未到过内蒙，那里很远很远。我们在那里没有亲戚朋友，特别是生病时，孩子将感到无法忍受。孩子的许多同学都留下来了，让我们看看，以后再说。”„认为乡村“苦”的观念根深蒂固。1975 年，广州一家工厂的党委副书记给《人民日报》写信说，他不愿将他的子女送到农村去，因为他是解放后才迁来广州的，他记得农村很苦，新闻媒介一时曾无法使他相信 1949 以来，乡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直到他在一个公社生活了一年之后，他才相信，虽然乡村生活仍然比城市生活艰苦，但物质生活方面确实有了很大改进。„对于一些家庭来说，青年人的离去，可能会使家里失去了劳动力，从而在照顾生病和年老的家庭成员方面产生了一些困难，这是一个在动员工作中被常常提到的问题。„面对这样一些具体问题，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摒弃了“养儿防老”这样一种传统观念而去相信“养儿防修”。„

家长们所关心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由上山下乡运动所引起的身份地位及职业方面的问题。一些家长担心他们的子女在农村很难或根本就没有前途。„他们甚至确实看到了这种可能性。他

们认为上山下乡是人往低处走，并沮丧地说，他们的子女必须从最底层重新开始奋斗：“如果将我们家几代以来的第一位中学毕业生送到乡下去，那将是一个‘极大的遗憾’。”上山下乡是人往低处走这样的观念不仅存在于普通老百姓的思想之中，在解放后的中国领导阶层中同样也有市场。毕竟，社会中的领导阶级是工业无产阶级，而贫下中农只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最可靠的同盟军”。因此，一些工人家庭不愿让他们的子女降为农民。“工人的儿女有着优良的家庭出身，没有理由将他们送到农村去。”

报纸报道家庭对上山下乡运动的不赞成态度时还常常表现出了家庭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通常是一些家庭成员拥护，一些却反对这场运动，经过家庭内部长期的讨论和一定的思想学习之后，“好”的一边占了上风。一些文章大量描述了这类家庭矛盾，尽管没有清楚地写明这类矛盾是如何产生的。有时，是年青人想到农村去，但家长反对，最终年青人说服了家长。有时是一位，或两位家长都扮演了动员子女下乡的角色，譬如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位解放军司令员的女儿认为，因为“我还年青，最好让我继续上大学或参军”。这位父亲便和她一起学习了毛的思想，她就到农村去了。另外一些抵制上山下乡运动的例子，多半都是家长的一方——一般是家中的母亲对这样的运动持不同意见。如果说这后一种例子有什么模式，那么通常都是政治上有更重要的地位的家长起着说服和动员另一位家长的作用，这后一位家长因为较少参与政治活动而更加恪守旧的传统观念。在北京那个不愿将儿子送去内蒙的家庭中，就是孩子的母亲，一位党的宣传机构的成员，支持儿子到内蒙去，并用忆苦思甜的方法说服了丈夫。然而，在另一些例子中（或许报纸上不常报道这类例子），家人中没有人愿意接受那种新的价值观。无须证实，在这类例子中，这样的家庭会公开抵制上山下乡运动。不过，如果不存在逃避上山下乡的可能性或因此将会背上干扰上山下乡方针政策贯彻执行

的罪名的话，那么，尽管不愿意，这个家庭还是会做出服从上级指示下乡去的决定，因为如果不这样，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

中国领导人对许多城里人继续恪守传统观念所采取的相应措施是坚持不懈地开展上山下乡运动。他们希望，在反复的动员工作中所创造出的“声势浩大”的支持上山下乡运动的“革命舆论”，能够消除传统观念，并改变人们的态度。”有时，他们的努力以高度集中的方式得以表现。1973年至1974年的批孔运动就是一个较好的例子，在这场运动中，新旧两种观念展开了公开较量，双方都在集中力量试图改变对方的观念。在批孔运动中，孟子的名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父母在，不远游”等均遭到谴责。”当然，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完成。

城市人口中接受新的思想观念的人所占的比例到底是多少，革命的价值观念是否在不断地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对这些问题作一个较为准确的结论是困难的。但有迹象表明，即使许多城里人没有接受新的价值观念，他们的态度也有所改变。看来，上山下乡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对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产生了影响。文化大革命前有许多人瞧不起蓝领阶层的工作，那时，一些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青年拒绝到工厂去工作。”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迅猛展开，工厂的工作渐渐受到了重视，“被安排进了工厂的意气风发，兴高采烈，而那些被安排去了乡村和山区的则感到自己低人一等。””我所采访的知青都着重强调了青年对工厂工作的羡慕和向往，有些人说如果当时能得到不久就能被安排进工厂这样的允诺，他们就不会逃往香港了。在被采访者看来，一位知识分子的女儿嫁给了一位城里的工人就是一桩好的婚姻。\*这样，上山

---

\*持这一看法的人并不只是出于留城的考虑。对文化大革命记忆犹新的人们说，知识分子和干部已不再象以前那样令人羡慕了，因为他们在文革中都遭到了冲击。参见第4章中对知青婚姻问题的讨论。

下乡运动便提高了工人阶级在一般城市平民眼中的地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多年来提高干体力活的工人地位的努力一下子就完成了。让青年下乡当农民，使官方让受过教育的人们去种田也不再象以前那样被认为是不体面或屈辱的事了，这仅仅是因为知青下乡的现象太广泛、太普遍了。还无法预测这种新的价值观是完全为群众所接受了，还是只是在由有关的方针政策及相应的措施所产生的压力之下存在一段时间，但这种现象确实存在着，这确实是值得一提的。

### 3. 什么人可以留下来？

倘若每年的中学毕业生全都要下乡，那么地方政府所要履行的职责或许就只是保证欢送和安置工作的顺利进行。但事实上他们的任务越来越复杂。不论在哪个城市或城镇，每年都只有一定比例的毕业生被送下乡，因此，地方政府就面临着决定每一个具体人去向问题的任务，这个青年是应当下乡、应当安排进工厂或商业单位，还是送去参军？这种选择的范围是随着上山下乡运动开展的强烈程度而变化着的。在全国范围内，1968年、1969年可供选择的面较窄，七十年代初选择的面宽了些，接着又窄了，特别是1974年或1975年（见表7）。然而，如果第2章里阐述的那些事实是准确的，那就表明，至少在全国范围内，某种程度的选择总是存在，即使在上山下乡运动最轰轰烈烈的那几年里也是如此。<sup>10</sup>另外，一些特殊的城市或镇，或许跟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不一样。表6显示了下乡知识青年在城市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的实质性变化状况。有些地方即使在全国下乡人数所占比例很低时，也坚持将本地的全部中学毕业生送到了农村。如辽宁的营口在1971年就是这样做的，并且，显然从那时起一直在这样做。<sup>11</sup>与营口地区1971年下乡的中学毕业生达到毕业生总



数的 99.5% 的比例相比较，其它有些城市和地区的下乡人数就相应少了些。据报道，有一些其它城市和城镇的下乡青年人数，接近上山下乡运动达到高潮的那几年，如 1974 年和 1975 年的全国水平。1974 年 7 月中旬，有报道说武汉在这一年将有 1 万学生从中学毕业，8 月，又有报道说这一年内将有同样数量的下乡知青到农村去插队落户。据报道，1974、1975 年辽宁省的一些城市如旅大、丹东、辽阳、抚顺和营口等也都积极开展了上山下乡运动。同样，1975 年，吉林有 13 个城镇将所有毕业生都送到了农村。而另一方面，广东省在 1975 年只将中学毕业生人数的 80% 送到了农村，但与 1972 年相比，这个数字也还是增加了，1972 年，广东只有 50% 的毕业生投入了上山下乡运动。

显然，有关方面每年对每一个城市的中学毕业生的三种就业形式都是有一定的分配名额的。上海一所私立学校——吴淞中学的一位官员在 1975 年谈到如何针对分配名额作出抉择时说：“国家通知学校需要多少人务农，多少人进工厂，多少人去参军或者支边。然后我们便去会见学生家长和学生本人，与他们讨论怎样根据国家的需要进行选择。国家的需要若符合学生的个人意愿，那么二者的利益是一致的。”但同时他也承认，为了完成分配额，常常需要开展“说服教育工作”。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意味着许多学生不愿下乡，如果没有足够的青年人志愿去完成下乡的定额，那么，做动员工作的人又该对谁去做“说服教育工作”呢？依据怎样的标准决定动员谁下乡、谁留在城市呢？

在作出选择时，当权者们的权限显然受到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但正式的限制范围不清楚。据被采访者说，政策允许残疾人、身体不好的人和家庭经济困难需要照顾的人留在城里，政策还规定了每户可以留在城里的子女的数目。一些被采访者提供消息说，在 70 年代初，当上山下乡的人数比例较低的时候，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一个孩子已经去了农村，那么其余的就可合法地留

下。1973年，当有关方面决定掀起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时，这项政策明显地改成了一家兄弟姊妹中只能有一个孩子留在城里。在广州的一所中学里，1973年有100多名学生被安排进了工厂，这些人占了毕业生人数总数的10%，据报道说，他们绝大多数都来自独生子女家庭。“如果这项政策被广泛执行，那就意味着在上山下乡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当权者极少或没有采取其它方式给青年在城里安排工作。”\*

据说当权者是根据青年的特长或身份安排他们在城里工作或参军的。“谈到特长，可分为政治、学术、艺术和体育等几方面。以政治方面的长处为例，被采访者提供的情况表明，好的政治表现，也包括好的阶级出身，是被安排进工厂，特别是参军的必要条件。原则上，政治上积极又担任过学生干部职务的有突出表现的青年应当责无旁贷地投入上山下乡运动。事实上，有关方面确实期待积极分子带头志愿选择大部分人不愿选择的职业。然而，积极分子中有一些人打个人利益的小算盘。例如，1968年，在北京，据说，学校红卫兵组织的“少数同志”“动员别人到农村和山区去，而他们自己却另有计划。他们感到因为他们是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所以他们应当受到‘照顾’，怎样‘照顾’他们呢？其实他们就是要留在城里，不愿去过普通农民的生活。”“事实上，也有一些这样的打算得到实现的例子。据被采访者提供的资料，1968年在广州，有东风兵团的红卫兵被指派为学校里的政治辅导员，并在城市里担任了其他的政治职务，这些人最终没有上山下乡。相反，那些政治态度不好的人则似乎要被选去上山下乡，因为有关方面认为这些人特别需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

---

\* 允许每家留一个孩子在城里的政策可能导致城市人口出生率的进一步降低。如果不愿参与上山下乡运动的父母因此决定只要一个孩子的话。

育。

文化革命前，一个人在高等院校入学考试中所表现出来的学业成就，可以作为使其免除上山下乡的依据。然而，文化革命一开始，阶级出身不好的学生，不论学习成绩多么好，通常都要被安排到农村去。1970年高校恢复招生之后，即使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原则上，中学毕业之后也不能继续学业；然而，事实上，在1975年这项原则面临高层次的挑战之前，已有种种因素（各方面的需要）动摇了这项原则的根基。例如，到了70年代，由于中国扩大了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对翻译和外语特别是英语教师的需求，显得特别突出。参观者得知“少数”高中生被允许直接升入大学以便学习外语；还有一些高中毕业后能立即在城里的小学里找到当教师的职业。“大约是由于科技人才奇缺，对于学习理工科的学生，深造的机会增加了。1972年，到广州的参观者被告知，中学毕业生中的“少数人”被直接送入了高等院校。“在那场以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原则为目的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参观访问中国的学者了解到，象北京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也在考虑直接从中学招收数学和物理专业的学生。”科学院的研究所也有可能招收突出的中学生，向他们提供某种形式的学习机会；或许，解放军也训练科学工作者和技术工作者以利军备建设的需要。”所有这些意味着，至少在某些领域及一定程度内，学术成就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方针政策产生了影响，尽管这样的影响还不足以使1975年曾主张设法让大量有天分的学生直接从中学升入高等院校的人们感到满意。

在外语、体育、音乐、戏剧及杂技这几方面有特长的青年可以凭藉他们与在安排青年上山下乡的具体工作中起作用的某一机构的特殊关系而免受上山下乡之苦。两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陪同美国代表团的青年翻译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显然是由于他们在语言方面的天分，这两位年青人在被送到农村去之前，成了中国

旅行社的工作人员，由于是旅行社的工作人员，他们到与旅行社有关的国营农场去呆了六个月，在那里他们边劳动边学习英语。在农村呆了这么一段有限的时间之后，他们回到北京，为他们的组织工作。”显然，他们的经历与那些普通城市青年的经历形成了鲜明对照，普通城市青年与类似的城市机构没有联系，因此，他们的返城是没有保障的。

对艺术或体育方面的人才，中国的城市，特别是象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有一个发现和招收在这方面有特长的青年的周密的网络。”国家体委在一些城镇设有工作部门，这些部门与学校辅导员的联系十分密切。当体育尖子从中学毕业时，国家体委的特殊政策可以使他或她不必按常规上山下乡。体育界的官员有权作出决定，并允许有特长的青年继续参加训练和比赛。1973年，当我陪同一个美国游泳代表团参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时，见到了一个负责水上运动的官员，这个官员强调，最好的游泳运动员也不能不被送去“上山下乡”，但有关方面可设法将他们安排到条件较好的地方并通知地方体育部门。不是每一个中国的县镇都有合乎标准的游泳池，那么这便意味着优秀的游泳运动员只能到方便到达城市体育训练场地的郊区，或者干脆就给他们在城里安排工作。”事实上，在音乐、戏剧及杂技这些领域里有特长的优秀人才也确实大部分都被从学校里招进了有关单位。”所以说，有关单位确实可以提供机会，使这些人不必上山下乡，或者至少少受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

身份地位又怎样影响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呢？一般说来，社会地位低、即阶级出身不好，除个别情况外，那是要被送到农村去的一个主要理由。”社会地位高，譬如工人阶级出身，或许也是留城的必要条件，但也不足以因此就被允许留城，特别是上山下乡人数比例要求较高，而当事人又没有突出的政治表现时更是如此。”同样，当一个企业需要从中学毕业生中招收学生或进行

其它训练时，这个企业的职工子弟可享受优先权。如果这个企业从附近的中学生中招收新工人，而城市规划者当初又将工厂、职工宿舍和子弟中学等一些相关设施尽可能方便地安排建在了一起的话，那么，工厂的职工子弟就确实可以被招进来。如上海柴油机厂就给在厂子附近的子弟中学毕业生享受了一些“优先权”。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是怎样完成上级所分配的上山下乡名额的。事实上，几乎不知道有关方面是怎样给各所学校分配上山下乡名额及安排在本地就业的，被采访者提供的报告显示了1968年没有下乡的学生的比例变化情况，这一变化范围从1%到15%、5%到10%不等。我们尚无法弄清这各种比例数之间的关系，譬如，学校的位置、学生组成成份的不同对下乡比例的影响等。很可能，这里有一些非正式的因素在起作用。

报纸上所刊登的引人注目的一个涉及到身份地位的问题，就是高干子女的问题。高干子弟这一身份本身就足以使这类青年得到自己所向往的工作，而不必由干部本人去主动对子女的安排施加个人影响。前面已有例子表明，地方的掌权者已依据一种不明确的前提达成了协议，即：重要人物的孩子理所当然应受到适当照顾。有这样一个例子，江西某县委书记的女儿高中毕业后，考虑到她的特长和爱好，她被“有关单位”安排进了一个单位做文化工作。还有这样一例，广西一个县委书记的儿子希望在毕业后能安排进工厂工作，学校也确实安排他进了工厂。在报纸上报道的这两个事例中，作父亲的都认为干部子弟不应享受特权，并且改变了学校的决定。如同在一些类似的例子中的父母那样，这两位身为干部的父母的行为与新的价值取向标准是一致的。这些例子说明，由于高干的身份地位本身就可以影响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干部们必须自觉抵制各种腐蚀与诱惑，不能按旧的传统观念去做官。一个负责地方武装的县干部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他高中毕业的女儿，非常想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这

位干部并不反对他女儿的想法，直到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之后，他才“豁然开朗”。最后，他说：“为什么所有的同志都认为我女儿参军是可以理解的事呢？这难道还不足以清楚地说明，在群众眼里，我是享有特权的人吗？”。

然而，也有一些干部为了使其子女能千方百计逃避上山下乡而动用自己的权力“走后门”。1973年秋，批林批孔运动中，报纸上有文章率直而明确地承认，有些干部在幕后为子女留城的事对有关方面施加了影响。以下来自甘肃、江西和安徽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

有些干部干得太离谱，以致利用他们的职务之便或各种关系将他们的儿女留在城里或将他们从农村抽调回城。

领导干部应当用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农村去的行动为群众树立榜样，并坚定地纠正让孩子躲避到农村去的错误倾向。

（合肥的一位党委书记说：）曾有一段时间，合肥市的一些干部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参与了不健康的“开后门……”活动，在教育青年人到农村去的问题上，我从来不搞任人唯亲，不论谁来说好话都不行。”

干部们既可以施加影响让其子女完全不用下乡，又可以在其子女下乡一段时间后，运用权力，将其抽调回城重新安排工作。相对于前者来说，那么，后一种似乎更加普遍。当上山下乡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干部们只能起模范带头作用，将其子女送到农村去，并且，许多人认为可以接受这一要求，但一旦舆论的中心转到了其它的事上面，干部们便可以利用他们各方面的关系，重新安排子女。最有名的一个这类重新安排

子女的例子，是一位做了部队高级官员的父亲，只打了个电话给“有关部门”，他的儿子便被南京大学录取了（详见第6章）。„

报纸宣传报道了许多抵制让后代享受特权的思想的腐蚀，将子女送到农村去，为大众树立了榜样的干部。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报道，在许多这样的例子中，干部们还做了不曾要求群众做出的牺牲，譬如，尽管自己已有子女下乡，还要将可以留城的子女也送到乡下去；拒绝有关部门因其家中有病人需要照料而安排子女留城的照顾，或者，甚至鼓励残疾儿子或女儿下乡去。„这类例子中最突出的是新主席华国锋。《人民日报》1976年曾在第一版报道了他如何鼓励他的小女儿离开北京到农村去插队，尽管，作为华国锋身边的最后一个孩子，政策允许她“留在他身边”。„

由于通常的思想观念的原因，这样的领导人的引导作用对于干部的子女们的上山下乡起着重要作用，这是保证广泛选择培养接班人的途径之一。这样做，“革命接班人”就不会是通过世袭特权和身份来选拔了。并且，这有助于上山下乡工作的顺利开展。没有什么比不光明正大公平合理地处理问题更能毁灭人们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所表现出的热情了，特别是在理想主义者中间尤其如此。文化大革命中，对“修正主义分配制度”的不满情绪便反应了这一点。„公平地处理上山下乡运动中的有关问题或许还可以使那些对新的价值取向热情不高的人，更能接受这场运动。一些在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期下过乡的知青谈了这样的印象，即那时的情景比文革前更加显得人人平等。到七十年代初期，随着对上山下乡的选择性的增加，似乎受到照顾的人的比例也增加了，没有受到照顾的人因此产生了愤世嫉俗情绪。当然，领导干部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农村去这样以身作则的行为对上山下乡运动所起的重要作用也得到承认了。„例如，在合肥的一家工厂，由于两位领导干部的子女没有带头下乡，其余的青年也便都等待观望，直到这两位干部公开在群众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这家工厂

的上山下乡运动才得以蓬勃开展。中共合肥市委发现这个市一家工厂的党委书记利用职权将其女儿送进了一所学校，这是由一家企业办的培养技术工人的技校。市委认为，如果不抓住这个例子进行正确原则的教育，那么就将削弱党对群众的说服力。„似乎只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领导人才严格强调高干子女必需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然而，事实上对于那些手中有权，可以给其子女提供各种机会留城的干部们来说，在执行的过程中也是一直存在着问题的。„上山下乡运动使新的价值观念与父母应当帮助子女争取过上良好的生活这样一种本能的期望之间发生了矛盾，这种矛盾对于那些自己已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的父母们来说，是一种辛辣的讽刺。

就干部们来说，促使他们支持上山下乡运动是因其职业、身份的本能所趋使的，干部们越是按革命的理想主义准则行事，上山下乡就越显得光明正大、公平合理，动员工作也就愈容易，这样，他们便为这场运动作出了贡献。但这远不意味着人们在思想意识观念上真正认为城市青年下乡是完全符合社会潮流的行为准则，如果人们的思想意识深处真由这一行为准则占主导地位的话，那就不会有人认为，让学术方面的优秀人才下乡是使国家的许多领域失去杰出人物的一种浪费了。

#### 4. 下到哪里去？

一旦决定要将一个青年送到农村去，就要选择插队的地点。插队地点的状况自然也是知青们极感兴趣的问题。因此，对这件事施加影响的问题就产生了。如果说上山下乡运动本来就因为一些青年留城了而一些没能留下来而显得不公平，那么，在知青所选择的“上山下乡”的地点这方面，也有不公平之处。有必要提一提这“不公平”的两点表现，第一点表现在知青插队的地点离家远



近距离的选择上。一些青年下到了附近的郊区或国营农场；另一些则下到了象从广州到海南、或从上海到黑龙江这样远的地方。下在附近郊区和国营农场的人可以经常回家，而下在离家远的边疆地区的人则可能至多一年只能回家一次。在郊区公社插队的人可以继续享受城市文化生活，而下在边远山区的知青由于与外界的通讯条件差，或许就不能享受什么文化生活了。从这一点看问题，40万下到上海市郊县的知识青年的日子就比60万下到新疆、黑龙江或云南的知识青年的日子过得好。

第二点表现在知青插队的公社及大队或小队的贫富不均。如第2章中所提到了，一般不安排知识青年到特别穷、地方经济无法接受移民的地方去插队。然而，在这一前提之下，知青所插队的各公社之间的贫富状况仍有很大差异。知青插队的单位的富裕程度是上山下乡运动中可变异度较大的一个主要问题。这个问题对下乡知青本人及其家庭两方面作出抉择都是重要的。在其余的方面平等的状况下，适应相对富裕些的乡村生活比适应收入较低的地区的农村生活要容易些。

另外，也有必要选择青年将要参加劳动的生产单位的组成形式。即：人民公社、国营农场还是生产建设兵团。<sup>\*</sup>在知青们看来，这几者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国营农场和部队农场的知青的物质生活较有保障，因为农场工人有固定工资，享受公费医疗，并不用为做饭这类日常生活安排操心着急。但国营农场或部队农

---

<sup>\*</sup> 尽管生产建设兵团所属的农场由解放军管理，但被送到这里的知青不属于正规战士。送到兵团的知青是在全国征募的。由于所需要的只是大量合格的劳动力的一部分，所以解放军可以从这批人中挑选其精华。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被挑选到部队系统服务被认为是令人羡慕的。部队农场的工人被称作“战士”，并且，如前所述，也接受一定的军事训练，但他们的社会地位比正规战士的地位低。

场的居住条件，特别是在边远地区的这类农场的居住条件一般都比较差，结构粗糙，陈设简陋。另外，这类农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部队农场的日常生活，强调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处于一种半军事化的状态。相反，在公社插队的知青，物质生活虽不那么有保障，但同样也不必十分守纪律，对待生产劳动，也享有更自由的选择性——可以好好干，也可以不那么认真。公社里的下乡知青靠工分生活，工分值随着每年收成不同而不同，也随着农民根据知青所作出的努力程度对他们的工分的分类不同而不同。公社的知青对生活拥有较大选择权，但同时也有风险。（不过，正如在下一章里将要讨论的，近年来，有关方面正在在物资供应方面作出努力，以保证在公社插队的知青的日常生活的正常化。）

真正投身于革命的青年或许会真心实意地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类青年受到集体生活、先驱精神、爱国主义及具有军事特征的解放军农场生活的吸引，会要求到遥远的边疆省份去。被采访者提供消息说，1968年，有许多左派红卫兵，其中包括干部子弟，自愿选择去了海南岛的部队农场。特别向往革命的青年会要求到延安附近的村子里去插队落户。延安是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的所在地，事实上已有两万知识青年，其中大部分来自北京，在那里插队落户。一群来自北京的中学生说：“延安人民对中国革命作出了杰出贡献，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他们的这一要求得到了北京和延安地区两方面的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赞赏与支持。这类情况一般都是成批成批人的志愿行动：集体主义精神或者说集体主义的压力大概有助于促成不考虑物质利益的“上山下乡”集体行动。

然而，我在采访中所得到的一个主要印象是，许多青年确实认真考虑了到某地插队给自己在物质及其它个人利益方面带来的得失问题。报纸上的宣传报道加深了我的这种印象。报纸上报道了这样的消息，即：广州一所中学里的两个班级的毕业生，全部

志愿上山下乡，并且宣布说“他们不挑选插队路线的远近及插队地点，不讲任何条件。”<sup>99</sup>知青们选择地点的倾向性各有不同，但或许最普遍的想法就是选一个离家近的地方，以便继续与家里保持联系，当然，这地方是富裕的。被采访的知青说，他们及他们的大部分同学都不愿去海南，主要是因为这个岛屿离广州太远，与外界通讯联络不方便。广东北部的一些县历来就有贫穷落后的名声，青年们因此也不愿去那里插队。不过，那些来自于经济条件不好，家中可能无力给他们寄钱的家庭的青年并不介意路的远近或地区的贫穷，愿意到海南这样的地方的国营或部队农场去落户，图的是经济上有保障。一位1968年曾在上海的一所中学读书的青年说，这个原因使她的一些同学要求去内蒙古和黑龙江。在她的同学们看来，安徽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一旦有自然灾害来临，人们便可以看见安徽农民在上海街头讨饭。显然，在家庭内部和朋友之间，对到某地去插队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一般都进行过多次讨论，各种想法都有。例如，上海这位知青的一些同学认为到北方去也不那么糟，因为寒冷的冬天意味着在那里一年只需要干半年活。另有一些人只是因为江西气候温暖便认为去那里也不错。她还有一个同学是共青团的积极分子，志愿申请作为上海第一批去延安插队的知青去了延安，显然，她的目的就是希望成为部队农场的领导干部的培养对象。一位广东的被采访者提供资料说，大湾国营农场，虽然离广州近，但因为那里有血吸虫病，一种由钉螺产生的病，人们不敢到那里插队。<sup>100</sup>还有，在广东，已经决定了要逃往香港的人自然是希望到离香港更近一些的地方。

知青若想对插队的地方有所选择，一个主要的方法就是尽早志愿申请上山下乡。广州地区的中学毕业生一般会被指定下往三类地区，其中包括海南的解放军农场及离广州距离远近不等的一些县里的公社。通常，早些志愿申请的人，可以满足自己的第一

志愿。当然，也存在一些限制，譬如，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对知青的选择也可能有影响。1968年，据报道说，在文化革命中参加过武斗的红卫兵，特别是打败了的红旗兵团那一方的红卫兵就被送到了海南的部队农场，在那里对他们的管理更容易些。

即使可供选择的机会很有限，但提供一个选择机会看来也是有助于上山下乡运动顺利进行的一项措施。既然上山下乡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对插队地点的选择有助于使知青能顺利度过这场运动的每一阶段，以便使自己对这场运动的投入能取得最好结果。然而，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城市和城镇都给知青提供选择的机会。

在1968年的上山下乡动员工作中，广东青年有大量机会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选择插队地点。其方法之一是利用广东当时执行的“投亲靠友”政策，这项政策允许青年到有他们的亲戚和朋友，也包括以前下乡的同学的村子里去插队。原则上，有关方面应该对知青提出的申请进行调查研究，确保农村公社同意接收，但在1968年和1969年初，上山下乡人数众多，社会秩序混乱，而行政管理也处于一种混乱状况的时候，很多青年只是因为个人对环境的选择便去了想去的地方。据一些被采访的知青说，学校里的分配工作是由解放军宣传队的成员来负责完成的，而这些人对广东的情况并不熟悉。由于缺乏准确资料，伪装有政治热情的学生也能够利用这一形势达到个人的目的。据被采访者提供的情况，由于这些弊端，1969年取消了投亲靠友政策。<sup>101</sup> 无需假设便可以知道，1968年一些知识青年的这种欺骗行为有其典型意义，这种情况无疑反映出了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时，一些城市知青的道德沦丧的状态。

报纸上没有公开报道干部们对知青插队落户地点的选择施加影响的事例，但这种影响极有可能存在。因报纸报道过某人曾劝告干部将其子女送到附近更方便的地方插队而不是到遥远的地方

插队。<sup>100</sup>很可能，干部们对知青插队选点的影响反映在对招收了大量高干子弟的特殊学校的对口下乡地点的分配上。例如，北京市31中有30%的学生来自干部家庭或高级职员家庭，1973年到这所学校参观访问的人们被告知，这所学校毕业生的下乡人数，1970年是30%，1971年少于30%，1972年超过了50%，在许多北京青年被送到象云南或陕西这样一些省份去了的那几年里，这所学校的青年全都下到了北京郊县的一个公社。<sup>101</sup>1975年，有一些外国人参观了湖南长沙郊区一个富裕的养鱼大队，在那里，有人碰到的下乡知青绝大部分都来自于干部、医生及大学教师家庭。这位参观者被这种“明显令人感到尴尬”的现象惊呆了，于是便产生了关于这些人的出身背景的讨论。<sup>102</sup>

## 5. 一场远未结束的“战斗”

如果将青年送到农村去的“上山下乡”的政策继续下去，那么，这项事业看起来似乎有利于寻找最大限度增加乡村对大城市人口容纳的途径。从理想的角度看，上山下乡应当成为城市日常生活中正常的一部分，就同中国社会主义其它方面所发生过的情况一样。并且，有关方面为造成这样一种气氛也做了许多工作。例如，创造条件让城市里的孩子很早就懂得农村生活，从幼儿园就开始教这方面的歌曲；中学阶段继续讲授有关农村的知识并学习上山下乡运动中的英雄人物事迹。无疑这些做法有助于使上山下乡在年青一代心目中成为一种正常的必由之路。<sup>103</sup>但事实上，城市上山下乡动员工作中反映出来的整体印象却是，将知青送到农村去这一做法既没有正规化也没有正常化。其原因是两方面的：首先，相当一部分城里人有着与这场运动赖以依存的价值观不合谐的思想观念。第二，上山下乡的实践常常证明这场运动不可能成为城里人所期待的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些城市居民们

看来，上山下乡运动总是以一种不稳定的、无法预测、并且难以抗拒的状态出现。城里的家长们不能肯定他们的孩子是否会被送下乡，他们是否有能力对插队的地点的选择这样命运攸关的事情施加影响，或者，他们的孩子最终能否返城。考虑到这些没有把握的因素，人们会特别敏感这场运动中的不公平状况，而不公平性又最容易激起人们的不满情绪。美妙而革命的口号掩盖不了下乡知青和留城知青之间、到近郊插队和到边远地区插队的人们之间显而易见的对立情绪。因而，毫不奇怪，中国有关方面在谈到上山下乡的说服动员工作时，总是强调在这其中碰到的困难，并指出“这场斗争远没有结束”。

中国领导人为解决这些问题颇费了些精力。有关方面为了让人们更能接受上山下乡运动并适应与之有关的种种要求，一直在修订有关方针政策，采取新的措施。1974年夏，湖南的一个工业城市株洲实行的一种新的安排知识青年下乡的方法，引起了全国公众的重视，并被赞赏为其它地方应当学习的一种安置知青的模范方法。株洲所采取的方法是让株洲市内的各单位与周围县里的农村中的有关单位挂钩。市政府有关部门与周围农村的有关公社共同制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计划，这样便大大增强了知青上山下乡的稳定性，并且可以保证株洲知青不会下放到遥远的地方：

从1974年到1980年，将知识青年送到山区和农村去的计划成了家喻户晓的事情。工厂的领导们知道某一年该厂将有多少职工子弟要下放到哪一个公社，乡村干部们知道某年将有多少知识青年下放到哪一个大队，做父母的知道他们的子女在中学毕业后将去哪一个地方插队。

株洲模式具有预知性及稳定性，同时它也强调城市各单位在

动员工作后的继续参与并对知识青年在乡村插队落户的全过程负责到底。从前，城市各单位只是参与将知识青年送到农村去的动员工作，对知青下乡后的一切安排，并没有紧接着开展有计划的活动。以前，为了对其在农村插队的子女实施正面影响以便使子女对插队生活感到满意，城里下乡知青的家长们也曾尽最大努力做了许多工作。各有关方面也仍然十分关注这一问题。<sup>100</sup> 同样，为了使离家在外的知青们能更好地适应农村生活，许多城市每年都组织到农村去探望知青的活动。<sup>101</sup> 但是城里的大部分单位，譬如工厂，却很少为安置工作本身做什么实事。<sup>102</sup> 而在株洲，工厂在其职工子弟中学毕业后将去插队的公社建立“支农点”。在这些青年下乡之前，城里有关单位的干部即与其在农村的对口单位取得联系，做一些准备工作。城里的单位帮助知青建造房子，或提供一些建筑材料。城里有关单位还派出干部到知青点和青年们一起生活和劳动，帮助他们解决在农村碰到的实际问题。这些干部并负责回城后向有关单位及知青家长汇报情况。由于城乡之间建立了这样一些联系，知青们就不是完全脱离城市了。报道株洲情况的有关文章没有提到给知青在城里重新安排工作的问题——这些文章中同样也宣传“终身务农”的主题——但象这样让知青点与城里的某一特殊单位保持联系确实有助于帮助知青回城。<sup>103</sup> 株洲是一个发展中的城镇，城里有单位需要人时，便可以从这个城里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抽调。即使这样的事不发生，城里有关单位对上山下乡安置工作的参与也使下乡知青的家庭有一种安全感。因此，《人民日报》将株洲模式誉为缩小城乡差别的一种新方法是不是为奇的。一篇评论文章赞扬这种新的做法“非常及时地满足了广大群众的愿望，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因为知识青年及其家长免除了担忧，贫下中农也对此感到高兴。”<sup>104</sup>

那么，其它地方对株洲模式的仿效情况如何呢？由于这种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认可，城里有越来越多的单位，特别是工

厂企业参与了上山下乡运动，也就是说，不仅参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说服动员工作，也参与他们下乡后的安置工作。当然，如果是象株洲这样，将青年安置在附近农村而不是较远的地方，城乡之间建立联系就更容易一些。但广泛实行这样一种新的安置方法还是需要克服地理位置上的障碍，在某些情况下，城里的一些企业被指定将其中学毕业后的职工子女送到较远的农村公社或国营农场去插队落户，企业的干部也一起参与插队。<sup>100</sup>事实上，将城里的干部派到农村帮助领导下乡知识青年，已成为一种能够为人们广泛接受的实践方式，下一章将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讨论。

对情况进行预测并事先作出计划安排是株洲模式的主要特征之一，但其它地方学习这种模式是否能取得同样效果却令人怀疑。不同城市每年对劳动力的需要情况不同。在报纸上没有读到其它城市的青年人也能事先知道自己是否会被送到农村去的报道。株洲青年事先就能知道自己将下放到附近农村，因而有一种稳定感，这一点，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能轻而易举地仿效的。也不是所有的郊区都能吸收新来者安家。并且，从根本上讲，上山下乡运动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将城市青年送到边疆省份去。因此，上海一直都是将知青送到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并且，1976年还第一次将知青送到了西藏。<sup>101</sup>这并不是说有关方面不是一直在努力，尽力争取将更多的青年安置在附近农村。例如，据一位1973年到北京探亲的华侨说，家长们对青年有些去了边远山区，有些去了郊区，还有一些留在城里的工厂里这种不公平现象很有意见。所以，报纸和有关方面告诉家长，在实践中，上山下乡运动将会越来越正规化。根据报纸的报道判断，据不完全统计，事实上1974年到1975年间北京青年都安排到这个市的郊区插队了。<sup>102</sup>

上述状况表明，只有当稳定性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时，才有助于上山下乡运动的顺利进行。可以想象，稳定、公平的上山下乡



政策应当是将所有的知青都送到边远的农村插队，在那里度过终身。这样的制度可以排除其它所有的选择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但在许多城里人看来，这也是一种最糟的结果。因此，说服大家自觉走上山下乡道路，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许多城里人看来，最理想的上山下乡制度应当是所有的青年都到附近农村插队，按规定锻炼一段时间之后再全部返城。但由于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事实上不可能有这样的政策。因此，制定政策的人们便在以上谈到的所谓最好和最坏的方案之间灵活机动地进行着平衡。这样做的结果是产生了许多不稳定因素，这些因素阻碍了上山下乡运动的进一步制度化。（使人们对上山下乡运动不能习以为常）。这种不稳定性还产生了其它副作用，例如，为那些想要设法逃避上山下乡运动的干部们提供了从事不正当交易的机会。不过，这种不稳定性也使一些有特殊才能的青年能通过正常途径免除上山下乡，并且，对许多城里人来说，这种不稳定性意味着他们最不希望出现的结果没有成为现实，这就使城市人增加了紧跟形势的自觉性。

#### 注释

- 1 1975年7月26日南昌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47期，1975年7月30日。
- 2 1974年10月2日广东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201期，1974年10月16日。
- 3 1975年6月5日长春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10期，1975年6月6日。
- 4 1970年8月8日《人民日报》；1972年8月21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65期，1972年8月23日。另据被采访者提供的报告。
- 5 参见1965年5月26日《文汇报》有关城市下乡知青的报道；1969年5月22日《光明日报》报道了农村干部向知青家长介绍下乡知青状况的消息；1972年1月3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个延安地区赴北京汇报团所作的报告；1972年5月3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个知青家长代表团从北京到延安去探望知青的消息；另据1973年2月25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消息，1969年到1972年间，北京派出了10个学习、慰问团和7个学习小组到外地了解北京下乡知青的生活状况，《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3月1日第41期。

- 6 1972年10月18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2年10月20日第205期。
- 7 1973年5月1日《红旗》第5期谭闻的文章：《青年应当站在革命斗争最前线》。
- 8 1972年10月20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2年10月26日第208期。
- 9 1962年7月7日《解放日报》。
- 10 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 11 1973年5月26日《人民日报》，另可参见叶清：《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促进派》，《红旗》1973年第11期。
- 12 马丁·K·怀特于1968年、1969年的采访提供了来自广东的例子，1969年7月28日《光明日报》载文批判了文革前景山学校的一些做法，如教师们只是向学生们讲述边疆美丽的风光、宜人的气候及其它有魅力的地方。
- 13 据说黑龙江党委用许诺让青年尽快入团入党的方式动员城市青年到他们那个省去新队落户，见1967年2月20日《人民日报》。
- 14 史林（音译）《知识青年同工农结合的正确路线》第30页。
- 15 以1975年我的助手采访得到的资料为依据。
- 16 1973年参观过郑州的史密斯学院的史蒂文·戈尔茨坦教授提供了这条信息。
- 17 1974年1月7日北京新华社消息；1972年1月7日《人民日报》刊载的一篇来自河南洛阳的报道采用了这样一条富有特点的标题：《通过社会调查批判读书无用论》，另可参见下一节。
- 18 1968年9月14日《北京日报》；1969年1月18日《南方日报》。
- 19 1972年8月13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2年8月15日第159期；1975年5月3日《人民日报》。

- 20 1975年8月8日沈阳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8月14日第158期。
- 21 1969年7月23日、1969年6月1日《光明日报》;1975年8月8日沈阳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8月14日第158期。
- 22 1967年11月1日《支农红旗》第3期,《联合出版物研究处》第436期,1968年1月17日。
- 23 1973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
- 24 1973年1月18日《人民日报》。这30%不包括那些因病或因某种特殊原因而没有下乡的青年。
- 25 1974年5月4日长春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5月7日第89期及5月12日第92期。
- 26 近年来,辽宁省上山下乡的人数比例很高,因此,在营口、朝阳等一些地方,1974年98%“应当下乡”的知青去了农村;在旅大,1975年99%的应当下乡的知青去了农村。参见197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
- 27 1975年7月19日广州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7月22日第141期。另据报道,在北京的一些居民区设有这类政治夜校,甚至乌鲁木齐市也有仿效北京开设这类学校的例子。
- 28 以我的助手1975年采访所得资料为依据。
- 29 1975年7月3日哈尔滨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8月4日第150期。
- 30 据1975年8月8日沈阳人民广播电台消息,在旅大,民兵、人民解放军的一些单位,共青团、工会、妇联以及公众安全部门,在上山下乡运动中都起到了“生力军”的作用。这种全民动员或许是197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的知青响应号召下乡的比例达99%的保证。另可参见1975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有关上海、北京的民兵组织在知青运动中起作用的文章。勿庸置疑,青年人在这场运动中的错误行为是会受到社会关注的。据一位被采访者提供的材料,1972年下半年,广州的一些单位曾传达过一份批评上山下乡运动中不良倾向的文件;公开的宣传媒介也涉及到有关知青犯罪的问题。另外,关于

民兵组织的作用。还可参见第 6 章。

- 31 1976年11月13日、14日南京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6年第221期、224期。
- 32 1963年4月25日《北京日报》评论员文章。
- 33 1964年7月25日《中国青年报》。
- 34 1964年5月11日《解放日报》。
- 35 1962年7月7日《解放日报》。
- 36 1963年5月18日《解放日报》。
- 37 1964年7月4日《文汇报》。
- 38 同上。另可参见1969年4月24日、11月20日及1972年1月30日《光明日报》。
- 39 1964年1月11日、1964年2月29日《中国青年报》。这一说法自然遭到了驳斥。
- 40 1974年2月15日哈尔滨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1月9日第6期。对恢复高考制度的抵制行为是由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的一封信的发表引起的。见第6章注57。
- 41 1974年2月15日哈尔滨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2月22日第37期。另有一例,表明在山西太原的一所学校里存在着抵制上山下乡运动的情绪。见1974年2月26日《光明日报》。
- 42 1972年8月16日、9月6日《光明日报》。
- 43 1973年3月17日《人民日报》。
- 44 1972年12月2日《光明日报》,1975年2月13日《人民日报》。还可参见后面关于干部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影响作用的讨论。
- 45 埃兹拉·沃格尔教授曾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挂帅的国家里,个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已经由朋友间的友谊表达变成了同志式的情况交流。也就是说从表述个人情感观点变成了交流官方的信息。然而,由于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官方的价值观与公众的期望和前途观不一致,所以人们相互间也交流自己的情绪和想法。参见埃兹拉·沃格尔:《从友谊到同志:共产主义中国人际关系的变化》,剑桥,MIT出版社1976年版。
- 46 1971年1月16日《光明日报》。

- 47 1969年9月14日《北京日报》。1965年6月30日《文汇报》。1969年8月6日《广州红代会》。1973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 48 1975年2月13日《人民日报》。
- 49 1968年9月14日《北京日报》。1969年10月23日《光明日报》。1969年1月6日、1月12日、1972年2月17日《人民日报》。
- 50 1974年4月17日《人民日报》。
- 51 1973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 52 《支持和教育子女上山下乡干革命》。1972年《红旗》第8期第66页。事实上，这些情绪是由祖父母辈表现出来的。做父亲的立场相反。
- 53 1969年8月6日《广州红代会》。
- 54 参看1968年6月5日《北京日报》。1969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1972年9月6日、12月20日及1973年6月13日《光明日报》。
- 55 1972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
- 56 1969年1月5日、1969年1月15日、1969年2月13日、1973年2月27日、3月27日、8月20日《人民日报》均刊登过类似例子。
- 57 1971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过江苏扬州有家长不支持子女上山下乡的例子。
- 58 绝大部分被采访者都是处于这种情况。尤其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是如此。
- 59 参见1975年6月8日《人民日报》。
- 60 1974年7月28日沈阳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8月1日第149期；1974年10月9日武汉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第198期。
- 61 见1965年6月5日《北京晚报》。1965年6月6日《北京日报》。
- 62 1969年8月6日《广州红代会》。得克萨斯大学的戈登·贝内特教授曾在中国研究过经济问题。他发现，自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以后，一些低层次的行业也成了许多人向往的工作岗位。
- 63 当然，各种不同的解释都存在。
- 64 1972年11月22日沈阳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2年12月5日第235

- 期。另据 1973 年 11 月 22 日沈阳广播电台消息，1974 年 11 月 23 日新华社北京的消息，1975 年 9 月 14 日沈阳人民广播电台消息。
- 65 1974 年 7 月 11 日武汉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 年 8 月 12 日第 135 期。
- 66 1974 年 9 月 22 日沈阳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 年 10 月 2 日第 208 期；1975 年 9 月 14 日沈阳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 年 10 月 28 日第 192 期。
- 67 1975 年 8 月 4 日《人民日报》。
- 68 1975 年 8 月 24 日广州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 年 8 月 28 日第 168 期。这天的广播报道说 1975 年有送 8 万知青上山下乡的计划。事实上，这一年 8 月有 2 万人下乡，3 万人递交了“上山下乡的决心书”，报道说这包括了近年来中学毕业生半数以上人数，由此可见，8 万的计划数接近了全部中学毕业生的 80%。
- 69 威廉·肖克罗斯：《城市孩子与农民：并不平等》，纽约《时代周刊》1976 年 2 月 15 日。
- 70 取自 1975 年我的助手的采访报告。
- 71 据我所知，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有关于干部在自己职权范围内行贿受贿的议论，但在制定某种政策时，行贿之类的事所起的作用并不重要。见林恩·T·怀特：《文化大革命中上海的政策》第 339 页，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71 年版。
- 72 1968 年 7 月 13 日《北京日报》。
- 73 1973 年密西根大学米歇尔·奥克森伯格教授提供的资料，另见威廉·克森：《童年时代在中国》第 170 页，耶鲁大学出版社 1975 年版。
- 74 1973 年 7 月 30 日《香港STANDARD》。
- 75 1974 年 5 月耶鲁大学参观过中国的人员所提供的材料。
- 76 观察家们都认为这些均是获得高级技术训练的途径。
- 77 同 75。
- 78 显然，是少年宫所组织的活动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在上海，少年宫是许多观光者，也包括我自己去参观过的地方，参见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文化大革

命前后》，第 343—344 页。

79 应注意的是，在中国，由毛主席倡导的游泳活动十分普及，如，中国南部有许多河流和湖泊，远比有些大城市更具有普及这项运动的优越性。

80 泰维斯：《文化大革命前后》。

81 当然也有例外，至少有一个被采访者提供过这样的信息。

82 两位被采访者（一位是工人的儿子，政治上表现不好，另一位是革命干部的儿子，政治表现好）谈到了这些情况。

83 同81。

84 有资料表明，1968年，不仅是高中毕业班，其它年级的同学们也要上山下乡。一位来自中学低年级的被采访者说，那时，只有 25% 的初中学生可以继续学业。

85 参见上注42、43。

86 见1973年3月17日《人民日报》刊载的通讯《县委书记送女下乡》。

87 1972年8月16日《光明日报》。

88 1973年8月29日《人民日报》。

89 1973年9月14日兰州广播电台消息，1974年1月24日合肥广播电台消息，1973年9月20日杭州广播电台亦播出了同样的消息，分见《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9月19日第182期、1974年1月29日第20期、1973年9月23日第188期。

90 参见第6章注61。

91 见1972年12月22日、1973年8月20日、1973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

92 1976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

93 参见第6章第2部分；另参见第2章关于文革前高干子弟在干部子弟学校里享有种种优越条件的讨论。

94 参见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及197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

95 1973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及1972年7月3日《光明日报》。

96 领导干部将子女送到农村去的例子在群众中产生了轰动效应，1974年4月2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部队干部送子女下乡的例子；1975年4月22日《光明日

- 报》刊登了北京的政府官员送子女下乡的例子。另见 1975 年 5 月 3 日《人民日报》。
- 97 1975年4月26日石家庄人民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4月20日第 84 期。
- 98 1975年4月22日《人民日报》。除了那些申请去了延安或河北保定之类有著名模范人物下乡的地区插队的知青之外,其余 3 万北京青年都到郊区插了队。
- 99 1969年1月18日《南方日报》。
- 100 1975年春,美国一个考察血吸虫病的代表团参观了这个农场,代表团成员得知这种疾病已在 1971 年被消灭干净了。(取自哥伦比亚大学麦隆·科恩教授收集的资料)。1972 年 2 月 9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则通讯,表彰一位来自广东的青年在毛泽东思想的鼓舞下,克服了害怕血吸虫的心理,赤脚步入有钉螺污染的水域的事迹。
- 101 在这个国家的其它一些地方,采用投亲靠友的方式上山下乡的方式仍很流行,参见《热情关怀下乡知识青年的成长》第 28-38 页。
- 102 1975年2月13日《人民日报》。
- 103 参见亚洲学者联合会:《中国:人民共和国内部》第215页;克林:《童年时代在中国》第 152、170 页及密西根大学马丁·怀特教授所提供的资料。
- 104 哈佛大学罗斯·特里尔教授提供的材料。
- 105 正如第2章里所指出的,这是一个城市中学如何向学生传授在农村有用的知识的问题。见第 5 章。
- 106 1974年10月12日广州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10月16日第 201 期。
- 107 1974年6月12日《人民日报》文章《一个很好的典型》,次日《光明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 108 1974年6月12日《人民日报》。
- 109 参见1971年9月23日《光明日报》,1971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以及1970年9月 6 日《光明日报》上对上海黄浦、江苏扬州、山东青岛情况的报道。
- 110 参见1971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另据1973年1月16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消



息,《国外广播信息服务》1973年第13期。

- 111 有材料表明,学校不仅在思想上教育毕业生热爱农村,也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帮助学生适应农村生活。见1965年9月5日《人民日报》上报道的辽宁鞍山的例子。
- 112 1975年7月25日《人民日报》。
- 113 1974年6月12日《人民日报》。
- 114 1975年2月13日《人民日报》。
- 115 1976年3月30日上海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6年4月1日第64期。
- 116 见1974年4月29日《光明日报》,1975年4月22日《人民日报》。主动申请到延安这类地区插队的志愿者除外。

## 第四章 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民” 的艰辛之路

在农村安置城市青年的目标，是要他们扎根农村，以队为家，安心新的环境，与农民打成一片，成为有知识的农民，对农村的发展作出贡献。人们承认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经过一个艰难的努力乃至斗争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下乡知青将获得“锻炼”，从而成长和成熟起来，最终成为有价值的“革命接班人”。具体地讲，下乡知青必须进行的斗争之一是防止士气下降。士气问题似乎影响了许多人，这些人中包括志愿下乡者和初来时满怀豪情者。在抵达农村地区后，他们或迟或早地开始感到沮丧。引起最初适应危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农村生活的艰苦。一位知青的父亲在《红旗》杂志中写道：“永红下乡后，开始一段时间热情高，干劲足，可是过不久，在来信中慢慢谈起农村艰苦来了……‘出门要爬坡，种田要爬山，天亮要出工，摸黑方回屋’……永红不久又来信说：早晓得这样苦，就不到山区来。”青年们可能对前途感到气馁，他们必须适应农村日常从事的艰苦劳动，而在学校时假日从事的农业劳动并不是这种劳动的充分准备，青年们也会因普遍低水平的生活而沮丧。他们从比较现代化的地方进入较低现代化的环境时，可能深深体会到了某种文化的冲击，尤其当他们新的农村之家远离或隔绝于大城市的时候。他们在与农民交流时会遇到方言甚至语言习惯的障碍；农民的习惯和农民的偏狭会妨碍知青与当地人的契合；因为农村实行较低的卫生标准（如某些卫生用品的完全缺乏或不堪使用），使在描写下

乡生活的文章中“怕脏”成为经常出现的主题。农村生活的枯燥似乎还表现在单调的劳作、吃饭和睡觉，只有政治学习和偶尔的文化活动才能打断这一过程。下放还引起了身份的降低。例如，在南宁市郊区落户的一位青年听到小孩喊他“拉粪车的学生”时，便感到耻辱。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毛主席的思想教导他农业劳动也是高尚的，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卑下也无济于事。只要旧的价值观念还广泛地影响人们的思想，那么知识青年从事农业劳动和城市居民接受农民“再教育”的做法就仍会使人觉得降低了身份，以致影响青年对农村生活的适应。

即使下乡知青成功地克服了开始适应农村生活时遇到的困难，那也未必意味他们的适应问题已获得了永恒的解决。在短期内获得适应的青年以后还会经历新的士气危机。这种危机，从根本上讲，来自“改造”的无限长期性。如果回城的重新安置看起来遥遥无期，一些城市青年就要忍受农村生活的慢性煎熬。这些青年并没有接受扎根一辈子的建议。他们一般抱怨乡下没有为他们提供有希望的“前途”，当他们看到那些没有下放的同学正在享受着舒适的城市生活时，他们深刻而具体地感到他们受到了贬谪。

一位城市青年无论是否愿意适应农村生活，他对下乡之初和以后的适应危机的克服，是由若干变量决定的。首先取决于他自己的基本动机。这种动机大致上是由他的个性、他的期望和信仰决定的。他的期望和信仰又基于他的社会化经验和他的阶级背景等因素。但是，该青年并非一个自由的行为者。他的动机并不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受着周围环境的影响，如他的特殊的劳动生活条件，乡下对他提供的机会，他所在知青集体的性质，他与干部和农民的关系，以及他与留在故乡的亲友们的关系等。那么，这种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增强了他可能具有的适应农村生活的决心，又在多大程度上加重了他的不满呢？

环境所起的作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当局的行为决定的。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城市青年的下乡是一个违反“正常”期望值的革命纲领。它不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而需要从整个政治体系中自上而下地获得不断的支持。如果人们并不指望下乡知青的行为会自行符合官方的期望，那么也不能设想农村环境中的行为者，即当地干部和农民，会象高层决策者和管理者所希望的那样去行动。当地人有自己的观点和利益，它们可能妨碍知青再教育目标的实现，也就是说，它们可能会对青年们适应乡村生活的动机起反面影响。因此，怎样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对知青和本地人之间的关系实行监督、调节和指导，是一个涉及下乡运动根本目的的问题。

本章是对下乡青年所处的农村环境作用的考察。本章第一部分，将说明环境并不象原则所表明的那样，经常有助于下乡知青的适应。干部不总是提供必要的指导和监督；农民和下放青年之间并不总能免于冲突。本章第二部分讨论了为提高知青对乡村生活的适应程度于1973年开始采用的改善知青和农村环境之间关系的政策及其执行情况。这两部分在时间上有某种区分。第一部分主要基于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资料，当时，农村必须应付几百万追随文革的青年人的到来。这些年所产生的问题到1973年时成为决策者们的论题，并成为随之出现的改良运动的主题。

## 1.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 A. 义务、责任与指导、管理

人们普遍承认，当城市青年抵达乡村后，不能任其发展，他们需要指导和管理。指导在“再教育”的概念中是清楚的；知青在农村生活的目的毕竟是重新社会化，贫下中农在原则上是他们的

老师。指导的需要也来自安家的现实：知青们体验到了调整的困难和士气危机；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和危机他们需要帮助。他们抵达乡村时不熟悉当地情况，并且不熟悉农村的生活方式。他们必须学习生产技术。他们甚至可能不知怎样区分五谷和杂草。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没有成年，依赖性强，从来没有独立生活过；他们必须学习怎样安排他们的日常生活——怎样做饭和怎样做预算。

下公社的城市青年有各种安家方式。如果土地够用或可以重新开垦，就可以建立较大的独立的知青点。否则，就要按照“分散的插队”的原则，把青年们分为三人至十五人的小组，安排在生产队中，与农民一起生活，但不与农民同居一室。他们住在用安家费建造的一间或数间房子里，这笔费用是国家为此目的而提供给他们的。安家方式的不同造成了指导结构的不同。如果知青被安排在生产队中，一般来说安排有一名公社一级的干部负责他们的指导工作。此外，还可能安排普通农民与在他们生产队安家的知青们一起劳动。例如，安徽省天长县向阳公社，在1970年到1971年期间，吸收了230名上海青年。男生组织成15个小组，女生组织为25个小组，他们分布在40多个生产队中。公社的五·七工作部门负责安置，在公社、大队和生产小队三级机构中分别建立了五·七领导小组。有120名“政治可靠，思想进步，工作方式正确和热心青年工作”的农民被安排进了领导小组。这些农民当中有一些人作为“负责日常生活中生产管理和人际关系指导的政治指导员”直接同知青组一起工作。

报刊上公布的许多例子表明，当地的指导人员应该发挥积极作用。指导不应三天打渔两天晒网，以免问题突然暴露而无法解决。指导必须持续进行，因为知青可能会在坚持务农的信念方面发生动摇，他们的士气可能会低落，农民和干部应对知青采取耐心和关怀的方式，把政治教育同注重具体的安家细节如生活安排

等结合起来，毫无疑问，在公社安置知青的工作中，存有一些扎实有效的指导的实例。但是，来自报刊和被采访者的材料所提供的大量实例表明，指导还有待改进。忽视指导的一个理由，是某些当地干部认为，下乡知青毕竟不会长期留下，他们仅仅是“过路客”，对他们没有必要做大量工作。这种有违“终生”扎根主题的想法所以产生，可能是因为一些下乡知青又被抽回城里，也可能因为其他城市居民下乡是暂时的，如五七干校的干部，故党的报刊觉得有必要提请农村干部注意，全国实行的下放政策是长期的，不应把重新安家仅仅看作一种“权宜之计”。

当知青们初来时，干部和农民显然普遍关心他们的安家问题，但是下乡知青们一旦定居下来，这种关心就会松懈，他们刚来时，一些具体问题，如住房和工作安排等必然会受到注意。但是一旦这些急迫任务得到了解决，青年们正式地安置下来后，干部们就可能转向其它更为重要的事务了。正如一位被采访者所说，起初干部每天都同知青交谈和帮助他们，但是以后干部便把他们同农民一样看待，青年们唯一特殊的活动是在大队一级定期参加政治学习。另一些实例表明，地方当局曾花费极大的力量对下乡知青实行再教育——为他们拟订长期的学习计划，并一对一地配备负有义务改进他们思想的农民和干部——但是干部和农民很快就开始厌烦这种频繁的卷入。两年时间的再教育足够了，人们这样认为，为什么还要浪费大量时间作额外的努力？这种冷漠的后果可能在实质上中止下乡知青与当地公社各机构之间的联系。吉林省长岭县委成员们发现“一些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干部不了解（知青居住的）那些地点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象《红旗》在1971年所抱怨的那样，“有个别地方对在那里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召集他们开过一次会，也没有深入地了解过他们的情况，对这些青年人政治上有什么要求，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思想上发生了哪些变化，有了多少

进步，那里负责青年工作的同志恐怕是不知道的。”<sup>19</sup>

当知青队的指导和管理不完善时，城市知青的自主性便增强了，他们可能做出妨碍适应而不是促进适应的行为。对知青队采取自由放任的方式，为所谓反向团结的现象创造了发展机会。在这种现象中，知青组的成员地位或知青集体内的小帮派助长了而不是制止了无助于适应的态度和行为。如果指导是强有力的，团体就应按照有利于团结的原则发挥作用：领导者挑选积极分子和动机端正的知青，动员他们把团体的批评和压力指向落后知青，这也是一个促使思想动摇和处于中间状态的知青积极转变的过程。<sup>20</sup>下公社安家的被采访者普遍有这样的印象，他们团体的特点，一般说并不是积极分子试图以利于团结的方式影响落后和动摇的青年。相反，他们描述了积极知青和落后知青之间的深刻裂痕。这两个圈子没什么往来。有一个例子表明，落后青年害怕和躲避那些努力劳动和表现积极的人。另一个实例表明，每个圈子的人彼此瞧不起。还有一个实例是，出身好的人与出身坏的人住在不同的房子里，他们之间缺乏有意义的交往。还有一个实例：某生产队的10名知青中有两名是努力劳动和态度良好的。较消极的多数则要求这两位不要如此拼命，因为这会使其余人难堪。这两位没有同意，他们当中有一位正是提供这一实例的被采访者。应该指出的是，落后的多数没有采取诸如排挤两名积极分子的惩罚措施；而且他们的关系仍然很好，但是这两位积极分子也没有试图去影响生产队里的其它知青。对于这种裂痕，报刊曾确认过它的存在。<sup>21</sup>在一个实例中，知青队主要由积极分子构成，但是他们不是“帮助”一位落后的家伙，而是拒绝同他一起做任何事情，甚至企图把他开除出团体。<sup>22</sup>也有实例表明，农民干部造成了先进知青和落后知青之间的紧张，或促使这种关系恶化。他们强烈偏袒前者，压制后者。<sup>23</sup>

在某些实例中，村内的整个知青点是以反向团结为特征的。

团体内不存在落后知青和先进知青的区分，根本缺乏积极分子。人们在受到压力的情况下彼此意识到了别人的不满情绪，团体内所有知青都极端憎恨下乡。这种共同的反向团结因这样一个事实而获得发展：一个公社的知青通常来自同一个城市，一个村庄的知青通常来自同一个学校。”源于城市的内部裂痕，如红卫兵对立派别的成员资格，甚至阶级出身背景的差异等，可能会削弱、消除并被针对农民的共同的团结感所取代。”大团体反向团结的实例肯定存在过。在文革期间，当公开表达知青整体利益的机会到来时，一些农村的知青组织就会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本地的当权者。”而且共同的反向团结似乎已成为一些人从东莞县南部的公社偷渡香港的基础，在这里，“偷渡风”实际上传染了一些生产大队的所有知青。集体维护权利的例子同样存在。在生产队甚至生产大队，当知青们在劳动方面受到歧视，或配给了不适合的住房时，他们就联合起来设法解救苦情。”尽管我们可以举出整个知青组以反向团结为特征这样的实例，但是，被采访者转达的主要印象都是知青中不断出现的分裂阻止了整个团体的反向团结。被采访者承认，文革中的分裂很快就消失了，但是他们也强调，知青中的阶级分野同积极分子和消极或落后知青的分裂一样突出。”这一点表明，在一个既定的知青单位中，至少有少数人通常会多少作出一些认真的努力来适应乡村内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积极分子未必就打算影响他们的落后伙伴。

按照官方的观点，软弱的指导会使知青受到不利于下放的负面影响。报刊曾大量谈到这一主题，即促使知青真正扎根的影响是多么微弱，而当知青们不能经常处于“正确”的影响下时，已开始做的事情又多么容易被颠倒过来。”如果管理松懈下来，青年们就会回到自己的世界中去。如有一个实例表明，知青们把晚上的时间消磨在打扑克和看“坏书”上。”或者他们还可能受到农村中阶级敌人的影响，据说地主或富农是通过与知青们发展友谊来



破坏下乡的。在这类例子中，阶级敌人可能会作如下同情性评论，“把知青送到村里来确实太残酷了”，或者知青“在村里没有前途”，„在表示关心的同时还可能送上蔬菜和水果作为礼物。按照报刊的报导，这类来往足以使某些青年从积极变成消极，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已起到煽动他们以不正当方式返回城里的作用。„下面的引文描述 1972 年辽宁海城县一大批下乡知青的情况，它暗示如果允许自发的影响在知青中蔓延，就可能发生严重后果：

1968 年以来，2 万 8 千多名来自鞍山、营口和海城县城区的知识青年下放到了农村。开始，县委一些成员没有充分理解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教导的深远战略意义，认为“知识青年来农村只需要有一个生活和劳动的地方”就行了。当知青的问题发生时，这些同志又认为“知识青年难管理”，“知识青年不驯服”，因此，他们把知青看做负担，忘了要对他们做思想工作。阶级敌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捣乱，企图用小恩小惠拉拢青年，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其他反动思想毒害青年人的思想。„

对知青和知青团体的生活采取放任态度同样妨碍了他们的谋生能力，从而妨碍了他们对农村生活的适应。1973 年，报刊证实了许多被采访者的报告：许多知青没有实现自给，却不得不留在农村谋生。河北冀县被当作说明这类问题及其解决方式的典型事例，1970 年在该县东十固公社落户的大多数知青没有达到自给；关于该县的其他地区，还没有人提供同样的资料。„那些没有自立的青年依赖着父母的汇款，这是 1973 年最高层领导人关注的下乡政策的缺陷之一。在不能自给的原因中，有两条是由于缺乏指导而产生的。这两条是，知识青年的出工往往少于农民；

知青团体通常没有组织起来从事获利的副业生产。

缺乏管理扩大了知青个人行为选择的范围。那些不想扎扎实实劳动的人，特别是当他们可以依赖父母的汇款时，能够自行决定自己是否出工。在东十固公社，知青们平均工作日要比农民少三分之一；另一些报刊的报告表明，知青们的工作日年年都有较大幅度的变化，这取决于动员的强度。„在冀县的一个大队，知青1971年的平均工作日为205天，但是1972年当大队领导们抓了这一问题时，工作日达到了269天，被采访者提出他们可以很自由地决定这件事。大约三分之一的被采访者说他们劳动得很辛苦，与农民不相上下，但是也有人离开乡村的时间太久，尤其是他们去广州时要超假。在农忙季节，一位青年通常早上出工，下午睡觉，晚上再出工。在这种情况下，生产队并非因为要“加强领导”而违背事先的约定，而是仍按知青实际出工的天数发给他们口粮，就当他们已经正常出工了一样。不这样做知青们就会出现亏空，在口粮上入不敷出，这就构成了当地社会的负担。由于这种情况，知青们常常背上了懒惰的名声，使他们很难发展同农民的关系。

副业，如养猪和家禽，种植果树，经营自留地，从事手工艺等，是农民家庭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在许多例子中，城市青年没有从这种收入来源中获得过利益。„知青们作为公社社员分有自留地，原则上可以从事副业生产活动，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人这样做。被采访者指出他们太累了，无法在从事了一整天的集体地里的劳动之后再去忙自留地，或者说他们缺乏这么做的兴趣和动机。但是，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动机问题。它还是一个结构问题：知青团体还没有建立起必要的可以实行分工的机制，通过这种分工，副业生产劳动可以由队员们轮流承担，大家共同分担这一过程。换句话说，知青组织缺少能与农民家庭相比的体系。农民的家庭分工是一些成员，尤其是妇女和儿童，从事副业活动。

“改进措施”——本章第二部分将更充分地讨论这一问题——将推动集体户的建立。这是一个可追溯到60年代中期但直到1973年前后也没普及和充分发展的老主意。自由放任主义导致了另一个后果，即每位青年在集体地里劳动一天之后都必须为自己做饭。”被采访者说集体搭伙难以实行，因为知青们的财政状况各不相同，有些人有家庭资助，有些人则没有，一些人努力劳动，另一些人则不努力。同样，当一位青年生病时，知青组通常也没有适当地组织人来照料他。毋庸置疑，由此产生的后果必定是阻碍了知青对乡村生活的适应。

我们不必假定公社里所有的知青点都缺乏领导和指导。报刊曾报道过大量正面的实例，在这些实例涉及的知青团体中显然存在着利于团结的模式，并具有高度的组织性。”两位被采访者说他们邻村的知青组便是相当进步的，在那里积极分子肯定起着领导作用。而在仅由三、四位知青组成的被安置在生产队中的极小团体里，自由散漫可能达到极点。这些团体似乎明显地没有直接的领导。较大的知青点必然需要更正式的组织 and 领导结构才能发挥作用。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以加强对知青的领导为目标的改进措施之一便是将知青们集中到较大的定居点。

国营农场和解放军农场的安置方式提供了一个可与公社安置，特别是可与实行插队制度的公社的安置相比较的景象。国营农场和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场对知青实行了非常严格的纪律和组织管理。正如两位被采访者所报告的那样，在两个解放军农场里，知青们是按军队序列组织起来的，分作班、排、连和团。纪律是严格的，青年们不能自行决定是否要出工这类事情。而且，干部们努力要拆散小圈子、团伙和亲密的友谊，如果一位知青同他的连长辩论起来，他的朋友过来帮助他，那么这位连长就会断定这是一个“小集团”，并故意将其成员调到不同单位。而且，干部们试图动用组织压力去增加落后知青的责任感和热情。

不过无论哪种情况，这些措施不会完全生效。如果有时起带头作用的积极分子以身作则，那么落后知青或责任感差的知青通常会试图避免接触积极分子，有时则巧妙地嘲笑他们，尽管他们也害怕后者向上级汇报他们。而且，如果知青掌握了班长、排长和连长的职务（据说连长是知青所能获得的最高职务），他们可能在来自下面的非正式的压力下，向上级争取一些有利可图的象生产花生这样的经济作物的生产任务，或者向上夸大诸如清理树桩等工作的实绩。但是，被采访者认为，明显的集体反向团结难以获得发展；因为控制太严格了。例如，1970年一个解放军农场建立了非常严格的个人准则，没有一个人能实行这些准则，而不实行这些准则的惩罚，即降低工资，也没有能执行，因为这会打击每一个人。但是，知青们并没有集体作出决定不实行这些准则。不过这个例子也表明，解放军农场的知青的反向团结也是可能发展起来的，至少会采取潜在的形式。这并不是因为象在公社那样缺乏严格的指导或管理，而是因为来自上级的苛刻的工作要求产生了共同利益，它能弥合积极者和落后者之间的裂痕。\*

---

\* 在这个实例中，知青和领导之间的斗争显然没有解决。按照被采访人的看法，这些准则没有降低，全部工资也没有扣发。但是一段时间之后，若干更懒惰的知青却被扣发了工资，这是对其余人施加压力的一种方式。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被采访人对分配到生产建设兵团农场的解放军管理者的素质评价不高。有些人由于他们自己的身份而瞧不起当地的工人和知青；有些人犯过错误，他们分来农场是一种惩罚；另一些人则没有经验，而且一般来说他们趋向于“命令主义”，他们非常冷酷无情地要求人们艰苦劳动。相比之下，老职工显然受到了更多的赞扬，他们忠于党，在与知青们一起工作时也表现出色。

## B.农民与知青——传统与现代角色的碰撞与交融

农民们被要求要欢迎新来的知青，但是在热情欢迎的背后，农民是按照城市青年来此安家后自己的利益和付出的代价来评价他们的。当地人可能付出的代价包括干部和农民必须奉献给知青的时间和精力。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抱有“错误观点”，认为管理知青会成为他们的额外负担。“知青可能仅仅作为城市居民出现在乡村就会给当地社会带来麻烦，他们的价值观、习惯和志向与农民是不同的。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根本不愿意下乡。农民和村干部必定对“不安份的”或“狡猾的”城里人来到他们中间的前景表示担忧。文革之后的红卫兵难打交道，易于反抗。”如果城市知青消费的多于生产的，那么安家还会使当地社会付出物质代价。我们有理由断言，如果这些代价十分昂贵，农民对新来者就会持否定态度，关系就会处于紧张之中。反之，如果人们认为这种代价不太高，并且得到了相应的补偿，甚至因安置知青带来的利益超过了代价，关系就可能是良好的，利益可以是知青对村庄发展项目做出的贡献，或者是为当地社会提供的服务。

上层决策者对下乡可能加于农民的负担很敏感，曾试图加以减轻。例如，与农民相结合的目标并不意味着知青必须与农民家庭一起生活从而给农民增加负担。尽管时常可以听到对相反作法的异议，例如文革期间对“当权派”的批判，据说他们阻止知青和农民更亲密地生活在一起，“但是决策者为“结合”下的定义与分开生活的安排是一致的，其目的是避免因知青“破坏群众的家庭生活”而引起的恶果。”在我的被采访人中，没有一位是与农民家庭住在一起的。有人听说一位广州青年曾经要求这样做过，但是没有得到安排，因为他“不是一位亲属”。

如果这样解释结合的定义，那我们还可注意到，把大批城市青年安置在他们故乡省份并且常常邻近他们故乡城市的村子里这

一作法减少了习惯和方言的限制。相反，如果把知青送往边远地区，甚至送往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那么他们通常会被安置在国营农场和军队农场里，在这里不需要与周围的农村居民发生交流。“诚然，报刊曾发表过一些著名的实例说明在少数民族村寨中落户的知青学会了那里的语言，并达到了相当程度的社会结合。一些人甚至与少数民族家庭住在一起，如来自某些蒙古公社的报告。”但是这些实例也反过来说明了汉族青年由于不熟悉当地的语言习惯而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一位住在客家人村庄的被采访者，由于只会广东话和某些普通话，与村民接触必然有限。

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一定义，同样可以理解为有防止给农民增加负担的含义。早在1957年，一篇社论就警告过，如果把炫耀其文化优势的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送到村里为乡下佬们传授现代方式，就会引起农民的不满。“使城市青年接受再教育是提高农民对城市居民的身份和降低知青在当地人们眼中社会地位的一种方式：是青年们来向农民学习；是他们必须适应农村生活方式。只有当他们证实了自己对于当地社会的价值，他们的身份才能通过如抽调回城这种方式得到提高。至少在某些地方，为降低知青身份而采取的方式是经常把半文盲的农民提升到导师职位上，教育那些城市高中毕业生，这种作法引起了知青们的强烈不满。知识分子应该向农民学习而不是农民应该向知识分子学习这一观念，是说明一位曾在红卫兵运动中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被采访者后来觉得农村生活不堪忍受的主要理由。另一位曾在文革中参加过反对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斗争会的被采访者说，毕竟“我们是主人”。被采访者注意到，如果他们恭敬地向农民请教而不盛气凌人，农民可能会更容易接受他们的意见。但如果为了使下乡更易于为农民接受而把知青的身份故意降到农民之下，这也会至少给某些知青造成适应农村生活的困难。所以说，提高知青对农民的可被接受性，抵消了因知青下乡而让农民付出的代价。

决策者也曾试图减轻甚至取消因安置城市青年而可能强加给当地社会的物质代价。国家安置经费的目的是使公社能够不必支付最初安家费而吸收知青。1973年以前国家发给每位知青的安置经费是230元，1973年据说增加到了480元。人们不能指望，知青们在他们落户的最初六个月内能够同农民一样谋生，因为他们的力气和耐力都不如农民，他们需要时间掌握农业耕作的技能和知识。因此，部分安置经费用于支付知青落户的初期口粮。同样，安置经费也用于支付简易住房的建造，小型农具和其他生产必需品的购买。实际上，对于这些目的，安置经费并不总是够用，有一些实例表明，当地社会至少必须承担额外的财政负担。关于住房，人们知道，一些生产大队为建造合适的宿舍而破财。农民也为此而抱怨，他们经常被请去为建造知青住房而出力（见本章后面部分）。但是在某些实例中情况却相反，国家安置经费有利于那些吃救济的生产队或大队。在接近香港的广东地区的公社里，知青常常在安置经费花光之前就出逃了，他们给当地单位留下了一笔净收益，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农村干部似乎不再乎知青是否出走。同样的原因显然也适用于那些离开农村岗位而非法返城的青年。据报道，一些基层单位曾将安置经费挪作它用，用来购买化肥或作其它投资，因而造成了社会靠牺牲知青利益而受益的现象。”

按照农民的观点，如果知青被看作一块既定馅饼的额外消费者，为他们安家的代价就超过了收益。如果人均耕地本来就少，根本无需增加劳力，农民就会怨恨知青。因而在湖北的一个村子里，农民抱怨说，增人不增地会减少个人收入。而在另一个地方，知青因劳力短缺而受到较热情的欢迎。”当知青被分开安置在公社里时，交给他们的土地一般是边缘地或处女地。但是，也可能有某些农民希望自己开垦这些土地。报刊没有公开报道在竞争土地方面发生的冲突，但是在有1万名知青落户的吉林怀德

县，县委命令生产队把3—5亩好地交知青集体户支配，以用作科学试验田。也许在东北这个地区，土地并不稀缺，但是，如果土地稀缺，人们会关心农民的反应如何。如果新的消费者来了而交售国家的余粮和其它农产品的定额保持不变，农民同样会感到受了剥夺。实际上的政策是什么，并不清楚。一位被采访者说，因顾及必须分配给知青的额外口粮，交售定额降低了，但是他补充到，农民并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现金收入的减少。然而另一位被采访者则认为由于假定劳动者的增加会导致产量增加，交售定额没有降低。

如果涉及到农民的代价——利益计算的那些因素，如土地的利用等，不受知青控制，那么在农民看来，决定代价——利益变量的最重要因素便是知青们的表现，即他们干活是否尽力了，或者他们是否仅仅是本地资源的消费者。这不是一件能够准确衡量的事情。关键在于他们是否被视为作了真正的努力去适应乡村生活，是否在地里下力干活，尽其所能，即不是当地社会的一个负担。如果知青尽一切努力去适应艰苦的农村生活，坚持不懈地同农民一起劳动，他们被农民接受的机会就会增加。被采访者认为，农民对他们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变量，而相当多的青年完全缺乏努力尝试的动机。这一事实很能说明他们同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

如果青年们除下力劳动外还对本地的发展做出一些集体或个人的建设性贡献，他们同农民的关系就还可能向前发展一步。为使当地社会受益，知青团体可以建立小型水坝，开垦出一块迄今最肥沃的土地，承担一项诸如关系到本村电气化的工程，或通过“科学试验”改良当地使用的种子。青年个人对本地社会的贡献可以是成为赤脚医生或教师。这些贡献我将在第5章里详细讨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报刊更加公开地报道了这个主题。毫无疑问，农村地区的大量知青人口一直在通过这些方法对农村生活



作出贡献，农民们大概会感谢这一点的。

良好的关系还可能通过另外的方式在知青和农民的个人层次上发展。在个人相容性的基础上可以出现真正的友谊。知青和农民之间可以结成某些婚姻（见下述）。在一些地方，下乡青年愿意同某一农民发展简单的交换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好的关系基于小恩惠的交易。被采访者为农民提供的小恩惠主要是某些从广州买来的而在本村难以获得的商品，如肥皂、灯泡、牙膏和药品，但也包括帮农民写信，也有包括免费修理收音机、手表、电机（当然后来发展到为整个社会服务）的例子；还有一个例子表明，一位青年曾带农民家庭的孩子去广州旅游。农民回赠的礼品有花生、一只鸡、自留地产的蔬菜、一件新年礼物，或借用自行车。报刊同样指出了知青为农民服务的例子，但是正如第1章指出的，它把这类交易说成是知青向贫下中农表达阶级感情的无私行为。同样，报刊也描述了农民和干部为使下乡获得成功不厌其烦地帮助某个有困难的知青，无论他是生病还是士气低下。但是报刊也对个人关系的发展方向表示了不安。这种不安是通过许多事例表达出来的，在这些例子中，据说阶级敌人同知青拉关系是为了破坏上山下乡。

我们不能断定在知青和农民的关系中好的占多大比例，因为农民是按照某种有利于他们或者至少不会使他们付出代价的方式看待知青的。被采访者说，好的关系主要发生在知青个人和农民个人之间，只在个别情况下才发生在整个知青队同农民之间，而且在知青中只有极少数人享有同农民的良好关系。报刊的报道倒想说明良好关系的比例是相当高的，但是有足够的材料似乎表明冷漠的或差的关系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农民和干部对那些不努力劳动和适应的知青反映很大，他们感到失望、激愤、憎恶、不信任，或根本不理解。在河南济源县的一个地方，农民曾经象欢迎亲戚那样欢迎知青。但是不久关系

便冷了下来。这些青年害怕艰苦，情绪不安，说了和做了一些文章没有指明的错误言行。农民得出结论“这些城里人真难对付”，“我们乡下人不能同这些洋学生打交道”。正象大多数报刊所报道的，这个故事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公社干部教导城市青年和农民怎样和蔼相处，而且，后来弄清了，原来阶级敌人破坏了他们的关系。„若干被采访者也认为最初村干部是乐于助人和关心知青的，但是后来关系渐渐冷了下来，因为在干部们看来，知青没有回报，他们插了不少漏子，没有多少贡献。当地人对这些累赘的知青的怨恨常常基于对城市青年动机的不理解。干部和农民觉得，一些知青本来就不想呆在村子里，他们实际上不能忍受农民从小就已适应的劳动和艰辛，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如果不能应付农村生活，就可能出现不正当的行动。一位被采访者引证一位县干部的话说，他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知青受到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当地干部由于不能理解那些行为恶劣的知青，就仅以实际工作日为尺度来为知青分配口粮。但是即使这么做也没有改善知青的行为。正如一位被采访者指出的，他们在减少了你的口粮之后还能对你怎样？激愤和烦恼能转入公开的对抗，尤其是当某些知青对农民做出了实际的，如偷鸡这样的冒犯后。„一位香港华人在访问了他的湖北家乡之后写道：“一些人劝我不要同陪我从武汉来的‘下放’青年搞得太熟，理由是他们会欺骗我，或偷我的钱。我问他们是否厌恶‘下放’学生；他们说不，但是他们不信任他们。”„

知青和农民之间的紧张一俟时机成熟就会发展成公开的敌视和冲突。例如，在文革期间，一些村庄的农民结伙袭击了被谴责为闹事者的知青，按照红卫兵的报刊的指控，暴徒们殴打甚至杀害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按照被采访者的说法，文革以来更常见的情形是，不好的关系表现为彼此回避，在这种情况下，知青和农民除在必须参加的会议和劳动场合外，彼此几乎极少或根本

不接触。青年们退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并以优越和蔑视的态度来补偿他们同农民的糟糕的关系。”一伙知青甚至在门前挂上一块招牌，上面写着“闲人免进”，禁止他们视为不干净的农民来访。”不过，也没必要设想关系不好的情况居多数。可能大多数知青至少一度曾努力避免冒犯农民，尽管他们也没有特别尽力去发展良好关系。\*

前面的讨论曾含蓄地提到一个重要的论点，现在需要进一步说明，因为它阻止了知青与农村契合。我曾说过农民对知青的接受取决于知青为不成为当地社会的负担所做努力的程度。但是同样有证据表明，即使知青作了必要的努力，农民也未必把他们看做本地社会的正式成员。那些曾努力培养与农民的友好关系的被采访者指出，他们没有被完全接受，他们同农民之间的隔阂依然存在，农民没有把他们看作“我们”中的一员。”

抱着狭隘观念的农民不仅以排外主义态度对待外来者，而且歧视性地对待物质分配，特别是工分。”在工分问题上，如果成年男性农民被社员们裁定为全劳力、可作一等工作从而允许他每天挣10分的活，那么男知青则会被放在二等，甚至三等和四等，他们所能挣到的工分则被降到妇女儿童的水平。在河北冀县东十固公社，由于报酬“不合理”，与当地同龄同姓人每天所挣的平均工分相比，男知青平均要少挣2分，女知青平均少挣1分。”在那些用工分奖励特殊工作的村子里，知青一般派给较少酬劳的工作。知青刚来时通常被规定较低的工分定额，因为许多知青事实上缺乏农民劳动者的力量和耐力。但是，随着他们技能和耐力的提高，他们的工分定额也应该提高，在许多实例中这种情况却

---

\*我们将在第6章中看到，重新分回城市部门（通常这需要农村单位的同意）的希望是鼓励知青努力适应乡村的重要因素，但是当这种重新分配的前景看起来渺茫时，这种刺激就会失去力量。

没有发生，因为生产队不去做必要的调整。因此，一些知青与农民做了同样的工作却得不到同样的报酬。一位被采访者曾参加过伐木队。他和农民在同一地点伐木却少得2分，因为他不会播种。农民能播种，他不能，所以哪怕他从事其他劳动也不能同农民挣一样的工分。”另一位曾志愿下乡的前红卫兵积极分子指出，他同成年农民一样努力劳动，做一等的工作，却给四等的劳动定额。“他们剥削了我三等”，他抱怨道，并补充说他每月挣的钱不超过10元。这个例子表明，歧视尤其伤害了那些怀有良好动机和努力适应农村生活的知青的士气。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生产队都歧视知青。大约有一半被采访者说他们的劳动级别和工分是公正合理的，符合他们的实际工作量，但是歧视的普遍存在足以被视为是知青无法谋生和最终导致1973年爆发的旨在保障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同工同酬”的全国性运动的（见下述）一个主要原因。

说到参政，农民同样不总是愿意把青年当作社会的平等成员来接受。原则上讲，知青一加入生产队就成为社员，他们有权参加会议。实际上很多青年拒绝卷入村内事务。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是由于知青本身缺乏契合的兴趣，但也可能由于知青知道农民反对外来者参与。按照报刊的描述，许多知青不愿表现进步，生怕这么做会带来负作用，被农民指责为爱管闲事的捣蛋鬼。”如果一位下放青年批判干部们不参加体力劳动，干部们就认为这是一种反叛行为，除非他们经过学习上级文件确信知青有权参加批判运动。”城市青年尤其不愿在单姓村参加阶级斗争运动，因为农民似乎认为让外姓人批判一位亲戚不妥，尽管他这位同姓人是一位阶级敌人。”《北京周报》提供了一个来自广西的例子，“我们有两位女生参加了农民反对本地阶级敌人的斗争，有人威胁她们：你们还不了解我们这个地方，为什么你们要管别人的事情？你们女孩子不要多管闲事。两位姑娘听后心里很不安。”作为典

型，这个故事自然有这样一个结局，女知青因领导的帮助而在事实上参加了阶级斗争并成功地斗败了反对者。但这同样表明了当地居民反对知青干涉“别人的事情”。

还应该说明，在农民和知青的关系上各地也存在很大差异。正如一些知青竭力去适应而另一些人则不作这种努力一样，一些地方的社会也比另一些地方的社会能更好地接纳知青。在一些地方（见第5章），知青能发挥积极的参与，甚至领导作用。而在另一些地方，他们发现很难甚至不可能被接纳。我们不能确定这些情况的分布范围，但是能否解释这种差别？农村的现代化水平可能提供一种解释：越传统越落后的村子，越可能对外人采取偏狭和歧视态度；而越先进越现代的村子，就越可能以普遍性的标准来对待知青。这种假设具有极大的直观性。一位被采访者对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的区分支持了这种假设：“在工厂很容易结合；每个人都对那种生活习以为常，但是农民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生活水平低，如在住房、仪器、医疗、劳动方面，人际关系也是不同的，很难适应。”

即使这个假设看起来合理，我们也没有找到有效的资料证明它。在知青尽力适应却遇上了农民方面歧视的实例中，我们不可能了解现代化水平是否是一个主要因素。因为农民给予知青的待遇同样受到政治力量的作用。政治领导（和组织）影响着知青和农民的行为。如果村干部的行为合乎官方的规范，对知青的歧视就不会发生；那么知青所受待遇将超出农民的狭隘观念而更符合当局的普遍观念。<sup>\*</sup>如果村干部按照他们农民伙伴的价值观和意见行动，采取或认可歧视行为，那么必定是因为上级领导疏于或没有教育他们按照“正确的”规范行动。如果农民和官方的价值观

---

<sup>\*</sup>当然，这些普遍观念有自身的差别标准，如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所受的待遇便不一样。

发生冲突，那么村干部必然要受到提醒，他们不仅是农民，而且也是负有责任教育农民服从官方指示的共产主义领导者。因此，领导、组织、政治教育等政治因素对下级工作的作用如果不是第一重要，那么至少也同社会经济因素一样重要。当然，政治的决定作用有一条是对政权的信念，一些被采访者也谈到这一点。3位知青曾在离广州120公里的博罗县落户，他们没有遇到过歧视，与干部的关系“非常正常”，不存在虐待；工分是按照实际工作量给的，与农民的关系似乎也相当好，干部们鼓励农民帮助知青。就知青来说，他们也不“野蛮”；那里没有成批的偷渡，博罗显然是一个很穷的县，几乎没有本地工厂，但是它在政治上是进步的，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典型。两位被采访者指出，强烈的政治色彩影响了那里的插队工作，这与一些来自政治淡化地区的被采访者的报告形成对照。<sup>\*</sup>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我们不必惊奇，促进下放工作的改进措施之一就是“加强领导”。

## 2.“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用于推动城市知青适应农村生活的措施在原则上应该始终实施，正如安置工作经验所表明的那样。随着问题的产生和暴露，人们就应提出改进并加以落实。事实上在不同时期，国家和地方也都采取过措施改进知青下乡工作，但是直到1973年，即紧随

---

<sup>\*</sup>当然，这种差别不足以大到能使知青在一个永恒的基础上适应农村生活。值得补充的是，在他们提供的实例中，坏的阶级背景是引起偷渡的一个因素。其中一位被采访者实际上曾是一位积极分子和教师，但是她发现进一步擢用的可能性因她的阶级出身问题而被阻塞后，她最终离开了中国。实际上，由于这是一个模范县，阶级路线才执行得更加严格。

文革开始大量下放城市青年去农村之后将近5年，才发动了一场纠正下放政策缺陷的持续运动。第2章已经指出，这个运动是由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一位福建教师把下放青年遇到的困难成功地告知了他。1973年关于加快知青工作步伐和起草今后七年实施这一工作的具体计划的决定，无疑加强了对改进措施的需要。实际上，地方干部不重视下乡工作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个短期行为。

重新审查这项政策涉及到对下放工作主要方面的彻底检查，从领导效能到为安置知青调拨的资源是否充分。一些改进措施在1973年就采纳了，但是另一些措施后来才采纳。对下放的高度重视导致寻找新的方式和把地方的创新试验树为全国仿效的典型。第3章结尾提到的株州模式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74年6月这个例子受到了普遍的注意，它重新强调单独安排下放青年而不是把他们插到生产队。改进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非常注重具体的物质利益，即使是在重新肯定下放的意识形态目标的时候。下面引述的一篇批评“某些地方工作没有做充分而导致了不良后果”的文章证明了这一点：

知识青年的生活问题，主要是吃、住、用、劳动、医药、婚姻等方面，都要妥善安排好。要合理解决他们的口粮、菜地、烧柴等问题，要提倡办好知识青年的集体食堂；要切实解决好他们的住房问题……对女青年的生理特点要给予照顾；要关心青年的健康，注意防治疾病；办好合作医疗。

本章余下部分将考察用于改善城市青年安置的各种改进措施。

## A.改善领导——“书记挂帅”与“带队干部”

1973年的夏末秋初，在一次据说由华国锋召集的关于城市青年下乡的全国会议之后，许多省份也举行了关于这一主题的会议。<sup>①</sup>这些会议作出的结论之一是青年安置需要持之以恒的、制度化的领导。正如一篇来自贵州的社论所说，“各级领导绝不能把知识青年下乡的任务看作权宜之计……对于这项工作不应时抓时不抓，必须不断地反复地去抓，一抓到底。不应把知识青年一送到农村就将他们抛在一边”。<sup>②</sup>在公社以上的各级机构中，特别是县级，要有一名党的书记负责知青工作。迄今为止，如在黑龙江明水县，知青工作都是委托给业务部门去做，人们认为这就足够了，因为“中心工作太繁重”。<sup>③</sup>由于党委领导成员没有去解决下放工作，问题就出现了。因此，湖南的一次知青下乡工作会议作出结论“各级党委必须……把这项工作（知青下乡）列入议程，并确定一名书记具体负责此事。地委、市委和县委必须建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领导班子，有关负责同志要参与进去，并设立职能办公室”。<sup>④</sup>在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也同样强调把知青工作交给党委或支委的专门干部负责，这样，知青问题就能不断地引起单位主管领导的注意。安徽一个大队提出了一种模式。该大队的插队领导小组（安排知青插队的小组）由一名党支部副书记领导，大队安排支部委员们轮流去做知青的意识形态工作，该大队的和每个生产队抽一人在本生产队负责知青工作，党的支部委员会每月开会一次讨论知青的“思想问题”。年底大队对每个知青的表现都要作出鉴定。<sup>⑤</sup>知青工作专人负责和列入党委议程，是为了防止知青工作分散负责或交一般干部负责时似乎普遍存在的忽视和忽略倾向。

从两年后发表的评价判断，农村各级领导为保证不断关注知青下放问题所做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因此，1975年6月《红



旗》的抱怨与两年前听到的抱怨也是相同的。„湖北省 1975 年要求“各级党委”把安置工作列入他们的议事日程，其用语实质上与 1973 年时使用的相同，“第一书记必须经常检查这一点，常务书记必须负专责”。„在河北，“一些领导干部……既没有给这项工作以足够的重视”，也没有采取“迅速有效的措施”。„只有不断的鞭策才能使人们关心一个仍被大批农村干部当作负担并被认为是对他们显然没有重要价值的工作。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定程度的卷入也不可能。在安徽，1975 年，“领导机构进一步加深了理解……不断地改进了（安置）工作”。„1975 年 11 月发表的全国性评价也是积极的：“今年的安置工作要好于往年”。„但是地方行政机构对下放工作的兴趣显然不能与他们对每年收成的关心相提并论。

也许正因为农村领导者不太愿意在知青工作上花费时间，1974 年和 1975 年才动员城市干部去承担这个重任。1974 年有 4 万城市干部随同将近 200 万知青下乡，干部和知青的比例是 1：50。„1975 年当 200 万知青下放时，“6 万多干部”被派到农村，他们的比例是 1：33。„1969 年至 1970 年期间，上海派出 1600 名干部陪同“数十万”知青去农村地区；1974 年上半年在四川，1900 名干部陪同来自城镇的 6800 名知青去本省农村指定地区。„来自其他省市的报告表明，有时干部和知青的比例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武汉为 1：13，福建为 1：15。„与干部仅送青年到达农村目的地的早期作法相比，1974 年以来仿效株州的方式，干部要同知青呆上较长一段时间，也许经过一年左右的农村工作之后干部们才能轮流返城。„更须强调的是这些干部具有良好的素质：他们大多数是党员，不少人还是城里的负责干部。在湖北，“必须挑选优秀干部领导青年，他们当中必须包括一定数量的妇女干部……挑选干部领导青年，可以同干部下放参加劳动结合起来……”„

城市干部的主要任务是领导知青队。例如西安的干部有四项工作：(1) 组织知青进行政治学习，(2) 引导知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经受锻炼”，(3) 组织他们在学大寨运动中“贡献力量”，(4) 作好知青的生活管理工作。„城市干部要同当地行政和政治机构紧密结合，在当地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发挥作用！“应根据工作需要，把他们吸收进县、区、公社和大队的领导班子，具体负责农村落户知青的有关工作。”„看来，这些干部的出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取决于他们在各个地区的数量——减轻了当地干部管理知青的负担。他们的下乡有助于贯彻决策者要求经常关心知青的意图。

但是要想评价城市干部促进知青适应的实际作用还缺乏足够的资料。由于他们在事实上对知青队提供了经常性的指导，知青队或许会按照既定路线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而较少可能发展反向团结。城市干部的领导可以使知青更好地谋生。他们可以动员知青更努力更经常地劳动，为了使知青从事副业生产，他们可以督促必需的结构变革。城市干部比农村干部能更有效地领导知青。在已报道过的实例中，城市干部均来自知青的故乡城市。他们和知青有“同乡”的感情，这正是农村人在同知青的关系中所缺少的。这种同乡感为一致的交往提供了基础。实际上，城市干部的职责之一，正是以向城市单位和知青家长汇报情况的形式维系同故乡城市的关系。这种不断的联系，是为了让家长放心，从而推动知青的适应。„反之，人们也可以设想城市干部的出现会损害这种适应。显然，城市干部是要轮换的，而知青至少在原则上要终身呆下去。知青和城市干部之间的这种差异可以使知青更加感到他们相对被剥夺了，从而引起他们的憎恨。

## B.集中安置——“株州模式”的推广

对整个知青工作的重新审查使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有利于集中安家而不利于“分散”安家，有利于更加严格地组织起来的集体生活。政策目的是减少发展反向团结的可能，使知青团体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中央的政策倡导地方当局在不同的组织形式之间作出选择：

在安置下乡知识青年时应考虑当地的条件。在生产队可以建立至少 10 人组成的青年中心。知识青年可以安置在县、公社或生产大队经营的实行集体所有制的农场、林场和养殖场中……在有可耕荒地的地区，可以在当地生产大队或生产队的指导下建立实行集体所有制的青年农场和青年生产队。„

所有这些形式都包含着更大的集中，甚至在青年在生产队插队的情况下，政策现在也要求至少要有 10 人组成一个“集体户”或“青年点”。从来自各省的报告看，集中安家发展得很广泛。在福建，“那些还没有建立青年点的地方，应该把广泛分散的知识青年集中起来，建立青年点。应该帮助青年点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在四川，对新政策的强调在 1974 年导致了 1 万个知青点的建立，而以前这样的单位几乎没有明显地存在过。„1975 年，广东也强调了集体安家；政策声明强调“尽量减少”本年 8 万名知青在生产队安家的分散性。„

株州提供了独立下乡的全国样板。该县大致有 200 万亩未开垦的丘陵和山地，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可以供生产使用。\* 为此口

---

\* 6亩等于1英亩

的，各公社建立了属于公社或大队的农场、林场和茶场。到1975年时，600个这样的农场建立起来了；1.2万名下放青年同一些当地农民和城市干部一起在其中的420个农场中安了家（平均每个农场29名青年）：„

社队农场、林场、茶场是按照“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建立的。在一个大队范围内，生产队无力经营的连片山地，由大队办场，组织生产队联合经营；……农场、林场、茶场的收益，按照所属山权、场部积累和各队投工情况，实行比例分成。安置在这些社队的知识青年，户口落到生产队，平时在场学习、劳动，农忙回队参加生产；一个月回队几次和社员一起开会、学习，经常保持密切联系。他们同在场的社员一样，参加落户的生产队进行分配。„

同本地农村集体单位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江苏报道过一个实例，一家知青集体农场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建立起来的，但是，显然更平常的方式是，知青集体依附于公社的一个下属部门。„

更广泛建立独立青年点的倾向降低了城市青年与农民社会契合的程度。这无疑反映了当局的这种认识：城市居民和农民之间的紧密接触易于导致摩擦。而且，哪怕没有引起紧张关系的紧密接触也是不必要的。在青年和“落后”农民或阶级敌人之间发展非正式的关系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官方赞同发展城市青年和农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但是规定农民只能推动而不能损害下放工作。单独安置减少了发展亲密的非正式关系的机会，但是允许在开会或共同参与工作项目方面正式组织城市青年和农民之间的交往。

采取集中安置形式的主要理由，是“易于加强领导和统一组织学习”。„正如前面指出的，三、四人的知青小组容易放任自

流，它为自发的和错误的行为提供了机会。要想在生产队建立较大的集体户，就必须设立领导，通常采取的形式是由有经验的农民和城市干部担任“辅导员”或“户长”。更大的独立的单位甚至需要更加复杂的领导结构。例如，1970年江苏淮安县的一个公社决定在独立的荒地上安置40名知青，它为知青集体派去了两名干部和四名农民，组成了干部、农民和知青三结合的领导机构：“干部与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实行同住、同吃、同劳动和同学习，认真照顾青年。在干部和贫下中农的指导下，知识青年在建设农场的过程中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实行面对面指导和管理的条件下，城市青年之间的反向团结似乎不易发展起来。辽宁海城县截止1972年下半年安置了2.8万知青，据说由于放松领导而在这些青年中引起了“问题和骚乱”。该县对集中安置的回答是：

县、公社和大队都要组织专门机构安排专人抓紧知识青年的再教育……而且，贫下中农代表、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已经建立了大约1911个青年点，帮助知识青年自我锻炼。县委为了加强领导把1911个青年点合并为67个，作为生产大队的基层单位。百分之八十五的青年点建立了共青团支部和团组织，一些青年点成立了党的组织。”

两年后，海城县的知青增至4.8万，一家广播机构谈到了“青年社会”，它指出，1911个青年中心中的一部分已经自然地合并为更大的知青点。”

无论采取何种安家形式，主要的目标是通过集体化生活提高知青的谋生能力。当缺乏集体生活的时候，青年不仅要各自去他们生产单位的田里劳动，而且还要各自从事副业活动，经营自留地和为自己做饭。不能或不愿这么做的知青将丧失收入并在一日

三餐上将就凑合，忍受着不便。出于同样的原因，那些的确从事了这些工作的人却没有时间进行政治学习或从事社会活动以及关心时事新闻。<sup>100</sup>把下放青年集中为较大的定居团体，就能在知青之间实行分工，按照这种分工，人们将轮换分派任务，如经营食堂和养猪种菜等副业。分工使更安定和更固定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sup>101</sup>来自副业经营的收入提高了知青在农村的自力更生能力。在江苏淮安县的一个独立居住的青年集体中，40%的收入来自多种经营，包括种植蘑菇和草药，开办修理铺和饲养鸡鸭猪。结果，知青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了，为他们“扎根农村”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sup>102</sup>经营良好的知青集体有了增长的资金，如出售给国家的猪和其他产品，集体储蓄使知青们能够增添设备，丰富政治和文娱生活：如购书、订阅报刊、添置体育器材。

尽管有这些益处，作为集体生活特征的资源汇集和工作分派也能引起知青的冲突，除非对他们进行指导和管理。在广西贵县的一个大队，69名知青组织了10个“集体灶”。由于领导不力，其中有些集体灶因开支超出生活费用预算或在分派工作时发生争吵而造成了分裂。一旦党支部通过加强领导的形式给予“帮助”，集体灶制度就表现出了优点：他们学习“集体主义精神”，可以参加政治社会活动，饲养猪和家禽，并种植蔬菜。他们收入的提高，不仅因为副业生产，而且因为他们在大队集体田地里比以前更勤奋地劳动。<sup>103</sup>后而这一点值得强调，加强指导以使工作日增加的主题集中反映在改进工作的文件中。更持续的劳动可以仅是加强控制如实行“劳动考核”或要求知青每月达到最低工作日（在安徽的一个地方是22天）的结果，也可以是集体化团体生活的结果。<sup>104</sup>如果一个知青集体汇集资源，每位成员的利益就与其他成员的实绩休戚相关。这种利益能被该集体的领导者动员起来，并能使团体压力指向那些换个场合便不愿如此努力工作的人。报刊在谈到“集体生活习惯的养成”时似乎想到的就是集体独立性的

这种后果。<sup>103</sup>

建立青年集体是改进工作的中心一环，因此，青年集体得到广泛普及，是可以设想的，尽管我们不能断定过集体生活的知青在公社里占多大份额。关于知青收入的消息是很少发表的，但作为这种变化的结果，我们可以认为，也许更多的知青达到了自给，能够不依赖他们的家庭自己谋生，从而强化了对农村生活的适应。

在吉林怀德县一个早就组织了知青集体户的公社里，知青人均年收入从 186 元起，至 1972 年上升到 262 元，但是 1972 年又略有回跌，降至 255 元。<sup>104</sup> 我们不清楚这些数字中是否包含集体户的副业收入，也不了解这些数字与该公社农民人均收入的比倒。1972 年月收入达到 21.25 元，略高于据说 1972 年或 1973 年前国营农场农工的 16—20 元的月工资。我们有理由设想大量的青年已经达到了自给，但是我们不能估计他们的比例。

### C. 安“居”才能乐“业”

改进工作力图使城市青年达到自给，以此减轻“社会和家庭”的负担”。<sup>105</sup> 但是改进措施的代价本身是高昂的，需要追加资源。这种资源来自国家、城市单位和农村公社。国家增加了每位城市青年的安家费，据说从 230 元增至 480 元，显然这笔费用可以支持一位青年度过第一年全年，而不仅仅是六个月。<sup>106</sup> 国营农场的知青工资提高到每月 30 元，这是一项重要措施，因为旧的工资需要父母补贴穿衣和零用。<sup>107</sup> 另外，第 2 章已经指出，有一个省，即江苏，以贷款的形式拨了 600 万元用于知青安家，以帮助他们起步。毫无疑问，这个实例不是唯一的。

参与下放工作的城市企业和其他单位，按照株州模式贡献了他们干部的时间和有形的资源，尤其是在住房方面。在吉林召开

的一次下乡工作会议提到了城乡结合的资源问题。会议“指出……农村公社和生产队推广株洲市经验时不应只找大型的财力物力雄厚的城市单位合作，而城市单位也不应只同富裕的生产队和公社合作。”<sup>100</sup>可以设想出现的问题是，农村单位要最大限度地向城市单位索取，而城市单位则要尽量减少他们的付出。至于公社及其下属机构，会议要求干部和农民要为知青事务奉献时间，为建房提供劳动，做好准备工作。<sup>101</sup>1974年显然还实行了一项新的规定，公社必须在知青每年工作不少于250天的情况下保证他们200元的最低年工资。如果他们工分的现金价值少于这个最低工资，那就应该补贴这个差额。相反，较高的工分价值将象往常一样支付。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补贴是出自公社或其下属机构的资源，还是来自国家部门，也就是说来自县政府。<sup>102</sup>如果普遍实行了这项规定，那么改革将开始消除那些经常出工却因工分值太低而所得无几的人们的不满（见下述部分）。

住房是耗费资源的关键项目。本章第一部分已经指出，用于住房的国家安家费不总是够用，结果造成下放知青住房拥挤和低标准，或者使当地社会必须拿出自己的资金。<sup>103</sup>例如山西翼城的一个大队为知青住房投入了5,700元。<sup>104</sup>农民的反应没记录下来。在河北丰润县一个只有80户人家的大队里，1965年由唐山来的知青引出了一场关于住房的争论。“一些同志”建议建房数量仅控制在国家资金允许的范围内，尽管知青们势必住得挤一点。支部书记反对这种看法，理由是知青将长期留下来，因此需要足够的面积，显然他的意见获胜了。五年后，又有一批知青分到该大队，“一些同志”认为1965年生产队已经拿出了额外的资金用于知青的住房。这一次，他们主张不必再建房了，国家安家费可以投入农业生产。支部书记反对这种挪用安家费的提议，认为几年后知青将要结婚；因而最终还需要增加居住空间。他的意见占了上风，除1965年建的十一间住房外，又建了十间新房。<sup>105</sup>这件



事表明资源分配可以引起冲突，村子缺乏正确的动机，因此党的书记需要妥善地做出不同的决定。

集中知青，尤其是建立独立居住点的政策增加了住房需求，这一点可以说明为什么安家费增加了一倍多。另外，公社以上的行政部门还拿出了资金和材料用于解决住房问题。四川省把知青住房规定为“基本建设的一个长期项目”。<sup>111</sup>1973年召开了一次关于知青下放资金问题的省级会议，会议显然要求县政府提供建筑材料，因为同一份报告接着说到“綦江县委为知识青年建房提供了300方木材”<sup>112</sup>黑龙江巴彦县有800名知青落户，县建材局拟定了一份用于建立48个青年点的供给计划，保证提供木材、砖、水泥、沙、石和玻璃。<sup>113</sup>在甘肃永登县的一个实例中，党委发现一个大队没有为新来的知青建房，“立即同大队党支部协商，派专人从200里外的一个地方运去了木材。”<sup>114</sup>

城市参与安置的重点是住房。1973年，株州在8个月的时间里为下放青年建造了957座新房。“当缺乏建筑材料时，工厂使用了自己的边角料。当不能解决运输问题时，工厂又派出了自己的汽车”。<sup>115</sup>其他地方也报道过城市企业提供类似帮助的例子。<sup>116</sup>

更多地利用国家和城市资源并非意味着否定以自力更生和地方自助的形式解决住房问题。人们不仅期望基层单位承担实际住房的责任，而且还鼓励使用当地建筑材料和其他资源。当知青集体获得成功并积累了自己的资金时，这些资金也可以用于房屋扩建和装修。<sup>117</sup>

到底有多少知青受益于改进后的住房，这方面的材料是不充分的，不足以评价修建足够住房的改良运动成果。许多例子表明这一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河北冀县是一个解决安家问题的典型例子。该县为知青队修建了1189座房屋，每位知青平均0.8个房间。此外，冀县的建设还预见到将来知青要结婚：一对知青

夫妇将获得 1.5 个房间，这多少相当于本地农民的水平。<sup>121</sup> 在安徽，至 1974 年 5 月共有 40 万知青下放，该省建造了“4500 间新房”，但是我们不清楚这些房子是什么时期建的。在重点提到的四个公社里，“每位知青”都有自己的房间。“每个知青队都有自己的院墙、厨房、水井、厕所、猪圈和菜园。”<sup>122</sup> 所有这些材料表明许多地区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不过，这场改进高潮之后，发表的报刊文章仍然把住房看作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仅涉及新来者的问题。1975 年 11 月《人民日报》曾报道，广东四会一位县委委员反映有四个公社住房条件差，县委立即送去建筑材料加以改进。<sup>123</sup> 以前不曾有过提供充足住房的实例，就这一点而论，对农村生活的适应取得了进展。

#### D. “该杀就杀，该判就判”——对知青冤情的解救

下放知青在村内遇到的某些困难是由于歧视性待遇造成的。1973 年各省召开的会议提出了待遇平等的要求：“必须在知青和当地社员之间，男人和妇女之间执行同工同酬的政策。”<sup>124</sup> 同时，会议还要求杜绝挪用安家费：“国家提供的用于安家的资金和物资……应该严格控制……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允许将这些资金和物资用于其他目的。”<sup>125</sup> 在肉体上凌辱知青的行为也遭到了谴责：“对于迫害和残害知青的阶级敌人和罪犯，我们必须依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sup>126</sup> 传媒没有举出“迫害”和“残害”的具体事例。流传到海外的中国内部材料表明严厉镇压凌辱城市女青年的强奸犯是改良运动的重要内容。<sup>127</sup>

怎样才能补偿知青的冤情？方法之一是知青本人采取主动行为。他们可以向较高当局提出控告。但是高级官员并不总是作出答复，至少在文革之前是这样。红卫兵曾谴责这些官员中的官僚主义迟钝：“贵县太平农场有 77 名青年，他们来到该农场后有 26

名传染上了疾病。80%以上的女知青受到侮辱和强奸。农场领导人即支部书记和县委干部在这一事件上‘起了带头作用’。青年们就这件事向省、地委打了27份报告，均石沉大海”。<sup>126</sup> 被采访者说，向上级，例如负责知青事务的公社干部提出控告是可能的，他有权在现行政策和原则的范围内要求实行改进。一位被采访者觉得这位干部可以帮助解决有关生活和劳动的“小问题”，但是不能解决回城的大问题。另一位被采访者则怀疑控告的效果，他指出上级干部会把控告信转交回生产队或大队，使信落在受指控的那名干部手里。由于村干部能在如分配工作方面以穿小鞋的方式进行报复，知青可能对提出控告持谨慎态度。报刊曾报道过知青们不愿冒犯或批评当地干部，他们害怕丧失重新分配工作的机会，重新分配需要他们本单位的推荐。<sup>127</sup> 一位被采访者在评论基层干部的非正式权力时说，“甚至毛主席也不能改变它。”

集体的冤情是否能得到补救？在文革初期，一些公社和国营农场的知青曾积极反对过干部。他们对某些干部进行群众批判，召开批判会，检查帐目，看看安置经费是怎样花出去的。但是，正如我们将在第6章中看到的，文革期间力图对抗农村权力结构的下放知青一般都吃到了苦头。这是许多知青在动乱年代返城的一个原因。在整个中国社会，文革中的群众批判可使干部在滥用权力方面更谨慎。但是在知青与干部关系中，情况似乎还不是如此。相反，文革以后，在1968年和1969年，一些农村干部报复了那些在1966年文革第一阶段时批判过他们而现在回村了的知青。在有些地方，知青与干部的关系比以前更坏。<sup>128</sup> 文革以来，时常有人报道导致重新甄别的集体冤情。在江苏邗江县的一个大队里，一个五人的知青组挤在一座拥挤的房子里。他们要求大队革委会负责迅速建造一个较大的房子，并威胁他们说要去20多里以外的县城过夜。大队干部回答说他们的威胁违反毛主席的教导，但是他们要求改进住房是合理的。<sup>129</sup>

如果知青为解决冤情而采取的主动行为能生效，那么保证知青公正待遇的负担似乎就落到了上级机构的肩上。<sup>133</sup>上级官员下基层调查或清查在中国是个久已有之的方式，它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正常渠道的下情上达不足保证上级获取信息。<sup>134</sup>清查村内情况的上级干部有权直接采取改进措施。四川达县地区一位负责知青工作的官员查访了一个公社，他发现三位女知青居住条件太差，没有获得劳动工具和饮具。他还发现一些新来的知青没有获得国家规定他们应该获得的油粮补助。这位干部感到这些缺陷危害了下放工作，因此要求公社纠正这种状况。<sup>135</sup>在另一个河北的例子中，公社副书记下到生产大队调查情况，他发现知青住房太差，便亲自率领生产队建造了10座新房。<sup>136</sup>在这个实例中，公社党委对副书记在一个大队发现的住房问题进行了总结，采纳了全县推广的改进措施。上级调查组访问村庄是为了把可供决策者使用的信息汇集到中央。本章经常引用河北冀县的实例，这一点表明，调查报告无疑是关于需待改进问题的重要信息来源。

即使上级当局认识到必须采取改进措施，下级也未必会采取积极的行动。一位被采访者指出，1970年国家计委下发了一份据说经毛泽东批阅过的文件，要求当地干部阻止歧视。因此他们县的干部在全县范围内召开了一次知青会议，对知青们宣读了这份文件，并要求他们提意见。<sup>137</sup>青年们抱怨了糟糕的住房和不公正的工分。关于住房问题县干部同大队单独开了会，会议决定应该增建住房。该知青所在大队的干部并不满意这个决定。但是大队长还是要求知青去伐木，制砖，从附近东河运沙子，并且还分派一些农民去从事建房任务。然而该工程进展缓慢，缺砖时工程就停了下来。当这位知青1971年夏离开该村时，建房还没有完工。关于工分问题，同样没有结果；大队干部用指责来答复知青们的抱怨，说他们劳动的努力程度不够。这位知青所在大队的队长同十位生产队队长讨论了这个问题，十位生产队长也指责知青

没有努力干活。他们建议知青努力工作以获得一个好名声，这样当明年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调整工分时，知青的工分就会得到改善。这位知青的结论是，中央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当地没有正确地执行。而且人们得到的印象是上级没施加足够的压力来改变和克服县干部对村干部观点的潜在同情。\*<sup>100</sup>

与前几年情况相反，1973年决策者决定把解决知青冤情作为促使知青适应农村生活这一重要努力的重点。全国会议，省级会议，社论和典型实例都提到了对知青的歧视和其它形式的侮辱，从而在农村行政机构的官员们面前大大突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被明确告知，“必须进行严格的和全面的检查”，并采取纠正措施。<sup>101</sup>基本的设想是，不能充分地相信生产队和大队干部会准确地报告和纠正他们自己的缺陷。实际上，在安徽的一个公社，对安家费的使用权被从基层干部那里收了回来！“知识青年的安置经费由公社统一使用，统一结算。”<sup>102</sup>我们可以设想，这不是集中控制这些资金的唯一一例。

看来可以认为，1973年迫使农村领导采取改进措施的压力在许多地区或许大多数地区没有产生效果。如果改进工作需要上而施加相当大的压力，那么当这种压力因上级机构把精力和时间投向新的问题和新的重点而减轻时，那又该怎么办呢？对知青冤

---

\*一位曾在解放军农场工作的被采访者也说明了上级调查人、当地干部和知青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报告说，当地干部使用的计谋是选择知青中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伙去同工作组的成员谈话。同样，当工作组下连蹲点时，知青的生活是最好的，尤其是伙食。他指出，普通知青害怕坦率地说他们的意见，这些意见一般涉及伙食等生活状况问题，但是也会涉及干部的工作方法，干部们不愿让知青向工作组坦率地诉说。但是同时，干部们也不敢实行报复。如果团领导听说了报复事件，那将导致该连连长的撤换。他补充说，工作队离开不久，伙食状况又回到平常的糟糕状态。

情的关注一旦削弱，旧的侮辱就会再现，新的侮辱也会滋生。正因为如此，大规模派遣城市干部才有了新的意义。一般来说，城市干部比他们的农村同事更少受工作重点变动的束缚。而且，他们的地位使他们接触当地权力机构的机会同接触原来的城市权力机构的机会均等。因此，在要求解决冤情方面，他们所处的地位比知青本人更加有利。正是他们的来临，可以阻止当地的歧视性决定和约束干部个人受私人恩惠的引诱而滥用职权。<sup>100</sup>决策者肯定做过这种考虑，因为他们连续地做了这样的决定：1973年发起强调农村领导的改良运动，接着1974年又决定送更多城市干部同知青一起去农村。也许决策者已经认识到不能指望农村政治行政体系本身按国家要求来对待知青。

在陕西乾县，城市干部作为下放青年的保护人而发挥着潜在的作用。该县的一个大队“没有抓紧”建设知青住房。城市干部就把知青——他们都来自西安——和大队干部召集到一起，同他们一起学习毛的教导，“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帮助他们提高对知青生活条件重要性的认识，后来，党支部书记率领社员们“迅速地”建起了七座新房。<sup>101</sup>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进行这种干涉的其它事例。这要看城市干部事实上是否起到了这种作用。值得注意的是，1975年和1976年广播电台又时常提到需要“严厉打击”“残害”知青和“妨碍（他们）生活”的人。<sup>102</sup>改良运动无疑大大减少了歧视和凌辱知青的事例。但是保护知青不受凌辱和对冤情的解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 E. 婚姻与“扎根”

如果知青体验到了适应农村生活的困难，婚姻似乎就成为一种补偿。知青同本地人结婚可以说构成了与乡村契合的完整形式，而知青之间的婚姻似乎也推动了适应，使落户变成一种稳定

的生活。但是，1973 年以来婚姻才获得官方的赞同。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应教育知青推迟婚姻”。<sup>100</sup> 采纳这种主张的原因是，国家的晚婚政策与知青适应乡村这一问题相比占了上风。为了限制生育，在城市，妇女不到 25 岁，男的不到 28 岁不应结婚。在农村，受到提倡的年龄显然要低一些，分别为 23 岁和 25 岁。由于城市青年通常是在 16 至 18 岁之间下到农村，知青婚姻作为一个积极的政策性问题直到最近还没有产生。而文革前后下乡的一代现在已达到了可被官方赞同的婚龄。<sup>\*</sup> 改良运动同样关心婚姻问题：“在提倡晚婚的情况下，要关心解决他们的婚姻问题，并教育他们婚后继续革命，正确处理好工作、学习和家庭的关系。”<sup>101</sup> 并且还实行计划生育。<sup>102</sup> 按照被采访者和报刊的报道，知青同当地人结婚的主要方式是女知青嫁给当地男性。相反的情况很少发生，因为这与姑娘来自外村的农村传统的父权婚姻形式相冲突，也因为男知青通常没有足够的资源建立独立的家庭。如果男知青娶了一位当地人，这可能出于特殊原因。所以，在山西平鲁县，一位来自天津的青年娶了一位本地妇女，但是他在 1970 年被选为大队支部书记，而且还被提拔为县委副书记。作为一名向上晋升的干部，他无疑颇有收获。<sup>103</sup> 女知青同当地男性之间的婚姻有利于双方，但也会带来不利。被采访者指出，农民把潜在婚姻配偶的到来看作下放工作的好处之一，在一些村子里，这些潜在的配偶被看作是“国家分来的”。在广东的许多村庄，传统的婚姻习俗还在流行，男方家庭必须付彩礼和筹办奢侈的宴席。如

---

<sup>\*</sup> 政策要求下乡知青遵守城市婚龄还是农村婚龄，这一点并不清楚。无论如何被采访者听说过低于农村建议婚龄的知青之间和下放青年与当地人之间的婚姻。我从密执安大学马丁·怀特教授那里听到，他和威廉·帕里什发现，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广东农村妇女结婚的平均年龄是 20 或 21 岁，男的大约是 24 岁。

果娶一位城市姑娘就可能逃避这些义务。但另一方面，城市妻子可能不象当地女人那样能干，显然这种婚姻里存在某些不能指望的东西。从城市姑娘的观点看，嫁给当地人，尤其是嫁给村里有重要职务的人，可以获得安全、稳定和地位等前景。当然，这种婚姻的主要缺陷，是意味着永远要过农村生活，丧失了最终返城的可能性。报刊发表过一些女青年坚持嫁给当地人的实例。她们的父母和其他人持反对意见便部分出于上述因素，按照被采访者的看法，城市生活的吸引力使一些下放女知青嫁给城市工人。尽管按规定不允许妻子和孩子移居城市，这种婚姻还是有益的：探亲是可能的，妻子可以从较高的城市工资率中获利，而且关于居住地的政策最终可能发生变化。这种算计也隐藏在被采访者听说过的一种婚姻之中：女知青最初是被分到远离广州的村庄，但是她们后来嫁给了广州郊区的农民。

在批孔运动期间，知青和农民之间的婚姻被公开当作打破高贵者聪明、卑贱者愚蠢这一传统儒家观念的突出事例。例如，一个北京工人的女儿，白启娴，是她的家庭的第一名大学毕业生，1968年从河北师范学院毕业后来到河北沧县的一个村子安家（她的大学教育，换句话讲，可能是不完全的，由于文革的爆发，它已结束于1966年）。1970年她嫁给了一位只上过小学的农民。当这位农民教她作农活时，她便爱上了他，决定结婚是困难的，这个事例得到了公开报道，因为她同自己和持反对态度的其他人进行了斗争。她知道结婚就意味着失去回京的希望，她父亲反对这个婚姻，说：“嫁给农民，在农村生活一辈子，有什么前途？”她还受到了“一些抱有陈旧观念的人”的嘲笑，他们说“真遗憾，一位北京出生的大学毕业生嫁给一位农民。”据说一位教师把这个婚姻说成“丑闻”。甚至在村子里，据说当一些贫下中农赞同她的决定时，另一些人则认为她嫁给乡下佬太傻。白启娴驳斥了这些意见，坚持了自己的决定。她后来成为公社中学的一名教



师。<sup>108</sup> 报刊还报导了其他这类例子，如湖南解放军农场的两名姑娘嫁给了两位苗族青年，从而打破了旧观念，促进了新观念。<sup>109</sup>

男女双方都是知青的婚姻曾遇到过困难。辽宁海城县委因收到知青夫妇们送来的一封信，而对这种婚姻作了一项调查。到1974年11月止，该县共有知青总数为48,000名，其中1,631（占3.4%）人已经结婚。<sup>110</sup> 调查表明“王石公社某些生产大队的干部认为：下乡知识青年结婚以后，人离开了青年点，就用不着管了”。结果“他们对这些知识青年的政治学习和生活情况很少过问，致使一些已婚下乡知识青年思想上产生了波动，不安心在农村。”<sup>111</sup> 大队干部的这种忽略与公社干部的关心形成了对照。后者鼓励已婚青年学习政治，参加集体活动帮助他们解决住房和照看小孩的问题。由于海城县农村没有托儿设施——显然，在中国只有富裕的郊区公社才可能建立这类设施——作为母亲的知青必须留在家中照看他们的孩子，除非干部采取措施给予特殊帮助，如安排一名农民妇女照看孩子。但是全县“最需要急迫解决”的问题是知青夫妇的住房。解决的建议是这样的，在生产队，以前由知青居住的，因这些知青被安排进大队青年队而腾出来的住房，应该优先分给已婚知青夫妇，尽管还必须建造新的住房。这表明海城县知青夫妻不同于河北冀县，他们不能继续生活在青年点，必须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农民中间。由于缺乏青年集体的支持，在村内没有亲戚，难以同农民契合（已婚知青离开青年点后因怕冒犯农民而不敢参加“斗争”），以及缺少坚实的经济基础等原因，知青家庭发现很难维持生计。这就向当局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被采访者也听说过单纯的知青间婚姻不象知青——农民婚姻那样更为经常。这种对知青间婚姻问题的评价与海城调查报告相似。除非父母提供物质帮助，知青夫妻即使双方都出工也很难撑起一个象样的家庭。勤奋劳动的独身未婚知青可以养活自己，但他通常不能挣到供养一个妻子和孩子们的足够收入。农民婚姻

是建立在既定家庭生活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而知青婚姻缺乏这样的基础。除非他们多做工作提供适当补偿，否则下放知青间的婚姻不能视为推动知青适应农村生活的有效措施。

报刊很少发表知青婚姻统计资料，我们也不知道知青婚姻有多少仅属于知青间婚姻，有多少是下放青年和农民之间的婚姻。报刊公布了两省的数字。在吉林，到1975年11月，80万名知青中有5万名（6.3%）已经结婚。在辽宁，到1976年5月为止，120万知青中已有8万人（6.7%）结婚。<sup>137</sup>

在上述统计中，辽宁海城县的比例是3.4%，而该省昌图县则达到11.5%（1,000人中有115人），这种对比说明一个省内各地的比例相差很大。<sup>138</sup>在河北冀县，到1973年夏天为止，比例达到13%，在名义上存在的全部952名知青中，124人已经结婚。但是该省全面资料没有公布。<sup>139</sup>既然婚姻应该只产生于大龄组知青中，那么总的百分比或许可以根据几年前报告的知青总数来推算。在辽宁，1973年时有70万知青在农村工作。<sup>140</sup>这个数字将可能把婚姻率抬高到11.4%。

如此低的比例很可能是由于知青婚姻必然会遇到困难。但也可能是由于许多下放知青还没有达到婚龄这一事实，尤其是当他们采用25和28岁的婚龄时，这在独立的知青点中是很有可能。这就是说，1968年下乡的18岁女知青只有到1975年才能结婚；而男知青则必须等到1978年。下放使青年的婚姻率低于如果他们不下放时的状况。显然，验证这一推论需要更多的关于年龄分布等方面的资料，尤其要考虑那些被召回城市部门的人，还需要更多有关其配偶没有下放的知青婚姻比例的资料。决策者可能把知青下乡看做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城乡普遍地降低结婚率从而降低出生率的一项措施。如果他们的目标是不提倡知青结婚，那么，显然，这将同促进对农村生活的适应这一目标相冲突。不过也许事实并不是这样，按照1967年发表的一篇来自辽宁昌图

县的文章，公社党委的领导人认识到，知青结婚安家，表明他们决心在农村扎根，因此，知青结婚“值得鼓励和支持”。<sup>196</sup>这说明随着越来越多的知青完全进入成年，婚姻问题将越来越突出，这将促使决策者和行政系统动员更多的资源去促进这种婚姻。<sup>\*</sup>

#### F.不断强化的约束机制——“政治教育”

决策者非常重视作为改进措施的政治教育，因为许多问题的产生都可以归咎为参与知青下乡运动的人们所具有的“错误”思想、观念和概念。只要他们中有人不能理解新思想，那就必须不断进行学习，使每个人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因此，知青“必须努力学习，不断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以便提高参加扎根农村和建设农村的这一“伟大斗争”的自觉性和能力。<sup>197</sup>出于同样的理由，干部和农民也必须学习知青下乡运动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则。<sup>198</sup>

知青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多种多样，但主要是专门为知青组织的定期学习会议。被采访者指出，大队一级的知青学习会每周或每月举行一次，在公社一级，每年举行一次所有知青都出席的学习会，会议要开三、四天的时间，但有时需要两周。知青学习会上提出的主题同现行政治运动强调的主题——1972年为批修整风，1973年和1974年为批林批孔——相一致。但是会议努力使这一般性主题同知青的特殊问题结合起来，即通过使他们在

---

\* 本书对“城市知青”一词的使用掩盖了这样的事实：许多年轻的城市居民到七十年代中期已完全进入成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没用甚至叙述一位在农村已呆了10或12年，肯定已接近30岁的人时，仍然称他为“下乡知识青年”。

农村感到更加“愉悦”来促进他们的适应。例如，1970年和1971年时，许多知青被安排进了城市，这时政治学习的重点是集中解决留下知青的士气问题；批修则紧密联系讨论青年应有什么样的正确“理想”，应该怎样看待他们的前途。<sup>109</sup>一般来说，理论和现行政治主题学习的目的，是使知青们认识到他们在农村革命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前景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成功地传达这一前景，也许会使青年通过他们所参与的伟大事业的对比认识到他们自己所作牺牲的价值。

农民参加知青政治学习受到热烈的鼓励。当农民领导学习会时，就不再强调理论概念，而是交流苦情材料。贫农将诉说他们在旧社会的苦难，进行“忆苦思甜”。他们详述家史，描绘本村革命斗争史，以及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史。<sup>110</sup>下述引文来自一位在黑龙江军队农场安家的上海姑娘的文章，文章说明了“忆苦思甜”所产生的情感作用：“连里请当地老贫农林大爷给我们进行忆苦思甜的教育，在万恶的旧社会里，林大爷的父亲被地主折磨死了，母亲活活饿死，姐姐被迫卖掉，我听了以后，流下了悲愤的眼泪，我一定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一定更加热爱新社会，更加热爱毛主席！”<sup>111</sup>为了加强对旧社会苦难的认识，知青可能会吃一顿用野菜、树皮和粗粮做成的“忆苦饭”。

城市青年的政治教育还应通过他们参加村内政治运动，如“斗批改”以及通过同农民的非正式接触来进行。“再教育”模式要求农民个人同知青保持非正式接触。通过这种接触，他们使知青接受正确的教育和价值观，并通过实行革命的生活方式即无私的劳动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为知青树立榜样。从原则上讲，知青全部的农村经验，尤其是对生产的参与，应对他们相应的政治态度和观念发生影响。

政治教育尽管被人们看作是针对知青适应危机的一种措施，但它本身也是改良活动的重点。起初，农村环境不总是有助于深

人和持续的政治教育。中国农村的政治化程度是不同的；在许多地方，人们对明确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兴趣不大。<sup>100</sup>因此，当知青再教育的责任分散在干部和整个农民中时，这种教育几乎难以完成。被采访者指出，知青和农民之间非正式接触简直极少具有政治内容。同样，较早发表的资料表明，因干部减少了同知青的接触，知青会议的次数减少了，学习会议本身的质量通常也很低，且充满了形式主义和肤浅。<sup>101</sup>把知青集中起来，使他们的团体生活集体化，理由之一是为了改进政治教育。把知青团体改组为具有正式结构的集体，由选派的包括城市干部在内的领导人来领导，这种作法应该导致切实的学习制度的建立。这种制度的存在终将是该组织正常运转的标志之一。<sup>102</sup>这种新的方式是否会使政治教育更持久更系统，或者知青集体的学习是否会沦为例行公事，还有待研究，但是至少在目前，许多公社都创造了改进的条件。

中国传媒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即政治教育对知青的适应具有因果作用。“在（辽宁法库县）管家屯生产大队，并不是每位知青都有很大的才干。他们初来农村时有各种缺陷和弱点。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他们当中许多人表现了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他们通常思想虚荣，行动动摇。他们为什么会取得这么快这么大的进步？这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sup>103</sup>报刊举出大量事例说明，一些士气不振的知青，通过与干部谈话和农民演讲的忆苦思甜会等形式的政治教育，恢复了活力。<sup>104</sup>士气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返城的期待。例如，1968年来自西安的一些知青，六年后，感到他们已取得农业大学的毕业资格，应该回到自己的故乡城市。负责干部——在本例中他们来自西安——利用各种机会同他们一起学习毛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之类的材料；结果，知青们坚定了在农村忍受下去和把余生交给革命的决心。<sup>105</sup>

如果政治教育通过改变知青的态度来促进他们的适应，那么

教育材料的说服力就需研究。可以设想，忆苦具有说服力，因为它诉诸中国对老年人的传统尊重，激励知青“不辜负老一辈的期望”。<sup>100</sup>但是，基于两点理由，被采访者不同意这种说法。首先，知青都是解放后出生的，不可能准确评价“过去的苦情”。第二，知青们倾向于关心未来，尤其是他们自己的未来，而不关心过去；渐渐遥远的过去跟他们没有关系。如果这是一种普遍倾向，那么政治教育强调农村现代化未来可能性是否会更有效呢？被采访者对这一点也表示怀疑：他们对南方的广东所达到的现代化程度没有印象，他们一般用城市的眼光看待现代化，把他们的下放归咎于中国，尤其是广州工业化的姗姗来迟。

政治教育不能转变那些尚未适应者的思想，那还能做什么？可以设想政治教育以两种方式在发挥作用。如果知青决心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教育可以通过提供理性化和合法化的解释，起加强作用。对尚未适应农村生活者，政治教育的作用不在于它所转达的内容，而在于它自身的存在所表明的意义。持续不断的政治教育表明知青集体的正常运转，因而可以当作社会控制和“严厉的政治环境”存在的标志。<sup>101</sup>它意味着政治体制对知青的日常生活发挥着有形的具体的作用，意味着知青的日常交谈更可能以支持下乡的方式进行；意味着持不同意见的知青不以某种赞同下乡的方式就没有什么机会来渲泄自己的情绪。持续的政治教育的存在表明一种环境约束着知青的行为，好象他们已经适应了，并尽力去扎根。

改良措施力图达到两个目标。第一是造成一种农村环境来更有效地塑造和约束知青行为，减少无助于适应的行为自由。第二是改善生活条件，使下放青年在农村有可能过上过得去的日子，希望更多的青年终究会屈从和适应他们的处境。假如每个地方都实行了改进措施，那无疑为知青的适应乡村创造了比实施这些措施前更为有利的条件。

改进措施的实施证明中国政治机构有能力掌握和创造城市青年下乡管理的新方法。某些改进措施值得注意，它们很具体，直接涉及下乡青年的物质状况，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对物质改善的关心产生于1973年下半年，当时由于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整中国似乎都在向左转，向左转一般意味着减少对物质利益的关心。在这种场合，对下乡运动意识形态原则的不断强调同物质改善的具体而明确的关注是联系在一起的。改良措施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它们表达了对知青——农民契合可能性的怀疑这一现实主义观念。决策者不是简单地坚持知青住在农民的村子里，而是在可能的地方通过强调单独居住，把知青和农民相对分开。

知青的适应不仅仅取决于本章讨论的改良措施的执行。我们只能附带地提一下影响这个问题的某些其他因素，因为证明它们相关程度的观察资料不易弄到。因素之一是下乡青年的个人背景变量。我们可以设想，阶级背景好的知青要比阶级背景差的更易调整，虽然也有资料表明情况也不是没有例外，例如，出身工人阶级的青年，也许会更不适应，因为他们给社会对无产阶级提供的机会期望过高，而他们的农村管理者也不可能会由于他们来自好的家庭背景而对他们寄予更高的期望。<sup>100</sup>或许可以假定，来自较贫困家庭的知青要比小康家庭的知青更易适应。<sup>101</sup>来自小城镇的青年可能比来自大城市的青年更易适应，因为前者比后者更接近农民生活。下放到较穷地区的知青可能要比去富裕地区和邻近家乡城市地区的知青更难适应。邻近故乡城市的地区流行熟悉的习俗和方言，更容易适应。<sup>102</sup>另一种影响适应的因素，即为农村社会作有意义的和为人赞许的贡献的机会问题，这将在下章详述。本书最后一章还联系知青返城问题再一次讨论适应问题。

注释：

1. “支持和教育子女上山下乡干革命”，《红旗》1972年第8期66—68页。知青几乎在下乡后几个月就发生“动摇”，这是报刊的共同主题。见1968年12月5日《光明日报》来自山东莱阳县的实例；1972年11月22日沈阳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230期，1972年11月28日。
2. 被采访者报告了此事。
3. 一些例子见1970年7月8日《光明日报》〈掉进粪坑的猪引起知青反感〉；1970年11月15日《光明日报》〈知青害怕水蛙〉；1970年7月27日《人民日报》〈回乡知青害怕接触大粪〉，1972年2月25日《人民日报》（云南鹤庆县）。
4. 1969年6月27日《人民日报》。
5. D·戈登·怀特的《下乡青年的政治生活》，《中国季刊》第59期（1974年7—9月）强调这一论点。报刊也谈到了这一态度（见1969年5月22日《光明日报》）。
6. 一位被采访者在提出这个论点时专门联系了他在广州的同学。报刊也提到对未下放同学有好处的意识。这种意识在知青中造成了动摇；见1972年7月25日《光明日报》。
7. 1970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辽宁复县的实例；1973年8月10日《光明日报》，陕西陇县的实例；《热情关怀下乡知识青年的成长》，28—38页，安徽霍丘县实例。下面凡提到这本关于下乡问题的论文集，皆简称《热情关怀》。
8. 1972年11月1日合肥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214期，1972年11月3日。
9. 在这项工作上表现出色的有，江苏东台县的实例，见1969年6月27日《光明日报》，甘肃会宁县实例。在该例中，党的书记把一位知青带回家，同他一起学习了20多次，见1970年12月22日《光明日报》。
10. 由于报刊倾向于强调正面，关于这一题目的文章无疑会说明大多数情况是合乎标准的。
11. 若干例子均见1973年7月25日《光明日报》，1974年8月18日《人民日报》和1972年12月22日南昌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4期1973年1月5日，（“各地农村同志都应该欢迎知识青年，决不应把他们仅仅看作过路人”。）



12. 1974年6月15日《人民日报》。该论点是湖南株洲当局提出来的，第3章已经指出，株洲在下乡运动中已成城乡联系的典型。
13. 1970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辽宁革命委员会毕业办公室的文章。
14. 1970年12月17日《光明日报》所载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的文章。
15. 1973年1月2日长春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7期，1973年1月10日。
16. 匿名知青的信，“关于重视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的讨论”，71—73页。
17. 见马丁·怀特《中国的小团体和政治仪式》，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1页。
18. 有关实例。见1969年7月11日《光明日报》；1970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黑龙江虎林县实例；1970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广西贺县实例。
19. 1972年1月24日《光明日报》吉林长岭县实例。
20. 1971年1月11日《人民日报》，河北隆化县实例，（1970年11月20日《光明日报》也报道过）。
21. 1969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吉林安图县实例，但是这是一个同学之间结成小团伙的例子。
22. 这是理查特·克劳斯提出的论点。见《解放后中国阶级演变观念》，197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另见怀特：《下乡青年的政治生活》。
23. 见第6章关于文革时期知青行为的讨论。
24. 见本章下述。
25. 报刊的确时常提到文革不同组织的成员之间的不和；见1970年4月7日《光明日报》。在另一些例子中，知青被指责为具有“无政府主义”或自由主义思想；见1970年4月14日《人民日报》，1970年12月6日《光明日报》，广东海南陵县实例。
26. 见1969年8月27日《红旗》第9期，1969年9月22日《中国大陆期刊文摘》第165期，“用毛泽东思想对下乡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
27. 1972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辽宁北镇县实例。
28. 1973年6月30日和1970年10月15日《光明日报》。

29. 1973年6月30日《光明日报》，河北丰润县实例。该文载于《热情关怀》，39—50页。
30. 1972年11月26日沈阳人民广播电台消息，1972年12月2日《世界广播综览——远东篇》第4160期。
31. 1973年7月5日《人民日报》，亦载于《热情关怀》第13—19页。
32. 见1973年8月29日和1974年8月18日《人民日报》，《热情关怀》第28—38页报道过安徽霍丘县某生产大队知青的实例，说明知青之间也存在差别。“去年”，假定是1972年，平均出工日是280天，那么出工最多的人可达到324天。
33. 冀县实例，载《热情关怀》，第13—19页。
34. 例如，1970年2月17日《光明日报》报道知青为了不误工而吃冷饭；亦见1970年7月20日《光明日报》（陕西陇县实例）；1973年8月10日《光明日报》（广东四会县实例）和1973年9月16日南昌广播电台消息，1973年9月28日，《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89期。
35. 这类例子见1969年11月3日《光明日报》；另一例强调农民的领导，见1972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
36. 1973年7月25日《光明日报》（山东昌邑县实例）和1970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1975年仍流行那种认为知青造成了额外负担的思想。见齐秦：《巩固和发展上山下乡的成果》，第7页。
37. 害怕知青反叛的例子，见1969年11月23日《光明日报》，辽宁凌源县实例。
38. 1968年12月6日《人民日报》。
39. 1964年《劳动》第3期，第6—7页（感谢耶鲁大学的仲重午（chong wook Chung）提供了这份资料。
40. 但是国营农场和军队农场在成份上不同。被采访者描述的两个军队农场中服务的是现役军人和复员军人。在新疆，共产党接管后，许多民族武装被编入生产建设兵团；见乔治·莫斯利：《中苏文化前线》，（坎布里奇，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专题著作，1966年版第35页。）我们不知道有多少转业军人同知青混杂在一起。在内蒙，军队农场的—个连由80%的下放知青组成（见1973年11月9日《人民日报》）；其他是什么人，没有透露，国营农场可能混杂了相当多的本地人和外来

者。接近广州的大湾农场由 50% 的知青和 50% 的农民组成（资料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麦隆·科恩，1975 年）。报刊（1975 年 9 月 22 日《光明日报》）提到的另一个广东农场，由 70% 的知青构成。

41. 1970 年 3 月 17 日《光明日报》报道过一个同蒙古族家庭生活在一起的北京姑娘的例子；1971 年 3 月 17 日《光明日报》描述一个类似的天津姑娘的实例。1971 年 5 月 5 日《光明日报》还报道过另一个实例，一位来自上海的单身姑娘，在吉林浑春县一个 13 户人家的生产大队里同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42. 有一个关于北京知青的例子，她自愿去一个蒙古族的村子落户，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遇到极大的适应困难。见 1970 年 3 月 17 日《光明日报》。另一个例子是，一位河南姑娘来到西藏一个军队农场，很难与当地人相处，不会讲藏语，不习惯藏族食品。见 1968 年 11 月 1 日《光明日报》。
43. 1967 年 11 月 11 日《人民日报》社论。该社论也论及了回乡知青问题。
44. 若干位采访者报告了这件事。一篇重要的文章也承认了这一点。见郭青《关心知识青年生活》1973 年 6 月 22 日《光明日报》，1973 年 7 月 2 日《中国大陆新闻综述》3406 期。
45. 《热情关怀》第 40 页，丰润县实例；1971 年 5 月 6 日《光明日报》。河北滦南县实例，在该例中，知青把他们受到热烈欢迎的原因归之为缺少劳力。
46. 1973 年 1 月 24 日《人民日报》。
47. 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维克多·李报道说同他谈话的农民常常骄傲地指出，那些刚来时觉得农村生活非常困难，不能适应艰苦农业劳动的知青，渐渐地适应了，并且做得非常出色。
48. 农民为知青们做好事的例子见 1970 年 1 月 4 日《光明日报》（知青病了，生产队队长和农民步行 8.5 公里送他去医院），1970 年 2 月 17 日《光明日报》载（生产队队长抢救落水知青），和 1970 年 3 月 22 日《光明日报》（农民照顾生病知青）相反，也有知青照顾生病农民的例子，见 1972 年 7 月 3 日《光明日报》。
49. 若干事例见 1973 年 6 月 30 日和 1970 年 10 月 15 日《光明日报》。
50. 1970 年 3 月 9 日《人民日报》。
51. 被采访者说他们听说过些事。

52. 萨姆,《生活状况仍然落后的村子》,《南华早报》,1973年2月15日。
53. 事例见1967年11月第3期《支农红旗》所载《河南的悲剧事件》,《联合出版物研究处》44052,《共产党中国译文集:政治学与社会学》436期,第16—23页。
54. 见1969年1月24日《人民日报》,江苏一个小型国营农场的实例。
55. 1972年4月22日《人民日报》,江苏邗江县实例。
56. 访问过河北村庄的耶鲁大学的曹河武也说,干部把知青称作“他们”,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报刊描述了贫下中农邀请知青来家作客的情况,如在黑龙江爱辉县,但目的据说是“忆苦思甜”(1970年2月10日《解放日报》,《中国大陆期刊文摘》(附录)1970年5月21日272期,1972年7月3日《光明日报》举出黑龙江穆稜县的实例,在那里,农民邀请知青去吃年夜饭。
57. 1972年1月18日广州广播电台消息,《中国新闻综述》403期,1972年1月20日。
58. 《热情关情》,第13—19页。
59. 关于这件事,我受惠于芝加哥大学W·帕里斯教授。
60. 1969年1月8日《光明日报》,河南午阳县实例。
61. 1972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湖南南县实例。
62. 1971年5月6日《光明日报》,关于知青参加文革后期所谓“斗、批、改”运动的实例。
63. 1974年5月10日《北京周报》17期第21页:《走上山下乡的革命道路》。
64. 1973年11月7日《人民日报》(亦见第5章)。
65. 郭育:《关心知识青年生活》,正如一位被采访者所说,姑娘们的生理特点显然是针对解放军农场为姑娘们分派同男人一样沉重的工作这一做法而提出的。关于医疗,1973年11月21日《光明日报》报道了一个平等对待知青的实例,他们每年为合作医疗支付7角钱。1973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提到甘肃额济纳旗(现为内蒙所辖,文革时曾划归甘肃——译者)知青帮助生病者。
66. 1977年1月15日南昌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7年1月17日11期。
67. 1973年9月11日贵阳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9月13日第178期。
68. 1973年4月30日《人民日报》,另见《热情关怀》第5—12页。

69. 1973年9月25日长沙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10月3日第92期。
70. 《热情关怀》第32页,安徽霍丘县实例。
71. 齐秦:《巩固和发展上山下乡的成果》,第7页
72. 1975年10月22日武汉广播电台消息,1975年11月3日《国外广播信息社》212期。类似的主张见1975年4月27日杭州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4月28日第82期
73. 1975年4月26日石家庄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4月30日第84期。
74. 1975年11月1日合肥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11月7日第216期。
75. 新华社北京1975年12月22日电,《国外广播信息社》第248期。
76. 1975年1月18日北京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1月21日第14期。但是,4万人中可能不仅包括1974年下乡的干部,可能也包括以前下乡的干部。
77. 新华社北京1975年12月22日电,《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12月24日第2488期。
78. 新华社上海1970年5月5日电,《中国大陆新闻综述》4656期,1970年5月14日;1974年7月20日成都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7月22日141期。另一份关于上海干部陪同知青的资料,见1971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
79. 1974年10月8日武汉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10月11日199期。新华社北京1975年8月22日电,《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8月25日165期。
80. 1975年2月13日《人民日报》;1974年7月29日武汉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7月31日148期;1974年10月15日西安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10月16日201期。
81. 1974年7月29日武汉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7月31日148期。在西安的实例中,516名城市干部中有84%是中共党员。在株洲,193名城市干部中有176名即91%是中共党员,其中13人是党委委员。见1974年6月13日《光明日报》。
82. 见1974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关于西安干部同知青一起劳动的情况报道。

83. 1974年7月29日武汉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48期。1974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所载西安的文章提到了“统一领导”。
84. 1974年6月13日《光明日报》关于株州模式的文章说明了这一点。
85. 1975年2月17日兰州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2月21日第36期,来自武汉的广播也谈到了国家规定。见1974年7月29日武汉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7月31日第148期。
86. 1975年1月4日福州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1月7日第4期。
87. 1974年7月20日成都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7月22日第141期。
88. 1975年8月24日广州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8月28日第168期。
89. 1975年10月13日北京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10月16日第201期。广播还提到其他农场,包括果园、中草药园、鱼场和畜牧场。
90. 1974年6月12日《人民日报》。
91. 关于知青单位独立核算的例子,见1974年11月22日南京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11月29日第231期。
92. 关于实例,见1973年6月30日和1970年10月15日《光明日报》。
93. 齐秦:《巩固和发展上山下乡的成果》第8页。
94. 见1973年1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的吉林怀德县实例。1973年下半年该县另一份报告描述了一位农民户长教育知青进行节约,根据生活条件可以砍柴草,不用买煤烧。见1973年8月29日《人民日报》。
95. 1973年11月22日南京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11月29日第231期。在湖南株州,知青点上的人有三分之一是当地农民和干部;见1974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96. 1972年11月26日沈阳广播电台消息,《世界广播综览——远东篇》第4160期,1972年12月2日。
97. 1974年11月23日北京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11月26日第229期。

98. 见1974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99. 1974年11月22日南京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11月29日第231期。同样,较大的集体允许给体力弱的青年分配适当的工作,见齐秦:《巩固和发展上山下乡的成果》第8页。
100. 同上:关于自给的其他情况,见1973年8月10日《光明日报》(陕西陇县);1973年7月20日《光明日报》;1973年9月16日南昌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9月28日第89期。
101. 1974年8月18日《人民日报》。1973年他们平均工作335天。
102. 劳动考核是由安徽霍丘县创造的,见《热情关怀》第28-38页(这里也规定了请假的制度,不能不辞而别)。每月22天劳动的规定是1972年11月1日合肥广播电台报道的,《国外广播信息社》1972年11月3日第214期。
103. 1974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104. 1973年8月29日《人民日报》。
105. 齐秦:《巩固和发展上山下乡的成果》第8页。
106. 《中国新闻摘要》1973年11月22日第494期。
107. 被采访者的报告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伦·科恩的报告是一致的,后者曾于1975年访问过广州市郊的大湾国营农场。
108. 1975年6月5日长春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6月6日第110期。
109. 见1973年11月3日沈阳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11月8日第216期。该电台描述了辽宁海城县为下放青年过冬所做的工作。
110. 1975年这位知青受到一位助教的采访。
111. 按照简·麦德尔的说法(引自威廉·L·帕里什:《社会主义和中国的农民家庭》《亚洲研究》1975年第3期第621页),在陕西柳林建一座新房需要花600元。如果4位青年共居一房,原有的国家安家费大致足够了,但不会为本来要支付的其他项目留下较多的钱。我所采访的一位在实施改进措施之前就离开农村的知青曾住过各种条件的住房。在许多情况下,住房似乎不是问题,因为知青可以搬进腾出来的空房中。一些农民以前曾居住过这些房子,后来他们移民去了香港或其他地方。一位被采访者和其他10位青年被分到一个生产队,在他

们居住的3座房中只有一座是新建的。但是在其它实例中，这位被采访者住在没有建新房的村子里，他们必须凑合着住进年久失修的拥挤的宿舍中。

112. 1973年8月25日《光明日报》。

113. 《热情关怀》，丰润县实例，第48—49页。

114. 1974年7月20日成都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9月22日第141期。

115. 1973年10月29日成都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10月30日第209期。

116. 1973年8月15日《人民日报》。

117. 1973年10月27日兰州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10月27日第210期。一里等于三分之一英里。

118. 1974年6月11日北京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6月13日第115期。

119. 1974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所报道广西鹿寨县实例。该县化肥厂提供了卡车。1975年8月24日广州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8月28日第168期。报道了广州建工局为14个县派过技术员，帮助他们建造招待所。

120. 1973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描述了广东陆丰县一个青年集体积累了4千元的公积金，显然是用于住房和其他建设项目的。

121. 《热情关怀》中冀县的实例，第15页。

122. 1974年9月29日合肥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10月9日第197期。

123. 1975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关于住房问题的其他文章，见1974年11月5日《人民日报》，河北崇礼县实例；1974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有关于山西城市干部的文章。

124. 1973年8月29日福州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9月5日第172期，亦见1973年9月10日长春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9月27日第180期；1974年9月14日兰州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9月19日第182期。



125. 1973年9月20日合肥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9月27日第188期,郭青:《关心知识青年生活》。
126. 1973年8月29日福州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9月5日第172期。
127. 例如,1973年8月5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了一批29名罪犯,并贴出了布告。29名罪犯中,有17人强奸或诱奸下放到天津郊区公社的女知青,17人中有11人在公社,主要在大队和生产队两级担任官职。利用职权同城市姑娘发生不正当关系的干部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课刑范围从处决到15—20年监禁。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兰德尔·爱德华教授那里惠受了天津判决书的副本。云南也有类似的实例。见《问题与研究》1975年3月第3期第111—115页的文章《严厉打击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犯罪分子》。当然,关于这些案例,人们可能提出真实性问题,但是它们似乎是真实的。
128. 1967年11月20日《革命青年》第2期“愤怒声讨刘少奇”,《中国大陆新闻综述》4093期,1968年1月5日。
129. 如1971年2月12日《光明日报》。
130. 被采访者报告了此事,亦见1968年2月25日《文汇报》、《中国大陆新闻综述》4146期,1968年3月26日,该报规劝知青返回新疆,无论他们是否害怕受到“打击报复”。
131. 1970年3月8日《人民日报》,一位被采访者说到在他的生产队里,干部曾把国家安家费用于购买化肥,而不是知青的基本必需品如碗筷等。知青们向生产队长反映了他们“意见”,但是生产队长没有做出回答,他们又对大队负责知青工作的干部作了抱怨,问题得到了有利于他们的解决。
132. 在黑龙江一个军队农场的实例中,据说农民(应为知青——译者)批评了对知青生活状况的忽视,显然使问题得到改善。见1972年12月6日《人民日报》,给更高级领导的信也能起到某些作用;1974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对辽宁海城已婚知青来信的调查情况。
133. 关于详细的讨论,见米歇尔·奥克森伯格的《中国官僚政治内部的交流方式》第2128页,载《中国季刊》第57期(1974年1月至3月)。

134. 1972年8月9日《人民日报》。
135. 1974年11月5日《人民日报》。
136. 知青没有接触国家文件的自由，在这个实例中，他们不允许作记录。
137. 正是这位知青提供了这一引文，即一位县政府的干部评论说，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知青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
138. 1973年9月11日贵阳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9月13日178期。
139. 安徽天长县向阳公社。见1973年5月21日《光明日报》，《中国大陆新闻综述》5387期，1973年6月4日。
140. 第3章已经说明农民很欢迎株洲创造的城乡建立联系的做法。其中包括在青年点使用城市干部。由于存在滥用职权的现象，城市干部的到来会使农民感到放心。
141. 1974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142. 1975年12月19日长春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2年12月23日第251期；1976年6月29日南宁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6年6月30日127期。亦见1975年10月22日武汉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11月3日第212期。
143. 1972年12月22日呼和浩特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2年12月29日第251期。关于广西贺县女知青的情况——她们中的一些人考虑早婚，见197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关于河南刮“早婚风”的实例，见1971年1月30日《人民日报》。这两例显然是由安家困难引起的。
144. 郭青：《关心知识青年生活》，1976年7月9日《人民日报》。
145. 1974年5月6日《光明日报》。
146. 马丁·怀特提供的资料。
147. 1975年3月22日《人民日报》，《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3月31日第62期；和1975年1月28日《人民日报》，《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3月6日第45期。在第一个实例中，一位上海姑娘要嫁给郊区的农民；在第二个实例中，一位天津姑娘要嫁给吉林蒙古族地区的一位农民，两例都谈到了轻视农民的观点。1973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报道了一个对应的实例，湖南株洲一家工厂的

党组织书记鼓励女儿在农村地区出嫁。尽管这会断送回城的可能性。

148. 关于白启炳，见1970年2月22日的《北京周报》17.NO.8；1974年3月19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北京1974年5月30日电，《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6月3日第107期。
149. 1974年4月21日《光明日报》。
150. 1974年11月15日沈阳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11月26日第229期。
151. 1974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上列注释提到的广播消息从更一般的含义上作了同样的引述，它没有提到具体哪个公社。
152. 1975年12月27日长春广播电台消息，《世界广播摘要——远东篇》5104期，1976年1月10日，1976年5月10日《人民日报》。
153. 1976年7月9日《人民日报》。当然，海城的报道是在1974年。
154. 新华社北京，1973年7月4日电，《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7月9日第131期。
155. 1973年12月22日沈阳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12月27日第249期。
156. 1976年7月9日《人民日报》。
157. 1975年1月15日长春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1月16日第11期。
158. 1973年5月21日《光明日报》，安徽天长县向阳公社的情况，《中国大陆新闻综述》5387期。当地人学习的内容是要对知青的缺点错误采取更耐心更爱护的态度。因而，黑龙江明水县不是对落后知青采取轻视和瞧不起的态度，而是鼓励当地人团结他们，鼓励他们进步；见1973年3月30日北京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5月4日第87期。
159. 见1971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广东龙门县实例；1971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江苏宝应县实例。
160. 1974年4月25日和5月5日《光明日报》。
161. 1969年2月17日上海《文汇报》，《中国大陆新闻综述》（附录）249期，1969年5月2日。

162. 见马丁·怀特：《小团体和政治仪式》第164—166页。
163. 被采访者指出了学习会的低质量。在这种会议上知道大量毛主席语录的人能大出风头。
164. 如1974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西安城市干部的文章。
165. 1972年11月15日沈阳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2年11月21日226期。
166. 见1969年1月24日《人民日报》。
167. 1974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见前引书。
168. 1969年2月17日上海《文汇报》，《中国大陆新闻综述》（附录）249期，1969年5月2日。
169. “严厉的政治环境”的概念，参见怀特：《小团体和政治仪式》。
170. 两位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知青报告了此事。
171. 见1975年4月22日《光明日报》的报道。在广东一家国营农场，一位下放知青的适应困难因其家庭生活较富裕而加重。
172. 见1974年1月16日《光明日报》，该报描述了促进江苏扬州市知青适应贫困不堪的下放地区而采取的有针对性的教育方式。

## 第五章 “广阔天地”是可以 “大有作为”的

上一章我们集中讲述了城市知青下乡成为公社的普通社员，解放军农垦团的“战士”或国营农场的农工的生活状况。知青们把全部时间都花在做农活和参加政治学习上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间也发生了一个分化过程。一些知青的日常工作还是干农活，没有改变，但是另外一些人却增加了新的工作内容，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部分地替代了农活。一些知青成了社会活动分子，一些担任了正式的领导职务，一些人还被挑选出来承担特殊的职务如当教师或提供医疗服务。本章第一部分将对知青被派任到这些岗位的方式作一评价。

任用同下乡知青对农村发展所作的贡献这二者之间也是紧密相关的。关于贡献问题，我们将在本章的第二部分进行讨论。当然，知青不仅只是在被任命到特殊岗位上以后，或成了生产队甚或大队的领导人后，才对农村的发展作出贡献。他们每个人所进行的劳动都理所当然地为农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实际上，他们的贡献常常以集体的形式出现，如一个青年集体承担一个建设项目、一个知青小组从事一项“科学试验”或一个知青小组对一个村庄施加影响使其使用某项革新成果如改良过的种子等。在这种情况下，知青所作的贡献就超出了个人作用的范围。本章所讨论的两个主题不仅涉及农村变化问题，更重要地还涉及了下乡知青对农村生活的适应问题。把知青任用到某些特殊的职务或岗位上，

是通过改变下乡知青的地位以促进他们对农村的适应；同时，由于使知青们获得了一种满足、价值和成就感，也能促进他们为农村的发展作出贡献。但是，本章最重要的目的还是为关于知青下乡不仅对城市，而且对农村的发展也具有意义的假设提供明确的例证。

## 1.对下乡知青的任用

关于知青任用程度的具体情况，由于统计材料有欠缺，变得极为复杂。要对具体情况有比较准确的了解，必须区别政治和文化——技术职务的任用、重要职务和次要职务的任用，使下乡知青得以离开其所在的农村地区的任用和没有导致其离开的任用。关于第一类区分，我们应该考虑到，共青团团员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有可能被任用 to 政治职位上，他们也可能成为政治学习或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活跃分子。政治任用还包括被选举到一般的领导和管理工作上，如生产队队长或大队党支部书记。文化——技术职务包括在一些特殊的职位上进行的服务或活动，如：生产队或大队办的学校的教师、“赤脚医生”、农业技术人员、电工、木匠或无线电修理工。文化大革命以来，随着农村教育的发展、医疗水平的提高以及农业技术现代化的逐步展开，产生了更多的文化——技术职位，下乡知识青年占据了其中的一些。

由于下乡知青被任用的职务、所参加的组织以及所进行的活动范围很广，其中显然有主次轻重之分，所以，在重要职位和不重要职位之间也必须进行区分。在区分这两者时，可运用四条原则。第一，如果一个职务或活动占据了某人一天工作中的大部分时间，这种职位就可被认为是重要的；反之，如果它只占用了某人的业余时间，那它就是不重要的。一位在全日制学校中当教师的下乡知青显然比另一位在夜校教书的知青有一个更为重要的

工作。第二，一个重要的职务会使当事人在他所处的群体中的地位得到相当的提高；而一个次要的职务只能使当事人的地位有限度地提高。一位成了赤脚医生的知青能为别人提供急需的服务，所以，比起参加科学实验小组的大群人中的某个人，他的地位就高多了。第三，占据了重要职位的人有可能以不同的但却富有意义的方式来影响农村社区；而占据次要职位的人则很少有这种可能性。一位担任一个生产队队长的下乡知青显然比另一位成了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的知青具有影响力。第四，如果知青所任职务、所加入的组织或所进行的活动在数目上是受到控制或有限的，而且，任用过程中也是经过反复筛选的，这种职位就可被认为是重要的。在某些情况下，对知青在一些不重要的职务上的任用是通过自荐进行的；下乡知青会自愿地从事于某些活动。与此相反，选举某位知青担任一个生产队的队长却是一项重大的决定。同样道理，加入共青团比加入中国共产党要容易得多。

需要强调的是，次要的职位并不是不重要的。弄清成为积极分子的下乡知青的人数可以为弄清他们中愿意在农村好好适应的人的比例提供一个指数。测定知青中政治活动的活跃程度也可为将担任重要职务人数的多少提供一个指数，因为政治活动的表现一般不仅是政治任用的主要因素，而且也是文化——技术任用的先决条件。另外，次要职务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可能是“次要”的，但是它们一旦溶合成一个集体，就可能会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举一个很好的例子，如一个知青的科学实验小组成功地使一种改良过的小麦品种适应了当地的条件。

正如以上所指出的，在所有的情况下都作出职务的轻重之分是很困难的，有许多主观的判断会不可避免的加入进来。在作此区分时，如果一个职位或活动符合了可以作为重要职位的四条标准中的一条，它就能在多数情况下，但不是在所有情况下会被划入重要职位的一栏。表 11 作了具体的说明。

表 11 对重要和次要职位的任用

	重 要	次 要
政 治	大队党支部书记 生产队长 共青团支部书记 中国共产党党员 干部	共青团团员 毛泽东思想宣传员 批林批孔运动积极分子 积极分子
文化—— 技 术	赤脚医生 全日制学校教师 农业技术人员 拖拉机驾驶员 电工 木匠 生产队会计	科学实验小组成员 夜校老师 商店售货员 记(工)分员 出纳

第三类区别，即，使知青在其所在的农村单位的内部调动的任用和调离其所在的农村单位的任用之间的区别，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力图离开农业单位的动因可能会影响知青对在农业单位内部调动的态度。在农业单位内部的调动包括公社三级职务中某一级的工作或职务的变动，或在国营农场和解放军农场内部的调动。它不仅包括那些被委任的职位，也包括那些被指派去干的工作，如在公社或大队办的工厂中及在公社内部的代销店里干活。离开农业单位的调动我们将在第 6 章中以“重新安排”为题进行讨论，它比较典型地包括以下几种方式，如参军、进工厂工作（在县城或更远的城市里）或推荐到高等院校里学习。在最后一种情



况下，很难进行区分，因为现在一些高校就设在公社里，而且，离开农村到高校学习的知识青年被要求毕业后仍回到原来的农业单位。然而，高校毕业生的安排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知识青年高校毕业后事实上是否真的都回农村仍不清楚，而且，假设他们真的回去了，他们是否回到自己原来的单位即公社里的一个大队，或者被安排担任更高级的工作如在县城工作也还不清楚。下乡知青的这种移动方式我们也将第6章中讨论。有些知青被选入了县级甚至地区级的党委或革委会中，但他们还保持着原来在公社内的职位，在这种情况下，单位内部和单位外部的调动的区分就又难分清了。关于这种情况下的具体事例，我们将在本章讨论。

在讨论趋势和检索数据以前，列举一些新闻媒体中介绍的成功的下乡知青榜样的例子是会有帮助的，它们能够说明，至少在原则上被下放到农村去的青年的机会之门是敞开的：

1、朱克家，1969年毕业于上海的一所初中，然后在17岁时志愿下乡到云南省勐腊县的一个傣族山村。在那儿，他学会了木工活、修理农具和傣语，因而对当地的农民帮助很大。一段时间以后，朱接受了坐落在附近山边，但属于同一大队的一个爱尼族山寨的要求，到那儿落户、教书。他同意离开较为舒适的傣族山寨，参加爱尼族学校的建设，并且为了能在那儿教书，还学习爱尼语，同时，他还为村民们缝制衣服和剪头发。朱成了一位全面的革新者，他把拖拉机介绍到了这个山寨，还参加小水电站的建设。在上海探亲时，他又学会了电工知识。1972年，他拒绝了一次上大学的机会，以便继续能同爱尼族人呆在一起。朱在政治方面提升得很快。我们不清楚他何时加入了共青团，但是到1972年或1973年，他已经成了共青团云南省委的一名委员。同样，他显然只是在1973年4月才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却在同年的8月被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成了唯一一个跻身

这么高位置的城市青年。(另外一位名叫邢燕子的“知识青年”被选为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但事实上她早在1958年在天津完成了她的学业后，就回到了她的农村老家)。，尽管对于朱是否继续留在爱尼族山寨我们还不清楚，但是在1975年他成为大队党支部的副书记以后，他还继续留在这个大队。1974年初，他担任了一个访日青年团的副团长。一年以后，他被选为全国人大（中国的议会）代表和常委会委员。1975年10月，他作为十二位杰出知识青年之一，参加了关于农村发展的全国会议。\*

2. 侯隽，于1962年毕业于北京的一所高中，之后就到了河北省宝坻县。很早时，她就非常积极，在众多的活动中担任了领导职位，如组织夜校，进行广播站的工作、出墙报和组织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小组。她参加了一个科学实验小组，并在1965年成了这个小组的带头人，这个科学实验小组在使其所在的大队从缺粮到余粮的转变过程中作出了贡献。侯隽在文革前就是一个著名的榜样了，据报载，她曾经拒绝了文化界重要官员周扬（文革高峰期被清洗）要她离开农村，成为一名专业作家的邀请。文革时，有人攻击她受了敌人的“蒙骗”，并把她称为是邪恶势力，但是最后她还是得到了贫下中农的支持。在劝说在农村呆了三四年的知青继续留在农村的过程中，她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最后，也许是在文化大革命后，她成了所在大队的支部书记和革委

---

\* 朱令人瞩目的升迁也许不仅同他所取得的成就有关，可能与他同权力阶层的联系也有关。朱克家来自上海，上海是1976年10月初清除的“四人帮”的政治基地。事实上，“四人帮”曾被指控利用某些下乡知识青年，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个支持自己的网络体系。然而，正如1977年1月所发生的事情那样，朱的名字并没有被显著地同“四人帮”联系在一起，本章中所提到的其他著名的下乡知青同“四人帮”也无明显的联系。（关于这个问题，可同第6章最后一部分对比阅读。）

会主任，同时，她还是公社革委会以及县党委和革委会的副主任。，

3、董良翮，1965年从北京的一所高中毕业，之后下乡到河北晋县。他干活很卖力，掌握了各种农活技术，他在动员知青伙伴们建造一个猪圈、饲养禽畜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他也拒绝上大学或参军。为了替农民治病，他又学了针灸。他于197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1年成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1972年成了书记。作为大队领导，他又深入到一个落后的生产队中，同该生产队的干部一起工作，使该生产队成了一个先进生产队。1973年，他又同时成了公社党委书记。，

4、金士英，1969年5月，年仅16岁，初中还未毕业，就志愿同她的哥哥金训华一起，从上海下乡到黑龙江。三个月后，她哥哥为了抢救集体财产而牺牲了生命，并成了一个全国知青们学习的榜样。他留下了一本著名模范战士雷锋式的日记。他的妹妹在进行英雄式的工作和“虚心接受再教育”方面同他展开了比赛。1970年秋，当她在国庆节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时，她已成了大队共青团支部书记和革委会副主任。她于197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立即就当选为县委和地委委员。她仍然保留着团员和团支书的职位，而且在1973年5月担任了共青团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的职务。，

5、齐笑冬，于1968年从天津下放到吉林省的科尔沁右翼前旗，这儿是一个紧靠外蒙的草原地区。齐居住在一个以牧羊为业的公社里。她学会了蒙语，而且同别人一起承担了一项培育优良绵羊品种的任务。1970年，她成了大队育种站的负责人，她花了四年时间来完成此项工作，同时还完成了别的兽医任务。她的工作非常成功，1973年时，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4年2月成了公社党委副书记。从那以后，她的职责又有了变化，因为她在1973年加入了公社的民兵骑兵，她开始同武装部的领导一起

组织民兵学习和训练。作为公社党委的代表，她又帮助她“蹲点”的各大队设立了文化机构和夜校。齐也几次放弃了到工厂工作或上大学的机会。1975年1月，他出席了吉林省和天津市的先进知青集体和个人代表大会。

这些例子表明，下乡知青成为农民多面手和领导、克服性别和民族（汉族知青下乡到少数民族居住区）的障碍以及提升到权力机构或高级职务的可能性原则上是存在的。这些例子还表明，“成功之路”是非常不同的。其中一些人同时进行多种政治和文化——技术活动；其他一些人则是相继担任不同的角色。有的拒绝了重新安排工作的机会，从而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愿意继续留在农村的承诺。关于重新安排工作问题，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几部分中再次提到。

#### A.趋势和概况

知识青年的任用在文化革命前便受到了相当的重视，文革开始后几年曾被忽视，70年代初以后又受到关注。1966年以前，能被国家任用是用来引导城市青年自愿下乡接受再教育的一种刺激方式。1964年上海报刊上出现的这段报道非常明显地表露了这个目的：

1958年下乡到湖北大同湖国营农场的200名上海青年中，有160人成了干部和技术人员。1955年到江西共青农场的91名上海青年中的将近90%成了干部和技术人员。去年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的知识青年中15%多被评为“五好”工人……在不少农村地区的公社和生产队里，知识青年做着会计工作；许多知识青年被老农称赞为“可以依赖的会计”、“好干部”和“好管家”。这一切都非常令人鼓舞。

文化大革命后，吸收好斗的红卫兵到农村去成为主要问题，因此，再教育比任用受到了更大的重视。另外，政治气候对任用之风也不利，因为所谓的刘少奇用刺激法，包括职务调动去腐蚀青年的做法，受到了批判。“但是，由于时间的推移，也由于一些知青以努力工作和“虚心接受再教育”表现了自己，任用问题又被提上了日程。林彪的下台为人们批评他给利用知识青年的技术才能设置障碍提供了一个机会。利用知识青年的才能，特别是“那些在农村经受了几年锻炼，思想已经得到转变”的知识青年的才能，又成了新闻媒体的一个重要议题。”（参看表 12）

表 12 新闻媒体关于任用的报道 \*

(1) 年	(2) 有关知青 的文章数	(3) 提到政治 任用的次数	(4) (3)栏与(2) 栏之百分比	(5) 提到文化-技 术任用的次数	(6) (5)栏与(2) 栏之百分比
1968	187	34	18.12	12	6.4
1969	385	110	28.6	94	24.4
1970	239	173	72.4	128	53.6
1971	108	94	87.0	46	42.6
1972	212	183	86.3	155	73.1

\*说明：栏（2）数据来自表1。表中的数据是以如下方式得来的。每篇文章都经过检查，以确定是否提了知青的任用。每具体职务在一篇文章中只算一次。例如，如果一篇文章中数次提到知青加入共产党或共青团，只有两次是作数的——一次算作中国共产党，一次算作共青团。数据被分成政治和文化——技术的任用两类。重要和次要职务都包括其中：有关它们的区别，可参看表 18-21。提到回乡农村知识青年任用的地方没有包括进来，对农村知青和城市知青都适用的地方也没有包括进来。

另外，任用问题还是 1973 年开始的改进下乡工作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培养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是必要的，应该吸收那些有条件的人入党和入团，提拔那些出色的年轻人担任各级领导，以便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sup>11</sup>对任用问题的更加关注可以从新闻媒体中对知识青年报道的变化反映出来。

许多省，但不是所有省都公布了有关知识青年任用的数据。由于数据不是在同一时间公布的，所以要建立一个各省任用知青的整体图像非常困难。表 13 列出了 1973 年公布的 13 个省的数据，另外还包括一组 1973 年 12 月公布的全国性数据。

表 13 各省对下乡知青的任用\*

A 报道日期	B 省 份	C 知青 总数	D 中共党员		E 共青团员	
			总数	所占百分比%	总数	所占百分比%
1.71 年 12 月	广西	150,000	200	0.13	7,000	4.7
2.72 年 11 月	内蒙	180,000	4387	2.40	34,545	19.2
3.72 年 12 月	四川	800,000	980	0.12	25,390	3.2
4.73 年 1 月	陕西	140,000	400	0.29	7,000	5.0
5.73 年 3 月	湖南	260,000	978	0.38	26,9000	10.3
6.73 年 5 月	吉林	420,000	2,400	0.57	48,000	11.4
7.73 年 5 月	云南	400,000	4,000	1.00	47,000	11.8
8.73 年 5 月	广东	450,000	4,000	0.89	60,000	13.3
9.73 年 10 月	河南	300,000	1,190	0.40	36,700	12.2
10.73 年 10 月	河北	200,000	1,900	0.95	17,000	8.5

\* 资料来源说明：所有情况下某一省份的数据都只来自于一次报道。一些省份公布知青总数和知青任用人数的时间不同，为了避免引起混乱，这里没有引用这些报道。

- 1、南宁广播电台 1971 年 12 月 21 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2 年 1 月 3 日第 1 期。干部的统计数还不完整，因为不包括生产队一级领导。

续表 \*

A 报道日期	B 省 份	C 知青 总数	D 中共党员		E 共青团员	
			总数	所占百分比%	总数	所占百分比%
11.73 年 11 月	山东	110,000	1,100	1.00	11,000	10.0
12.73 年 12 月	浙江	348,000	1,000	0.29	27,000	7.8
13.73 年 12 月	福建	160,000	1,000	0.63	20,000	12.5
14.73 年 12 月	江西	430,000	1,800	0.42	31,000	7.2
15.73 年 12 月	辽宁	700,000	6,000	0.86	80,000	11.4
16.73 年 12 月	黑龙江	900,000	18,000	2.00	190,000	21.1
17.73 年 12 月	全国	8,000,000	60,000	0.75	830,000	10.4
18.74 年 5 月	安徽	400,000	2,000	0.50	49,000	12.3
19.74 年 12 月	甘肃	100,000	1,000	1.00	18,000	18.0
20.75 年 12 月	新疆	450,000	5,600	1.24	47,000	10.4

- \* 2、呼和浩特广播电台1972年12月22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2年12月29日第251期。这些统计数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有关人民公社的知青,一部分有关军队农场的知青。具体分类可参看表15。干部的统计数还不完整,因为不包括生产建设兵团中班排一级的干部。
- 3、成都广播电台1972年12月21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2年12月12日第248期。
- 4、西安广播电台1972年1月18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1月19日,第14期。
- 5、长沙广播电台1973年3月11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3月14日,第50期。G栏包括教师、赤脚医生、技术人员等。
- 6、长春广播电台1973年5月3日消息,《世界广播综览——远东篇》1973年5月10日第4291期。
- 7、昆明广播电台1973年5月4日消息,《世界广播综览——远东篇》1973年5月12日第4293期。
- 8、广东广播电台1973年5月3日消息,《世界广播综览——远东篇》1973年5月25日第4304期。干部统计数不包括生产队一级的。

续表 \*

A 报道日期	B 省 份	F 领导小组中的成员(或干部)		G 处于文化-技术岗位的知青	
		总数	百分比%	总数	百分比%
1.71 年 12 月	广西	9,000	6.0	n,a	
2.72 上 11 月	内蒙	5,277	2.9	n,a	
3.72 年 12 月	四川	19,163	2.4	n,a	
4.73 年 1 月	陕西	8,900	6.4	n,a	
5.73 年 3 月	湖南	32,760	12.6	36,100	13.9
6.73 年 5 月	吉林	11,000	2.6	n,a	
7.73 年 5 月	云南	200	0.05	n,a	
8.73 年 5 月	广东	20,000	4.4	n,a	
9.73 年 10 月	河南	16,800	5.6	n,a	
10.73 年 10 月	河北	10,400	5.2	30,000	15.0

- \* 9. 郑州广播电台1973年10月9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10月10日第196期。
10. 石家庄广播电台1973年10月11日消息,《国际广播信息社》1973年10月23日第204期。G栏包括教师、赤脚医生、农业技术人员和会计。
11. 济南广播电台1973年11月4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11月7日第215期。G栏包括辅导员、教师、赤脚医生、农业技术人员和拖拉机手。
12. 杭州广播电台1973年12月23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12月27日第249期。G栏包括赤脚医生、教师和会计。
13. 福州广播电台1973年12月22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12月27日第249期。
14. 南昌广播电台1973年12月21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249期。
15. 沈阳广播电台1973年12月22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249期。
16. 哈尔滨广播电台1973年12月21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1月4日第3期。
17. 《人民日报》1973年12月22日。



续表 \*

A 报道日期	B 省·份	F 领导小组中的成员(或干部)		G 处于文化-技术岗位的知青	
		总数	百分比%	总数	百分比%
11.73年11月	山东	6,000	5.5	1,000	0.9
12.73年12月	浙江	10,000	2.9	35,000	10.1
13.73年12月	福建	6,067	3.8	n,a	
14.73年12月	江西	18,000	4.2	n,a	
15.73年12月	辽宁	20,000	2.9	60,000	8.6
16.73年12月	黑龙江	19,400	2.2	n,a	
17.78年12月	全国	240,000	3.0	n,a	
18.74年5月	安徽	20,000	5.0	n,a	
19.74年12月	甘肃	3,000	3.0	n,a	
20.75年12月	新疆	23,000	5.1	n,a	

这些数据提出了许多需要解释的问题。关于重要和次要任用的区别问题，D 栏和 E 栏（即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是非常明了的，但是 F 栏和 G 栏又怎样呢？领导小组的成员（即 F 栏）指的是在革委会、党委或其它领导小组如党支部中任职的知识青年。有时候，新闻媒体中仅以“干部”一词来报道这些相同的数据。因此，F 栏可以看作是表示重要政治任用的数据。但是，这些各不相同的数据有时会把人引向歧途，因为一些报道中包括了农村地区的所有官职，而另外一些却不如此。例如，广西自治区的总数是不完全的，因为生产队一级的干部没有包括进去（参看表 13 说明）。再者，即使所有官职都包括进来了，其数字也可能把人引向歧途，因为正如一些模范知青的简历所显示的，有些知

\* 18. 合肥广播电台1974年5月4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5月10日第92期。

19. 兰州广播电台1974年12月22日消息，1974年12月27日第250期《国外广播信息社》。

20. 乌鲁木齐广播电台1976年2月17日消息，1976年2月19日第34期《国外广播信息社》。

青同时担任了不同等级的几个职务；这就可能导致重复统计。文化——技术职务（G 栏）一般以各种工作的形式出现，但在各个不同的报道中所包括的内容却又互不相同：河北省包括了教师、赤脚医生、农业技术人员和会计，而福建没有包括农业技术人员，但两年后，在福建的一次报道中包括了农业技术人员，但同时又包括了另外几种工作。„我们不清楚，1973 年在福建，知识青年是否有成为农业技术人员的，或者这次统计工作是否非常草率。山东文化——技术人员总数和云南干部总数的偏低，很可能是由于统计不足所致。另一个引起混乱的因素是把一些无关紧要的政治职务算入文化——技术职务类。如辽宁省在文化——技术职务一栏中除列出了 5 项工作外，还列入了“红色宣传员”，这种微不足道的政治职位的列入，使该省的文化——技术任用总数变得不可知了。纠正这些混乱极为困难，它们必然会给我们的分析带来一种不确定的因素。

那么，从表 13 中，关于下乡知青被任用到重要职位上的问题，我们能得到什么认识呢？这些数据表明，知青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数比加入到领导集体中的人数少，而且，就 5 个提供了数据的省份来看，成为领导集体成员的人比获得了文化——技术职位的人少。云南省是一个仅有的例外，但可以肯定，其统计数字是不完全的。知青加入领导集体的人数比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数多，意味着知青更易于获得第二等级的领导职位，如生产队副队长，大队革委会委员，而不能获得最重要的职位。尽管从 60 年代初以来党员的人数大大地增加了——全国党员人数由 1961 年的 1700 万增加到 1973 年的 2800 万——但从生产队一级来看，只有生产队队长才可能是一名党员。„应该指出的是，从本质上说，年轻并不应该成为接受重要任用的障碍，因为近几年的政策强调了领导队伍中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新闻媒体中曾以自豪的口气提到了一些人民公社，因为它们中的 3 个或更多

的主要职位是由 20 几岁的年轻人担任的。„主要文化——技术职务任用的人数比主要政治职务任用人数多，反映了社会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现代化程度的加深又会促使文化——技术职位比政治职位以更快的速度扩展。不过，这一现象除了反映了地方的需要以外，也反映了知青本身的偏好，关于这点，我们将在下文讨论。

把 D、F、G 栏累加，能够得到一个重要职务任用人数的准确总数吗？答案是否定的。就拿中共党员来说，因为他们很可能同时又是领导集体的成员，又占有文化——技术职位。把领导集体的成员和占有文化——技术职位的人数相加也会导致重复计数，因为大队、生产队的会计肯定又是生产队领导集体中的一员。但是，把这两者相加是得到主要任用人数估计总数的唯一办法。在公布了这两栏人数的五个省份之中，我们在把这两栏人数相加后可以看到，这些省里的 1618000 名下乡知青中，有 241260 名即 14.9% 的知青担任了主要的政治和文化——技术工作。得到这两者累计总数的另一种方法是把知青在全国范围内担任领导职务的百分比即 3% 同知青在这五省中担任文化——技术工作的百分比即 10% 相加，得到的总百分比是 13%。尽管数据上存在各种不尽人意之处，但我们可以认为，主要任用人数的百分比在 13% 到 15% 之间还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指数。„

在估计下乡知青所占的主要政治和文化——技术职位时，了解一下这些职位中下乡知青所占的比例将是非常必要的。关于主要的文化——技术职务，很明显，全国性或省一级的系统数据还没有。关于政治职务，我们知道，1963 年时公社一级有 150 万干部，大队和生产队一级有 2000 万“领导干部”。„1973 年担任领导职务的下乡知青有 2 万 4 千人，假定 1963 年时的数据还仍然有效，那么，知青担任的职务只占公社干部的 1.1%，由于一部分知青在军队和国营的农场，1.1% 的百分比实际上还太

高。如果下放知青的主要目的是给农村输入一批新领导和“带来新变化的催化剂”，那么，我们以上的发现和只有 13—15% 的知青被任用到主要的职位上的结果，一定显得有些令人沮丧。但是，如果把下放看作是一个知青面临需要适应重重困难的过程，那么，以上的结果就能被看作是一个重要的成就，它们显示了，面临重重困难，一部分知青——当然，人数不多——仍然表现颇佳。

表 13 描绘的是一张关于知青任用的平面图。表 14 则显示了在一段时间里，整个国家和五个省份的变化情况。让我们看看主要的任用，从全国范围看，中共党员和领导集体中的成员的绝对人数增加了。但是，知青新增加的人数超过了新任用的人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比例有所下降。各省的统计中，也可以看到同样微小的比例下降。例如，辽宁在 1974 年夏和 1976 年夏之间担任文化——技术职务的人数增加了 47000 名，即增加了 58%，但知青在该职务中所占的比例却由 11.3% 下降到了 10.3%。辽宁的情况符合新闻媒体中体现的精神，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下乡知青应该被任用。因此，在这两年之内，知青中的党员人数增加了 126000 名，或增加了 121%，知青的干部人数翻了一倍。这些增长足以抵消辽宁下乡知青人数的增加，因此，以上两类人中知青所占的比例有了增加。

但是，正如我们从表中可以看到的，在一些省份，知青受重要任用的绝对人数下降了，这是什么原因呢？E 栏，即领导集体的成员的数据表明，内蒙古、河南、湖南和广东的人数都减少了。河南和湖南的党员人数先下降，而后又上升了。河南在 1973 年到 1975 年间，知青担任文化——技术职务的人数大大地减少了。值得附加说明的是，任用人数的绝对下降在其它省份也出现了。例如，1975 年 1 月吉林有 9000 名知青党员，但到 12 月只剩 3000 名了。”

表 14 不同时间里对知青任用的变化\*

A 报道日期	B 知青 总人数	C 中共党员		D 共青团员	
		总数	百分比%	总数	百分比%
全国					
1.1973 年 12 月	8,000,000	60,000	0.75	830,000	10.4
2.1974 年 12 月	10,000,000	70,000	0.70	1,480,000	14.8
辽宁					
1.1972 年 11 月	1,000,000	5,000	0.58	19,000	1.9
2.1973 年 12 月	700,000	6,000	0.86	80,000	11.4
3.1974 年 8 月	720,000	10,400	1.40	158,000	21.9
4.1976 年 7 月	1240,000	23,000	1.85	339,000	27.3
内蒙古					
1.1972 年 12 月	180,000	4,387	2.40	34,545	19.2
2.1975 年 9 月	210,000	7,400	3.50	53,000	25.2

\* 资料来源:

全国: 1. 《人民日报》1973年12月22日。

2. 《人民日报》1975年12月23日。

辽宁: 1. 沈阳广播电台1972年11月15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2年11月29日第226期。

2. 沈阳广播电台1973年12月22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12月27日第249期。

3. 沈阳广播电台1974年8月5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8月8日第154期。

4. 沈阳广播电台1976年7月13日消息。

内蒙古: 1. 呼和浩特广播电台1972年12月22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2年12月29日第251期。

续表 \*

A	B	C		D	
报道日期	知青 总人数	中共党员 总数	百分比%	共青团员 总数	百分比%
河南					
1.1973 年 1 月	240,000	1,072	0.45	22,334	9.3
2.1973 年 10 月	300,000	1,190	0.40	36,700	12.2
3.1975 年 1 月	360,000	835	0.23	58,354	16.2
4.1975 年 4 月	360,000	3,200	0.90	58,300	16.2
湖南					
1.1973 年 3 月	260,000	978	0.38	26,900	10.3
2.1973 年 9 月	280,000	940	0.34	26,900	9.6
3.1973 年 5 月	450,000	950	0.21	52,400	11.6
广东					
1.1973 年 3 月	450,000	4,000	0.89	60,000	13.3
2.1975 年 5 月	560,000	4,000	0.71	70,000	12.5

\*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1975年9月15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9月 29 日第 189 期。

河南: 1. 郑州广播电台1973年1月6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 1 月 12 日第 9 期。

2. 郑州广播电台1973年10月9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10月 10 日第 196 期。

3. 郑州广播电台1975年1月14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1月 16 日第 11 期; 郑州广播电台 1975 年 1 月 16 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 年 1 月 17 日第 12 期。

4. 《人民日报》1975年4月10日。

续表 \*

A 报道日期	E 领导集体中的成员		F 担任文化—技术职务者	
	总数	百分比(%)	总数	百分比(%)
全国				
1.1973 年 12 月	240,000	3.0	n. a	
2.1974 年 12 月	290,000	2.9	n. a	
辽宁				
1.1972 年 11 月	n, a		n. a	
2.1973 年 12 月	20,000	n. a	60,000	8.6
3.1974 年 8 月	33,000	4.6	81,000	11.3
4.1976 年 7 月	66,000	5.3	128,000	10.3
内蒙古				
1.1972 年 12 月	5,277	2.9	n. a	
2.1975 年 9 月	3,200	1.5		

\* 湖南: 1. 长沙广播电台1973年3月11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3月14日第50期。

2. 长沙广播电台1973年9月25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10月3日第192期。

3. 长沙广播电台1975年5月7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5月9日第91期。

广东: 1. 广州广播电台1973年5月3日消息,《世界广播综览——远东篇》1973年5月25日第4304期。

2. 广州广播电台1975年5月8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5月9日第91期。

续表 \*

A 报道日期	B 领导集体中的成员		F 担任文化—技术职务者	
	总数	百分比(%)	总数	百分比(%)
<b>河南</b>				
1.1973 年 1 月	n. a		100,000	42.0
2.1973 年 10 月	16,800	5.6	n. a	
3.1975 年 1 月	11,884	3.3	40,900	11.4
4.1975 年 4 月	11,800	3.3	40,900	11.4
<b>湖南</b>				
1.1973 年 3 月	32,760	12.6	36,100	13.9
2.1973 年 9 月	13,785	4.9	n. a	
3.1975 年 5 月	16,400	3.6	44,000	9.8
<b>广东</b>				
1.1973 年 3 月	20,000	4.4	n. a	
2.1975 年 5 月	15,000	2.7	n. a	

关于以上任用人数绝对下降的最简单的解释是数据收集程序的变化。如湖南省 1973 年 3 月到 9 月间，领导集体中的成员下降了，但这却是统计过程中的人为原因所致，因为 3 月份的报道包括了生产队一级的干部，但 9 月份（以及 1975 年 5 月）的报道却不包括这一级的知青干部。尽管如此，河南省文化——技术职务任用人数的下降不能仅仅用统计中包括或不包括了某类工作来作解释；下降的原因更应该归于对下乡知青和回乡农村青年学生的更仔细的区别上。„1975 年的报道称有 500 万的回乡农村青年和 36 万下乡知青，而 5 月份报道的数据却只适合于下乡知青任用的统计。



关于任用人数绝对下降的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老知青被重新分配回城镇工作，即 1968 年和 1969 年下乡并在 1971 年或 1972 年受到任用的知青后来被送到高校学习或城镇工厂工作，新下乡的知青由于不能被任用到重要的职位上，所以不会在统计数据中显示出来，成功知青的重新分配事实上已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参看下文）。这种解释方法似乎可行，但表中有关重新分配和任用人数下降之间关系的直接证据却没有。■对于任用数下降或某些情况下非常缓慢的增长的另一种解释是由于职位的正常调动。例如，生产队和大队干部每年或每半年选一次；任期满后，一些知青无疑会回到全日制农业劳动岗位上去。综合以上诸条因素，也许可以解释知青任用人数的绝对或相对下降的原因。

通过对表 13 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1973 年，大约有 13—15% 的下乡知青被任用到一些主要的职位上。表 14 的 E 栏和 F 栏又为我们提供了辽宁、河南和湖南 1975 年或 1976 年的数据，中共党员的数据不能包括在内，因为其中存在重复统计。得出的结论是，1975 年或 1976 年这三个省主要任用人数的比率是 15%（即在 2,050,000 名下乡知青中，有 307,100 名受到了主要任用）。因此，1973 年以来任用情况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只有一小部分下乡知青担任了主要职位。由此，新闻媒体继续号召“积极”任用知青也就不足为怪了。■

由于有大规模的新知青下乡，被任用到主要职位上去的知青的比例至少暂时下降了，因此，换一种计算比例的方法也许更有意义。例如，辽宁省 1976 年领导集体成员和文化——技术职务任用的比例如果以 1973 年的知青总数，即 70 万进行计算，那么主要任用人数的比例就是 27.7%。再如河南省，把 1975 年的任用数和 1973 年 10 月的知青总数相除，得出的比例是 17.6%；又如湖南省，把 1975 年 5 月的任用人数和 1973 年 3 月的知青总数相除，得到了 23.2% 的比例。然而，进行此类统计时，得到

城市知青返城和新下乡的准确人数无疑更为重要。

在全国和省级的统计数中，青年团员的人数是次要任用的一个主要指数。表 13 和表 14 表明，共青团员人数总是多于中共党员人数。它在大多数情况下也超出了干部的任用人数。这一情况并不奇怪，因为共青团本来就是一个年轻人的组织。”对加入共青团的知青人数，我们也很难找到比较指数。1964 年，有 13% 的农村青年加入了共青团，但当时这个比例被认为太低了，于是就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人团运动。”我们也不知道 1974 年有多大比重的农村青年被允许加入了共青团，但以 1964 年的标准来判断，14.8% 的下乡知青入团率应该被认为是偏低的。1973 年，辽宁省全体青年中有 28.3% —— 即 600 万中有 170 万 —— 加入了共青团，与此相对照，辽宁的下乡知青中只有 11.4% 的人属于团员。”将近 3 年后，即到了 1976 年夏天，该省下乡知青中的团员比例便上升到 27.1%，但是全省青年中团员所占的比例却不清楚。

共青团员的数据既夸大又缩小了下乡知青中次要任用的实际程度。一方面，许多共青团员可能已经被计算到主要栏目如领导集体的成员或文化 —— 技术职位占有者中去了。另一方面，由于青年必须在某些方面表现了积极性才能被吸收加入共青团，所以在任何单位，积极分子的人数一般都应该比共青团员的人数多。例如，1975 年 3 月河北省 200,000 名下乡知青中，有 20,000 名共青团员，但有 40,000 人被称为“马列理论学习积极分子”，有 20,000 人被称为“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和批林批孔运动中的骨干力量”。”以上数据重复统计的程度很难确定，但有一点却是很清楚的，即积极分子的人数超过了共青团员的人数。省一级的非团员积极分子的人数很少进行统计，如果我们假定每个共青团员的后面至少应该有一名其他政治或文化 —— 技术岗位的积极分子，那么，按全国 10.4% 的团员比例估计，将使次

要任用的比例在 1973 年 12 月达到约 20%，1974 年底达到 28%。这些估计数清楚地表明，下乡知青具有越来越多的参加政治和文化活动的重要机会——如成为政治学习指导员、读报员、无线电广播播音员、夜校教师或参加科学实验小组。

从表 13 和表 14 中可以看出，总体上，13—15% 知青被任用到主要的政治和文化——技术职位上，20—30% 知青受到次要的任用，但各省之间差别很大。这些差别并非由于各省报告发表日期的不同所致，即，早些发表，数字可能会低些，而晚些发表数字则会高些。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 1972 年大约相同的时间里，

表 15 内蒙古地方农村和兵团对下乡知青的任用\*

单位类型	知青总数	中共党员		共青团员		领导集体中的成员	
		总数	百分比 %	总数	百分比 %	总数	百分比 %
1972 年							
生产建设兵团	100,000	3,847	3.80	28,277	28.3	2,702	2.7
地方农村	80,000	540	0.68	6,318	7.9	2,575	3.2
1975 年							
生产建设兵团	200,000	6,500		40,000		640	
地方农村		930		12,900		2,600	

\* 资料来源：

1972 年：据表 11。报道中没有提到国营农场。兵团中领导集体成员的数据不全面，因为没有包括班排一级干部。

1975 年：据 1975 年 8 月 31 日呼和浩特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 年 9 月 19 日第 183 期。报道中说领导集体的成员包括了各个等级的；兵团中领导集体成员降少的原因没有得到解释。

内蒙古有 2.4% 的下乡知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四川却只有 0.12%。另外，除了各省之间有差别之外，同一省内也存在差别，从我们现有的关于一些地区、县、公社以及公社以下组织的统计数字可以证实这点。在有关这些区别的诸多原因中，其中有一个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些统计上的证据，那就是：一些拥有一定规模的生产建设兵团的省份，入党和入团的人数比例就高。正如表 15 所显示的，内蒙古就是这种情况。就党员和团员人数情况来看，兵团和地方之间的差别是很大而且很明显的，但就领导集团的成员来看，这种差别显然不存在。有关文化——技术职务的任用这儿没有。表 16 显示了兵团和地方之间党员——团员比例方面存在的差距在新疆也存在。对于黑龙江省，1974 年 12 月公布的有关全省下乡知青的数据，可以同 10 个月后公布的兵团知青的数据相并置。很明显，兵团对知青的任用大大超过了地方，因为兵团知青的党员人数超过了 10 个月前公布的黑龙江全省的知青党员总数（参看表 17）。由于我们不知道这 10 个月内公社一级的知青任用人数增加了多少，所以难以得出有关这方面差别的准确结论，但毫无疑问，黑龙江省兵团中知青的党团员人数比地方农村中知青的党团员数高。

如何来解释这种差别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兵团中的下乡知青是一群志向远大的精英分子，因此，他们就好比农村地区的下乡知青更具备入党的条件，但是有关这一论点的论据还不充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兵团中已明确了一个事实，即下乡知青是主要的受任用群体，而农村地区中的下乡知青却要同当地年轻人进行竞争，以引起任用者的注意。这也引出了一个假设，即，当下乡知青同当地农民分开居住时比同当地农民混合居住时受任用的机会要多，因为当地的农村领导会更器重本地青年而不是外来者。如果这一假设正确，我们也就能解释第 4 章提到的，提倡在人民公社内单独建立自给自足的知青点的原因了。关于各种居

表 1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地区和兵团对知识青年的任用\*

单位类型	报道日期	知青人数	中共党员		共青团员	
			总数	百分比	总数	百分比
1.新疆兵团	1973 年 5 月	100,000	2,000	2.00	20,000	20.00
2.新疆塔里木盆地兵团	1974 年 5 月	60,000	1,862	3.10	13,500	22.50
3.农村地区	1972 年 12 月	200,000	950	0.48	2,300	1.15
	1973 年 11 月	200,000	3,000	1.50	9,000	4.50

住方式，包括在生产队里混合居住、在生产队或大队设立青年农场或青年点以及在国营农场和兵团里的各种任用方式的资料，目前还缺乏，因此，对这一假设进行全面检验仍不可能。<sup>22</sup>但是尽管它不能被检验，也值得一提，因为它使我们认识到，当地干部和农民的态度是知青任用中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

\* 资料来源：

1. 北京广播电台1973年5月9日消息，《世界广播综览——远东篇》1973年5月23日第91期。
2. 北京广播电台1974年5月5日消息，据《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5月9日第91期。
3. 乌鲁木齐广播电台1972年12月22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1月5日第4期；以及乌鲁木齐广播电台1973年11月11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11月19日第223期。如表15内蒙古的情况一样，农村地区的数据中是否包括了国营农场不清楚。

表 17 黑龙江省全省以及兵团知青的任用\*

报道日期	单位	知青总数	中共党员		共青团员		领导集体中的成员	
			总数	百分比 %	总数	百分比 %	总数	百分比 %
1.1974 年 12 月 22 日	黑龙江	1,000,000	20,000	2.0	200,000	20.0	17,000	1.7
2.1975 年 9 月 18 日	黑龙江兵团	400,000	35,500	8.9	130,000	32.5	13,000	3.3

## B.理不清的情结——农村干部和农民的态度

政策的制定者们鼓励任用下乡知青，但农村的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看来还留有相当的余地。如果根本没有一个知青受到任用，高层的官员就很可能进行干涉，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存在着一套知青任用的指标或一个固定的比例规定，因此，地方的态度就根据各地情况的不同而互有差异。第 4 章中我们已经指出，许多农民对下乡知青心中怀有或表现出了不信任；因而他们不愿在地方上任用下乡知青也就不奇怪了。而且实际上，新闻媒体中也曾引用农民的话，表达了对委任下乡城市青年危险性的担忧。这

\* 资料来源：

1. 1974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
2. 哈尔滨广播电台1975年9月18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9月19日第183期。另一则来自北京的广播称兵团中的知青人数“超过300,000”。参见1975年9月10日新华社电，《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9月19日第183期。

些农民称知青会“带来祸害”、“制造麻烦”而且还“自高自大”。新闻报道认为这些担忧也能通过那些经过努力工作、有良好行为与农民建立了信任度以及在担任乡村次要工作中的知青来消除。”

然而，尽管知青们可能是合格的，但当地人仍然继续反对任用他们，就因为他们认为城市青年是外来者，是一时的过客，他们对农村所负的责任不会长久，正是由于这种态度，导致了如报纸所登载的以下事实：广西壮族自治区六陈县自1969年以来一直居住着5,100名下乡知青，直到1973年年中才仅仅有1人被允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实际上他是到工厂去工作以后才入党的。有些地方干部认为培养下乡知青入党是“自己种树，别人乘凉”，“同样，在吉林省的一个大队里，由于下乡知青被认为是会随时飞走的“飞鸽牌”，所以，尽管该大队50名知青中有10人已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党员们却不愿花费必要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虑他们。”上一章提到过的农民的代价观在这里也很明显，即：为什么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培养知青干部，使别人受益呢？在文化——技术任用中，因为要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在职培训，所以也存在花费问题，这在培养赤脚医生问题上特别明显。既然认为下乡知青没有长期扎根农村的打算，其结果必然是倾向于任用当地青年，因为他们在农村有家庭联系，对他们每个人，人们从孩提时起就很熟悉，而且，他们被认为比下乡知青对农村更具有长远的利益。”

每当对知青任用不利的态度占上风的时候，外来的干预就变得重要了。有这样一件事例：一位下乡知青对当地县委抱怨说，村党支部不愿意任用知青。于是，县党委就派人下去调查，为什么知青很少被任用，并组织基层干部学习有关这方面的政策。”但在吉林省的一个生产大队，党支部发现支部内一些党员干部的态度与上级的要求存有差距，于是，该支部组织干部学习毛泽东思想，向他们反复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任用知青是党的利益

需要，而不仅仅是为了某个特定单位的利益。

希望得到任用的下乡知青一定要表明他们“安心”呆在农村。从现有的材料来看，这是挑选知青的最重要的前提。农民们衡量安心的标准是知青是否努力工作，以及他们在培养同当地农民的友好关系中所付出的努力，特别是他们是否经常离开农村。那些经常离开所在的农村或者回城探亲超期的知青被认为是不安心的，而且也不会被任用。在这一点上，有一个现象值得提出：许多模范青年的事迹总结中都有一条，即放弃了离开农村的机会。放弃进工厂或上大学的机会无疑是一种献身于农村的令人信服的表现，而这种献身的背后，很可能就伴随着当事人在当地有重大的提升。

可以想象，地方的需要会影响干部和农村对知青任用的态度。农村迫切需要有人为它提供文化——技术服务。云南省的模范知青朱克家就是为了满足这种迫切需求才转到爱尼山寨去教书的。但这也并不就意味着城市青年是能够满足这种需求的唯一候选人，其他人也能成为担任乡村教师、赤脚医生、农业技术员或生产队会计职务的人选，特别是回乡农村知青，他们是在公社或县城上了中学以后又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庄去的。福建省南安县从文革开始后共招收了 1400 名乡村教师，其比例情况如下：54% 的教师是“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某种文化水平”的贫下中农；15% 是退伍或特别指派的地方驻军战士；31% 是“劳动了两年以上，表现良好的回乡知识青年。”也许，这个县并没有下乡的城市知青；在别的县，大批下乡知青成为教师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一位被访问者得知，在广东省顺德县的 10,000 名下乡知青中约有 1/4 的人成了教师；而甘肃省会宁县的 5,000 名下乡知青中，有 1,620 名（32%）成了教师。”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观点，即某些地方可能不一定要依靠城市青年，在这个方面，地方的落后程度也许起了一定的作用：那些农民很少有机



会上中学的地区较之教育比较普及的农村地区就会更多地依靠城市知青。我们在第2章中已提到，有相当一批知青被下放到了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在那儿，他们的服务相对说来就没有那么受欢迎。事实确实如此，有一位在比较繁荣和发达的地区江苏省无锡市附近农村担任过干部的下乡知青说，那儿的教师都由正规师范学校毕业生担任，而不依赖于象下乡知青这样的缺乏教学训练的中学毕业生。

从以上有关需求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出，任用者在是否选用下乡知青上是有自己的选择的。除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些因素以外，还有两个因素可能也会影响他们的选择。其中之一是，地方主义并不是在所有农村地区都一样严重。不论是由于政治原因还是现代化的影响，事实上，有些地方的农民并不反对外来者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一位当过教师的知青告诉调查者说，当地青年嫉妒心并不重。他们认为，下乡知青是毛主席派来的，如果他们历史清白，工作能力强，就应该受到提拔。”当地青年反对的只是懒惰知青。第二个因素是，当地农民可能更喜欢任用知青担任某些职位，尽管当地人中也有称职的。一位担任生产队粮食仓库保管员的知青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每到收获季节的晚上，他就对收获的粮食进行归类，其中一部分分给各家农户、一部分上缴农业税、一部分卖给国家。农民们乐意让他去做这些工作，因为他们晚上要到自留地里劳动或从事副业生产。更引人注意的是，有些地方的农民可能还倾向于选举能干的外来者担任如生产队长这样的职务，有些村庄被一些麻烦所困扰，如不同姓氏之间的人相互争斗，这就使得很难选出一位大家都拥护的当地人担任生产队的领导。正如威廉·帕里什指出的，“在那些长年歉收或社会关系很糟的生产队里，问题在于如何寻找人去担任领导而不是如何撤掉一个坏的领导”。”新闻媒体中就报道过知青成为生产队领导，而且带领农民同经济和社会

的落后状况进行有效斗争的例子。

在这些例子中，城市下乡知青也许由于具有更高层的背景而不得被提拔，但至少从本质上说，农民可能从这样的提拔中预想到了自己会得益（参看下文关于领导及其影响的论述）。最后，对基层干部的需要和物质报酬的低下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当地农民愿意让外来者分享它们。

由于缺乏完整的统计资料，我们无法就知青任用的比例与当地青年特别是某些特定群体，如回乡知青的任用比例进行比较。但是，通过各种参照物，包括一些调查性的报道，我们可以得知，城市知青事实上在受任用方面处于一种比较不利的地位。江西省上游县营前中学 1970 年毕业了 135 名农村青年。这些人中，15 人入了军，25 人成了工厂工人。余下的 95 人回到农村后，任用情况是这样的：11 人（占 11.6%）入了党；42 人（占 44.2%）入了团；56 人（占 59%）成了干部或生产队和大队一级领导集体中的成员；26 人（占 27.3%）担任了文化——技术职务。„而在同一个知青群体中，要发现四种职务的任用比例都比较高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回乡知识青年被任用到重要政治职位上去的可能性也可能比下乡知青的高。我们可能举陕西省某公社的情况为例，该公社有两位青年，一位是回乡知青，一位是下乡知青，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乡知青不久就被任命为生产副队长，并且在抗干旱斗争中作出了特殊贡献。下乡知青担任了理论辅导员，白天继续做农活，同时，在晚上辅导毛泽东思想和文化的学习。尽管两人都是党员，回乡知青担任了一个重要职务，而下乡知青却只担任一个次要的职务。„仅仅一个例子不能证明这种状况的普遍性如何。但是新闻媒体中以赞许的口吻进行的分析却说明了在政治任用方面这种区别是存在的。报纸中有关知识青年的文章大多讲的是下乡知青，其中也有一些是涉及到回乡知青的。如果把提到知青政治任用的情况分成主要和次要两

类（如表 18），我们可以看到，提到回乡知青受到主要政治任用的时候总是比提到下乡知青的时候多。如果如表 19 所示的，把农村公社中最重要的五种领导职位，即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大队队长，公社革委会主任和生产队队长列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回乡知青和下乡知青之间在任用上存在更加巨大的差别。

表 18 新闻媒体中关于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任用的报道 \*

年	文 章 数 目	提到下乡知青受 政治任用的情况			提到回乡知青受 政治任用的情况		
		数目	主要任用	次要任用	数目	主要任用	次要任用
1968	187	33	17(51.5%)	16(48.5%)	29	25(86.2%)	4(13.8%)
1969	385	102	40(39.2%)	62(60.8%)	17	11(64.7%)	6(35.3%)
1970	239	165	68(41.2%)	97(58.8%)	22	17(77.3%)	5(22.7%)
1971	108	72	36(50.0%)	36(50.0%)	14	13(92.9%)	1(7.1%)
1972	212	133	96(72.2%)	37(27.8%)	22	22(100%)	0

这些数据表明，下乡知青比起回乡知青来，在乡村的领导职务中，特别是在要求有很高的组织、管理和领导才能，以及具有同农民相处的能力的职务上，受任用的机会更少。但是值得指出的是，1969 年到 1972 年间，新闻媒体中提下乡知青担任五种主要职务的次数增加了一倍，而回乡知青提到的次数则很少有增长。从 1973 年起，报纸中出现了相当一批文章，描述下乡知青担任了生产队长或大队支书，这些材料让人想起，下乡知青担任

\* 说明：该处提到的下乡知青的政治任用仅限农村人民公社，这也是为什么第三栏中总数目比表 12 所列的数目小的原因。

主要领导职务的人数比以前在增加（参看下文关于领导及其影响的讨论）。然而，从总体的角度，并且把先前提到的关于党员人数的统计数字也包括进来，我们可以看到，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下乡知青的绝对人数还是很少的。也许这一状况仍然存在，即，城市知青更容易被接受担任次要的领导职务而不是重要的领导职务。

表 19 新闻媒体中关于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  
担任五种主要职务的报道

年	城市知青		回乡知青	
	提到城市 知青次数	提到担任五 种职务次数	提到回乡 知青次数	提到担任五 种职务次数
1968	33	0	29	7(24.1%)
1969	102	3(2.9%)	17	2(11.8%)
1970	165	5(3.0%)	22	6(27.3%)
1971	72	4(5.6%)	14	4(28.6%)
1972	133	8(6.0%)	22	6(27.3%)

至于文化——技术职务，在主要和次要职务的任用比较上，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之间差别不大（参看表 20）。如果列出五种主要职务——教师、赤脚医生、农技员、机械操作手（主要是拖拉机手）和会计，则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之间的差别比五种主要政治职务任用的差别要小得多（参看表 21）。如果回乡知青在主要文化——技术任用方面的优势已经消失，那么，其中之一的理由就可能是，下乡知青在特殊职务上比起在一般的政治职务上就更容易让当地人接受。在特殊职务上，担任该职务的下乡知青同农民之间的互相影响更多地限于该职务的范围内，同本

地区的各种关系越少，下乡知青就越能更好地完成他的任务。可以肯定，这一观点是同官方所认为的同农民的结合的好坏是能否有效地担当特殊职务的主要条件的政策相矛盾的。此外，还有一些因素，如下乡知青的喜好和能力，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之间在主要的文化——技术任用之间差别不大，以及下乡知青在主要的文化——技术职位任用上的人数比在主要政治职位任用上的人数更多。

表 20 新闻媒体中关于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  
在文化——技术职务任用上的报道 \*

年	下乡知青的文化 ——技术任用			回乡知青的文化 ——技术任用		
	提到 人数	主要任用	次要任用	提到 人数	主要任用	次要任用
1968	12	7(58.3%)	5(41.7%)	19	10(52.6%)	9(47.4%)
1969	89	37(41.6%)	52(38.5%)	19	12(63.2%)	7(36.8%)
1970	122	75(61.5%)	47(38.5%)	14	8(57.1%)	6(42.9%)
1971	37	20(54.1%)	17(45.9%)	13	4(30.8%)	9(69.2%)
1972	120	55(45.8%)	65(54.2%)	9	4(44.4%)	5(55.6%)

\* 说明：如表18一样，提到国营农场和兵团中政治任用的地方已从表中的数据中减去了。

表 21 新闻媒体中关于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在五个主要文化  
——技术职务上任用的报道

年	下乡知青		回乡知青	
	提到的次数	提到 5 个主要职位的次数	提到的次数	提到 5 个主要职务的次数
1968	12	6(50.09%)	19	10(52.6%)
1969	89	33(37.1%)	19	10(52.6%)
1970	122	62(50.8%)	14	6(42.9%)
1971	37	16(43.2%)	13	3(23.1%)
1972	120	45(37.5%)	9	3(33.3%)

### C. 知青的心态种种

下乡知青认为被任用是一件令人羡慕的好事、一种能使他们适应农村生活的积极措施吗？在第 4 章中，我们已提到了一些知青关于农业劳动单调和他们在农村地区地位低下的抱怨，答案已经很明显了。事实上，下乡知青对受任用的反应是非常复杂的；他们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动机和偏好。首先，一些知青把在农村地区受到任用不仅仅看作是在农村中取得的成就，而把它看作对自己返回城市的最终目标具有影响。这使得一些下乡知青对受任用的机会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以图有一份好的简历，从而能被重新安排工作。例如，沈阳郊区一个人民公社的领导“再三纠正下乡知青中存在的错误思想”，即“第一年入团，第二年入党，第三年进工厂”。<sup>11</sup>但是，通过这种走“迂回路线”取得重新安排工作的方法，有时却不一定会产生预想的结果。一位下乡到黑龙江农村的女知青，工作非常勤奋而且在政治上也很积极，最后她被选为她

所在生产队的队长。后来，她看到几位表现明显不如她好的知青同伴或被安排到工厂工作，或被推荐到大学去学习，她就非常失望，感到“先进吃亏”了。一些下乡知青拒绝了受任用的机会，以免对农村担负长时期的责任。有这样一个事例：两位受到农民邀请的下乡知青拒绝担任教师，理由是，如果接受这一职务，他们将不得不在这一地区长期呆下去，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回城。还有一个事例：一位女知青被群众选为妇女队长，她却不愿意出任，因为这会把她“钉在农村”。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有些城市知青认为，哪怕在城里当一个工厂的普通工人，也比在农村当一个基层干部或教师强。另外一些知青则希望得到一些以高一级的教育为基础的工作，所以拒绝受当地任用的机会。一位受到调查的下乡知青讥笑了成为赤脚医生的主意，他说，他想成为一名专业医生，而不是半把子的医生。另一位受调查者曾担任了为县政府服务的艺术工作，他最后逃到了香港，因为他希望在更高一级的学校里发展他的艺术才能。这些反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受任用并不会有利于知青的思想改造，同时，这又在某种程度上吻合了地方上农民的怀疑，即一些下乡知青对农村缺乏基本的责任，因而不值得被任用。

即使回城的动力没有那么巨大，农村地区的各种职位也不显得那么有吸引力。一些知青认为，在农村当干部并不是令人羡慕的工作，报酬很低，要求却很高。当了干部就意味着把晚上的时间也搭进去，因为生产队干部白天全天都要干农活。有一位知青指出，知青中争当生产队干部的动力一般并不高，下乡知青只要出身成份比较好，当生产队干部还是不难的，但是，要当大队特别是公社一级的干部则难多了，因为这些干部是脱产的。另外，生产队干部在事情干糟了时不仅要受到上级领导的指责，而且还会受到农民的指责和批评。许多知青在农村中所处于的边缘的地位，无疑会使他们当领导成为一件极易得罪人或犯错误的非常

棘手的事。如果象第4章中指出的那样，一些下乡知青不愿象普通的公社社员一样，参加农村事务的讨论，那么可以肯定，他们将更不愿意担任某些领导职务，因为这些职务要求他们积极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报刊中登载了一些文章，记述了一些下乡知青被赋予重要责任时害怕得罪农民或犯错误丢面子的情况，这说明上述的这些现象还是存在的。”

绝不是所有知青都对受任用的机会持消极态度或缺乏热情的。从报刊中或对知青调查中得来的数据都表明，许多下乡知青确实希望受任用，而且一旦没有受到任用就会表现出失望。”有一位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的知青承认，在政治职务方面，当了干部确实不会带来什么物质利益，但它能提高你的地位和名誉——从下乡知青的观点来看，这两者都是他们希冀得到的东西。”另一位接受调查的知青工作努力、表现良好，并且被选为代表，到邻近的大队和公社去介绍她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应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经验。但是，据说由于家庭成份问题，她失去了一个在政治的阶梯上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出席一次广东省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如果不存在家庭成份这种标准的话，她就很可能竭尽全力的使自己成为一名政治领导。为了证明鼓励任用知青政策的正确，报刊中刊登了大量对自己所担任的职务表示满意的下乡知青的事例。

那些愿意受到任用的下乡知青更喜欢担任文化——技术职务还是政治职务呢？新闻媒体由于受政治因素的约束，并没有提供很多关于知青喜好的具体信息；但是接受调查的知青确实表示了自己对文化——技术工作的偏好。最受青睐的则是熟练的技术工作。接受调查的知青大多希望成为电工、木匠、无线电修理员、技术员或机械师。他们说，农民尊重这种工作，而且，正如以前已经指出的，具有这种技术（如修理无线电）的知青比较容易同农民形成良好的关系。对熟练技术工作的偏好不仅同下乡知



青在农村的前途有关，而且还同他将来被安排到工厂（如果不是省城的，则至少是有到县城或公社的）工作有关。然而，在接受调查的下乡知青中，实际上除了有一人成为木工以外，再没有什么人成为熟练的技术工人。在国营农场的知青则存在有限的机会，成为熟练的技术工人。某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团中共有2500名知青，其中有约100名知青操作各种机械设备，包括拖拉机、卡车，他们的工作非常令人羡慕。接受调查的下乡知青大部分反映说农村的下乡知青有成为大队学校教师和赤脚医生的。有个别人（包括受调查者本人）成了会计、接生员、公社广播员、乡村艺术家、记工分员和售货员。

担任教师或赤脚医生这样职务的好处之一是它们可以免去一部分农活，而担任干部在原则上是无法免去的。另外，担任这些职务比仅仅只干农活能挣更多的工分，如一位女知青，她当了教师后，工分就从每天7分上升到了9分，仅比一个全（男）劳力一天的工分少1分。但是，担任教师的下乡知青比普通知青受的纪律约束更严，这被一些知青认为是一项缺陷。值得指出的是，教书并不被人认为是一件令人满意的工作。一些接受调查的知青抱怨说，文化大革命使教师的地位下降了，教农民的孩子则是一件相当令人沮丧的工作。然而，尽管这些工作（如教书）不如熟练或技术工作那么吸引人，但还是有人希望去干的。有些接受调查的知青承认，他们的大队只需少量的教师和赤脚医生，因此，给人的机会不多。

对知青的任用促进了知青对农村生活的适应吗？尽管上述材料还不完备，但它们已经表明了，任用并不总是能促进知青对农村生活的适应的，一些曾受到任用，而后却又去了香港的知青其出走的行动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对于那些如报刊上所说的，把任用仅仅看作是获得回城安排机会的一个渠道的知青来讲，任用也并不能促进对他们的改造。与以上这些人形成对照的是，另外

一些知青在受到任用之后，拒绝了安排回城的机会；还有些知青也表现得要在农村的职位上长期干下去。另外，在接受调查的知青中，有些人渴望被任用，但由于机会不合适或阶级成份的障碍而没有遂愿。虽然政策允许任用那些家庭成份不理想但表现却很好的下乡知青，但接受调查的知青却反映说，有些知青尽管表现很好，而且也希望得到任用，但由于阶级成份问题最后却没有获得任用的机会。“如果在实际生活中把阶级成份的标准用得灵活一些，这些年轻人中受调整的比例是会提高的。总地说来，我们可以断定，对知青的任用促进了那些原来就准备努力改造，适应农村生活的知青的决心，正如在第4章中指出的那样，下乡知青是带着不同程度的决心来到农村，并准备克服他们面临的困难的，对于那些愿意下功夫进行改造的知青来说，被安排到重要职位上去的机会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对这种人，受到任用可以促使他们继续呆下去，而且最终可能（虽然不全是）会使他们长期呆下去。

尽管如此，任用机会的增多确实使下乡知青接受改造的程度提高了。也许对政治和文化——技术职务两者都可这样评价。但是技术职务能使农村生活变得更有趣，更精彩和令人满意。然而，从事文化——技术工作的机会在将来是否会大大超过70年代中期的水平还有待于观察。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已经宣称，要到1980年前“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到本世纪末全面实现现代化。因此，特殊的文化——技术职务就会大大增加。正如新的国家主席华国锋在1975年所说的：“（我们要）造就一支宏大的亦工亦农、掌握现代技术的农业机械化队伍。”另一方面，尽管技术上可能实现现代化了，中国的农业还可能会保持其劳动密集型的特点。鉴于此，一些接受调查的知青抱怨说，即使公社使用了化学肥料或发电机、拖拉机和机械，也只需要个别的熟练工人和技术专业人员。”随着现代化的运用，这种状况可能

会得到改变。不过，当农村地区走向现代化时，农民受教育的机会也会大大地增加，这就会（正如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的那样）进一步限制下乡知青受任用的机会，当然，知青和农民分开居住的地区除外。因此，从长远看，知青被任用到主要的文化——技术职务上的人数可能会增多，但大幅度增加的可能性则不存在。

#### D.再教育与再学习

当一个地区走向现代化并且可以提供越来越多的文化——技术职位时，下乡知青受任用的一个障碍就可能是没有足够称职的人选来担任这些职务。那些极想得到熟练和技术工作的下乡知青大部分首先得接受训练。在过去的几年里，农村地区学习技艺的机会增多了，本节是对这些机会的考察和分析。

首先，对城乡青年的教育状况和城市学校为农村工作培养青年进行的努力作一评价。下乡知青同自己本生产队或大队的同龄人比起来，受教育的优势是很明显的，因为后者一般都只上了小学，而下乡知青大多是中学毕业生，包括初中、高中或文化革命以来广泛设立的联合中学的毕业生。在大队学校中受过教育的农村青年并不都实际上完成了小学学业，因为退学率非常高。事实上，许多大队办的学校也开始提供一年两年的中学教育了。如果乡村青年的教育水平普遍比城市青年的低，那我们在比较下乡知青和中学毕业的回乡农村青年时，就不能把两者等同起来了。如果具备材料，我们就可以证明，下乡知青受过高中教育的人数确实多于回乡农村知青。来自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或各大省城的知青在所受教育的质量上也超过了在公社或县城的中学里上学的回乡农村知青。大城市里的学校具有更好的教学设备，学生也

能接触到更多形式的文化娱乐方式。\*

如果说下乡知青在学业上比回乡农村知青确实存在某种程度的优势，那么，这种优势并不能促使他们在担任农村职务时变得更为称职。尽管政治和道德水平都符合了，在学校中取得了好成绩的下乡知青也很少有因此而直接被任命到农村职务上的，如生产队会计和民办教师。乡村民办学校的教师一般只有中学毕业程度。有一些是高中毕业生，有的也只有初中毕业程度。但是，对于大多数另外类型的文化——技术工作来说，其主要的要求不是达到知识的某种抽象的水平，而是对知识的运用能力。这些工作要求人们具备具体的技术和技艺，也正是在这方面，下乡知青常常遇到问题。例如，1970 年有 17 名湖南省长沙市的知青下放到了该省偏僻山区的会同县。对于这些知青的到来，农民们显然非常高兴和欢迎。他们把建造一座水电站和一个大坝（两个工程都不大，其形式在中国非常普遍）的任务托付给了知青。但是，这些长沙来的知青却一点也不知道如何去干。后来，大队买来了一些化肥，并让这些知青去使用它们，知青们又做错了：他们不仅浪费了肥料，还毁坏了庄稼。下乡知青刚到农村时，他们经常抱着一种在城里人心中比较普遍的态度：“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将会被下放到农村去，我们就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去读书了。”<sup>11</sup>现在，他们的失败使他们认识到，知识即使是在农村也是重要的。

---

\* 在对下乡知青所受教育程度进行估价时，另外一个必须考虑进来的因素是文革时期教育所受的干扰。1966 年中断了中学教育的青年一般被称为 1968 年（即在他们被下放到农村去以前）的毕业生。不管他们是否只上了一年高中，这种所言和所实之间的差异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红卫兵那一代的城市青年在适应农村生活中存在很大的困难。据闻，有些农民抱怨说，城市中学的“毕业生”比小学毕业生所知道的东西还少。

而且，实际上他们还需要另外的实际应用知识。大队党支部也认识到了下乡知青不仅需要学习政治，而且还需要学习技术知识。因此，青年们开始每周学习两个晚上，每个月又加学一整个白天。在经过对设计和测量适当的学习、实践，并获得一定的技术后，他们就能够建造水电站了。

经常可以听到有人抱怨，学过化学的中学生不会使用化肥，学过物理的中学生又不会修理电动机，这种对文化革命以前教育的批评意见非常普遍，因为那时的学校教育偏重理论而忽视了实践。以上所举文革后毕业生所遇到困难的事例说明了“教育革命”并非在任何地方都产生了同等强烈的影响。一些城市的初级中学在课程职业化以便同农业有更大关系的改革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例如，天津一所中学在给学生讲授生物课时，传授一些同农业有关的、将来下放到农村后可能会遇到的具体知识，如试验田的管理。他们讲物理课时，传授一些同农村电气化有关的知识。福建省福州市二十五中高中学生每年要在农村的分校中呆六个月，这六个月中，一半时间用来参加体力劳动，一半时间用来学习。学生们就能把物理或化学课中的知识同农业生产联系起来。但是，这样的例子也许是很少的。在学校的正常授课时间已经大大缩短的情况下，要学校既传授基础理论知识，又把它们同实际联系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学校处在城市中，其课程内容更容易同附近的工业生产产生联系。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人们批评说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并没有得到正确的落实，甚至遭到了歪曲，与此同时，这场运动促使一些城市设立了短期学习班，教给年轻人一些在农村派得上用途的具体的本领。例如，广西的南宁二中为 900 名将要从初中和高中毕业的学生安排了 24 次有 11 种科目的为期两周的学习班，学习班讲授的专业知识包括木工、电工、园艺、兽医、植保、建筑工程和规划、农业器具的使用和维修、农业会计（包括珠算）、有

线广播网的架设和收音机的安装维修等。授课的老师来自南宁的各企事业单位以及各所高校。学生们要求“初步掌握”有关专业的“基本知识”。“这些短期培训班的目的在于弥补即将下乡的学生们平时所学必修课的明显不足。

许多城市学校的学生在承担农村的多种文化——技术工作以前都毫无准备，除非学校为毕业生作了较好的准备。由于人们批评县级学校也不正规，所以，在远离家乡的中学就读的农村青年也有可能未被教授农业专门技术知识。“这或许可以说明在表 20 和表 21 里，为什么在提到对主要文化——技术职务的任用时，回乡青年也没有被比下乡青年有更多的提及。当然，回乡青年仍然有许多非下乡青年所能比的优势，他们对地方上的情况更熟悉，也更容易适应家乡的生活。但无论是城市青年还是回乡青年，在到了农村后，都要接受培训，以便能胜任文化——技术工作。

过去几年里，在乡村学习文化——技术的机会要比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增大了许多。这并不是说那时根本没有机会（如在农村的保健方面就培养了大量必需的赤脚医生），而是说，正规培训的机会要比现在少得多。“文化——技术方面的技艺大多是个人或集体在乡村里边做边学中非正式地得到的。广泛学习正规技术的时机尚未成熟。文化大革命之后，下乡青年的政治再教育被强调起来，而文化——技术的学习却受到了质疑，这仅仅是因为刘少奇曾经主张为了让青年人接受改造，可以为他们提供一次在乡下继续学习的机会。“到了 70 年代，当政策上越来越强调下乡青年应对农业现代化作出贡献时，人们又开始对文化——技术的学习发生了兴趣，这可以从对林彪的檄文里看出来，他被谴责兜售“读书无用”、“技术无用”、“政治代表一切”及反对“又红又专”的模式等滥言。“为下乡青年建立半日制学习所受到的另一个阻力来自一些地方官员，因为他们对知青下乡运动是

否长久不变表示怀疑。”

由县、公社、军队农场和城市机关制订的正规学习计划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从 1971 年起就开始了，1973 年以后则被广泛地推广开来。”较早的一次尝试是在 1971 年 11 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党委发起了一场在下属单位建立“红专”夜校的运动。一年之内，有三分之二的下属单位事实上已经行动起来了。所授的技术课程有农业机械、农业、畜牧业、林业、医疗和卫生保健。下乡青年们学习这些科目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但上面要求把重点放在应用上。因而在收割麦子时节，机械课又讲授了如何预防机械的损坏，在农闲季节则讲授机械保护知识，包括老工人和有实践经验的技术员在内的老师们，对学生们进行技术指导，他们自己也边教边学。有报道说，这些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这个部队的十六连有 55 名青年参加了夜校学习，其中有十三个青年学会正确使用和保养机车，有二人担任了“东方红”拖拉机驾驶员，有三人可以单独驾驶“康拜因”，一人学会电焊技术，二人学会挂马掌、钉马钉，三人学会制造“5406”、“920”菌肥，两人学会搞小麦杂交，四人学会配制波尔多液、硫磺合剂和果树治疗，一人学会给猪打针，一人当了兽医，一人学会开榨油机。”

1975 年，中国的报刊新闻广泛地报道了设在县、公社，甚至大队里的既吸收农民也吸收下乡青年的农业大学的情况。比较典型的是位于辽宁省偏远的朝阳县的朝阳农业大学。它的目标是把学生们培养成“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和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及知识的新农民”。其重点放在短期培训班上：从 1970 年到 1975 年，朝阳农大培训了 10,000 名技术人员，而毕业的正规大学生只有 167 名。学生们不交家庭作业本，他们仍是各自公社的成

员。他们不像大学毕业生那样进行全国统一分配，而是回到各自的大队和生产队当农民。因而，他们并不存在象正规高等学校的毕业生那样，接受提拔，有离开农村地区的可能。”在其他地区，地方上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增多（如河北建立了90个此类大学，招收了20,000名学生），起初是为了方便在农村基层单位内的业余学习。”例如，1974年秋，位于上海郊区的10个国营农场一起联合办了一所有3,000名学生的业余大学，从干部、老农、技术员和城市青年中招来了近300名教师，每周有两至三晚上课，学习期限约一年。课程包括政治、语文、农作物管理、工业基础、灌溉、家畜喂养以及革命文学和艺术。”

除了地方上的学校外，自1973年起，由城市里的学院和大学开设的函授课程也成为农村人受教育的一个重要的机会。有些城市象哈尔滨、上海、武汉、昆明和成都的高校已开始开设函授课程，但最初并不是专门为下乡知识青年而开的。在哈尔滨，市下乡知识青年办公室和教育局于1973年11月建立了一所函授学校。它由包括下乡知青代表在内的革命委员会开办，学校聘用了来自东北农业学院、省农机学院和市科学技术局的136位老师。参加的公社和国营农场为函授学习成立了“领导小组”，到1974年6月，有3,300个学习小组计15,000名下乡和回乡知青被吸收了进来，他们在各地安排的学习监督员的监督下于农忙季节每周学两个小时，农闲季节每周学四个小时。公共课是政治、语文和数学，专业课是政治、蔬菜种植、农村电工，还有机械、家畜喂养和牲畜疾病防治。”

随着在农村地区的学习机会的增多，书籍和学习材料的供应也大大增加了。在1973年的改进运动期间，出版社和新华书店都把注意力放到了下乡青年的需要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二十种自学书籍，这一经验被公布推广，农村的各个地方也都为下乡青年配备了图书馆和阅览室。”到1973年10月，黑龙江生产



建设兵团四分之三的连接建立了阅览室，农村公社中下乡青年居住区有三分之二的地方设置了阅览室，而十分值得注意的是，1973年以前根本就没有考虑下乡青年对政治、文化、技术和科学读物的需求。”江苏省射阳县新华书店还组织了七个流动服务组到下乡青年的居住区去，帮助他们建立阅览室，并特别提供适应地方上农作物栽培情况的技术书籍。”显然，为乡村受过教育的青年提供书籍热并不是暂时的，它将保持下去，而且侧重在提供技术教材上。”

后来，有些下乡知识青年得到了在城市里暂时学习的机会。这些机会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有可能在城市的学院或大学里整整学完三学年。当然，那些被送到城市大学里的下乡青年学习的可能是同农业有关的课程，也可以认为，他们毕业后若仍回乡村，也许能胜任比本章所描绘的那些由医生、农艺师、工程师和公社中学教师所占据的更高级、更专业化的职务，由于我对这些假设尚存疑问，故而关于下乡青年在城市高校学习的问题将放在第6章作为再分配问题的一部分加以讨论。在这里，让我们看看由上海等城市发起的为离城的下乡青年提供短期培训的计划。由于许多上海青年被送到了很远的省份，象黑龙江、新疆和云南等，他们每两年的冬季有4到6周长的探亲时间，这就为安排他们学习政治文化提供了时间。1973年，乡政府、街道委员会、中学和工厂举办了从微生物的利用到理发等十个科目的学习班。在1973年到1974年间，大专院校为下乡知识青年开设了一系列讲座，聘请了173名专科教师任教，有100,000到150,000名下乡青年参加学习，其中近10,000名上了关于乡村图书保管、中草药和针灸的短期课程。1975年，工厂企业也开始行动起来，计划培训下乡知识青年学习各种技术知识。”

在估价所有这些教育计划的作用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对这些计划起制约作用的各种因素。首先，除了一两项计划外，这些计

划大多是既针对城市青年，也针对农村青年的，而其中下乡知识青年的比例我们并不清楚。在选择培训学员时，本地青年可能会受到优先照顾。”其次，我们并不知道培训的质量如何，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能学到多少东西明显是值得怀疑的，即使是业余学习，有一部分可利用的时间也被用到了政治上，这就减少了学习专业知识的时间。（一般来说，除了专门对全体下乡青年所安排的少量政治学习外，参加有组织的政治学习如“政治夜校”的机会很可能要比文化——技术的学习机会多。）第三，我们不清楚那些被培训的青年实际上是否在做他所学的那种工作。只有少数几个计划考虑到了要事先对需求进行调查，培训计划和实际需要在很多情况下很可能是脱节的。

尽管如此，这些计划总的来说仍有可能产生积极的效果。首先，从农村现代化的观点来看，它们反映出一种现实主义态度，即对专业人材的大量补充主要不是需要修满了学业的大专院校毕业生，而是需要那些接受过短期培训，能够把知识运用到一定的具体工作岗位上去的人材。这并不是说农村不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有大学文化水平的专业人材。在中国，此类专业人材可在较高层次的农业机构里，尤其是在县里和公社里找到。”然而，研究一下教育和农村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就可看出，为了能够对日益发展的农业有所作用，这种专业人材必须同受过技术训练和实际操作现代机械的人共同工作，通过他们，专业的知识就可以广泛地普及到农民中去。”这些计划大大扩大了乡村级的专业人材的数量，就此而言，农村现代化也被向前推进了。

其次，接受过培训并被任用承担专业性任务的下乡青年有可能比那些没接受过培训的下乡青年更能适应乡村的情况。那些能够修理拖拉机发动机或者算出复合肥料施到各类作物上去所应有的含量的青年，会有一种从工作中得到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有报道描绘说，在黑龙江军垦农场的红专学校里，当下乡青年们认识

到农业并不仅仅是体力劳动时，他们的情绪高涨起来：“他们越学越觉得自己懂得少，越学越觉得农业有钻头，农业有奔头。”学习专业知识和技术的机会增强了他们的适应性：“夜校加深了他们扎根边疆的思想，使他们更加热爱本职工作。”<sup>11</sup>如果情况真是如此，外界观察家们就只能对扩大城市青年受教育的机会为什么花费这么长的时间才到来感到惊奇了。

## 2.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力军”

中国领导人的目的是彻底改变农村的面貌，总起来说，它可称为“发展”。变化既是政治性的变化，它们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形式、价值和实践的愈益制度化；变化也是文化的变化，目标是拓宽农民的视野，提高他们的理性思维和吸收新思想的能力；变化还是技术性的，目标是广泛提高先进机械的利用率，把它们运用到农垦上去。变化又是有形的，为的是改变农村的“面貌”，其样板便是有名的大寨大队，它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大大改变了荒芜的山地，获得了高产。毛泽东的口号“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概述了这些变化的内容。<sup>12</sup>

城市青年对这些变化作出了哪些贡献呢？1976年春，新华社在批判邓小平同时为知青下乡运动作辩护时赞扬知青说：“农村需要这些能贡献他们的政治和文化科学知识、改变农村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知青。实践证明，这些青年人具有革命理想和文化，有改变农村面貌的强烈愿望，他们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力军。”<sup>13</sup>这一好评具有何种程度上的真实性呢？在这一节里，我将从下乡知青的四种身份来评估他们的功绩：（1）作为一般的领导者和革新者；（2）作为科学技术革新者；（3）作为教育尤其是初等教育的推动者；（4）作为农村劳力的补充者。

### A.“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前一节的叙述表明，有些城市青年担任了一般性的领导职务。此外，下乡知识青年可能还扮演了没有正式职务的非正式领导角色。然而，由于许多下乡知青面临着适应和契合问题，他们担任领导的比例可能很小。在1972年至1973年我采访过的知青们也认为，并不存在大量任职的情况，但自那时起新闻媒介所透露出的信息表明，下乡知识青年担任一般领导职务的人数增多了。曾经在接待下乡知青时不得不克服物质困难的辽宁省海城县（见第4章），到1975年为止，3,000个生产队就有300个是由下乡知青领导。1975年，海城接收了56,000名下乡知青，而同期的全国各县平均接受人数是大约5,700名，从这方面看，海城县是个例外。但这是改造的一种结果，而且是需要加以分析的一种结果。让我们再来看一些个别的例子。

第一例是来自上海的女知青宋爱敏，她于1969年3月来到吉林省琿春县的一个生产队落户。她经受了“三大革命运动”的考验，于1971年7月入了党，6个月后被选为第四生产队的“政治队长”。她发挥她的政治积极性，发起了村镇应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保护集体和国家财产不受个人利益损害的讨论。有一段时期，她反对一股“吃喝风”，认为阶级敌人煽动落后的社员们屠宰和吃掉自家养的猪，而不是把它平价卖给国家，他们甚至还想煽动将队里养的猪也杀掉分了。宋爱敏同一个进步的贫农讨论这些问题，并号召自己队里的社员都动员起来，揭露敌人的阴谋，刹住这股“歪风”。在她成为干部之后不久，又出现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在一次社员大会上，有些农民建议将队里的30亩好地与社员种的30亩自留地更换。宋爱敏坚决不答应。于是，有人便对她说：“你是下乡知识青年，又刚当队长，如何关心群众生活。你

还不懂。”显然，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因为说这句话的人还补充说：“这事就按大家的意见办吧！”作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宋爱敏不为大多数社员的意见所左右。她严肃地回答说，贫下中农选她当队长，她就得为贫下中农掌好权（革命政权），她决不会同意这种走回头路的做法。接着，她耐心细致地给大家做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最后提高了认识，纷纷作了自我批评。不仅如此，宋爱敏还敢于严厉批评一位乘她不在私自拉了 5000 斤黄豆去榨油的队干部。她利用这件事引导社员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宋爱敏还带头增产增收，发动群众试验推广了大豆、玉米、小麦的间种套种等先进耕作方法，新开水田 30 亩，并且使全部水田和 80% 以上的旱田实行了科学种田，还增施河泥肥 3000 多车，全队的庄稼比去年长得更好了。”

第二个例子是安徽省霍丘县红旗大队，这个大队有 52 名知青，大多于 1968 年至 1972 年间来自上海。由该大队党支部写的这篇文章描述说，下乡知青在变这个有 800 名社员和“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的落后队为对国家有贡献、集体有储备粮、社员收入有了增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下乡青年的一个贡献就是加强了队里的领导。以前大队的领导素质很低。党支部七个委员有四个没念过书，在旧社会里是帮工讨饭的；另外两个只上过小学。他们把握党的方针政策有一定的困难；工作时不是凭热情，就是有盲目性。1970 年，一位女知识青年被选为党支部副书记。她领导大家学习毛泽东思想，结果使党支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该党支部的书记以前没能领会毛主席的对待犯了错误的干部的政策，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一位受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在工作中犯了错误的支委，而不是帮助他改变态度（“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位下乡青年的干预使这位书记改变了对待犯了错误的干部的方式，使他们也更加积极地工作了。

有些生产队领导班子比较弱，党支部就选派一些下乡知青参加这些队的领导班子。有一个后进队社员人心不齐，生产上不去。知识青年通过调查他们纠纷的原因，帮他们调停，并解决了这个问题，所用的方法主要是向他们灌输毛主义原理。在这个队以及其他的队里，下乡知识青年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在理论上强调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并保证政权掌握在贫下中农手中，而不是在以前上层阶级的成员手中。青年们调查村里阶级斗争的历史，通过座谈访问，搜集了大量阶级斗争的生动事例，最后对阶级敌人进行了广泛的批判。例如，有一个队里，一名坚持“反动立场”的富农分子利用宗族关系破坏贫下中农的团结。在这个队插队的一位知识青年利用一个在旧社会里受苦受难的老贫农的事例，写了一篇题为《阶级亲还是宗族亲》的大批判稿。他揭露敌人利用宗族关系冲淡了阶级裂痕因而贬低贫下中农政权的阴谋。

霍丘下乡知青的雄心壮志和实际行动对改变这个贫穷落后的县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党支部为他们的决心所感染，经与贫下中农商量，制订了一个三年改变面貌的全面规划。主要是兴修水利、科学种田等。青年们在村里起着关键作用的另一个领域是在生产中采用新技术、推广新品种，如进行密植和推广双季稻等。后一项一开始没试验成功，群众对这个地方能不能种双季稻有怀疑，干部也有疑虑。那位党支部副书记利用去省里开会补助的钱买了三种优良早熟品种。下乡知识青年们在试验田里试种获得了成功，从而使农民们相信，在一年里能收割两次稻谷。同样，下乡青年们还演示了密植的优点。最后，下乡青年们还在教育工作中起了领导作用。生产队以前中学生较少，文盲很多。下乡知青们建立了8所夜校，成立了18个读报小组，以及26个家庭学习辅导站，全大队的800人中有700人参加了政治文化学习。”

这两个下乡优秀知青在改变农村面貌中起积极领导作用的例子决不是出现在新闻媒体中仅有的两例。在理解这些例子时，还

必须指出的重要的一点是，知青们担任领导职务的问题对于中国整个政治体制来说有着重要的关系。换句话说，这一体制可以被看作是下乡青年的或明或暗的后盾。他们会引用它的价值、原则或政策，他们还可向上层请求帮助，这一点被认为对于社会主义原则的不被侵犯尤其起作用。政策制订者们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必须常常进行“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因为农民们作为典型的小自耕农，往往会屈从于“倾向于资本主义的本能”，而且，当生产队在集体利益之上给个人以选择时，这些本能就会显露出来。此类倾向在农村普遍存在，但对生产队这一层构成的威胁最为严重。”生产队作为公社的基层单位，有一些自主权，只有在生产队里，农民的参与才最有意义。生产队常常是一个自然的村庄，它的特征是高度的团结一致。当那些原则上被看作是社会主义保卫者的村民（干部、贫农和下中农）没能维护集体利益时，知青们能够而且愿意出来维护它的能力就成了社会主义体制一种明显的财富。因而，《红旗》杂志表扬了下乡青年，说“他们成长为社会主义原则的捍卫者，努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着重号系笔者所加）。

我们可以通过好几种途径看出下乡青年积极捍卫社会主义原则时有着或明或暗的后盾。一个下乡青年会揭露一种越轨行为，并引起地方领导的注意，地方领导意识到这是原则问题时，便会自己采取纠正措施。”或者，一个下乡青年会提醒高层官员注意某个问题，比如说，“封建习俗”又死灰复燃，或阶级敌人正在发起攻击等。”有一次，来自延川县一个村庄的知青报告说，农民们利用鼓励养猪的政策扩大他们的自留地，占用开垦出来的田地。他把对集体利益所造成的这种损害报告给了生产队领导，但他们不予理睬。当他向公社反映也未见行动时，他就步行到县城，县党委终于支持他的立场，并提出应纠正这种做法，还号召全县学习该青年的“先进经验”。”一旦得到了上级的支持，下乡

知青在地方上的领导能力就有进一步的提高。有时候，颇有成绩的下乡青年会被作为较高层的工作队员派到落后队进行排忧解难的工作。

在新闻媒体报道的其他一些例子里，下乡知青由于独立性更强，便不可避免地同地方领导发生了一定的矛盾。有报道说，一位叫孙玉文的知青同他的生产队长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斗争。这位农民队长已当了十几年干部，但从不参加生产劳动，不带领农民们改变乡村的面貌，地里发生草荒时，这位生产队长却押着大车到外头去拉脚。孙玉文制止了他用队里大车赚外快的做法。他强迫生产队长把车赶回队里。尽管这引起了队长的不快，但孙玉文继续抵制他的其他一些做法，如搞“五定一奖”等。报道说，贫下中农都支持孙玉文。1973年初，他们一致要求改选队长，推选孙玉文为队长。大队领导人认为队长不便随便撤换，于是只选孙玉文当了副队长。这使得正副队长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大。队长试图同孙玉文和解，但孙拒绝在原则问题上妥协，且继续纠正他的不正当行为。最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派人帮助解决该生产队的领导班子问题，社员们一致推选孙玉文担任生产队长，后来又选他为大队党支部书记。

这些年轻人是出于什么动机而“敢说敢做敢斗争”、敢向领导们挑战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最终有政治体制作后盾。\*农民的支持是另一回事。人们常常把贫下中农描绘成是这类下乡优秀知青的鼓励者，其实，他们的支持有时是消极的、微弱的，下乡知青常常不得不承受地方上的所有偏见。这时，知青集体自身

---

\* 由于各个地方情况不同，知青们并不总是能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于1976年10月遭到清洗的“四人帮”就被指控在青年干部中培植亲信，鼓励他们同在职的老干部作对。虽然这里所称的一些阴谋行为尚未得到印证，但这一可能性不能被排除。参看第6章最后一节。



的支持就极为重要了。例如，宋爱敏就是先动员她所在的那一知青团体的人，然后才带动农民的。一个有着较好的组织和较好的动机的知青团体为知青领导人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人数多就是一种安全保证；可以设想，地方干部或农民们报复孤立的一个个人较容易，但报复一个团体就很难。作为知青团体的一员，他在乡村事务中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他结婚后，离开了这个集体，便“很难同人作对”，变得“不怎么好斗了”。换句话说，知青集体可以扮演乡村的压力团体的角色。第4章中所叙及的越来越普遍地建立知青点的倾向，说明了政策制订者们试图增强下乡青年的能力，以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捍卫社会主义旗帜，成为广泛变革的发动者的本意。然而，正如前一章所提到的，各个下乡知识青年小组愿意支持政府目标的程度是迥然不同的，当然，我们可以说，能够而且愿意对农民们挑刺的知青团体也不是少数。

综上所述，下乡青年能否成为果断的乡村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级领导、农民和知青同伴们支持的程度。他们自身的信仰、毅力和能力等如何，也对此有强大的影响。另一个个人的条件是阶级地位，出身于工人阶级或革命干部家庭就可以使人增加可信性。由于这些并不是所有担任领导职务的知青都具有的，所以，在处理一些问题如社会主义原则问题时就常常不能理直气壮，或者知青们只是缺乏揭露不正当行为的意愿。有人报道说，他那个生产队的农民们过去常常砍附近国有森木的木柴去卖；下乡知识青年们知道这件事却视而不见。或许，我们上面所谈到的一些因素所产生的作用，还没有能达到足以超过要求知青同农民保持一致的压力。萨姆·雷伯恩的建议，“向前进，往前走”，对于下乡青年来说，也象对于美国新的国会议员一样具

---

\* 萨姆·雷伯恩（1882-1961），美国国会议员。1937年曾当选为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译注

有某种无奈性。积极去适应新环境的下乡知青可能只能那样做，即适应地方的现实，而不是同它相对抗。下乡青年要想被招进或被再分配回城市，必须得到当地公社的同意才行。在农村中捣乱的人只能一事无成，而且，当地领导还会以其他方式报复你。<sup>185</sup>因而，被选进地方领导班子、地位不稳固的下乡知识青年就更能顺应地方上的特权，而不是揭露它。例如，在河北的一个生产队里，队干部试图用为未生的小猪留饲料的方法为村里多留些粮食，而不是把它卖给国家。他向队里的会计（一位知青）保证，这种违反政策的做法没错。这位下乡知青觉得必须听队长的话，因为自己毕竟是在村里接受再教育。当大队领导获悉后，便批评这位年轻会计不敢于同错误倾向作斗争。<sup>186</sup>这个例子证明，再教育政策对知青们施加了压力，使他们顺从，或者至少为他们提供了明哲保身的理由。政策制订者们自己也好象是矛盾的。他们希望看到青年们积极监督歪曲社会主义原则的行为，但他们也对自以为是的知青们凌驾于地方的情绪之上或耀武扬威而引起农民们的不满很敏感。“虚心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对专横的知识青年干部的规定，它既要求知青干部之间相互竞争，又要求有助于减少他们的武断。<sup>187</sup>

政策制订者们还希望看到下乡知识青年成为农业革新的有力推动者。在中国的许多乡村，干部和农民并没有挖掘出农业的发展潜力。挖掘这些潜力是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的一个基本部分。在农村里从事生产的知青有机会充当一些变革的带头人，如实施某项计划、进行科学试验和搞革新。使下乡青年成为变革代表的各种因素和使他们成为领导，带领大家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各种因素并不矛盾。但是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即农民对待下乡知识青年们所进行的革新的态度。有一个村子里，下乡青年们建议生产队试播新种子，“一些”干部和农民反对这个建议，他们担心这会导致减产。结果双方发生了矛盾，而就象报刊通常所做的那

样，这次据说又是由于在保守的反对者后面隐藏着阶级敌人。<sup>108</sup>在另一个村子里，当下乡青年们要求批给一定的土地及生产资料进行科学试验时，“一些人甚至害怕这些知青会试验失败而妨碍生产”。<sup>109</sup>农民们很可能对革新有可能造成损失保持着警觉。虽然人民公社的体制为危及到某一生产队的最基本需求的灾难提供了保障，但据我所知，并没有对革新失败或其它冒险行为所造成的收入减少作出担保。<sup>110</sup>所以，要想使当地人对知青们的积极性反应良好，就必须使他们的能力能令当地人信任，尤其是在技术问题上（见下一节），而这又会导致下乡青年们懒于说服当地人去接受某项革新。<sup>111</sup>

如果有政治体制作明确的后盾，也就是说，如果知青显然得到了上级政府的信任，被委以变革的使命的话，他们会在革新时发挥最大的作用。例如，云南省洱源县一个落后的队里，大队书记找到一位上海知青，让他带领大家学大寨。这位青年动员了其他的下乡知青以及村民和干部。他们首先学政治，学阶级斗争，继而便拟定了好几个小计划，他们的事例鼓舞了全村，于是形成了大干快上的气氛，虽然这使一些懒汉受不了，但成就是很大的：以前只有四五十人愿意在春耕中出工；现在有了 200 多人。下乡青年还使村里通了电，而且所有 2,000 亩可耕地都被翻种了，而以前仅有 1,050 亩。<sup>112</sup>有关的报道没有说明这个青年同队长的关系如何（队长的作用好象被忽视了）。在其他一些下乡青年起着革新作用的例子中，一切正式和非正式的积极作用都被归结于有一位知青当上了队里的头头。<sup>113</sup>

虽然大多数下乡青年没有在村里起着积极的带头作用（这自有其原因），但他们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即使他们不直接介入乡村事务。他们的存在、他们的态度、他们的行为以及他们同农民们的相互关系都对农民的价值、习俗和态度产生影响。影响的程度尚无法估算，但无论是传媒还是被采访者都认为，这种影响确

实存在。报刊新闻把女知青描绘为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她们打破旧传统，同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结婚，或者在村里干着习惯上只有男人才干的活，如插秧，盖房子，砍柴或捕鱼等。女知青的这些做法起了表率作用，农村妇女纷纷仿效。<sup>115</sup>接受采访的知青们说，下乡知青扩大了农民的视野，使他们了解到广州人是怎么生活的，现代生活方式是怎样的，包括丈夫做家务和带孩子等。年轻的农村人可能会受到未婚知青的影响，在两性交往上要比地方习俗所允许的更为自由。<sup>116</sup>有时候，下乡知青城市化的装束也引起当地青年的羡慕（“只有象广州青年人的穿戴才是好穿戴”），并使他们效仿。有一个村子的一位城市青年把喝咖啡和喝啤酒的城市生活习惯介绍给他的农民朋友。还有好几位被采访的知青说，他们将小说包括一些禁书介绍给了农村青年。确实，引入一些城市娱乐活动打破了农村的单调生活，这也是知青下乡运动的一个意义重大的派生物。许多城市青年把体育活动介绍给村里人，包括乒乓球、篮球和游泳。而且，新闻媒介还经常报道下乡青年的美术小组和业余戏剧团。<sup>116</sup>

所以，知青与乡民之间的日常接触对农村习俗具有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在那些交通闭塞，下乡青年可能是农民们首次有着较长期的私人接触的外来人的偏远乡村，情况更是如此。但这种作用的程度有限，因为大多数下乡青年都是在离大城市较近的乡村和长期受城市文化影响的较为发达的地区落户。不仅如此，如果下乡青年真的到落后地区去，他们也常常是落户于同农民的交往不怎么密切的军队农场和国营农场。在农村里的知青同农民的联系也很少，因为不是所有的下乡青年都在生产队里插队。政策制订者们认为，在有着长期非正规交往的地方，如果农民对上层生活水平的欲望或仇恨被煽动起来，就会产生不可预期的后果。尚没有迹象表明下乡青年与农民的相互交往正在产生这些后果。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当城市干部被派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时，

他们都被告知不要在农民面前宣扬自己的相对富裕，也不要告诉他们自己的薪水是多少。<sup>117</sup>

## **B. 农业技术革新**

报刊登载了大量城市青年进行技术革新，为农村现代化作出了贡献的事例，以下的十二个例子反映了这些报道的范围和种类：

——在内蒙古黄河湾的某军队农场，下乡知识青年们在贫瘠的土地上进行马铃薯有性杂交试验，解决了马铃薯的退化问题。他们还在戈壁滩上实行科学种田，获得了亩产皮棉八十斤的好收成，结束了“塞外不能种棉”的历史；在黄河岸边盐碱泛滥的不毛之地，大面积种植水稻获得高产。（1972年1月24日《人民日报》）。

——在江西新干县下乡的两位女知青办起了业余气象站，并能预报雷雨，因而保护了秧苗未被冲坏，她们的预报还对科学种田起了参谋作用。（1973年8月23日《人民日报》）。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邕宁县落户的一位下乡女知识青年用土方法培育成功杀螟杆菌，对农业生产作了较大贡献。此后，广西各地都派人到她那里参观学习，普遍推广。（1972年8月16日《光明日报》）。

——在湖北省洪湖县，下乡知识青年养殖场进行科学试验，提高鱼的冬季成活率。结果，成活率从1969年的30%提高到1971年的80%。（1972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

——江苏省宝应县有十一个生产队，队队都建立了科学试验小组。由下乡知识青年组成的小组制造5406菌肥、920

生物激素、4115 农药、酯化饮料；引进、培育良种；推广双季稻；进行病虫测报、天气预报等。结果收到良好效果，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72 年 10 月 16 日《人民日报》）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部四连的农业科研小组改造荒原，夺取粮食高产，培育了大量的优良品种，成功地进行移种南方瓜菜的试验。他们还在北方的恶劣气候下繁殖了引进的小麦、大豆、玉米、稻子等优良品种。（1972 年 2 月 9 日《人民日报》）

——一位下放到海南山区一个贫困农场的男知青利用他在学校里所学的数学和物理知识计算水平落差，他建议党委批准他的建水电站的计划。水电站动工了，党组织把造水轮机的任务交给了他。他利用附近水电站的水轮机作模型，把一块块五毫米厚的钢板捶打成叶片，终于把水轮机造成了。接着他又接受了造压力水管的任务。没有钢筋水泥，他就用别的材料代替。第一次因为缺乏经验，没有搞成。但他运用自己学过的书本知识，精心计算出流水的压力，吸取老工人的实践经验，用水泥拌碎石就地造出一条长达四十多米的“土水管”。在他的带领下，水电站终于建成了。（1973 年 7 月 25 日《光明日报》）。

——湖南省醴陵县河西大队以种蔬菜为主。为了提高机械化程度，抗旱夺丰收，大队党支部把制造自动洒水器的任务交给了知识青年科研小组。当时，他们不敢接受这个任务，党支部就用批判林彪的“天才论”来鼓舞他们。他们于是研究旧机器和求助于农机厂，经过多次失败后，终于研制成可喷灌 712 亩菜地的喷水系统，大大提高了生产力。（1974 年 3 月 28 日《人民日报》）。

——山西省阳高县谢家屯大队的牲口得了病没药治。下

乡知识青年就决心自己制药。在有关单位的指导下，他们以土代洋，因陋就简，办起了药厂。两年里，药厂得到了发展，生产的药品不仅供应本地区，还支援了其他一些地方，共为集体增加收入一万六千多元。（1973年8月23日《人民日报》）。

——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一位曾对无线电感兴趣的男知青运用他的知识和钻研技术的兴趣承担了检修柴油机的任务。他先后修理了柴油机、脱粒机、拖拉机、脱皮机以及收音机、扩音机等，为生产队节约了大量资金。（1972年11月20日《光明日报》）。

——在江苏省东台县某大队下乡的一位女知青把队里的十二亩重碱地改造为可耕地。生产队地运用她的经验，改造了一千二百亩重碱地。（1972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

——在云南省鹤庆县一个少数民族乡村里落户的三位上海知识青年，为该村第一次安装电线并通了电。（1972年2月25日《人民日报》）<sup>100</sup>

对于这些事例以及其他一些事例，我们可以提出以下一些问题：这些革新有哪些长期的作用？湖北省洪湖县鱼的成活率在以后几年还会很高吗？这些下乡知识青年得到了哪些帮助？又受到了怎样的监督？倘若某项贡献事实上是知青独立完成的，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他们能独立完成？做出这些贡献的下乡知青个人或集体的比例各是多少？在所有的这些革新的事例中，这个比例变化了多少？答案可能是，只有一小部分下乡知识青年作出了技术革新的贡献。被采访者也提供了他们周围的下乡知青所进行的技术革新的部分材料。在广州一家郊区工厂工作的青年制造了一台水泵，又有一组青年造了一架卖货用的天平，还有其他一些青年造木制水管，为生产队节约资金等。向全国播发的一则评论在谈到

农村科学实验时指出：“农民试验员和技术革新大军包括了大量的老农、敢于创新的许多年轻人和一些在农村落户的知识青年”（着重号系笔者所加）。<sup>100</sup>这篇文章还估计，在农村搞科学试验的总人数达 1,300 万。根据现有的材料可知，参加科学试验的下乡知青人数比例最高的为延安地区，至 1971 年，该地区两万北京知青中有三分之一加入了这一队伍，另一地区为广东省扶绥县，在 1974 年有 37% 的下乡知青参加，是所有农科试验力量的三分之一。<sup>101</sup>如果这些数据比较典型，即是说 1,000 万下乡知青有三分之一在农村参加了科学试验活动的话，下乡知识青年就是各地科学试验小组的 1,300 万成员的四分之一。毫无疑问，参加的下乡知青实际人数要比这少得多。延安和扶绥所代表的只是人数高的地区，并不是平均数。可以肯定，在许许多多农村地区里，只有少数几个甚至根本就没有下乡知青搞科研。接受我采访的知青都没有参加，他们只知道有少数知青参加了。当地青年，尤其是回乡知青起着主导作用。<sup>102</sup>下乡知青参加的人数并没有如要求的那么多，这还可以从官方的一份报告中看出来，该报告号召下乡知识青年在这一领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sup>103</sup>

前面关于下乡知青的技术培训的讨论说明，有许多知青是不具有搞科研作贡献的能力的。我采访的知青们也很少把自己周围知青所作的技术贡献归因于以前所受的的技术培训。因而，我们可以说下乡知青搞的科学试验和技术革新有许多是失败的。新闻界好像并没有报道完全失败的例子，虽然有好多报道都描绘了下乡知青败而不馁并最终成功的精神。有这样一个富有意义的例子。落户在离家乡河北省唐山市 25 公里的风集县一个生产队的下乡知青，很希望搞些科研，党支部支持他们，批给他们 20 亩地，又给他们两间屋子做实验室。小伙子们从唐山母校借来了一些技术性书籍、显微镜和其他仪器设备，便干了起来。他们做了 26 个试验，梦想实现一些伟大的突破，以此一鸣惊人，其中的



一个方案是培植棉花树：他们把棉花苗嫁接到泡桐树上，希望以后无需年年都重新播种一次棉花籽。农民们称他们是“看书种庄稼的洋秀才”。最后，党支部领导插手干预了，支部领导教育下乡知青们不要脱离人民群众，同时成立了由干部、农民和下乡知青三方联合组成的科研小组，并由党支部负责人管理。小组从当地的条件出发，同有见识的老农们一起从事一些更现实、更切实可行的工作，包括改进耕作方法，开发高产作物和控制虫害等。一位以“害虫的克星”闻名的知青发现了消灭七种害虫的方法。此外，科研小组还成功地生产出“920”植物激素和“5406”菌肥。据说这些革新带来了粮棉的高产。<sup>128</sup>

这些例子得出的结论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即知识分子（在这些例子中是下乡知识青年）若不同农民大众打成一片，就不可能在工作中取得成功。的确，这种有一定才能智慧和学识的城市人同落后的农村人的关系相互颠倒的做法很值得注意。这些例子表明，不是城市人引导农民走改变环境的新路子，而是农民教给城市人合理的变革方法。然而，即便我们假定中国农民对于革新的成败与否有明智的判断力，但涉及到科学试验，仍然会对这种干部、农民和下乡知青的“三结合”产生一种盲人领盲人的疑问。换句话说就是，这些乡村水平的试验是否也有那些受过训练并能提供监督和指导的科学家及技术人员参加进来呢？事实是，至少有一部分乡村水平的科学试验是同那些帮助“农民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进行试验”的“全国范围的农业科研机构”合作完成的。<sup>129</sup>1974年访问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植物研究所代表团曾在一份报告里描述了这种农业专业研究机构同基层人民的密切关系；这份报告还特别提到了省级研究所的“基点”作用：

这些“点”其实是有选择地建在遍及各省的某些队上的实验站，是有选择地用来检测土质和环境条件的。被派往这些

站的是来自各研究所、轮流下乡的科学家；也有“农民技术员”在站上接受这些科学家的训练以便完成试验工作。任何时候，各研究所都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科学家在各基点工作，其范围的广大也令人印象深刻：例如，陕西省农科院同遍及全省 75 个县的 100 个基点保持着联系，并为每个站调配了人员……尽管他们在社会上保持着低姿态，但那些被轮流派到各基点去的科学家显然在各试验站的培训和研究工作中起着主要的作用。<sup>125</sup>

导致科学家“在社会上保持低姿态”的政治气候也妨碍了新闻媒介对他们作用的充分认识。<sup>126</sup>报道下乡知识青年的科学试验的文章很少提及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是否起了作用，或者起了多大作用。有一则报道突出了一个事实，即农民和下乡知识青年正在进行试验的某个生产队是科学院的一个“试验点”。<sup>127</sup>

即使大多数关于下乡知青的科学试验的报道不提及专业人员的参与，我们也可以认为，在很多事例里，受过训练的科学家和技术员者直接或间接地起着作用。他们的影响使下乡知青和当地农民的试验有了眉目，也使他们对中学毕业生进行科学工作有了感性认识。前面已经指出过，农村现代化不仅需要专门科学家，还需要知识程度不是很高的，能与专业人员一起进行新技术新方法的运用和推广的人员，正如写过中国绿色革命专题文章的本尼迪克特·斯塔维斯所说，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常常可以进行复杂的高水平的研究，但这些国家“基层的检测、演示和评估的机构从总体上说还很不完善。”<sup>128</sup>相反，在中国完成这些重要的程序是可能的：“这些基点站的许多工作是查明在某一特定地区哪种做法最好。故这些工作虽被称为实验，其实是演示性的：例如，在一些常规种子旁边种植改良种，以便向农民显示新种子比老种子有哪些优点，许多被说是在生产队一级进行的试验工作都必须从这一

意义上来理解。”<sup>109</sup>

证实下乡知识青年作出的很多科学技术贡献不是他们单独作出的，而是与其它人一起作出的，并不否定有些地方的下乡知青搞技术革新主要是靠他们自己，而且据目前所知，他们没受过什么特别的技术训练这也是事实。那位领头建成了一座小型水电站的知青（前面 12 个例子中的第 7 例）即是一例。尽管这些事例并不多，但也值得仔细研究，它提出了改造付出了哪些代价，又获得了哪些好处这一问题。导致这些下乡青年成功的因素有好几种。其一是背景和家乡环境，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到云南去的上海籍下乡知识青年在学校里，曾经是“电迷”；他在建设一座小型水电站中起了领导作用。<sup>110</sup>在另一个例子里，一位下乡知识青年成为了乡村医生，他的双亲都是医生；在家时，他曾跟他们学习过。<sup>111</sup>时间和经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些报道表明，下乡知识青年有时花好几年的时间向周围的人和模范学习如何工作，或者在取得成功之前利用业余时间自学过。<sup>112</sup>也有一些下乡知青们通过共同努力和学习，集体解决问题从而取得革新成功的事例。这类事例的一个共同因素是：这些集体的下乡知青们都有很高的天分而且怀有较高的志向。这些天分高的青年如果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就可能会继续中学的学业，如上专门学院或上大学，从而成为成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但是，他们被送到了农村，按毛主席说的话就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然而，如果他们被允许继续其学业的话，他们会不会为国家现代化作出比只有益于某一地区发展的革新更重要、更长久的贡献呢？事实上，有些天资聪颖的下乡知青已被选送进高校了。就象赤脚医生的那个例子一样，在这些例子里，农业劳动和高等学校之间已产生了一定的关系。<sup>113</sup>因为，在农村学到的实践经验很可能提高了高等教育的价值，尽管人们对后者的质量表示怀疑。但是，毫无疑问，大量的有天份的下乡知识青年没被

选送去深造。对于他们来说，倒可以问一问他们在乡村的这种贡献（价值显然是有的）是不是使国家的发展丧失了某种潜在的机会。

### C. 乡村知青教师

使所有农民的孩子有机会上学是国家一个重要目标。自大跃进以来，政府所采用的一个战略是鼓励农民自己集体办学校（民办学校），下乡知青们就是在这类学校里教书。这类学校由地方筹措资金开办，因而为国家节约了资金，但其中有一些显然也得到了国家的额外资助。国家无力为所有农民的孩子建高质量的小学；所以，有人曾评论说，如果仅仅国家单独负担农村教育的话，就会有許多村子的孩子因国家的财力物力所限而与学校无缘了，尤其是在山区。<sup>100</sup>相反，无论是在大队还是在自然村落里，集体开办的学校可在所需要的任何地方建起来，它们适应性好，符合农村地区的不同情况和需要。这些学校的质量当然比较低，因为集体往往没有钱购买相应的设备和建造房屋，教师通常也未受过训练。低质量的教育也引起过那些觉得农村教育应“正规化”的人的反对。正如云南某个大队的“一些同志”所说的：“办学校，历来是县上派老师，国家盖房子，上级给经费。何况我们地处穷山区，没有国家和上级的拨款，普及教育怎么搞得成！”<sup>101</sup>

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较大的政治运动过程中，这些反对意见都未被理睬，而社队学校却被大量地建成。在这些运动过后，公社学校的数量不仅未减少（如大跃进之后），学校的建设率反而有增加（文化大革命后很明显）。<sup>102</sup>而且在后来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新建学校数又有了大的增加。例如，在四川省巫溪县，1972年只有74%的学龄孩子上学；两年后，这一比例上升到98%。从全国来看，注册的小学生从1972年的1.27亿上升

到两年后的 1.45 亿。<sup>137</sup>

只要乡村学校仍被看成是解决教育普及问题的有效的方法，知青们就会有所作为，新闻媒介报道了一些知青在以前没有学校的地方建起了学校。<sup>138</sup>在没有国家援助的情况下，建设学校的一个关键点是要尽可能减轻集体财力的投入。例如，1969 年一位福州市的初中毕业生到福建省顺昌县某大队落户。一年后，他自愿到队里一个小乡村的学校教书。由于学校设施严重缺乏，他遇到了很多困难，他和学生们不得不自做课桌和板凳。节约效益是显著的，在整整两年时间里，大队只为学校投资了一元钱。<sup>139</sup>另一位女知青，在山西省太原市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开了一所小学，学校利用旧的窑洞作教室，石头作凳子。虽然她自己只是个初中毕业生，但 1968 年她却为这个五年制小学增加了一年中学课程。星期天，她就向公社里的其他老师学习。<sup>140</sup>还有一个例子，一位落户在河北省某村庄的回乡知识青年，利用假期到山里采集草药出售，为大队学校筹集资金。<sup>141</sup>

提到回乡知识青年当教师，我们必须重申前面所说的，下乡知识青年决不是乡村学校唯一的师资来源，下乡知青当教师的比例各地显然有较大差异，我们虽然没有下乡知青占乡村教师总数的比例数，但可以肯定这一比例并不低。<sup>142</sup>从大量关于下乡知青在少数民族村庄落户办学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在少数民族村子里落户教书的下乡知青的比例极高。著名的知青模范朱克家在云南省爱尼族一个村子里教书，这只是一例。另一例是一位北京青年，她于 1968 年落户在内蒙古自治区西乌珠穆沁旗，在旗里她建立了旗里由队里办的第一所学校。她的行为带动了其他人，两个月内，这类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增加到 50 所，它们都是由下乡知青执教，这使得旗里 90% 的学龄儿童能有机会接受一些教育。<sup>143</sup>还有一些被公开报道的例子，如广西自治区瑶族、贵州省布依族和甘肃省东乡族。<sup>144</sup>在所有这些例子里，汉族青年都必须

在教书之前学会当地的方言，因为小学教育并不用普通话，而是用当地的方言，学方言是下乡知青们遭受挫折的一个原因。在云南，“大量”的下乡知识青年成了教师，“一开始，由于语言障碍和不同的风俗习惯，他们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所以，有些人一点也不喜欢他们的工作。”于是，他们就学习毛主席思想，以此为动力学习方言。<sup>100</sup> 引人注意的是新闻媒介很少报道回乡农村知识青年，他们在担任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师时自然没有语言障碍，<sup>101</sup> 不用回乡知青担任教师似乎可以看作是一些少数民族村庄，特别是那些直至近几年还很闭塞的边远地区教育所取得的微小进步。<sup>102</sup> 那些克服了重重困难成为少数民族儿童老师的下乡知青，对乡村教育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下乡知青教孩子们时显然不是用普通话，这就限制了他们对促进国家一体化所作的贡献，他们只是把基本的文化知识和政治价值教给了孩子们而已。

有些农民很渴望教育，但从新闻媒介和被采访者所反映的情况看，事实并不都是如此。包括下乡知青在内的公社学校老师不得不说服和哄骗不情愿的父母把孩子送去上学。一位在山西省破鲁县教书的下乡知青发现，有必要“追踪”学习积极性不高的孩子们，到他们的家里去访问，鼓动他们的家长让孩子入学。上文说的那位在河北一个村子里教书的回乡青年发现，18个学龄儿童中，只有8、9个上了学，她激烈地批评了农民的态度。农民对教育没多大兴趣有好几方面的原因：干部们常常只抓象增产之类的主要工作，所以，他们很少去关心普及教育之类的事，也不采取必要的行动动员农民关心教育，更不用说去为适应农民的教育需要主动作出一些安排；<sup>103</sup> 在许多农民看来，送孩子上学，即使是上本队的学校，也会增加自己的支出。他们抵制上国家办的学校，是由于学校通常离村子很远，这样，孩子上学不仅要能够交得起学费，还要穿合适的衣服并需要一份单独的伙食费，而这只

有较为富裕的家庭的孩子才读得起。上队里的学校，减少了农民的这些花销，虽然许多这类学校也收少许学费。但很多农民家庭确实需要学龄孩子照看小弟弟小妹妹，并干些副业，或者为集体做些轻便活，如放牛放羊等，以便挣些工分。这些情况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重视，因为它们极其普遍，而且已极大地妨碍了农村教育的普及。在干部们的鼓励下，乡村学校的老师们发明了许多多的补偿方法，尽量做到既能满足农民家庭的需要，又能使孩子读书。教师们允许学校的学生带着弟弟妹妹上学，使他们能得到照顾；他们还把上课时间错开，使学生们既能干活又能上课；他们并把课堂移到牛栏里或渔船上，教师在渔船之间划来划去授课。<sup>100</sup>

农民不关心教育还同教育没什么实质用途的看法有关。至于对女孩子受教育，则存在着传统的反对意见：“丫头迟早要嫁给别人，读书有啥用？”<sup>101</sup>在这时候，当教师的下乡知识青年，尤其是女知青，就不得不去改变农民这种重男轻女的态度。<sup>102</sup>然而，一个更明显的事实是，知识青年的下乡，也成了农民抱有“读书无用论”态度的正当理由：“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也不过一辈子扛铁锹，孩子们读书有啥用？”<sup>103</sup>如果下乡和回乡知青由于被定死在某一固定的位置上而不能跳出农村，从面象普通的农民一样劳作一生，那么，为什么要念书呢？这种态度被官方激烈地批评为刘少奇式修正主义的流毒，官方反复强调，教育是农业现代化过程的必要的一部分。随着不断的现代化，越来越多的农民实际上也会逐渐认识到教育的益处，而不是由于知青跳出农村的结果。但是，当了教师的知青努力动员农民孩子上学以弥补他们自己呆在农村所带来的农民对教育的淡漠，这件事本身便对下乡知青思想改造的一个矛盾。

从被采访者一些描绘来看，农民一般并不反对教育本身。就是说，他们觉得孩子能够读书写字和简单地算帐是好事。但他们

对念书达三年多或四年多有何价值表示怀疑，觉得这样会失去好多机会，如挣工分等。这种态度的结果便导致许多村里的孩子实际上没有完成基本教育。虽说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小学，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也能上队里的初级中学。但被采访者认为，实际上通常只有一半超过了小学年龄的青少年从小学毕业。有一位知青同伙伴们一起组织了一个夜校小学，他们自愿授课，不需要报酬。一开始，他们有许多学生，但到了年底只剩下几个了。<sup>155</sup>换句话说，要让农民长期关心教育并不容易，这需要不断地激励和多方的支持。下乡知识青年既帮助农民提高对教育的兴趣，又在乡村学校里授课，还教成年人读书写字，或者参加其他体力劳动，就此而言，他们为改变农村面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sup>156</sup>

#### D.是“变相劳改”吗？

所有被送到农村的知识青年都必须进行体力劳动。对于那些没有较优越的岗位的年轻人（他们占大多数）来说，劳动是他们基本的活动。我们很难评价他们的劳动为农村的发展作出了什么贡献。首先我们应弄清农村劳动大军里有多少是下乡知识青年。农民劳动大军的准确人数有多少，我们尚不清楚，但如果假设农民大军为 7 亿，那么，1200 万下乡知青只占 1.7%。然而，农村各地的下乡知青人数不等，因而在有些省份他们所占的比例就比较大。上海七个郊县有 440 万居民；落户在那里的 40 万下乡知青就占 8.8%。但 440 万中有一些住在郊区县城里，因而知青实际上占农村人口的比例要更大一些。至于其他一些省份，我无法弄到它们的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比例情况。没有这个比例，计算下乡知青占全省人口的百分比便有很大的出入（估算一下是可以的）。黑龙江，120 万下乡知青占所估计的 2830 万人口的 4.2%；辽宁，120 万下乡知青占所估计的 4170 万人口的 2.9%。<sup>157</sup>



但辽宁要比黑龙江城市多，因而前者城市人口的比例就比后者可能要大一些。即使手中没有城市和农村的人口比例数，我们也可以认为有些省肯定比其他省更加依赖下知青们的劳动。河南 36 万下乡知青占全省人口的 0.55%；内蒙古 21 万下乡知青占全区人口的 2.6%；新疆 45 万知青占全区人口的 5.2%。<sup>106</sup>所有这三个省区都主要是农牧业省区。

在乡村，如果下乡知青插队同农民们一起劳动，要估算他们劳动量在当地总劳动量中所占的比例就更困难了。我在第 2 章已说过，下乡知识青年可为人口稀少的公社或因庄稼套种、连种而导致需要额外劳力的公社解决劳力短缺等问题。但是，除了第 2 章里已提到过的这些特殊情况之外，知青的劳动好象并没有什么新的意义了。如果下乡知识青年是插队安置的，我们不仅很难把他们的劳动同农民的劳动区分开，而且，他们事实上并不会作出更大的贡献，虽然我们可以说，这种安排为干劲不足的下乡知青们提供了克服挫折的机会（参看第 4 章）。

相反，如果下乡知识青年落户于国营农场、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农场或者作为知青团体被安置在公社的下属单位，他们的劳动成就就可以依据贡献而容易估价得多，正如下面所提到的，在这些地方的下乡知识青年，事实上干活更加卖劲。当然，即使在这些情况下，已作出的贡献往往也不是下乡知青们单独作出的，因为国家农场也吸收了农民，军队农场有些也会驻扎有非流动性的军人。但是，当新闻媒介描述下乡知识青年们在国家农场或军队农场所作出的成就时，都暗示下乡知青是主要的一部分劳力。例如，1962 年至 1964 年，在国家办的农场、林场、牧场和渔场落户的下乡知青有 29.2 万名。据报道，他们在建设 185 个新的国营农场和扩建 566 个老农场中起着主要的作用，他们在这两年内开发了 118.6 万亩荒地。1963 年，他们种了 34.6 万亩树木，同时扩大“海产养殖面积达 55.7 万多亩”。<sup>107</sup>

知青劳动大军所从事的典型的工作是开垦荒地、造林、修水利和其他一些建设性项目。各类下乡知青集体的规模相差很大。从隶属于生产队的、从事荒山开垦的 10 人或 20 人的小组<sup>100</sup>到生产建设兵团中的一些师，下面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的一个例子：

在根治塔里木河的艰苦战斗中，六万上海知识青年是一支重要的突击力量。他们和老农垦战士一起，在塔里木河上游兴建大型拦河闸一座，在上、下游修起大中型平原水库十座，开挖引水渠和排渠 1400 多公里，还兴建了七座水力发电站，驯服了这条被称为“无缰之马”的河流，使塔里木垦区 190 多万亩耕地变成了能灌能排的良田（1974 年 5 月 13 日《人民日报》）。<sup>101</sup>

在海南岛和广东雷州半岛的军队农场下乡的两个知青集体的材料可作为以上新闻报道的补充。他们所从事的同样是开垦荒地，不过是种植橡胶树。其目的是帮助中国减少依赖从马来西亚进口的橡胶。他们进展迅速，地被翻耕了，不过两年左右，其中一个农场已种上了 27,000 亩橡胶树。<sup>102</sup>然而，在一定地区内可翻耕土地并不多，因而下乡知青所作的贡献并不总是显得很大。至 1975 年，“约 300,000”名黑龙江军队农场的下乡知青（他们有许多从 1965 年起就在那儿了）翻耕了 100 万亩地，这等于 67,000 公顷。<sup>103</sup>据地理学家泰奥多尔·沙巴德的说法，至 1971 年，东北三省有 1000 万公顷的可耕地，其中黑龙江占大部分。<sup>104</sup>

显然，下乡知青劳动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开发出新的土地。对滁县典型的宣扬表明政策制订者们是多么看重这一目标。湖南省滁县县有大量的山地，有些明显地可以被开垦。好几个下乡知

青农场的建立主要就是为了这一点。滁口事例表明，在中国的边境省份，有着大面积的可耕地，有些地是可以利用象知青的开垦这样的集体的劳动被加以利用的。学者们曾经怀疑，许多额外的土地被开垦利用代价是否合理，他们建议中国农业发展政策的重点主要是提高现有农田的产量。许许多多下乡知青团体也为实现这个目标作出了贡献，他们参加了农场土地的基本改造计划，如提高土壤质量等。

报道下乡青年劳动小组所取得的成就的文章都前后贯穿着一个主题，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排除万难。确实，公正地说，赞美英雄式的、自我牺牲的劳动也许是所有关于知青的报道中最突出的部分。典型的英雄事例很多，如不畏严寒酷暑和极原始的生存条件，向沙漠要农场的“十二个铁姑娘”。关于知青小组如何在荒山野岭建设家园的充满着献身精神的报道，会使人想起美国开拓者们的事迹。

下面一段摘自一篇题为“艰苦奋斗创新业”报道的短文，描述了在山西省蒲县一个只有 21 人的生产队落户的 21 位北京青年的事迹。

没有土地自己开，没有房子自己盖，胸怀朝阳创新业

.....

为了加快垦荒进度，知识青年们把饭带到地里吃。干粮冻硬了，就用开水泡一泡，手冻裂了，就用胶布粘起来坚持干。经过十二天的战斗，开荒五十多亩，当年打了九千多斤粮食。

知识青年们……自己动手盖房子。在深山里砍了木材，交通不便，运输困难，他们就十几个人抬一根大梁，一步步挪，一尺尺推。（1973 年 6 月 12 日《光明日报》）。

对英雄式的劳动和经历的艰难困苦的描述，道出了高度的献身精神和责任感，也表明了知青们的这种努力不仅为生产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导致了知青与乡村的同化。但是，上述描述可能更多地反映了报纸表扬的目的而不是下乡知青们的实际态度。例如，曾在军队农场落户的两位被采访者以某种愤怒的语气描绘说，一切以完成橡胶种植任务为先，而不惜牺牲生存条件和文化生活。当新闻界向那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顾伤病坚持劳动和为了事业不顾伤病（有些作出了牺牲）的青年们欢呼叫好时，基层的现实却可能是医疗保健和安全保障的被抛弃，而不是青年英雄主义。<sup>107</sup>

不过，献身精神毫无疑问在那些可歌可泣的劳动事迹里起着重要的作用。真正革命的青年会自己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去。由于进取本身的刺激和冒险，也由于成为先进分子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成就感以及可能入党和提拔到领导岗位的前景，他们就会自愿去这么做。（前面已经说过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地位在军队农场里极高。）他们的献身行为会很好地感染其他集体成员，加强团结，提高凝聚力。一些在将荒山野岭开垦成农场的工作中取得了成就的下乡知青小组由于受到一些上级象征性的回报，如被授予“先进集体”称号和参加省里的下乡知青代表大会等。<sup>108</sup>它们的团结就会得到进一步加强。集体因素显然非常重要。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在生产队插队的下乡知青往往缺乏很强的集体精神，没有较高的乐于克服困难的士气，结果导致农民对那些懒惰和脱离公社的城市青年的不满。相反，组织和领导得较好的下乡知识青年集体，则有能力使成员们产生压力而不是懒散，这种压力即使难以导致他们做出献身行为，至少也会使他们劳动得更加勤奋。<sup>109</sup>然而，对于那些被说服和教育的对象来说，他们会把集体帮助他们的努力看作是强制而不是纪律约束。在军队农场情况更是如此，那里同一小组在劳动中所受的压力比等级森严的准军

事部队的训练时还要大。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指责知青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并没有全错。所以说，除了纪律因素和报答因素外，把下乡知青劳动小组连在一起的粘合剂可能还有强迫性因素。但是，无论其原因多么复杂，公开组织的下乡知青为主的劳动单位无疑对中国农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对偏远地区。

### E.现实与可能之间的巨大差别

1975年，美国一份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重要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农村地区教育和培训的扩大，劳动人员的不断增多，关于肥料和机械的经验以及自1968年起有1000万中学毕业生从城市被派往农村，都使农业受益。”<sup>100</sup>城市青年的下乡使农村受益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如果把下乡青年所作的贡献加起来，所列出的表格确实将会很长。然而，要估量出这些受益的份量究竟有多大却很难。比如，我们不知道自1968年以来的农业增产有多大部分应该归功于下乡青年的贡献。我们甚至不能确定下乡知青为农村带来的好处是否是纯粹的好处，就是说，他们的贡献的全部价值是否超过了全部下乡工作所付出的代价，假设二者都可测量的话。不过，由于知青下乡工作并不是仅仅为了刺激农村的发展，而是还有另外的目的，因而，即使农村受到了纯粹的“损失”，这一工作也会继续进行。

如果依据某些客观的标准评价知青下乡这一计划是可能的话（不管它多么不精确），那么结果便是，下乡知青在农村所作的贡献是比较小的。事实上下乡知识青年在整个农村只起着很小一部分带头作用，只进行了微不足道的基本的科学试验。如果考虑到回乡青年农民的因素，他们在公社学校里当教师和赤脚医生的比例也很低。然而，因下乡知青们分布在中国农村和边境的人数不等，故而在某些特定地区，他们的贡献也可能极其重要。

如果我们再检查一下下乡计划本身，便很难避开这样一个结论，即在下乡青年的实际功绩和可能功绩之间有一个鸿沟。即使人们提供了能使每一个知青都积极改变乡村、促进乡村现代化的最佳条件，这个鸿沟也是明显存在着。许许多多积极性不高的下乡知识青年并没有为乡村做出什么包括劳动在内的贡献，倒使农民觉得他们是种负担而厌恶他们。况且，我们在第2章指出过，有些下乡知识青年并不是落户到明显需要他们的村子里，而是到仅仅能够接受他们的村子里。前面有统计数字表明，13—15%的下乡知识青年充当着主要的政治文化——技术角色，但自1973年起，这一百分比显然并没有增大。另有20—30%的人担任了较低的职务，那些在统计数字中没有被点到的知青无疑也在以其他非正规的方式起着作用。但是，如果这些统计数字是精确的，那么就意味着大约有一半的青年除了体力活外没有作出什么其它贡献。或者说，这些下乡知青并没有象先进典型那样，既是一名“普通的劳动者”，同时又起到改变农村面貌的“催化剂”的作用。<sup>m</sup>

这些发现使我们对下乡工作的实施计划发生了怀疑。“上山下乡”不仅仅是把城市青年送到农村，而是把城市知识青年送到农村的计划。然而现在约有一半人只是干些体力活。如果这同计划者们的目的有关，那么又何必让这些知识青年接受学校基础教育外的教育和培训呢？不错，人们早已认识到，随着现代化的提高会愈加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劳动者，但小学教育程度不就足以能完成大多数农活了吗？反过来说，如果政策制订者的意图是使农村充满有知识的劳力，那么为什么只有大约一半的知青参加可用得上他们的知识的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大约只有一半”实际上还是非常宽泛的估算，它不仅包含所有业余活动，而且它所包含的有些政治职务和文化——技术工作事实上并不需要受第二次教育，如开手扶拖拉机。进一步说，有些职务所需要的技术训练常常也并不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城市第二课堂和农村短期培训班所

提供的。

毫无疑问，要使教育做到既要最大限度地使用下乡知青，又要不造成一点浪费的确是很困难的。公正地说，无论是什么地方，都很难使正规的教育同受教育者实际所做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况且，这一计划在中国的实施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在某种程度上，红卫兵一代所受的正规教育并不完善这一事实妨碍了将下乡知青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力量来使用的努力。从文化大革命起，计划的设计者和政策制订者便从实践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采取了新措施，如为下乡青年提供更多的技术培训机会等。不过，种种压力却又限制了下乡青年承担的文化——技术任务的完成程度。一种压力是回乡农村知青不断受到任用。当下乡知青单独建点落户时，这种压力便不存在，但这样下乡知青必须干所有的体力活，有许多人只能从头到尾都只干体力活。此外，文化——技术作用的地位也并没有得到很快的提高。不过，国家许诺要迅速实现农业现代化，这可能会改变这种状况。

至于适应问题，有些下乡知识青年很看重下乡落户同招工回城的关系，于是他们便算计着作出积极贡献以为自己赚张回城票。可结果是，作出贡献或许还提高了成功地同化于农村生活的可能性。在农民们看来，一个作出贡献的城市青年比没作出贡献的城市青年更容易接受，显然这个因素也影响着知青与农民结合成功程度的变化。而就下乡知青而言，他们有许多人在村子里寻找能使自己的存在变得更有意义、更有影响的活干。对农村发展作出有形的贡献就可产生这种意义，同时也提高了个人或集体在农村的地位。不过，贡献的大小取决于它们使知青们内心感到满足的程度。干体力活可能是使人最不称心的事。从事开拓性劳动的集体所取得的成就能使知青们有一种价值感，但值得怀疑的是，长期的农业劳动会不会使下乡知青们厌倦一个普通农场职工的日常生活呢？对于那些现在回城当了工人的知青来说，到了城

市便是对做体力活的补偿。在那儿有获得技能和做更复杂的技术工作的机会。但是，除非有越来越多现在只干着农村体力活的下乡知青可以从事运用他们的知识的有意义的活动，否则，他们不适应农村生活的一个主要根源便将永远存在。我的观点是，对于这些知识青年来说，上山下乡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目标。这些下乡知青在农村自始至终在干着体力活；他们并没有弥合脑力和体力劳动二者间的差别。

注释：

1. 小队和大队一级的干部都被要求不应因工作而脱离体力劳动。例如，小队长是不脱产的，虽然他可以因参加会议而计工分。大队党支部书记和革委会主任通常是半脱产的，但近来要求大队干部每年得参加 300 天的劳动。公社干部是脱产的行政干部，但是，按照干部应该参加体力劳动的原则，他们每年也得至少正式参加 60 天的田间劳动。最近要求的时间更长，要达到 200 天；赤脚医生和会计可以半脱产；全日制学校的教师在繁忙的季节可以全部脱产。生产队和大队一级干部的津贴形式是工分，公社一级干部才能由国家开工资。关于农村干部报酬方式总的情况，可参看 A·多克·巴尼特：《中国的干部、官僚和政治权力》（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67 年版）一书的第二、三部分。关于最近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政策变化，参看新华社 1976 年 12 月 24 日发的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6 年 12 月 27 日发第 249 期。
2. 这些区分是由我基于被采访者的叙述、新闻媒介的报道以及其它二手资料而作出的。
3. 有关邢燕子的文章可参看 1968 年 7 月 26 日《人民日报》；1970 年 3 月 30 日《人民日报》；北京广播电台 1974 年 4 月 30 日消息，1974 年 5 月 14 日《国外广播信息社》第 94 期。
4. 朱克家：《扎根农村干革命》第 51—56 页；朱克家：《我爱边疆一草一木》，1972 年 5 月 5 日《光明日报》；1972 年 9 月 12 日《人民日报》；1973 年 5 月 20 日、1975 年 10 月 18 日《人民日报》；1973 年 8 月 24 日《北京周报》16 卷第 34 期第 23 页



- “一位年青人的心愿”；1975年1月24日《北京周报》18卷第4期第10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以及1974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的文章。
3. 1970年8月3日和1972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也可参看1972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的文章）。
  6. 1973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
  7. 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1972年8月22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2年8月29日第169期和1973年12月21日的《光明日报》。她哥哥的日记登在1969年11月29日第12期的《红旗》杂志上，1969年12月29日第669期的《中国大陆期刊文摘》上登有译文。
  8. 1975年2月13日《人民日报》。
  9. 1964年4月23日《解放日报》文章：《来自农村和边疆地区的上海知青齐聚一堂汇报成就》，见1964年9月11日《中国大陆新闻综述》增刊第125期。同类文章可参看1965年11月8日《中国大陆新闻综述》增刊第145期刊登的1965年8月15日上海《新民晚报》的文章。
  10. 《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批判文选》，1967年4月出版，见1969年5月5日《中国大陆期刊文摘》第653期第5页。
  1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1972年10月16日消息，见《国外广播信息社》1972年10月19日第204期；呼和浩特广播电台1972年12月22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2年12月29日第251期。
  12. 贵阳广播电台1973年9月8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9月13日第178期。
  13. 福州广播电台1975年12月23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6年1月6日第3期。
  14. 关于农村党员在各个权力阶层中的分布情况的分析，可参看米切尔·奥克森伯格：《中国农村的地方领导，1962-1965》第170-180页。
  15. 1974年8月28日《人民日报》，该文描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个公社的情况。1973年8月23日的《人民日报》刊文，甘肃省白银一个公社不愿任用知青，而宁愿任用当地青年。
  16. 文化——技术任用情况被夸大了，因为一些额外的职务被包括了进来；而领导集体中的人数可能被缩小了，因为有一些权力阶层的人可能没有被包括进来。

17. 据安炳荣 (音译):《中国人民公社的政治经济》第639—640页。
18. 1975年1月7日长春广播电台消息。据《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1月10日第7期, 以及1975年12月27日长春广播电台消息,《世界广播综述——远东篇》1976年1月10日第5104期。
19. 1973年1月, 文化——技术工作包括教师、赤脚医生、农业技术人员、会计和拖拉机手。两年以后, 除了包括以上的工种以外, 还加入了牲口饲养员和理论辅导员。由于工种的增加, 文化——技术工作的任用人数如果没有增加, 也不会减少。内蒙古的情况参看后面的表15。
20. 辽宁省是表14中下乡知青总人数暂时下降的唯一省份。这一下降反映了下乡知青被重新安排工作的情况, 同时也可能是对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进行更为详细的区分的结果。
21. 武汉广播电台1975年10月22日消息, 据《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11月3日第212期。
22. 需要指出的是, 1974年辽宁省的任用人数不包括这一年居住在农村的22万名下乡知青。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12月26日第249期。
23. 一些下乡知青在去农村之前就已加入了共青团。可参看《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3月31日第62期刊登的1975年3月19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文章。
24. 维克多·C·芬内尔著《中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 1949—1966》,《中国季刊》第42期, 1970年4—6月, 第116页。
25. 《北京周报》1973年5月11日第16卷第19期第7页刊载的《与工农相结合》一文。
26. 石家庄广播电台1975年3月8日消息, 据《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3月17日第52期。
27. 例如, 河北省的天津地区 (原文如此——译者) 1973年在40000名下乡知青中, 有12600名被任用主要的政治和文化——技术职务中, 占31.5%, 整个河北省则占20.8%。参看《扎根农村干革命》一书第24页和表13。在甘肃省会宁县, 5000名下乡知青中, 有1620名成了教师, 1500名成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辅导员, 1265名成了科学实验小组的成员。尽管一些个人无疑参加了不止一种工

作或活动，主要和次要两者任用的比例之和也达到了88%，远远超出了全国范围内的最高估计数45%。参看1973年5月4日《人民日报》。江西省罗坪县礼林公社200名下乡知青中有39名入了党，比例达到17%，而当时江西全省的比例只有0.4%。参看1973年《人民日报》和表13。从被采访者反映的情况看，知青受任用的比例并不高。一些知青提到了自己所在生产大队主要职务任用的比例，都在10%以下。如有一个大队有53名下乡知青，其中2人当了教师，3人当了干部。有一个大队例外，该大队有30名下乡知青，13.1%受到了任用：2人成了教师，1人成了接生员，1人成了木匠。有一位被采访者还了解一个邻近大队的情况，那儿有约20名下乡知青，他们担当的职任非常重大：其中约有一半人成了教师、干部或当地工厂的工人。但被我采访的知青中基本上无人入党。其中一位知青认为，由于同香港比较接近，在吸收党员时就要作慎重考虑。然而，表13中广东的数据表明，该省知青入党比例比全国平均数还稍高。需要指出的是，多数被采访者是在强调任用知青之前离开中国的。

28. 1973年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各单位的有关统计数公布过，但下乡知青的总人数却没有。从1969年以来，7200名下乡知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5000人加入了共青团；2080名成为连队或机关干部；190名成了共青团团委的副书记；78名成了团或师党委委员（参看1973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当然，这些数据指的是广州军区下辖三省（湖南、广西、广东）军队农场下乡知青的情况。
29. 《中国大陆新闻综述》1973年2月16日第910期第3页所载文章认为，兵团的知青是一个经过特殊挑选的阶层。但是兵团中也存在调整问题（参看第4章）。然而，正如第3章中所指出的，一些雄心勃勃的年青人也可能选择到象延安这样地方的农村去。从统计结果看，延安地区20000名下乡知青受任用的比例大大高于整个陕西省的平均数。1973年，延安地区有1.5%的下乡知青入了党，但陕西全省范围内只有0.28%入了党；延安地区入团的下乡知青有15%，但全省范围内只有5%；延安地区担任干部的知青有11.5%，而全省范围内只有6.3%。关于陕西省的有关数据，可参看表13；关于延安地区的数据，参看1973年11月15日新华社消息，载《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11月15日第221期。
30. 一位曾下放到军队农场的被访问者说，知青有提升到连长一级的可能，但实际上

这种事很少发生。由于生产建设兵团的高层领导都被正规和退伍军人占据了，下乡知青副连长一级以上职务的提升常常受到他们的阻碍。因为有关兵团领导集团的具体数据还不完善。所以，关于这一点，还不能进行详细的分析。但有关广州军区的数据（见注 28）以及表 15-17 表明，兵团知青入党的人数多于担任干部的人数，而地方的情况却正相反。关于国营农场，一份有关云南国营农垦场 100000 名下乡知青的报告表明，入党的知青人数多于担任领导的人数：2.7% 的知青入了党，33% 入了团，而只有 2.5% 任了领导。参看 1976 年 1 月 9 日第 6 期《国外广播信息社》所载 1975 年 12 月 21 日昆明广播电台播出的消息。国营或军队农场中取得成就的知青极有可能被吸收入党，但只有较少的知青担任行政职务。

31. 1969 年 9 月 22 日第 655 期《中国大陆期刊文摘》载 1969 年 8 月 27 日《红旗》杂志文《用毛泽东思想对下乡知青进行再教育》，也可参看 1972 年 8 月 22 日《光明日报》，该期报纸刊登了福建省一个山村的消息，这儿的人认为知青即使已在村里呆了二或三年，他们也不能任村里的领导。
32. 1973 年 7 月 23 日《人民日报》，其中一个原因是下乡知青一般都来自很远的外地，因此很难对他们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进行审查，而且，审查工作也一般是知青入了党以后才进行的。
33. 1973 年 7 月 25 日《人民日报》。
34. 接受采访者再三强调了这点。但是，应该指出的是，下乡知青确实存在一个调整问题，他们对城市存在偏好。有关这一问题的一个例子，可参看 1975 年 5 月 12 日《人民日报》。
35. 1974 年 1 月 20 日《光明日报》，此事发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钟山县。
36. 1971 年 6 月 1 日第 6 期第 40 页《红旗》杂志文《一个社会主义教育普及网》，P.J. 西博尔特著《中国的革命教育》引用了该文，但在“31% 是知识青年……”（见该书第 221 页）一句中省略了“回乡”二字，国际科技出版社 1973 年版。
37. 1969 到 1972 年间的《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有关知青教育问题的文章中并没有提到南安县。
38. 格雷厄姆·约翰遜：《中国南方的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未出版；也可参看

1973年5月4日《人民日报》。会宁县统计数据中有可能也包括了回乡农村知青。

39. 这位知青下放在发展程度较高的博罗县（参看第4章）。
40. 小威廉·L·帕里什：《中国农村的政治参与》（未发表）。也可参看奥克森伯格：《中国农村的地方领导》第183—184页，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41. 1974年1月7日《光明日报》。文化——技术工作的具体分布情况如下：14名教师、4名拖拉机手、6名科学实验小组组长和一名农业技术员。
42. 个别种类下乡知青的任用比例可能会高些。如江西省罗坪县200名下乡知青中有39人入了党。比例为17%。见注27。
43. 1975年2月13日《人民日报》。
44. 1976年7月9日《人民日报》。
45. 1973年4月30日《人民日报》。
46. 1972年8月29日《光明日报》。此事发生在河北省三河县。
47. 1973年8月18日《光明日报》。此事发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
48. 关于下乡知青不愿任职的其它例子，可参看1968年7月25日、1971年4月23日和1972年2月25日《人民日报》以及1970年9月19日《光明日报》。
49. 这位被采访者于1970年离开中国。从那以后，逐渐明显地形成了一种从赤脚医生中招收医学院学生的方式（其中有关信息是1975年由哥伦比亚大学的迈伦·科恩教授提供的）。这里，这位知青指出了赤脚医生和医学院学生之间的差异。当时，中国有大约一百万赤脚医生，而医学院学生只占中国30或40万高校学生的一小部分。参看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第21页。在1957—1958年间，434,600名学生中只有54800从事卫生事业；参看利奥·奥林斯著《共产党中国的专业人才和教育》第69页，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物，1961年。
50. 被采访者的报告。关于协调上下压力问题，一位后来成为兵团连长的被采访者也表述了同样的观点。
51. 参看1970年3月2日《人民日报》。该报列举了一件事例。一位在广东省开平县的下乡知青成了一名会计，但却害怕犯错误。
52. 参看1968年5月5日《光明日报》。该报列举了一件事例，一位自愿到辽宁省新城

县农村的知青由于不被任用而变得非常失望。也可参看 1971 年 11 月 22 日《光明日报》。该报描述了沈阳军区下乡知青们的目标。

53. 这位被采访者来自工人阶级家庭，有资格受到主要的政治任用。但是他不喜欢农村生活，所以摒弃了可以得到的机会。
54. 一位被采访的知青由于所工作的学校缺乏必要的条件，在教了一学期后就辞去了教师职务。也可参看下文关于农村教育的论述。
55. 上文提到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积极分子家庭出身不好，她不可能被提升到高级的政治职务上。但非常有趣的是，她被允许当了一名教师。另一位接受采访的知青说，她认识同村的一名知青，该知青被选派到县城去参加一个全县范围的低级中学教师培训班。但在发现了他出身不好以后，他又被遣送回村。许多出身不好的知青都认为自己的家庭出身是影响其提升的致命障碍。当被问到任用问题时，他们会耸耸肩，然后回答说，只有那些出身好的知青才有可能受到提升。参看《扎根农村干革命》第 117—123 页。这里讲了一位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湖南省零陵县知青的故事。开始时，他心里充满不满情绪，但后来他在阶级斗争中受到了教育，他成了一名宣传员，最后他负责灭虫和机械修理，成了一个青年小组的领导人。另一个同样的例子可参看 1973 年 8 月 23 日的《人民日报》所载的发生在江苏省宝应县的事例。
56. 华国锋：《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第 10 页。
57. 新闻媒介却报告说缺少经过训练的专业人员。广东省屯昌县一个大队没有人能修理二十台机器中的一台。参看西博尔特：《中国的革命教育》第 182 页《四种新型的学校》。
58. 利奥·奥林斯：《共产党中国的教育》第 507 页。
59. 1973 年 12 月 14 日《人民日报》。
60. 1964 年 3 月 2 日《中国大陆新闻综述》第 118 期增刊载 1963 年 5 月 4 日《北京日报》文。
61. 1973 年 7 月 1 日《光明日报》。
62. 1974 年 5 月 5 日《人民日报》。
63. 参看 1975 年 7 月 2 日第 573 期《中国大陆新闻综述》“上海再次强调教育改革”。

64. 有一则批评说，学生们知道得很少，有些人“甚至把水泥施到田里，以为它能除害虫”，参看《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1月21日第14期载1974年1月15日福州广播电台消息。关于具体知识提高的事例，参看1975年4月22日《光明日报》和1975年7月2日《中国大陆新闻综述》第573期。
65. 1974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66. 参看注64引用的关于一所县城学校的广播报道。关于城镇教育尽力适应农村需要的情况，参看1975年5月11日《光明日报》。
67. 1968至1972年间出现在新闻媒体的文章中，提到下乡知青担任了赤脚医生或卫生员的总共有62处，是主要文化——技术任用工作中最多的单项；提到在当地学校教书的文章数次之，有37篇；提到任会计的有35篇；机械员有23篇；农业技术员有15篇。
68. “刘少奇讲话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一百个例子”，见《中国大陆新闻综述》1967年4月4日增刊第173期第12页载1967年2月1日和1967年2月8日《井冈山》的文章。
69.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1972年10月16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2年10月19日第204期以及1972年12月13日呼和浩特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2年12月15日第243期。
70. 1974年6月15日《人民日报》，此事发生在河南省濉溪县。
71. 1973年6月15日的《人民日报》（也可参看1973年7月17日《光明日报》）登载了吉林省长岭县一个由县里举办的训练机构的例子。1974年8月17日的《光明日报》则刊登了一则广东省一个县建立公社一级的业余学校的事例。
72. 1972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
73. 《红旗》1975年第5期文《学校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工具》。
74. 1974年7月5日石家庄广播电台播出，载于《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7月8日第131期。
75. 1974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参看1975年3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则关于上海9个公社组织了一所大学的消息。
76. 哈尔滨广播电台1973年11月2日播出的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11月7日

第 215 期和 1974 年 6 月 16 日《光明日报》登载的文章。另外的例子还可参看 1974 年 6 月 7 日《人民日报》；1974 年 7 月 26 日 17 卷第 30 期第 23 页《北京周报》文《下乡知青函授课程》，以及 1974 年 6 月 12 日第 512 期《中国大陆新闻综述》。还可参看 1975 年 7 月 4 日播出的昆明人民广播电台的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 年 7 月 10 日第 133 期；1975 年 5 月 12 日《人民日报》关于武汉函授学校的文章；1973 年 7 月 3 日《人民日报》关于成都函授学校的文章，以及 1975 年 3 月 12 日《光明日报》关于上海农业大学办函授学校的报道。

77. 1973 年 8 月，黑龙江召开了一个省级图书发行会议。参看 1974 年 1 月 9 日《光明日报》。
78. 1973 年 6 月 27 日香港《大公报》。
79. 1974 年 1 月 9 日《光明日报》；1973 年 11 月 25 日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 年 12 月 3 日第 232 期。广播中提到，“革命工作”是针对坏习惯和不良习气的。
80. 1973 年 8 月 10 日《人民日报》或 1973 年 8 月 10 日《光明日报》。
81. 1975 年 7 月 3 日《人民日报》；以及《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 年 7 月 21 日第 140 期载新华社 1975 年 7 月 18 日消息。
82. 1973 年 1 月 16 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 年 1 月 18 日第 13 期；1974 年 1 月 17 日《光明日报》；1974 年 1 月 17 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 年 1 月 25 日第 18 期；1975 年 2 月 20 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 年 2 月 27 日第 40 期；以及 1975 年 5 月 3 日《人民日报》。
83. 唯一一位参加过一个县级赤脚医生培训班的接受采访的知青说。他的大多数培训班的同学都是当地青年。
84. 新闻媒体中大量报道了知识青年的政治学习情况，但造成的印象却是，“政治挂帅”更多地是一种人为的现象而不是实际情况；参看第 4 章。
85. 一位被采访的知青说，他们公社的机器修理站任用了两名工科院校的毕业生。但是由于熟练工人就能做所有的工作，这两人就又转到县城里去了。参看本尼迪克特·斯塔维斯：《进行绿色革命》（康乃尔大学出版社 1974 年版）特别是该书第



4章“加强农业技术服务”，也可参看下文“技术革新”部分。

86. 小克利夫顿·R·沃顿著《教育和农业增长》，芝加哥1965年阿尔定版。
87. 1972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
88. A·多克·巴内特著《毛以后的中国》第191页《论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和它对世界的历史教训》。
89. 新华社1976年5月3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6年5月5日第88期。
90. 1975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有可能这些青年队中有些是独立的。
91. 1973年11月7日《人民日报》第3版，同一标题两则报道中的第2则。
92. 1972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其它关于这些下乡知青的故事见《热情关怀下乡知识青年的成长》第28—38页；1974年7月18日《人民日报》。
93. 齐言（音译）：《以更广的方式投入农业》，特别是该报：\*—。
94. 严欣：《做帮助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促进派》。
95. 参看1973年11月3日《光明日报》，该报报道了湖北省潜江一位下乡知青向党支部汇报知青中的资本主义倾向，从而受到领导支持并同这种倾向展开了斗争。
96. 1974年1月20日《光明日报》，事例来自广西自治区陆山县。
97. 1973年11月7日《人民日报》第3版同一标题下两则消息的第二则；1974年6月8日《人民日报》，这些文章讲述了一位下放到陕西省延川县的北京知青同当地领导产生一系列矛盾的故事。
98. 1972年2月5日《光明日报》，事例来自河北涿鹿县；1972年10月4日《光明日报》，事例讲的是河北省冀县的，在以上两个事例中，知青和干部矛盾的解决者都是妇女。
99. 1975年7月15日《人民日报》，事例来自辽宁省新宾县。
100. 下乡知青作为一个集体在孙玉文一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101. 1974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事例来自辽宁省海城。
102. 1971年1月11日《人民日报》，湖南省沅江县一个大队里，生产队里的“一些人”想迫使会计给社员多分东西，一位女知青在一位贫穷的下中农的帮助下出面支持会计，其他知青则认为这不关她的事或不给予她以支持。
103. 注99中提到的孙玉文是一位矿工的儿子，在97中提到的延川县的知青也都有革

命的背景。

104. 知青干部也会受到来自同伴的压力，要求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们自己办好事。有一个事例，知青们想从一位知青会计那儿借钱，因为他们知道生产队刚出售了棉花，有些钱，会计坚持原则，拒绝了。参看 1970 年 2 月 9 日《人民日报》。
105. 文革期间，广东省新会县发生过这样的事：“黄埔大队下乡知青张××揭露了村里的干部私分粮食的事实。大队干部于是就在公社干部面前诋毁她，不让她再呆在原来的生产队，她只能含泪离开了原来的村庄”。参看 1968 年 1 月第 7 期《支农红旗》，《中国大陆新闻综述》1968 年 2 月 26 日第 4125 期。
106. 1970 年 12 月 17 日《光明日报》，事例来自河北省固安县。
107. 1971 年 9 月 11 日《人民日报》讲了一则有趣的故事：一位吉林省科左后旗的知青担任了干部后就对农民失去了感情。另一事例刊登在 1970 年 1 月 30 日的《人民日报》，讲的是辽宁省桓仁县一位女知青当了生产队长后，没有执行群众路线的事。
108. 1971 年 11 月 22 日《光明日报》，讲的是广西自治区龙临县的事。
109. 1972 年 10 月 16 日《人民日报》，载 1972 年 10 月 30 日第 5244 期《中国大陆新闻综述》，事例来自江苏省宝应县。
110. 关于这点，参看小克里夫顿·R·沃顿著《危机、动荡和农民的生存》。
111. 知青的建议至少可能会受到仔细的考虑，例如，1973 年 1 月 18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事例，陕西省陇县一群下乡知青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求建立一座水电站。
112. 1973 年 5 月 26 日《人民日报》，事例来自云南省洱源县。
113. 1975 年 5 月 30 日《光明日报》，上面登载了一则事例，辽宁省开源县一位女知青被下放到一个生产队以改造它，她几乎马上就成为了该生产队的队长。也可参看 1974 年 1 月 3 日《光明日报》，上面讲述了内蒙古的一则事例，1975 年早些时出版了一篇重要文章，提到“正越来越多”地“有计划派遣更多的知青到落后的生产队中去”，其中提到了辽宁的开源县，该县在 1974 年把 200 名“优秀知青”“下放到落后的生产队”，让他们担当重任，“他们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参看 1975 年

- 12月23日《人民日报》文《一千二百万知识青年光荣务农》。
114. 1974年9月12日《光明日报》登载了北京郊区延庆县一则事例。另外，著名的榜样、后来成了中央委员的回乡青年邢燕子也曾倡导组织了一个“妇女捕鱼队”，由于妇女被认为不能干这种工作，所以她们一时被人看不起。1958年7月26日《人民日报》。
115. 芝加哥大学小威廉·L·帕里什教授的私人信件。
116. 参看1972年6月12日《光明日报》中福建省上杭县的事例。
117. 杰克·陈：《走运的一年》第26页。
118. 几则事例的出处按顺序依次如下：1972年1月24日《人民日报》；1973年8月23日《人民日报》；1972年8月16日《光明日报》；1972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197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载1972年10月30日第5244期《中国大陆新闻综述》）；1972年2月9日《人民日报》；1973年7月25日《光明日报》；1974年3月28日《光明日报》；1973年8月23日《人民日报》；1972年11月20日《光明日报》；1972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1972年2月25日《人民日报》。
119. 1974年12月29日新华社《每日新闻公报》《中国农村群众性的科学实践产生了新的成果》。
120. 《纽约时报》1971年7月3日第2版耶南的文章；1974年10月10日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新会县的事，载《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10月11日第199期。
121. 其中一则事例可参看1972年10月27日《光明日报》（载1972年11月9日第5252期《中国大陆新闻综述》），讲述了知青柳昌银的事迹。他在50年代回到了吉林省安图县朝鲜族山村，并花了许多年时间试验在山上种植稻子。
122. 耨为农（音译）：《加强农业科学研究》。
123. 《热情关怀下乡知识青年的成长》第44—46页。
124. 参看注119。
125.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研究》第163—164页。
126. 耨为农：《加强农业科学研究》第32页写道“轻视专门的农业研究机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作用是错误的”。

127. 1971年2月21日《光明日报》，事例来自河南省内黄县，也有一些年青人通过自学，取得了一些成就，然后又同专业科研机构发生了联系。下放到河北省农村的程有志的事迹曾得到广泛宣传，参看1972年5月15日《人民日报》，以及1974年5月29日新华社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5月31日第106期，程还成了他所在大队的支部书记。
128. 康乃尔大学本尼迪克特·斯塔维斯博士的私人来信。
129.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研究》第164页。
130. 1973年9月17日《人民日报》；也许他已经从著名的上海少年宫的设施中得益了。
131. 1973年12月7日《光明日报》；文革期间，许多青年没有下乡，呆在家里，其中一些人在坚持自学。
132. 把盐碱地转变成可耕地的这位知青是在1964年下乡的；她的事迹报道于1972年（是12个榜样中的第11个）。同样，水果专家程有志于1964年来到农村；他的事迹也在70年代得到报道；参看注127。
133. 参看本章注49。
134. 有关这问题的材料，参看西博尔特：《中国的革命教育》第7部分《农村学校的基础教育》。
135. 关于为农村教师提供培训问题，曾作过一些努力。参看西博尔特：《中国的革命教育》第166-177页，以及1971年9月16日第386期《中国大陆新闻综述》，该杂志记述了广东师范学院工作队的事迹，这些努力大部分是为村办小学附设的低级中学培养教师，参看1974年10月29日《光明日报》，《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12月3日第241期，上面提到了北京师范学院的培训项目。
136. 1975年2月18日《人民日报》，事迹来自贵州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
137. 参看唐纳德·J·芒罗著《共产党中国的平均思想和教育情况》第256-304页。
138. 1975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关于全国的数据，参看约翰·W·刘易斯：《中国之旅札记》第156页；以及丛朴（音译）：《中国怎样普及教育》第9页。1976年，中国在校小学生达15000万，参看1976年6月1日《人民日报》。
139. 1970年7月9日《人民日报》，事迹来自陕西省宜川县。

140. 1973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
141. 1972年8月10日《人民日报》。
142. 1973年2月18日《人民日报》。
143. 1968到1972年间《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中出现的有关下乡知青改造的文章中，提到下乡知青成为教师的有37次，是主要的文化——技术职务中提到次数第二多的。参看本章注67。
144. 1973年2月21日《光明日报》。
145. 关于瑶族的情况，参看1973年1月11日《人民日报》，上面讲述了广西自治区钟山县的情况，以及1973年8月23日《人民日报》，上面讲述了巴马瑶族自治县的情况；关于布依族的情况，参看1972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上面讲述了贵州省册亨布依族自治县的情况；关于东乡族的情况，参看1974年5月4日《人民日报》，讲的是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的情况。
146. 1972年9月14日昆明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2年9月15日第181期，事例来自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147. 其中一个事例可参看1970年5月12日《光明日报》，发生在新疆自治区克尔克孜族。
148. 1975年5月25日《人民日报》，事例发生在甘肃省康乐县。
149. 1975年2月18日《人民日报》，事例发生在四川省巫溪县。一位当过教师的被采访者抱怨说，她所在村子的干部不去修理课桌椅，对学校的事不管不问。
150. 1973年12月15日《光明日报》，事例发生在江苏省盐城县。注145中提到的事例也包括了一些附加性的安排，如允许孩子们带着自己的弟弟或妹妹来上学。参看1974年5月4日《人民日报》，事例发生在河南省郑县。
151. 参看西博尔特：《中国的革命教育》第202页《贫下中农具有了社会主义文化》，文章是有关甘肃省临洮县的一篇调查报告。
152. 1973年1月11日《人民日报》，事例来自广西自治区钟山县。
153. 西博尔特：《中国的革命教育》第202页。
154. 由于退学率还不知，所以很难对关于教育普及已取得了很大进步的宣言进行估价，例如，据称1973年就有“93%的学龄儿童入了学”。参看丛朴：《中国怎样

普及教育》第9页。

155. 下乡知青也给成年人教文化。例如，1973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刊载的福建省顺昌县的事例，以及注92中提到过的红旗生产大队的事例。
156. 约翰·S·艾尔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省人口估计》第22页。估计进行的年代是1974年。下乡知青的数据来自表9。
157. 同上。河南：6580万（1974年）；新疆：860万（1974年）；内蒙古：770万（1974年）。
158. 1964年3月22日《工人日报》，《联合出版物研究处》第25108号第122期《共产主义中国文摘》，1964年6月16日。
159. 1969年7月28日《人民日报》，事例发生在辽宁省开原县。也可参看1973年7月24日《光明日报》中河南省东宋县一则相似的事例。
160. 1974年5月4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4年5月9日第91期。相似的事例还可参看1974年5月13日《人民日报》；以及1974年5月9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3年5月14日第93期。另外还有一个例子，事迹稍微小一些，参看1971年6月25日《光明日报》，讲的是1969年冬在内蒙古乌梁素湖边上建立一个军队农场的事。这个团级规模的农场中的2500到3000名青年大多来自象北京、天津、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两年内，他们开垦了近1万亩农田，建造了工厂，种植了1万多株果树，捕获了38万斤鱼并且还从湖沼中收割了大量的芦苇和灯心草。
161. 1974年6月7日第17卷第23期《北京周报》第31页《海南岛的热带作物更多了》，上面提到了建立新的橡胶基地的努力。
162. 1975年12月29日哈尔滨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6年1月6日第3期。
163. 西奥多·沙巴法：《中国正在变化的版图》第243页。纽约普雷格尔出版社，1972年。
164. 参看德怀特·珀金斯：《强制影响了中国农业的发展》第353页中的论述，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物1975年印行。
165. 下乡知青参加农田基本建设问题在争建大寨式县全国会议后得到了重视。参看

1975年12月19日长春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12月23日第247期。

166. 1972年5月1日兰州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2年5月3日第87期。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的例子很多。另外一个例子可参看1972年5月9日《光明日报》。上面讲到了西北一牧场的8位女知青的故事。她们住的草房四面通风,高天也挡不住雨。她们早上3点就起床,晚上很晚才回来。她们还得自己砍柴生火,等等。
167. 1973年6月12日《光明日报》。需要指出的是,3年前,知青中间流传着一个说法,说有些知青不愿意建造永久性的住所。他们认为自己在几年后一旦完成了再教育就要离开。另见1970年6月22日《光明日报》。
168. 1970年5月13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个发生在新疆的知青被困在矿井的故事。由于缺氧,油灯灭了,但是有几位知青仍然坚持在井底工作了40多分钟。1972年4月4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内蒙古一位女知青带病坚持工作的故事。1970年4月7日《光明日报》讲了吉林省一位男知青的事,他在修筑水利灌溉工程时得了肝病,但他仍然坚持干了20天,直到被送进医院。1972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记述了兵团的两位女知青为了抢救牲畜而献身的故事。1969年6月29日《光明日报》讲述了山西省朔县一位女知青,当她的手臂被卷进割草机时,为了保护割草机,她要求将自己的手臂砍掉的故事。
169. 提到这类“先进集体”的地方,包括南京广播电台1975年2月23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2月27日第40期;1975年8月11日广州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8月12日第156期;1975年11月6日成都广播电台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5年11月13日第220期;以及1976年6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
170. 黑龙江省明水县的一个人民公社发生过一个很有趣的事例。由于一些下乡知青抱怨生活条件差,当地领导就把他们分开居住,并让农民监督他们。这些分开居住的知青后来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一起开垦荒地。尽管“有些人思想发生了动摇”,但整个集体还是非常团结。参看1970年7月10日《光明日报》。
171. 小阿瑟·G·阿什布鲁克著《1975年中国经济概述》第30页。

## 第六章 对运动的稳定性、权威性的挑战

尽管下放知青原则上要终身定居于农村，但是有些知青事实上并非持久留在村里。本章第一部分拟就下乡知识青年被重新分配到城里工作专门作一分析。通过对重新分配的过程的考察，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下乡知青对农村生活的适应程度，并且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许多下乡知青，也许是大多数，并没有完全适应持久的农村生活。因此，插队落户不是自觉维持的，其顺利进行离不开思想和组织教育及物质和强制手段，不过首要的还是稳定的政治制度。尽管可以肯定，这种工作调动本身并非是造成政治不稳定的一个缘由，但是，假如这种政治制度由于某种原因而变得不稳定，给心怀不满的群众造成发泄怨气和表达自己利益的机会，那么其中下放知青将首当其冲，从而构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力量。从中国最近的政治历史来看，造成不稳定的事件实际上是以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发生的。许多下放知青利用那次动乱的机会，返城并抗议这种工作调动制度。本章的第二部分将专门对下乡知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反应作一考察。

### 1. 生活的转机——招工、招生、征兵

中国的报刊报道说：“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每年要有一些知识青年到工厂工作，参军，推荐上大学。”，



工厂、部队和大学成为脱离农村的主要途径。然而，分配进工厂、部队和大学是否就等于永远离开了农村，这一点并不明确。就进工厂工作而言，他可能被分配到城市或许县城的一家国营工厂，也可能是公社的一家工厂。如是后者，他仍然在农村挣工分，而不是拿工资和附加工资。参军复员也并不意味着就能永远回城里。1973年春，题为“教育大纲”的一份整理好的部队文件要求战士理解，退伍军人分配到工厂工作必须压缩，因为国家招工计划已经超员。然而，这一规定可能没有在下乡知青人员中实施，因为某种规定显然给予他们返城工作的权利。1975年，社会大力宣传复员的城市青年选择返回他们参军前下放的农村的事迹，尽管他们并不需要这么做。例如，沈阳一所中学的一个毕业生1968年到辽宁开原县落户。他在村里表现好而在1970年下半年参军。一退伍，他先回到了沈阳。但是，由于他思想积极，最后还是在他以前的生产队落了户。他并不需要这么做，因为如他所说，“我是个复员军人，按规定，可以回到沈阳找工作。”，他和其他下乡知青退伍军人自愿回农村的事例被赞颂为与“资产阶级法权”决裂。不过，虽规定退伍的下乡知青有权回城工作，人们也要问，效仿他们事迹的人究竟有多少。

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高等院校的毕业生一般都是回原单位。然而实际情况如何，不得而知。现以江苏无锡的一位青年为例，1968年他在本省北部的一个国营农场落户。农场改为军垦农场以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农场的领导。1970年他进上海复旦大学学生物，1973年8月毕业。生物系的党总支要他留在系里工作。这个居住在上海的机会与他的革命观念发生了冲突。他决定返回军垦农场，即使农场坐落在贫困地区。一回到农场，他的兵团就让他负责生物控制组的管理工作。后来他当上兵团的部门副主任，指导整个单位的科学试验，从而使他的职务与其所学专业相对口。这个例子说明，毕业生在分配时可以

有所选择。尽管没有有关分配工作的总的资料，但是，据 1974 年 11 月在澳大利亚访问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的成员说，北京大学 1974 年 1 月第一个毕业班的“大多数人已经返回原工作单位或原地区”，“原地区”可能是指分配到更高一级的农村，如县或专区。然而，“自工厂选拔来的学生大多数回到了工厂，而曾经是下乡知青的学生大多数”由国家计划委员会下属的科教办公室“分配到中央机关各部门”，“许多下乡知青没有返回他们的公社、国营农场或军垦农场的结论被许多关于再分配的文章所证实，这些文章典型地在暗示离开原单位去城里上大学就等于永远离开农村。”

1975 年，毕业生返回原单位工作的原则得到反复重申，且语词激烈，口号是“从公社中来，回公社里去”，大学毕业生坚决要求返回农村的事例得到了热情赞扬：“一毕业……他们以无产阶级精神反对资产阶级，表现出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以实际行动与旧的思想、旧的习惯势力决裂，拒绝挣工资，拒绝吃商品粮，与普通农民一样生活，走向农村，争当社会主义新型农民。”。换句话说，这些毕业生不想当国家干部，这种情况与文化大革命前及至 1975 年前的作法形成鲜明对比。

广泛执行大学毕业生回公社再当普通农民的原则，显然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即他们是否会有机会从事所学专业领域里的工作。一位 1968 年下乡的哈尔滨青年在 1971 年被选送到一所高校学外语。1975 年毕业时他主动要求当农民，申请获准，他回到了他的大队，在那儿，他“投入了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战斗”。国家为他的学习花了不少钱，他是否并且如何能够利用他学到的知识，这一点宣传报道中没有提。”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似乎有一种有区别的处理方法，以使返回农村的人，虽然不是国家干部，但至少可以从事他们的专业。以新疆为例，“今年，‘学生一毕业，从公社来回公社去’的原则将作为新疆自治区的农业院

校及有关学校的一条总的政策来执行。部分医学和师范院校的学生学业一完成，也将返回公社。其他院校……也将试行这一政策”。„一些省份的高等院校已办起“毕业后……从公社来回公社去试点班”，这也表明返乡不是自动的。„大学毕业生的分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高等教育不应造就一批精英的思想目标，显然难以与越来越复杂的经济和管理体制对人员的需求相一致。由于现时的大学毕业生数量很少，并且长期未能培养出新的大学毕业生，许多官僚机构急需大学毕业生。„此外，使大学毕业生降为普通农民已引发了决策者们之间的冲突。他们中的一些人觉得这一发明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是荒谬的（见第2章）。因而，如果实践继续急剧偏离既定方针，这并不令人吃惊。„就眼下的目的而言，无疑是对现实的部分歪曲为代价的，下乡知青被分配到学校、工厂和人民解放军中，将被视作长期或永久的回城。

下乡知青再分配到工厂、解放军和高等院校的总体范围不为人知。1975年美国发表的一个统计数字表明，25%或1968年至1973年底被送到农村的800万下乡知青中的200万人获得了再分配。这个资料，尽管不是难以置信的，但没有被证实。„各省份并未透露综合的统计数字，只有一些偶尔的披露，如在1972年底的云南，“大批的”下乡知青参加了“解放军、进了高等院校和工厂，或者到金融、贸易和文化部门工作。”„有些省份报道的下乡知青人数下降可以说明再分配的重要性。如在辽宁，据报道，1972年11月有近100万下乡知青，但到1973年3月只有71万。然而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其他因素如下乡知青与回乡知青之间的细小区别也是这些变化的原因。安徽报道说，1975年4月有50万下乡知青，而到了11月只有近40万；其后的广播指出“许多”下乡知青拒绝回城的机会，因而使人相信这一结论即数字的下降的确反应了再分配的情形。„大多数省份下乡知青统计数字并未显示出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实行再分配，因为又有许

多知青下乡，这造成了当时下乡知青数目的净增长。

再分配的比例是由许多地区性差异决定的，1973年，一位去广东顺德县的参观者发现，这一地区总数为1.1万人的下乡知青中仍有1万人在村里。”相比之下，一位去河北遵化县的访问者却获悉1973年这里几乎所有的下乡知青都已离开了乡村。”在河北冀县，自1965年以来，已有2030位年青人在这里落户，但到1973年只有952人仍在这里。”1968年初，6万名下乡知青落户在黑龙江建三江（音译）农场局辖下的国营农场，1976年中，仍有4万名留在农场。”县以下单位发布的数据差异更大。去北京市郊的红星公社的参观者们了解到，自1968年始，共有7200名城市青年落户在这里，但到1975年这个数字却是5600，说明其再分配的比例是22%。”在吉林省长岭县的第七公社，1972年只有“少数”下乡知青获得再分配。”一位被采访的知青说，广东增城县的一个公社里，总共800名下乡知青中，只有70多人于1972年回到了城区。其他消息提供者说，（他们通常仅对他们生产队的再分配情况有特殊的了解）他们那儿的比例，大大低于10%，有一个例外，四会县的一个生产队里50名下乡知青有12名进行了调动，但其中8人去了社办工厂，报刊的零星资料表明这一比例要高得多：在辽宁的一个知青点，1971年下乡的60名知青中，近乎一半被送到工厂和高等院校。”1964年有30名下乡知青落户在安徽岳西县一个山村里，十年后，只剩下14人。”

下乡知青能有一半获得调进城里的单位工作似乎是少见的，事实上，许多报道叙述了长期落户却未提及再分配。”此外，许多指数表明，再分配的比例不可能都有那么高。这其中包括每年逃往香港的几千下乡知青，包括具有良好阶级背景的下乡知青（被采访者强调，由于城市的大门始终向这部分知青敞开，故他们不可能留下来。）和非法回城的知青，还有许多关于因未能得

到再分配而导致信念危机的城市青年的故事。(见下)

将进高等院校、解放军和工厂的情况分开来看，就可以发现，在高校招生中，整体录取率低妨碍了一部分下乡知青入学。1970年至1972年间，共有20万人入学，1973年是15.3万人，1974年是16.7万人。<sup>\*</sup>如果这所有人都是下乡知青，他们最多也只占下乡知青的近6%。其实，这些学生是从工厂工人、士兵和农民、还有下乡知青中招来的。下乡知青被高等院校录取的真正比例事实上很低。1972年，10万福建下乡知青中有1738人被高校录取，80万四川下乡知青中有6400人被录取，分别占1.7%和0.8%。<sup>„</sup>同在1972年，黑龙江某生产建设兵团所辖的3400名下乡知青中有48人即1.4%被送进大学。<sup>„</sup>1973年的统计数字似乎没有，但是大量的新闻报道显示出下乡知青被送往大专院校的人数增加了。<sup>„</sup>

1974年黑龙江部队农场为高等院校送去了8300名学生（占1975年在该省军队农场服役的40万下乡知青中的2.1%）。<sup>„</sup>显然这些不完备的数据还不能勾画出知青升学的长期的趋势图表。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如果这些零散的数据反映了国家录取率的特点，它们将表明大学学生中有很大部分实际上来自下乡知青。如果把1972年的3个百分比运用于约700万在农村服务的知青总数中，结果是这样的：四川0.8%有5.6万名大学生，黑龙江农场1.4%有9.8万名，福建1.7%有11.9万名。前面我

---

<sup>\*</sup> 这些统计数字指的是中专以上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学院和大学，显然，它们不包括近年在农村迅速发展的农业“大学”的入学率（见第5章），这些“大学”的学生大多数不进行整整3年的课程学习。这些统计数字还不包括专业技术学校和师范学校的入学率。一些下乡知青被送到这类学校，但报界很少提及他们，也没有透露这类数据。

们曾指出，1970年至1972年间，全国范围内招收了20万大学生，由于高等院校是逐渐恢复的，大多数学生是在1972年入学的，如果假设1972年有12万新生入学，再以四川的百分比（0.8）看全国录取率，那么1972年有5.6万名或近一半的新生是下乡知青；如果以福建的百分比计算，几乎所有新生都是下乡知青。如果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1974年的百分比为基数计算，这将意味着这一年有16.8万名下乡知青（800万人中的2.1%）进了大学，比综合所有消息来源得出的总录取数还多出1000名。这些结果自然可能源于不准确的数据，或者它们说明，地区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是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下乡知青占高校录取数的极大部分，尽管当时知青个人上大学的机会很小。”事实上，下乡知青入学比例的不相称已成为1973年后期即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北京大学的政治问题。据一位中国留学生说，有一张大字报指出，1972年进外语系学习的85名学生中有68名来自农村，只有两人是真正的农民；66人是从北京插队的下乡知青，”为什么会发生这类事情，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讨论。

至于人民解放军对知青的征招，即使零散的统计数字也无法得到，只偶而见到一点有关下乡知青参军资料。”同样，下乡知青去工厂工作的数据也没有透露。然而，有关招工的新闻资料比有关征兵的要多得多，下乡知青也把招工视为离开乡村的主要途径。根据新闻材料和被采访者的判断，1970年至1972年，有许许多多的下乡知青被招工，但比例不平衡。”有几位被采访者埋怨，由于广东省工业落后，该省的知青再分配比例一直很低。”这几位被采访者听说在较北边的省份如湖北，有大量插队知青得到了工厂的工作。1973年，工业企业招工的速度放慢（见第2章），但1975年工厂招收下乡知青的比例又显著增长。”（根据一年后批判据说是由邓小平及其同伙吹起的“拔根风”运动来

看,)在湖北襄阳县,160名新近落户的知青被送到工厂当工人,或进城当干部。”在广东,“从1975年7月起,许多工厂被市劳动局授权征招那些在劳动和政治上表现好的知识青年填补空缺的岗位。”。

下乡知青获得的工作经常是在县城而不是在大城市或家乡城市的工厂里。”在远距离的调动中,一个上海青年也许要在内蒙古或黑龙江的公社服务多年,然后才能成为一名工人,而不是回到上海,如果这是很普遍的话,它将意味着下乡知青为偏僻城镇的工业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仅仅列举来自下乡知青的工厂工人数的多少并不说明问题。到中国的外国参观者了解到,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所在地),500名下乡知青中有20人在一家310名工人的县农业机械厂工作,而在河南辉县,县化肥厂的535名工人中有15人是插队知青。”这两个例子当然并不典型,但是,也许有200万下乡知青被再分配,其中大部分成为工厂工人,他们总体上的影响应是比较明显的,这一点是真实的。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一些下乡知青没有被再分配到城市工业单位,却去了公社或生产队的工厂,而其他一些被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经营的工业企业所招工。”由于统计数字的缺乏,使我们虽不能对这类调动作出准确的评估,但可以肯定,下乡知青以这些方式对中国农村的工业化也作出了贡献。

#### A.得以离开乡村的诸因素

原则上是“国家需要”决定着再分配。但是,一个城市青年能否真正获得再分配,不仅取决于他是否符合规章和条例,而且实际上更多地是取决于非正式因素。最普遍运用的原则是城市青年必须至少在农村呆上两年才能被再分配,决定能否被高校录取的具体规章已发表。这一过程包括志愿申请、个人所在单位的群众

推荐、领导同意和录取机构的学术评价。“条件包括需初中毕业、政治和工作表现好，还要有良好的阶级背景，尽管章程提倡录取一些来自剥削者家庭但表现突出的青年。决定工厂招工的课程没有公布，但很明显，它包括必须本人表现好，并且阶级背景好的优先。”

两个非正式因素对知青再分配有重要影响：知青所在农村单位以及在城市的其家庭的行为。原则上，农村单位应该拒绝那些捣蛋鬼得到再分配，但是，摆脱那些它不想要的下乡知青当然也是符合其利益的。不过，能公开说明这一点的证据几乎没有，那些通常表现不好的知青丧失了合法回城的机会，他们唯一的出路是非法离走，或幡然悔悟。“如果农村单位难以通过驱逐异己来满足地方的利益，它就能留住那些表现好的知青吗？留住有杰出表现的知青显然是个问题。正如前一章所指出的，许多对公社作出贡献的“先进”知青没能得到再分配。一些知青担心接受征兵可能反而会影响他们最终回城的机会，因为他们复员后仍将会成为公社的财产。新闻媒介对依据恰当的标准选送下乡知青而不是搞“本位主义”的生产队进行了表扬。”在一个部队农场里，知青等待选拔进行再分配的工作，必须要克服不愿意失去积极分子的“某些人”的反对意见方可进行。”但是，成绩突出的人硬被留下，从而导致表现一般的人得到再分配的程度也不能过分地夸大。被采访者都强调，表现好是获再分配的一个主要条件，而重视这一点为知青不冒犯农民提供了动力。”当那些表现好的知青得到再分配而那些对接受再教育无动于衷的“捣蛋鬼”却留在村里时，农民一直在抱怨，这是众所周知的，”而那些被高校录取的下放知青通常是被报界誉为有突出成绩的人。”

当进行分配时，是否存在着歧视下乡知青的现象呢？在高校招生中，每个农村行政机构都被分配了定额，在知青落户稠密的地区，数额可能大一些。”但是很明显，定额并不仅限于下乡知



青。政策声明呼吁要平等对待插队知青：“必须平等对待那些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sup>11</sup>它说明了歧视的存在。不过，在农村基层，抱怨这种不公平的呼声并不多见。有一位被采访者说，一个生产队干部的亲戚被提名上大学，而不是那些学业上更合格的下乡知青。事实上，下乡知青组成了大学新生人数的绝大部分，这一现象说明对下乡知青的歧视在选拔过程中也许并不重要。

有两个因素对下乡知青有利，或者至少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有利。一是来自大城市的下乡知青的学术水平比回乡知青高，当强调学业水平时，前者是有利的。如1973年，有“一些地方追求修正主义的东西，诸如片面注重候选人的文化水平，实行‘业务第一’和分数挂帅。”<sup>12</sup>这在何等程度上使人们感到注重学业水平的压力，尚难准确估价，但是强调学业水平极可能会导致下乡知青入学率增长。<sup>13</sup>既然在农村服务多年的插队知青被明显地视作农民，录取更多的下乡知青显然也符合增加农民在高等教育中的比重的基本目标，至少在名义上可以这样说。<sup>14</sup>1973年更加注重学业资格的作法，也曾遭到了象文化大革命中那种批判修正主义的摧毁性打击。<sup>15</sup>两年后，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对提高学术水平又做出了新的努力，但是下乡知青的录取率是否受到影响，还不清楚。学业上的准备是一个不断发展中的问题，而且非正式的程序也许将继续更好地为聪明的和准备充分的城市青年运转。<sup>16</sup>

第二个有利于下乡知青的因素是他们中一些人家庭的活动能量。家庭的态度，如第3章所示，对动员城市知青去农村落户，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但它们同样影响着知青回城。正统的革命家庭试图鼓励下乡知青留在农村，他们通过书信和探访加强子女的信念。<sup>17</sup>但是，并不是所有家庭都发挥了模范作用。新闻媒介报道了许多关于家长为子女回城寻找机会的例子。干部，特别是高干，为此目的可以利用他们的关系。事实上，社会上有这种想法，即干部将利用他们的“渠道”：“每个人都认为”或“一些人”

觉得，干部的孩子能够回城是自然的。在高校录取中，高干利用非正式渠道加以影响的事件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不断被揭露，当时有几位学生因通过“后门”不正当地进了大学而被退了学。最突出的例子是南京大学学生钟志民，他的故事，清楚地说明了非正式的关系网的影响、家庭联系的重要性以及思想意识准则如何被合理的说明，这一切，使钟的例子值得我们详细地谈一谈。

钟是“革命家庭”子女，他的家庭有着为革命事业奋斗的难忘的纪录。在苏维埃时期（1928—1934），他的祖父是村里原苏维埃主席，后在长征中牺牲了，同期牺牲的还有他的一个叔叔，他的父亲也是革命时代的老战士，参加过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后留在军队，成了福州军区负责干部工作的高级官员。因为这一点，钟志民写道“我总觉得我出生于一个好的家庭……一个具有如此革命传统的家庭，接受一点特殊照顾是没错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钟赞成“血统论”是毫不令人吃惊的。1968年，红卫兵大串联开始，钟刚好初中毕业，被内定插队，他不愿意去，但觉得不得不去。由于强劲的群众运动作用，他的父母同意了，但告诉他，“你先去，然后我们再想法把你调回来。”钟被送到了江西瑞金，这曾是江西苏维埃的首府所在地，由于他的祖籍在江西，他这样分配不是什么巧合。他在村里只呆了三个月，他认为他应该得到的“特殊照顾”便到来了，1969年，一年一度的招兵热潮正在进行，钟与县武装部的政委取得了联系，被允许顶替一个农民参了军。在解放军中服役三年后，钟想去上大学，1972年4月，钟回忆说，“在我的坚持下，我父母给军分区的部门领导打了电话，说我应该被选送上大学。”钟被南京大学录取，绕过了为给群众在决定中有主要发言权而精心设置的推荐程序。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广泛宣传的共产主义理想和自己虚伪行为之间的对比，使钟的心理世界产生了危机。当他离开部队去

上大学的时候，他不断听到人们对不正当的行为的议论，他是“羞耻”地离开部队的。作为一名学生，他在实际生活中，始终与工农保持着密切联系，从他们那里，他“听到了许多对‘走后门’的抱怨。”此外，作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的学生，钟深受毛主义对修正主义和长期存在的特权的批判的影响。他开始想退学，并将他思想上的窘境告诉了家里。

家里的反应是冷淡的。他的亲戚同意说他也许是犯了一个错误，但是刚刚有个良好的开端就离开学校就太遗憾了。一个亲戚以意识形态上的理由为他留在学校辩护：“退学可能会阻碍‘左派’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由于全国有许多其他人在搞‘走后门’，你的行为会制造混乱。”同样，另一位亲戚指责他是极左主义。钟坚持要离开南京大学，他父亲劝他找党组织，由组织决定。他父亲曾认为没必要退学，最终也同意“他们家一些人当农民是正常的”。但是钟的行为不能为家庭其他成员所接受。

钟然后去见了南京大学革委会主任，主任劝他不要退学，因为中央委员会对走后门问题的决定（意指不好的影响？）是在他人学后颁布的，因此不适用于他。另外，钟是一个好学生，没毕业就退学等于浪费国家钱财。钟仍然坚持初衷，最后递交了退学申请，《人民日报》1974年1月刊登了该申请，他的申请得到批准，受到赞扬，并被广泛宣传为真正的革命行动。起先，钟要求允许他重新参加解放军，但1974年2月底，他却回到了他1968年被分配去的江西省瑞金县的公社里。不用说，他的到来受到了热烈欢迎。有必要顺便加一句，钟并没有在默默无闻的群众中消失。回来后他出席了江西和福建的省级下乡知青大会。1976年人民日报一篇文章称赞他反对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同年，他成为共青团瑞金县委副书记，但他坚决拒绝领取因任工作得到的国家工资，坚持象普通农民一样挣工分。

这个故事最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其本身所隐含的意义。钟自己

从工人、农民那里听到关于“后门”的“许多抱怨”，这时一个亲戚说：“全国有许多其他人在搞‘走后门’”，正如他的退学申请所说：

为了将他们的儿女送进大学，一些人依靠地位、权势、影响或私人友谊及关系，而不是群众推荐和党组织规定的其他正当渠道，一些人甚至将录取名额视作他们可以馈赠的“礼物”。所有这些一切使真正的工农兵代表受到了排挤……象瘟疫一样，这种不健康的行为正腐蚀着我们党……它破坏了党和群众的联系，损害了我党的优良传统，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精神完全不相符合……为什么他们（一些人）总想把自己的孩子，而不是工农兵家庭的孩子送进大学？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新的社会主义大学和旧的一样，是通向名利的阶梯，在大学学习可以为他们带来光明的前途和荣誉。”

钟的榜样被其他通过后门上了大学的学生所效仿。全国各地也宣传一些类似的事迹，其中大多数涉及军队家庭。”

如果钟志民在其要求退出南京大学的申请中所作的总结是准确的话，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停止社会地位的承袭，即旨在不允许高干父母为他们的孩子走向上层铺平道路的基本目标没有实现。\* 如果这一结论准确的话，它可以帮助理解继续进行大学招生和毕业生分配改革的实验。1975年所强调的“从公社来到

---

\* 正如第1章的讨论所示，肃清“四人帮”后，据说这些激进派曾大肆渲染“走后门”事件，旨在刁难他们在党内和政府中的对手。如果属实，这项指责可能引起人们对钟志民事件本身的权威性以及他关于党内有泛滥影响的“瘟疫”的指责的怀疑。但是，也有另一种解释，这就是公开这类事件并不是为了攻击地方官僚机构，而是(接下页)

公社去”的政策，不仅要求学生毕业回到农村，而且不允许毕业生成为国家干部，这大大降低了某些人为孩子走后门上学而牵线搭桥的积极性。然而，正如前面指出过的，我们仍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这样的政策是否行之有效。由于持续的关于高等教育之价值的争论，可以假定，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将继续为他们的子女高升施加非官方的影响。

父母们也在为他们在农村的孩子能回到城市工作施加影响。1974年夏天，北京出现了大字报，抨击某些领导干部以给下乡知青分配“有利的”城市工作为交换收取贿赂。“当干部的父母利用“私人关系”，探查空缺的工作以让他们自己的孩子来填补。”如果能为农村居民找到一份工作，合法回到城里显然是可能的。甚至可以绕过官方渠道如劳动人事局。在某些情况下，家里人也去探查城郊的工作，因为，从一个较远的农村单位向一个城郊的农村单位转户口比从农村转到城市单位要容易。例如，一位插队在贵州绥阳县的上海知青1974年初接到她父亲来的六封信，要她回上海，因为他已为她找到了市郊的一份工厂的工作。另外她父亲还为她找了一个丈夫。这位姑娘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她想留在原来的村里，保持她的独立性。父亲写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当她回家探亲时，家里召开了家庭会，但是毫无用处。父

- 
- \* 进一步降低军队在社会上的作用的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文化大革命前，人民解放军被誉为中国社会的模范，并且由于文革的动荡，军队在政治体制中的作用急剧上升。然而，从那以后，特别是林彪垮台以来，地方党组织得到重建，解放军的影响削弱。就在钟志民事件公布之时，发生了解放军各大军区司令调动的事件，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军队和地方领导机构根基很深。钟志民事件可以被充分利用，表明军队和任何机构一样，容易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并以此为依据，削弱军队在地方政权中的作用。

母便与她断绝了关系。她离家住进同学家里，但给父亲工厂单位的党委写了一封信，要求提高其父的政治觉悟。”

那些想努力适应农村生活的下乡知青会因此受到来自千方百计为改变他们“受苦受累”生活而努力的亲戚们的重重压力。”一位城市青年 1968 年落户在浙江武原县，1971 年，他父母劝他找一份县城企业的工作。他抵制着诱惑，自问，一个人“能否当了干部就可以离开农村”，他决定留下来。然而，后来新的回城机会时常来临，亲戚和“社会舆论”不断给他施加压力：“我的年龄越来越大了，人们在背后议论我，说如果我不赶紧离开农村，我后半辈子将一直与泥土和粪便打交道。当我听到这些，我的思想也曾动摇过。”最后，他站稳了立场，娶了一位农村姑娘并扎根乡村。”

中国的新闻媒介大力宣传知青拒绝回城的事迹。显然，拒绝回城可能标志着纯洁的革命动机。其中也确有一些事例表明，对革命事业的真正奉献是其核心因素。那些“以苦为荣”的理想主义青年，抵制着回城的诱惑，但是他们要受到家庭反对和社会嘲讽的严重考验。”即使在中国，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是不易的。还有一些决定留在农村的下乡知青可能动机并不那么纯洁。这些在农村获得殷实的地位、身份和荣誉的人会觉得这足以补偿他们因农村生活而遭受的损失。正如第 5 章所指出的，拒绝回城的革命行动会带来在农村领导机构的地位进一步上升。一位受到赞美的年青人名叫柴春泽，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他 1971 年插队在辽宁翁牛特旗的一个贫穷的生产队，两年后，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了支部副书记。他父亲第二次试图诱劝他儿子回城，柴回信告诫父亲要坚持革命原则，这是他作为有 20 年党龄的党员所必须支持并为之奋斗的。这封信被发表并受到赞扬。几个月后，1974 年春，柴成了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

拒绝回城的青年可能还有其他理由。那些拒绝上大学的人之

所以这样是因为现在的教育并不象过去那样是一条稳妥晋升之路。那些从因文化大革命缩短学制后中学毕业的知青可能并不觉得他们有能力去学院或大学学习。或者，某些特殊情况也降低或消除了城市生活的相对优势。一位被采访者认为，在珠江三角洲的插队知青对分配到工厂工作没有兴趣，因为他们的收入高，离广州也近。另外那位上海父亲为女儿安排婚姻的事件表明，保持与家庭关系的独立性也许也是导致拒绝回城的一个因素。

报界刊载的诸多拒绝再分配机会的事迹，在实际生活中可能只是少数。类似的事迹经常被报刊关于下乡知青因未能得到再分配而出现信仰危机的报道所扯平和超过。<sup>\*</sup>这类题材比较典型的表现形式是，某个城市青年目睹同胞获得再分配，自己便有一种相对失落的感觉，于是这位青年思想开始“波动”，变得不积极、觉得沮丧、失去热情，从而更加担心未来。<sup>„</sup>许多表现好且认为他们的美好表现最终将使他们得以回城的下乡知青都是这样。广西琼山县某生产队的一个6人知青集体，因为其杰出的表现，被命名为县一级“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单位。表面上看起来，他们的价值得到了转换，他们也完全适应了农村生活，但是后来，其中一位知青得到了再分配，因而破坏了其他人的信念。他们变得非常失望，这导致了他们的退步。他们接受的再教育太肤浅，这一点变得十分明显。<sup>„</sup>这肯定不是唯一的例子。<sup>„</sup>再分配重新燃起了在乡村度过多年的知青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这里有一个很合适的例子，一位女知青1965年插队到湖北潜江县，她来自武汉。因为表现好，1966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共青团支书。她的事迹包括为文盲开办学校并和阶级敌人作斗争。

---

<sup>\*</sup> 由于报纸的教育作用，拒绝再分配表示“扎根”的事迹比因再分配而产生信仰危机的事件更可能上报。因此，计算有关两类事件的文章数目不可能正确指导我们了解各类事件的数量分布。

1970年初，国家对知青实行再分配，她觉得自己是合格的。随着她的同学“一批接着一批”的离开，她的信念坍塌了。她的党支部书记告诉她，她的态度表明她只是表面上入了党而不是真正的精神上入了党。”在此类和其他各种情况下，解决信念危机的办法是加强政治教育。”

## B.破坏剂还是安全阀？

再分配与适应农村生活的关系是复杂的。前面的事例说明，再分配机会的存在对适应农村生活有着破坏性作用，它制造不确定因素，激起难以得到实现的期望，并对那些没能被再分配的人有着动摇军心作用。因此，为了增强适应农村生活的分量，高层决策者也许应该结束再分配。道理很简单，如果上山下乡对于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大多数人是永久性的话，所有下乡知青就会认真考虑他们将长期在乡村生活的前景，从而被迫努力去适应农村生活。

如果这条推论思路正确的话，为什么决策者不选择停止再分配呢？一个解释可能是，出于国家的观点，“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高于个人动机，因而也高于增加适应率的目标。下乡知青是人力资源，他们组成了大学新生的重要来源，其中一些人也有必要去工业企业工作。这是新中国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个人利益必须全心全意地服从于国家、人民和集体的利益。因此，一个动机良好的插队知青应响应号召，尽自己所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无论在工厂或在农场”。”但是，只要城乡差别存在，这一表面上合理的从业道德就非常理性化地说明了个人待遇的不平等。也许，它使决策者们忽视了不平等隐含的不稳定。

另一个关于再分配继续存在的解释是，决策者们认为安排城市青年到农村落户是必要的。他们也想到过停止再分配可以促使



一些人适应农村生活，但是它还将导致其他更多人的日益不满。从这一点看来，再分配可以发挥安全阀的作用：它激励许多下乡知青好好干，去适应——尽管仅仅是表面上的——以期望表现好会导致最终的回城。这一点可能通过区分3组知青在适应农村生活方面的表现来得到证明：第一组包括那些完全适应农村生活的知青，第三组是根本没有适应农村生活的，而第二组则介于两者之间。关于回城，第一组的人根本不想，甚至可能拒绝回城的机会。第三组的人可能会非法离开，而第二组则期望最终获得再分配。对这3组的人数比很难作出精确的衡量，但是完全有理由指出第一组和第三组的知青只是少数，两者之间的则是大多数。

没有多少必要再去刻划第一组人的特点，这一组的核心是忠实的革命者，他们的价值观已经改变，他们无视个人利益，投身于对国家事业的无私奉献中。他们中有些人由于在农村地位的提高、个人成就感以及因做出实质性贡献的满足感而更加忘我地献身。他们中也有一些人是因为境况使他们满足于农村生活，比如那些在非常繁荣的公社插队的知青。在决策者们看来，这一组人的存在是极其重要的，它为去农村插队是大有作为的论点提供了明证，对于激进的政治家来说，这一组表明人是可以重新塑造的，三大差别是可能克服的，新一代“革命接班人”不是通过世袭而是通过基层培养的。

在相反的另一边是第三组。他们的不适应以多种方式显示出来，包括被动的不幸、长期士气不振、工作表现差、长期依赖父母，以及不正当的性行为。第三组的一些人成为村里的捣蛋鬼，对农民和农村生活公开表示厌恶。他们好斗、不服从领导，而且也许会触犯点法律如偷盗。然而在农村公开行为不端的范围是有限的，因为可以加强组织控制而使人相对放心。（见第4章）工作表现不好而非行为不端，可能是第三组成员的最广泛的表现。没有可靠的证据说明除了在第4章提过的有关纠正冤情的

事件之外，农村没有发生过知青集体抗议事件，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外（见下）。对于当权者来说，第三组的知青在农村造成的问题不如在城里严重。他们中的一些人千方百计在城市多呆一些时日，他们在家和在村里的时间参半，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过着半合法的生活。也有一些人离开农村的岗位，一去不返。通过多种估计可以判断，可能有几十万这样的知青。像那些毕业后根本就没有下过农村的知青一样（见第3章），他们没有工作和配给粮票、布票的权利。他们不得不依靠亲戚朋友生活，或者转而犯罪赖以生存。有些人在逃避控制、伪造证件方面显示了非凡的创造性，这使他们能够至少打发一些日子，比如去建设工地找临时工作。另有一些人为了生存成了从事偷窃和黑市活动的罪犯。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中国城市面临着犯罪问题，而那些逃避分配和非法回城的知青是一个重要因素。用美国的标准看，无疑这个问题并不大；而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在公开场合也提及，可见这个问题已经够严重的了。对此的反应包括加强社会治安管理、建立城市民兵和严惩一小撮严重违法乱纪者。这就是将城市青年下放到农村的代价之一，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与现制度决裂并选择一条生活在现制度约束和机会之外的生活道路。

第二组的下乡知青包括表现优秀到一般的。总的说来，他们不与现行制度发生冲突；他们呆在可以允许的范围之内，但他们在工作努力和政治活动上的表现程度却不尽相同。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只在表面上适应了农村生活。他们不愿意永远生活在农村。他们隐藏着的不满在某一时间会以信念危机的形式明显表露出来。对于决策者来说，第二组是挽救的目标，正是第4章所讨论的主要对象。究竟有多少第二组的知青因1973年的挽救运动迈入了第一组，这并不清楚，但是一些偶然的证据，特别是仍继续强调政治教育的必要性，表明进展并不十分大。

只要大部分下乡知青仍在第二组，只要挽救措施不是完全有效和知青的价值观没有得到改变，决策者们就可能有很好的理由认为，扩大表现好的知青部分的一个办法是给予知青再分配的前景。当然，所有的决策者必须意识到对下放最大的阻碍是其永久性，如果要使下放一夜之间得以被接受，就必须将其建立在循环的基础上。假设下放有一定期限，毫无疑问，在象中国这样的集体主义国家里，城市青年是能够自愿承担建设农村的重任的，即使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sup>11</sup>但是一个完整的循环制度也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因为它等于是一种承认——心照不宣的但不是没有错误的，而这对于某些决策者来说却是不能忍受的——改造人的意识形态目标没能实现。它还将要求城市部门能够吸收所有回城的年青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至少在目前不可能。由于这些约束，决策者们似乎考虑了一个半循环制度，即表面上宣称真正的永久下放，而实际上可逐渐实行再分配，这一制度将扩大第三组的队伍，也许会导致无法管理。

如果决策者真的认为半循环制度能象安全阀那样发挥作用的话，他们或许已经判定知青根据这一完整计划要求回城的代价是值得的。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些回城希望破灭的知青在灰心丧气，一些人可能加入第三组。有必要回溯一下第一章里谈到的1973年和1974年逃往香港的人数增多的事实，很可能这是由于工业部门招工的减少而引起了1972年的一段时间开始的再分配比例下降的后果。即使那些想回城的知青不加入第三组，而是耐心等待政策的改变，如扩大再分配的范围，那也会使该计划充满不确定和不明确的因素，从而影响其制度化。<sup>12</sup>另外，那些想回城的人必须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图；结果这种伪装将损害旨在改变城市年青人的目标。因此，下放计划的动力基础变得不可靠了。

## 2.不当“被遗弃的人”

尽管许多城市青年没有完全适应农村生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在政治体制的规范内工作，无论是缺乏积极性或是不希望以自己再分配的机会作为冒险。如果他们潜在的态度抉择要找到公开表达的机会，政治体制必须发生变化。这一变化终于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而发生了（1966—1968），其标志是毛主席动员群众起来造“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文革期间，群众享有前所未有的结社的自由，结果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团体如雨后春笋一般，首先在城市然后在农村产生。这些团体被允许出版自己的小报，他们在小报上猛烈抨击“走资派”，与别的竞争团体辩论、煽动和争吵，群众组织还有把“走资派”拉下马的自由。群众拥有的自由是毫无限制的。只要你坚持毛主席思想和高举推翻修正主义的文化大革命旗帜，你就有合法的权利参加。而各权力机关，无论中央或地方，也定期地镇压“反革命”组织和那些在他们眼里不符合标准的个人。此外，中央和地方领导也试图影响和操纵群众运动，有时他们中一些人插手运动以期限限制和约束运动的范围。然而群众确实有了相当的自由，部分是因为激进的上层领导在一段时期内成功地扩大了运动的规模，部分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势头很猛，已很难控制，即使当毛主席自己试图控制的时候也无能为力。在文革高峰期，潜在的社会紧张关系和矛盾表面化了，团体和个人有了依照自己所理解的利益行事的机会，而不是文革前或文革以后的那种情形。”

没有预料到的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之一是，1966年前去农村插队的城市青年有120多万人回到自己的城市。中央领导并没有批准他们回城，事情的发生迫使他们做出反应。1967年1月开始，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后面均简称“中央”）发布指示，号召

知青回到农村的岗位上去“干革命”，而不是在城里。„官方报纸的社论和领导人如周恩来的声明为官方指示提供了力量，它们都坚持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政策，得到了毛主席完全的支持。„但许多知青，虽然不是所有的，却无视官方的呼吁。一直到1968年夏天，当城市秩序最后被强制恢复以后，作为当时正在进行的控制红卫兵运动一个工作内容，所有知青才回到了农村。换句话说，文化大革命导致了許多下放计划的破产。

如果说下乡知青只不过利用了政治运动而回了家，这未免太简单了。文化大革命本身，确切地说不是最初爆发时，并没有呈现为一个依照个人利益行事的时机，而更象一个群众参加的集体行动。知青回城应该至少部分地被视为是他们对难于维护自己利益并与农村“当权派”作斗争的反应。也就是说，由于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展开，知青了解到城里发生的事情，他们组织起来参加了红卫兵组织，开始批判并向负责知青事务的农村干部挑战。然而，他们并没走得太远。正如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所写，知青们认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在文革中成长起来并反抗他们的知青们实行各种各样的政治迫害”。„试图挫败下乡知青斗志的农村干部使用的一个策略是实行新闻封锁。广东省北部的仁化县的一个国营农场就发生了这种事，那里的下乡知青直到1967年初才听说文化大革命。„或者，他们试图以生产是首位的借口阻止知青“干革命”。„不过最重要的策略是不给予知青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甚至通过给知青钉上形形色色阶级敌人的标签而使他们成为被斗争的目标，正象有些城市党员干部为压制来自下面的批评所做的一样。

城市青年办的小报刊登了关于1966年夏参加和组织文革活动的农场或生产队干部给敢于批评他们的知青戴上“反党分子”或当时被痛斥的“黑帮”爪牙的帽子，并拘禁和迫害他们的事件。农村干部可以利用有些知青家庭背景不好的事实而妄加怀疑。„另

外，由于城市拒绝他们的捣蛋鬼的存在，知青经常被怀疑的目光所看待，而文革中的重要主题之一，即学校在资产阶级控制下，这使他们的名声进一步下降。据报道，湖南零陵地区“最大的走资派”说过，“知青本来是学生，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他们可能会转向资产阶级，甚至转变为资产阶级右派。”<sup>10</sup>所以，下乡知青应该得到控制、改造，差不多象阶级敌人那样对待。因而1967年初还是在零陵地区的宁远县的一个公社张贴了这样一个布告：“春节期间，地、富、反、坏、右，以及上山下乡知青必须申请批准才能离开，且只能离开半天，如果逾期不归，将被交给村里的贫下中农来斗争。”<sup>11</sup>一位曾在广东增城县一个乡村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知青说，他的生产队召开群众大会，知青和“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都被排除在外，知青抗议被划到阶级敌人一类，他们的抱怨后来虽说受到公社官员的极度重视，但这一事件却颇说明问题。

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压制知青活动的事发生。据一位在东莞县一公社插过队的知青说，那里的500多名知青自己组织起来，张贴大字报，召开大会批判负责知青事务的公社干部，他们举出了一件因一牲畜死亡而指责知青蓄意破坏的事例。这种对抗没有什么太好的结果，但是知青也没有遭到报复。他还说，在广州郊外的从化县一个国营农场，知青们批判当地干部忽视知青福利，工作作风差、态度恶劣，还不关心文化大革命。他将这些情况与他所知道的发生在一些较大农场的更加持续激烈的对抗作了对比。在他的国营农场，1967年夏爆发了知青与当地红卫兵之间的暴力冲突，但是，这只是当时席卷广州及其郊区的群众组织之间大武斗的一部分。同年9月，中央采取重要措施，制止武斗，县贫下中农组织在解放军的帮助下逮捕了知青派的领导人并将他们拘禁了一个月。

当知青谋求维护自己利益反对农村干部时，农民经常站在后

者一边。早些时候，人民日报社论曾指责说：“最恶毒的是挑拨（被走资派）知青与贫下中农之间的磨擦。”<sup>[10]</sup>实际上，这一点是知青要求参加城市的文化大革命的理由之一，他们的要求一再被中央拒绝。因此一份知青写给广州人民的呼吁书指出，在农村的知青造反派力量是分散和虚弱的，易受保守势力的迫害，保守势力的力量来源于走资派成功地“蒙蔽”农民群众去支持他们。<sup>[11]</sup>文化大革命，换句话说，加深了下乡知青与农村干部和农民之间的隔阂。正如一位知青所指出的，下乡知青是激进分子，想打破现状；而农民是保守分子，想维持现状。实际上，一些农民确实造了当权派的反，但他们这样做并不和知青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利益。<sup>[12]</sup>原因是知青在日益紧张和冲突的局势里是局外人。在这个年代里，传统的中国农民对局外人越来越不信任和敌视，视他们为对当地社会的威胁。<sup>[13]</sup>文革期间，至少有一些村子里的农民是这样表现的，否则就难解释报道的一些特殊事件的发生：“去广东新会县大奥（音译）农场支援农业工作的知青起来造反，他们被指控挑起武装冲突。那些被走资派煽动的农民和无视真理的人包围并用鱼叉和竹杆袭击了知青，并宣称鱼塘是那些知青的葬身之地。”<sup>[14]</sup>1967年8月中旬，在广东中山县衡兰（音译）公社，成群结队的武装的农民，据说是在公社干部的唆使和组织下，袭击了知青。据披露，这些知青因偷了香蕉而惹怒了农民，但他们已同意做出赔偿。农民却没有因此而罢休，他们打死了两名知青，同时还痛打了另一位站在他们立场进行交涉的知青，这位知青迄今仍与农民保持着良好关系。活下来的知青四散逃命。<sup>[15]</sup>类似事件可能只是极少数，也许知青的小报过分夸大了，<sup>[16]</sup>但它们确实表明，在动乱的年代，当谣言四起的时候——谣传衡兰公社的知青拆毁了公社党委大楼——当基层群众的热情被煽动起来以及潜在的不满表面化的时候，号召城市青年与农民相结合的计划是不可能得到实行的。



对农村干部促使知青离乡回城的指控也显示了仇视外来者的主题：“采取欺骗、引诱甚至残忍地克扣粮食定量的方法，他们唆使大量的知青……放弃生产岗位涌入城镇。”<sup>100</sup>一些当权派告诉下乡知青说，你们的“问题地方上无法解决；必须去上海或北京才能解决。”他们鼓励下乡知青和其原城市居民离开乡村去争取重新获得城市户口，使用了诸如“扭转下放中的不公平”的口号。<sup>101</sup>在一些地区，包括新疆，当权派支付路费以便下放知青能够回到上海。<sup>102</sup>这种利用物质利诱促使知青离开农村岗位，被中央强烈斥责为“反革命的经济主义”，唆使知青离乡被视为给“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施加“压力”的一个手段。<sup>103</sup>

许多知青的回城应该在这一农村背景下进行评价。那些遭受挫折或在为维护自己利益反对农村领导层的斗争中受到压制的青年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冤屈只能在城里得到平反，只有在城里，“黑安置体系”以及负责它的上层掌权派才能直接受到攻击。因此，这些知青都以政治性和参与性的方式对文革做出了反应。然而，这同时也有一些知青以个人机会主义的方式做出了反应。他们利用文革溜回家。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行动也是具有政治意义的——“用双脚投了赞成票”。但是并不能指望这些知青能够通过参加政治活动对下乡政策产生影响。对于他们来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政策，它不能也不会改变。对政治功效不太敏感的青年基本上是旁观者，对文化大革命好奇但不参加。对于他们来说，动荡可以使他们在艰苦的农村生活中得到更长的假期，还有旅游的机会，表面上是参加“革命串联”。他们中的一些人直到1968年还对回乡号召避而不应，另有一些人虽早就向上级做出许诺，但直到1967年才回到农村。

有关回城的下乡知青人数和回城参加政治运动的人数比例的统计数字极其罕见。1967年11月，周恩来在与广州红卫兵的谈话中发现，有3万知青离开了农村，这显然是指广州的知青。<sup>104</sup>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十年，大约有 46000 名广州青年被送到农村；<sup>100</sup> 因此周的数字说明 2/3 的知青回城了。消息提供者说，他们农村单位的一些同事没有马上离去，但是最后几乎都回了城。至于参加这场运动的知青的比例，一位曾积极参加过广州的文革运动的被采访者估计，有一半的广州下乡知青参加了广州的运动，但参加的程度是不确定的。<sup>101</sup> 比如在 1967 年广州武斗高峰期，许多参加者退了出来并呆在家里。

### A. 文革中回城“闹革命”

回城展开积极政治活动的下乡知青组织起来了，他们和其它红卫兵组织、相关利益团体一起提出了要求。在广州，回城知青结帮的基础是来自同一下乡点，如国营农场，或是具有共同的、特殊的利益。如有一个团体叫做“6-1, 2, 3.”，指的是 1961-1963 年下乡的知青，据陶楚讲，他们曾得到 3 年后回城的许诺。但是，1964 年后，这一许诺被取消。这诱发了他们对使自己身临困境的走资派的不满。同样，“66-9”的成员则是阶级背景不好的年轻人。1966 年 9 月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向资产阶级分子进攻时，他们当即被遣送到农村。据提供资料的人讲，广州有约 30 个回城知青团体，规模从十几人到几千人不等。1967 年夏天，一个叫“支农青年”的集团宣称，他们有 2 万名成员，分布在 10 个不同的组织中。<sup>102</sup> 该集团还办了一份小报叫《支农红旗》。

全国各地的下乡知青在北京也十分活跃。1966 年年末，广州的知青到北京向政府施加压力。有一人称他是广东的国营农场的知青的代表，另一个“6-1, 2, 3.”组织的人说他代表在公社插队的知青。他们来到国务院，要求得到回城参加城市文化大革命的权力，他们在农业部和农垦局受到了接待，但所提的要求被

婉转地拒绝了。次年1月份，广州知青到北京“痛斥就业安置小组的头头谭震林”。<sup>106</sup>长沙的下乡知青则派出“汇报团”到北京，向中央汇报湖南下乡知青的情况，并参加“革命经验交流”。<sup>107</sup>上海在新疆插队的知青也到了北京。全国各地的知青汇聚北京，为组建全国性的知青组织打开了机会之门。1966年12月，当时尚未失宠的谭震林对知青说“你们知青组织不要设立全国性的总部，重新安置办公室就是你们的总部，还有总理办公室。俞秋清和许立奇是总理任命的，你们能取代他们？实际上，你们这些人决不可能控制100多万人。”<sup>108</sup>但是，1月份，日本记者报道说，知青正在组织“农村地区革命知青全国总部”。<sup>109</sup>中央很快作出行动，以将此类企图扼杀于萌芽状态。所有全国性的红卫兵组织都被宣布为非法，而知青受到特别的注意。2月17日，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命令，要求“所有外出交流经验、请愿、拜访高层人物的知青均应立即回到原来单位，……所设立的一切联络点均毫无例外地取消”。<sup>110</sup>一个星期后，北京军管会公布了一个全国性知青团体的名单，宣布它们为非法，并称“决心制止这类活动”。<sup>111</sup>众所周知，这个命令结束了组建全国性团体的企图，但是，不同省份的知青之间的交往仍在继续，甘肃与广州的知青就这样。<sup>112</sup>

在城市，知青被组织起来集中攻击“黑暗的上山下乡制度”。所采用的方式有贴标语、散发小字报，它们攻击该制度的各个方面，并公布了滥用职权的例子，它们指责对此负有责任的国家领导人，主要是刘少奇和谭震林。在象长沙、广州、武汉这样的城市中，知青将当地上山下乡和就业办公室作为攻击目标。在长沙，1966年末和1967年初，知青和他们的父母举行了全市性的集会示威，并召开了对长沙上山下乡办公室一位主要官员杨某某的批判会，据报道，这损害了这位刘少奇的“爪牙”的“尊严”。<sup>113</sup>在广州，1967年5月，有3000人参加了控诉集会，谴责省市负

责上山下乡的官员。由于这些官员拒绝参加集会，导致了知青在军管会为期三天的绝食和静坐活动，并致使广州上山下乡办公室被占领。<sup>124</sup>显然，这些冲突并未引起多大骚乱。但是，1967年9月，在武汉发生了同样的集会，而且酿成了流血事件。当时，知青代表向市人口办公室提出质疑，办公室要知青集中到一家旅馆前的广场上等候答复，但他们并未得到答复，而是受到了群众组织的殴打与枪击。事实证明，是人口办公室的干部挑动这些群众组织来教训“流氓无赖”的，约有12名知青被杀，这一事件导致1967年夏天几个月中城市暴力事件的大规模升级。<sup>125</sup>最终，知青将那些负责动员他们下乡的基层干部视为眼中钉。下乡知青还回到学校批斗负责挑选学生下乡的校方领导和居委会干部。<sup>126</sup>在上海，由去新疆插队知青的父母组成的团体似乎发挥了重大作用，街道委员会的干部受到了责骂和人身攻击。上海的一份报纸诉苦道“一些知青的激进组织将攻击矛头直指街道和里弄，甚至有些人为了让儿女从农村返回城里而揪斗干部，这样做是错误的”。该报提出：对“干部的错误与缺点……以及无意识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该予以理性的对待。<sup>127</sup>

已经回城的知青追求对他们更为重要的斗争目标，而且他们往往作为一个大的群众组织联盟的一个部分从事活动。在文革期间，学生和成人团体大体分为两大派别，一是众所周知的“保守派”，另一是激进的左派“造反派”。两派都宣称是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但他们的倾向、利益、成份及政治关系截然不同。<sup>128</sup>造反派一般是与北京的领导小组有关系。该小组是文革初期建立的一个特别机构，它的领导人试图使文化大革命越左越好。造反派反对党的原有权力，他们要求对政治权力进行根本上的再分配。他们所提出的最激进建议是废除统治集团的权力，建立以1871年巴黎公社为样板的、新的、非官僚主义的机构。在1967年“一月风暴”期间，上海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公社，但这一

实验被毛主席中止了。毛主席希望纯洁统治集团和列宁体制，而不是取而代之。他谴责无政府主义，说：“总是要有‘头头’的”。<sup>100</sup>激进派想将文化大革命扩大到军队。在运动的后期，他们倾向于反对新产生的机构——革命委员会，这一行动过早了。相比较而言，他们的保守派对手对根本性的变化不感兴趣。保守派集团是在地方党政干部作防备性调动过程中结成的，尽管他们也参加了对某些掌权者的斗争，但他们的兴趣主要在于与教育战线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势力作斗争，而不是反对党的机构。保守集团与强调秩序的人民解放军军区指挥官保持着密切联系。<sup>101</sup>

保守派倾向于维系于那些在 1966 年前享受政治制度好处的人。支持他们的年轻人中有高干子弟和阶级背景好的青年，成年人中则有高干和大工业企业的固定工和熟练工。左派集团则从那些感到在文革以前被剥夺了好处的人或曾在这场动乱的第一阶段受到党的官员迫害的人中寻找支持者。那些人中包括阶级背景差的学生、小干部、街道和集体工厂的工人及在过去受过整肃的人。对政府的城乡政策最为不满的人有：被遣返回村但仍在城里寻找工作的退伍军人；季节工和协作工（指受工业企业招用，做定期工作、不享受固定工资或社会福利的农民）；被派往遥远的内陆地区或农村的城市工人和就业人员，某种程度上也包括被低价农民工所取代的固定工；当然还有下乡知青。<sup>102</sup>正如一位被采访者所说，地位高的人加入保守集团，地位低的人加入激进团体。

在广州，下乡知青团体附属于激进的“红旗”派。长沙的最著名的知青团体是湖南主要的激进组织“长沙风雷”属下的“战斗队”。一些当地没有知青群众组织的城市的下乡知青，则显然是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左派团体。<sup>103</sup>这样，城市青年经历了动乱的各个阶段，因而从总体上讲也参加过各个时期的造反运动。他们参加了 1967 年 1 月的激烈的夺权斗争，在“二月逆流”期间受到了

镇压。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告知要对左派进行干预，并宣布大多数激进团体为非法，由此恢复了社会的秩序。在这年的春夏季中央的力量平衡偏向有利于扩大左派倾向时，激进团体得以恢复名誉。他们参加了1967年夏天的武斗，这场武斗毁坏了中国的城市。《支农红旗》的一篇词藻华丽但平淡无味的文章记述道“在黑三月和八月的血雨腥风中……，从农村返回广州的英雄的青年人面临着白色恐怖，他们勇敢地站出来，公开宣告‘要和广州的红旗战士一起，誓死战斗，’在由广州的保守派制造的几十次屠杀事件中，有100多名下乡知青被杀害”。<sup>[1]</sup>

八月武斗后，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遣散阶段，知青参加激进运动成了问题。中央决定停止派别斗争，命令所有团体缴出武器并授权人民解放军进行干预，推动群众组织之间进行“大联合”谈判，准备成立革命委员会。中央还大胆地采取行动，阻止知青团体进一步参与城区活动。10月8日发出的“紧急通知”命令立即解散城镇知青团体和联络点，禁止城区群众组织吸收知青为成员。<sup>[2]</sup>但广州和长沙的青年团体在当天就拒绝执行这一命令，直到1968年1月，他们仍在散发出版物。知青小报称他们仍得到某些团体的同情和支持。但很明显，他们处于守势，受到日益严重的遣散压力。<sup>[3]</sup>到1968年1月末时，也许大多数知青团体都停止了作用。有位知情者曾是一个国营农场知青小团体的头头，该团体有30多人。但由于害怕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他在1968年1月辞掉了头头职务。不过，他象其他许多知青一样，直至1968年夏天仍在参与文化大革命的活动，不过其时是作为城市合法居民占多数的激进团体的一员。而其他知青则在1967年秋天开始返回原插队乡村。<sup>[4]</sup>

在文革期间，城镇青年就上山下乡提出了三种要求。一是要求将它变成为轮换制，或干脆取消它；二是要求停止此制度执行过程中的滥用职权现象；三是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直至“黑暗

的上山下乡制度”被彻底摧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真正新型的马克思主义的模式建立为止。

本章开头提到过，为上山下乡规定一个期限能被知青接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知青将此作为一个主要的要求提出并不令人吃惊。广州的知青团体，如‘6-1，2，3，’就提出了这一要求，其成员要求重新得到回城许诺。已回城的知青则直接提出“要户口”或“建户口有理”<sup>100</sup>的口号。要求限定务农期限的似乎仅仅是那些已经历过农村生活的人，在广州，一些知青还要求对所有青年都实行四年轮换制。<sup>101</sup>上海也考虑了轮换制的做法。原党委会的掌权者“居然同意在三、五年内让到新疆支援农业建设的青年返城的无理要求，这个要求是他们头脑不清的父母们提出的”。<sup>102</sup>此外，有的知青也提出要完全取消上山下乡，他们认为，上山下乡政策是如刘少奇或邓小平这样的当权派制定的。于是，大连的知青宣称“让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青年去农村落户只能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sup>103</sup>知青们要求得到“进城”的“人权”，这显然是参照了人人有权自己选择居住地的思想。<sup>104</sup>

既然中央认为上述要求是非法的，它们在北京就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取消上山下乡的要求为攻击城市知青提供了火药。周恩来在与广州红卫兵头头谈话后认为，提出轮换制要求的知青是受了陶铸等人的右倾主义路线的欺骗。他斥责一些知青仍在继续提非法要求，且走得太远，居然“污蔑”中央要他们返回农村的指示，尽管毛主席也支持他们，周恩来对这些知青的政治立场表示怀疑，指责他们企图破坏广交会。<sup>105</sup>周恩来的话受到一些红卫兵组织的赞同，广州美术学院的红卫兵发表了对“支农青年”的致命性控告书，指控它搞“帮会主义”，是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忘记了革命原则，公然反对毛主席，将上山下乡说成不是“国家的需要”，这纯粹是走资派的恶毒用心。控告书写道：“支农青年”在年轻人中组织帮会，然后公开宣布他们的政治观点是“要人权”……

从来就没有抽象的人权，……讲“人权”和背离革命原则的“家庭”观念，会落入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罗网。如果一个人维护自我存在，自私自利，就会出卖革命，出卖同志，变成可耻的叛徒。在一小撮坏蛋的煽动下，许多青年人在军管会前静坐示威，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施加压力，……公然提出解决他们家庭问题的要求，并威胁要破坏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他们阴谋毁坏祖国的声誉，……削弱社会主义。<sup>143</sup>

处于被告席的《支农红旗》只得宣告忠于毛主席提出的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思想，但它反驳了坏分子和阶级敌人的代理人渗透进他们内部的指控。但该报也承认，他们一开始提出的要求得到户口和人权的口号是“落后的”和“低水平”的，实际上“没有赢得人民的支持”，“经过运动后，我们明白了许多，为了实现真正的革命纲领，我们放弃了那些一时冲动提出的要求。”（参阅下文）《支农红旗》1968年1月的一篇文章亦承认，“少数人”仍墨守旧的观念，坚持将“建户口”视为斗争的主要目的。<sup>144</sup>

从原则上说，改进上山下乡政策的要求要比部分或完全取消这一政策更为合理些。前者在知青的行动中已不言自明，如他们攻击据称是受了贿赂的街道居委会干部，批斗将知青送往尚未准备接纳他们的地方去的上山下乡办公室干部或将年幼体弱的年轻人送到农村的干部。<sup>145</sup>小字报还揭露了那些用威胁利诱的办法动员青年离开城市的干部。知青抱怨，在文化大革命前，他们在农村吃不饱穿不暖，而且受到了当地人的不公平对待和粗暴的虐待。<sup>146</sup>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对此有了反应。谭震林很快成为知青发泄愤恨的目标，他在1966年末承认，“在具体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太多，在动员工作中做坏事的人太多”。<sup>147</sup>10月8号的“紧急通告”也强调有必要合理对待知青，该通告说“派到农村去的人应该与原来的公社社员、工人及机关工作人员享有平等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决不能有任何不公平的待遇，不得降低他们的工作岗位，



不得打击、迫害他们，也不得试图将他们赶回城镇……。在秋收和分红时知青的口粮一定要安排好，他们最紧迫的住房问题应予适当解决”。<sup>100</sup>这个文件不仅涉及到1966年以前的情况，也涉及了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新情况，其时，知青与当地农民的关系十分糟糕。中央急于让返城知青回到农村，于是就警告农村干部不要对返回者进行报复。<sup>101</sup>那时，下乡青年对生活条件问题很敏感，国家领导人似乎并不轻视知青小报中痛苦的陈述。小报称，由于条件恶劣且受到残酷对待，知青彻底绝望了，有的甚至轻生自尽。于是，周恩来承认“有些地方对知青安排不当”，但即使这样，问题应在当地解决。他认为，主要的问题是知青思想意识错误，原因出于如下事实：即一些知青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而出生于干部和工人家庭的知青仅仅是不习惯农村生活而已。<sup>102</sup>

不幸的是，尽管文化大革命为象知青这样的团体提供了要求伸诉冤情、平抚不满的机会，但那个时代的政治气候完全不利于让人怀着同情心去倾听他们的呼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旨在复活曾在1949年前激励共产主义革命的那种价值观的复兴运动。文革时，中国革命的英雄主义言辞泛滥，到处充斥诸如“朴素、立公”这样的口号。毛主席的“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生动地表达了这样一种精神，即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事业服务而不畏牺牲，永不终止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责任。<sup>103</sup>在这种气氛下，工作岗位不合适的抱怨声很可能会受到冷淡，人们会说，真正的革命者要与困难斗争并战胜困难。在说服上海知青返回新疆时，《文汇报》就害怕遭到报复一事发表文章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我们决不应该因害怕受到不公或打击而拒绝回新疆”。<sup>104</sup>到有可能认真地关注下乡青年面临的实际困难时，已是过了好几年头了。

也许是政治气氛不利的原故，知青这些经修正的要求并未以



纲领形式具体地提出，因而也只能从披露滥用职权行为的文章中推断出来。知青写这些文章的主要动机不仅仅是伸诉苦情，也是想让中央和群众组织相信，为了完全彻底地消除招致他们受怨的“黑暗的上山下乡制度”，他们有理由呆在城里。<sup>155</sup>换言之，这些揭发文章旨在使知青的第三种要求立得住脚，即将继续革命作为产生真正符合毛泽东主义的，与群众相结合的制度之先决条件。这一要求赤裸裸地体现在“要革命，不要安置”的口号之中，它有一箭双雕之用，既确认刘少奇主义的下乡政策“有罪”，又证实了他们拥护毛泽东主义的价值观。<sup>156</sup>1967年10月末，在长沙知青的一次集会上，有人发言说：

知识分子应该到农村去，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长期的战略布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迫切要求这么做……刘少奇的上山下乡运动是阻止知识分子到农村的最大障碍。因此，全党全民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彻底清除中国的赫鲁晓夫，彻底打碎刘少奇的下放制度。在此基础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执行一系列正确的政治和经济的路线、方针、政策。这将为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开辟一条光明大道，他们会为此欢欣鼓舞。<sup>157</sup>

真正的毛主义的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与修正主义官僚实行的旧的下放制度有何不同？具体情况很难说明，但是城市青年提出上山下乡制度要与毛主义价值观相一致，这种要求本身就反映他们心中最基本的不满，即旧制度使他们处于不稳定的卑微的社会地位。被送到湖南一家国营农场的知青抱怨说：

知识青年在现在的社会属于哪个阶级、哪个阶层？有关工作安排政策没有书面的规定，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关心

的问题。每当我们某个学生向农场的某某干部提出这个问题，他总是拉下长脸，说：“大多数知青是地主或坏人的儿子，你们的儿子还是地主，儿子的儿子也不例外……”这样，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地主就存在，永远也不可能消灭阶级。这完全是混蛋逻辑。”

上面提到，红卫兵小报把对城市青年的这种想法归罪于旧制度的掌权者散布一些看法。据说刘少奇把青年分三等：上等的进大学，中等的进城市企业，下等的下农村。”而以毛的价值观为基础的上山下乡会消除这种使人反感的地位划分，引导知识青年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与农民结合。

城市青年提出的为了实现真正符合毛主义的改造，应进一步革命的要求，在有关方面看来，与他们当初提出要取消上山下乡要求的涵义是一样的。1968年1月，周恩来重申了他的看法，即种种口号不过表明了城市青年想留在城市逃避到相当艰苦的地方去。他说，城市青年“回到北京，回到大城市，他们说上山下乡政策是刘邓路线这是错误的。（这）是毛主席的思想，目的在于把我们注意力转向农村和广大群众……”值得一提的是几乎在下乡知青受到冷遇、极左组织出现的同时，最为著名的湖南省无联（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发表了揭露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红色资产阶级”的控诉书，号召继续革命，复兴非官僚机构的公社。不清楚下乡知青在这个或类似组织中的作用，但不听话的知青确有可能参与其中。湖南省无联的小册子《衰亡中国》还清楚提出“上山下乡修正主义运动”。中央作出反应，将《衰亡中国》列为反动刊物。”

将“被遗弃的”城市下乡知青和升学青年区分开来尤其使人反感，文革后期实行的平均主义的上山下乡制度取消了这种划分，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城市知青心中的怒火。同时，毛主席

1968年发出的要求农民对城市青年进行再教育的号召导致了一种新的地位划分，许多城市青年对此也不满。出身不好的青年希望以其表现而不是以其血统来判断他们的要求也没有得到满足。文革小组鼓励出身不好或一般的青年起来造反，反对出身优越、“生来就红”、自高自大的“红卫兵”，而后者通常得到党组织的支持。然而，完全以表现来划分阶级的作法没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实现，因为我们在不同方面看到，即使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表现突出，家庭背景仍是决定城市知青待遇的一个主要因素。

评价下乡知青在文革中的抗议活动时，有几个因素必须注意，即知青参与文革的程度以及他们对上山下乡政策提出正面挑战的程度受到了制约。第一个限制因素是中央权威的明确性归根到底得到强权的支持。这一现实至少对一部分城市青年可能产生了抑制作用。1967年秋天，知青小报急切地要改变取消上山下乡政策的原定目标，原因就在于知青省悟到有受到镇压的可能。第二个限制因素体现在相反的方面：一些在前面被划在第一组的城市青年没有参与反下乡运动，因为他们事实上支持这一政策。<sup>100</sup>在别的事情上，对于上山下乡运动矛盾的态度也可能减少了知青参与的范围。从采访中可知，一些城市青年懂得上山下乡的道理，但拒绝把它用在自己身上。在问及为什么要执行上山下乡政策时，一些人提到农村缓慢的工业化速度和城市人口的不断膨胀，以及提高农业生产的需要。他们认为，上山下乡是对这种状况必要的反应。可能在下乡青年中相当多的人都理解、同情，甚至赞成上山下乡运动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理由，但他们希望并寻求自己能逃避艰苦的改造。<sup>101</sup>在文革中，那些将整个制度的利益和自身利益分开的人本身并不反对这个政策，而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便要求得到城市户口或实行轮流下放制度。这种要求可以看作是协调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种尝试，尽管不受政府的欢迎。

另一制止城市青年反抗和要求的因素可能是文化方面的。政治依附倾向从来被认定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这种倾向可能阻止了对国家政权特别是象毛主席这样令人敬畏的人物发出挑战。<sup>106</sup>对政府强行决定他们的生活的权力的做法进行质疑既不妥当也不合法，这种想法很可能使一些城市青年远离所有的政治活动呆在家里。如一篇文章所称，成了“逍遥派”或者堕入无谓的暴力争斗。<sup>107</sup>这种文化的认同性可以用来解释一些下乡知青年组织为什么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使自己符合中央参加文革的规定，而不去维护大家的权利。1966年10月下放到湖南农村的一个66届毕业生组织为重返母校革命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们的理由是1966的毕业生被赋予了这种革命的权力。<sup>108</sup>出于对政府决定的不同理解，城市下乡知青组织之间极易产生分裂。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6-1，2，3”，其成员认为他们的待遇应当不同于1964和65年下放的知青，因为以前中央好象对他们有规定。<sup>109</sup>他们的行为似乎表明了一个主题而不是一种公民政治文化，那就是个人没有感到有能力影响总的政策决定。<sup>110</sup>

尽管对城市青年参加文革的范围和性质有着种种限制，事实是许多人的确参与了重要的反抗活动。而且，他们的一些所作所为完全突破了因文化的局限性或害怕政府强权而带来的限制。取消下放的要求公开向政府的政策提出了挑战，而合法地攻击下放制度的极左言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实例——在革命的面具下也公开鼓吹了。<sup>111</sup>不管对他们参加的愿望作何解释，他们的行动清楚地反映了对上山下乡政策普遍的不满。

全面理解下乡知青文革中的政治活动还必须提及另一种限制，即下乡知青在群众运动中相对弱小的地位。1966年只有120万下乡知青，而且不是所有人都参加了动乱。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中学生加入了红卫兵，但1966年秋据说1100万人在北京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sup>112</sup>相较而言，下乡知青运动的普遍影响必然小

了，的确，可能通读文革的书籍也不会遇到有几处提到他们。<sup>100</sup>而且城市青年下放农村的事情似乎与学生运动关系不大，从我所采访的1966年前从未经历过农村生活的红卫兵的谈话也看出了这一点。最初，这种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漠视令人惊异，因为1966年以前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蓬勃开展了。1966、1967届中学毕业生的分配推迟了，但下放农村肯定是他们的一种可能。<sup>101</sup>与己无关的一个原因是，红卫兵也许希望在政治活动中的良好表现加上在派别斗争中站在最终胜利的一方会使自己得到高等学校入学通知或城市工作。<sup>102</sup>另外，文革的目的也恰恰是要减少学生对具体事务的兴趣。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发动文革时曾号召全国的青年参与国家大事，即，关心根本的政权问题，从而依靠学生来捍卫他的革命路线，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政权将在革命者手中还是在修正主义者手中？对于迄今完全处在森严的政治等级制度最底层的唯命是从的年轻人来说，毛的号召给予他们一种飘飘然的感觉。他们觉得自己的行为举足轻重，他们似乎掌握着中国的未来。在这种情况下，困扰下乡青年的种种忧虑只不过是小事一桩。一个回城的下乡青年说，城市下乡青年所想的是回到城市，但在文革中最大的问题是政权，无人关心这些知识青年能否回城。因而，正如献身革命的口号减少了人们对具体的违法乱纪事情的兴趣一样，文革压倒一切的中心——政权问题转移了对具体事务如上山下乡制度的注意。

红卫兵学生可能对上山下乡不感兴趣，但由于此政策是范围广泛的城乡政策的一部分，所以这一政策不仅在城市青年中而且在其他人中引起了不满。前面我曾提到过合同工、临时工、下放到农村的城里人、复员军人和其他人参加激进运动的问题。所有人都受到强调农业的发展战略的影响，该战略要求城市居民下到农村、限制城市移民及使用廉价的农民合同工以图控制城市开支。这些政策与有关阶层的直接利益相抵触，故当反抗的机会随

文革来临时，他们便道出了心中的怨气和要求。他们的反抗也得到了中央激进领导人含蓄的支持，在合同工和临时工中出现了明确的响应，他们的斗争在1966年12月得到江青，毛的妻子的支持。<sup>106</sup>然而，对造成了他们的不满的城乡政策的广泛而普遍的挑战并未出现，许多受到这一城乡政策不利影响的人加入了激进运动，有的象城市青年一样还结成了组织。他们也攻击修正主义机构，或许还希望一个新的政治结构会或多或少地平抚他们的愤怒。可以想象得到，出于联合起来公开抨击给他们带来苦难的政策的目的，他们可能会形成一种利益趋同的联合。也许组织和领导还不足以形成一个标榜共同利益的与众不同的联合，所以事实上并不清楚哪些社会阶层的人，比如复员军人和下放的城市居民，成立了自己与城市下乡知青不同的组织。他们失败的原因也可能部分是由于中央的干预。1966、1967年间遍及部分城市的罢工加深了中央对“个人主义”的经济要求的敌视。因而，在江青支持合同工的不满之后不久，中央对他们的运动的热情却降温了。1967年2月，工人被告知不要成立自己的组织。<sup>107</sup>不管什么原因，那些受国家的城乡战略之害的人未能联合起来，这不可避免地减弱斗争的影响力。由于他们仍然关心文革的绝对明确的目的，他们的精力便从引起他们不满的真正缘由上转移了。故而，我认为，“文革中激进派的行为是有计划、有目的的，类似‘利益集团’”的这一结论，只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正确的。<sup>108</sup>

## B.巨大的后遗症

文革期间，城市下乡知青反对上山下乡制度，参加了席卷中国城市的动乱。正如本文所示，1968年起执行的下放计划继续造成青年人的挫折和不满。如果中国政治体制仍象66—68年间一样不稳定，可以预见城市青年会利用时机组织起来，发泄不

满，要求变革。

他们将以何种形式起事难以预测。文革的经历不足以指导他们的行为。比如，那些不能上大学的人所体验的被遗弃的感觉，那些被回城的许诺或幸福美好生活诱骗到农村的人胸中的忿恨，都会激发城市青年道出心中的愤怒。自1966年以来，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变化，抗议之声不一定集中在这些主题上。但是在文革之前即提出的根本问题依然存在。它们包括永久性、平等（关于再分配）、地位（针对农民）和至少某种程度上的虐待。由于这些共同点存在，抗议的主题可能是重复的。同时，也很少能知道那些参加文革的人从经验中学到了什么，这又将如何影响他们的反应。据认为，1968年下乡的红卫兵普遍感到幻灭，觉得自己被出卖、被利用了。<sup>m</sup>但一点也不清楚60年代后期在农村地区插队的进程如何影响他们对新的重大政治危机的态度和进一步的反应，也不清楚那些因年纪小未参加文革和那些70年代下乡的青年会如何表现。政治危机的性质自会对人的反应带来重大的影响；它将决定城市青年是否公开要求取消上山下乡或公开抨击以左和极左为根据（即以真正毛泽东思想为名义）的纲领。既然一些知青支持这个纲领，自相残杀的冲突很可能在城市知青中产生。不管形式如何，其反响会远比文革期间大，因为下乡青年的人数已从1966年的120万增加到1976年的1200万。<sup>m</sup>如果再次面临一个反抗的机会，城市下乡知识青年肯定会结成一支扰乱社会的强大力量，不仅在城市，而且也在他们聚居的农村。

文革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隐含了一种引发新的群众动乱的潜在可能。这种潜在可能存在于毛的意识形态之中。1966年，毛主席发动群众反对修正主义当权者。他的做法给中国政治进程引进了一个原则，即革命者可以反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从而带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统治基础的根本原则的质疑，该原则是只有党组织——即正式任命的领导——才能决定对与错。文

革之后，毛的原则被重新阐述。王洪文（文革的产物之一，升到最高层的一个领导人），1973年在党的十大上讲：“我们必须具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遇到路线问题时……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必须毫不顾惜自己，敢于反潮流，要不怕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杀头。”<sup>[1]</sup>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面对政治上层建筑中的修正主义表现，应当发动群众与腐化的官僚作斗争。所以，王引用毛1966年的话：天下大乱达到大治，每七、八年又来一次。<sup>[2]</sup>

群众动乱的潜在可能之存在也因为上层的冲突存在。一些夺权者，从自身利益出发，会发动群众运动以达到他们的目的。文革中群众运动在打倒当权者中起了主要作用。一些领导人认为城市下乡知青是可利用的政治力量，这经常成为某些人攻击高干对立面的一种手法。此类手法在文革中已经派上用场了。谭震林便被指控制定详细的计划要把年轻知识分子变成暴动的后备力量；1966年前的北京市长彭真据说已经这么做了。<sup>[3]</sup>文革后林彪被含糊地指控为在夺权活动中挑动城市知青的不满情绪；但详情还未曝光。<sup>[4]</sup>更加含糊的是，1975年“邓小平和右倾分子……也对青年讲一些象‘青年将突然来到童话世界中的聚宝盆，不需要下乡……如果青年跟着他们进行一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震撼世界的新长征’之类的话。”<sup>[5]</sup>对1976年10月被清洗的四个激进领导人也提出了明确的指控：煽动青年闹事，作为他们夺权行动的一部分；在江西省，“四人帮”的信徒在下乡知青中散布谣言，怂恿他们反潮流，打击“在各级党、政、军组织当领导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更加阴险的是，四人帮的走狗到“知识青年中，向他们灌输反党思想，给他们补助，唆使一些青年打砸抢，挑起事端，然后把责任转嫁给各级党委。”<sup>[6]</sup>

除了煽动城市知青闹事外，激进派还“到处联络，企图利用知青下乡作为他们搞阴谋诡计的一种办法”。<sup>[7]</sup>激进的领导甚至



在自己周围培养了支持者。突出的例子是张铁生，他在 1973 年抨击恢复“资产阶级”优势的大学入学考试。<sup>100</sup>据说，“四人帮”支持他，把他用作他们在辽宁省教育系统的一个代理人。<sup>101</sup>张也是 1976 年 7 月写公开信抨击邓小平及没有点名的“领导同志”反对扎根农村的 19 名城市知青之一。这封信登在人民日报头版。<sup>102</sup>在清除四人帮后，有人揭发张是混入大学的骗子、反革命分子。<sup>103</sup>1977 年初，虽然没人说以先进事迹出名的下乡知青（如在前一章谈到的从南京大学退学的钟志明）都与四人帮有牵连，但确有可能在急于冒尖的城市知青中有一些人同情或支持左派。“四人帮”被指控鼓动两代人之间的仇视，挑动年轻人与老干部互斗，以此来实现他们压倒一切的目标，即将矛头指向上层高干。例如，河北的激进分子“散布谬论说，人越老就越修、越反动。”<sup>104</sup>现在还不能确定执行激进路线的下乡知青是否都成功地进入当地的领导层。但清除激进派后，一群参加 1976 年全国学大寨大会的知青写信给华国锋主席，表明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的决心，这就并非偶然了。<sup>105</sup>

现存只有一些零星材料表明邓小平、“四人帮”和毛的继承人之间的斗争给下乡知青提供了一次发泄心中怒火的机会，就象文革中一样。如 1976 年 3 月广东出现了历数下乡知青悲惨遭遇的大字报。<sup>106</sup>1977 年 1 月，据说描写知青 1968 年下放黑龙江的苦难的大字报遍布上海。他们利用当时上海爆发的批判张春桥运动的机会，控诉张把在文革中反对他的上海青年放逐到黑龙江。<sup>107</sup>正如文革期间一些城市知青试图把反对的目标与刘少奇的“资本主义道路”联系起来一样，现在希望回城的知青也试图把它和名誉扫地的激进领导人联在一起。

从可获得的 1977 年初的材料来看，似乎可以公正地说，体制的约束力在 1976 年仍在起作用，它有效地制止了象城市青年一样愤懑不平的一些人表明他们的意见。这些限制的存在可与被

称为“保守派”领导人的权力联系起来，他们信奉更为正统的列宁主义关于党群关系的教义，最终成功地驱逐了激进对手。

在意识形态方面，这些保守派相信纠正党内的错误倾向的同时可以打破群众与上层冲突的平衡。他们认为群众运动合乎需要，但可能觉得群众政治运动应象过去一样在党的统治集团的领导和控制下进行。他们的口号是党“领导一切”，即判定什么是、什么不是修正主义是党组织的任务。<sup>100</sup>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从毛那里得到一些支持。毛认为这是矛盾双方的关系。他希望出现“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这样一种政治局面。”<sup>101</sup>他有时激进，有时又循规蹈矩。1975年初，他发表了号召“安定团结”的口号，但到年底他又抱怨团结与稳定不应掩盖阶级斗争，即推动激进变化。<sup>102</sup>但他又不仅仅只支持激进观点。

在行动方面，保守派无可置疑地害怕象文革一样不加控制的群众运动的后果。他们很清楚潜在的社会动荡、分裂、不满爆发时所产生的怒火。他们意识到文革遗留的派别斗争的影响以及这种斗争极易重新突发。<sup>103</sup>他们寻求保持对群众运动先发制人的领导，他们禁止成立象文革中的“战斗队”的组织，从而把象反邓小平一样的激进运动控制在可能控制的范围内。<sup>104</sup>

1977年初，支持恢复纪律、团结、稳定的领导人胜利了。他们有利的一个原因是中国高层普遍认识到放纵象下乡知青那样的团体可能导致社会动乱，这种说法并不牵强附会。如果这一条理由站得住，它就包含了一种讽刺。“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一个“新生事物”。它曾作为防止修正主义和达到革命的激进的意识形态目标的一个纲领受到欢迎。但这个纲领只有在政治和管理稳定的条件下才能实行。换句话说，城市青年的下放本身又恰好导致了非常传统的势力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激进力量的怀疑。

注释：

1. 1975年5月6日《人民日报》，关于吉林长岭县下乡知青再教育的编者按。
2. 照顾到家庭困难，也有人可以回城。例如，1974年江苏常州发出通知，被生子女可以回到父母身边，见1975年4月6日《人民日报》。不清楚的是，这方面是否有全国性的规定。每个家庭只允许一个孩子留在城里。或者是地方单位根据全国性的方针自行做出决定。被采访者提到这样的规定，如果兄弟姐妹两人都在农村，允许一人回城；或如父母有病需照顾，可以有一个孩子回城。值得补充的是，报纸赞扬这样的人，他们思想觉悟高，不利用这些规定，坚持留在农村，尽管这样做给其家庭造成困难。见，如1971年2月21日《光明日报》关于来自南京的某知识分子的女儿拒绝从内蒙古返回南京，尽管其母亲有病的报道。
3. 如在公社工厂工作的下乡知青的一些例子，见1972年8月22日《光明日报》，1975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后一种情况是，下乡青年在安徽临川县的一个公社自办工厂。据一份报道，下乡知青“也可以在公社或生产大队开办的工厂落户”。见兰州广播电台1975年2月17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36期，1975年2月21日。
4. 《连队形势教育大纲》（第五课），昆明军区政治部宣传处1975年4月6日。
5. 沈阳广播电台1975年4月6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67期，1975年4月7日。一位曾在军垦农场工作的知青认为，参加人民解放军的下乡知青复员后理应返回军垦农场。
6. 其他例子见兰州广播电台1975年6月15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18期，1975年6月18日；上海广播电台1975年3月31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63期，1975年4月1日。
7. 1975年1月8日《人民日报》。
8. 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1974年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分配》，第308—309页（《中国季刊》第58期，1974年5—6月号）。然而不清楚的是，这段话是只针对北京大学，还是指所有高校。
9. 见1973年8月29日《人民日报》所载山西夏县的事例。
10. 石家庄广播电台1975年2月26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40期，1975年2月27

日。

11. 哈尔滨广播电台1975年8月14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60期,1975年8月18日。
12. 乌鲁木齐广播电台1975年8月15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60期,1975年8月18日。如果大学毕业生坚持离开上海回江苏军垦农场,将被给予一个与其大学学历相应的职位,见注释7。
13. 哈尔滨广播电台1975年7月6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32期,1975年7月9日;济南广播电台1975年7月10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35期,1975年7月14日。
14. 1974年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大学校长被告知,大学生数量明显太少,见“大学校长访华代表团报告”。
15. 1977年初,新的领导们似乎对这个问题没有采取行动。
16. 彼得·J·塞德尔特“编者序”。这个数字由某美籍华裔教授提供,他是在北京得到的,但认为这个数字是非常粗浅的估计,他不愿透露姓名。
17. 昆明广播电台1972年12月21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248期,1972年12月22日。
18. 见表14、第5章;河北广播电台1975年4月10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71期,1975年4月11日;北京广播电台1975年12月10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240期,1975年12月12日。
19. 格雷厄姆·约翰逊:《中国南方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第41页。
20. 耶鲁大学,豪华德·费提供,1973年。
21. 1973年7月5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1974年7月4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31期,1974年7月9日。
22. 哈尔滨广播电台1976年5月21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06期,1976年6月1日。
23. 伯克利著《农村小型工业》第10章,加里福利亚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
24. 1972年10月4日《光明日报》。
25. 1973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

26. 1974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
27. 例如，1962年至1966年间，6万上海青年在新疆塔里木盆地落户。根据1974年的一个关于他们的报道，他们似乎仍在那里。见第5章注释160。
28. 1973年11月26日香港《文汇报》、《中国新闻摘要》第495期，1973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1973年10月15日。
29. 福建广播电台1972年11月22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228期，1972年11月24日；成都广播电台1972年12月21日消息，《世界广播综览——远东篇》第4178期，1972年12月23日。四川的数字包括技校录取的学生。
30. 北京广播电台1972年12月6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240期，1972年12月12日。
31. 福建广播电台1973年9月27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91期，1973年10月2日。
32. 197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哈尔滨广播电台1975年9月18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83期，1975年9月19日。
33. 经历过1970年至1972年征兵的被采访者强调涉及的人数较少。他们说是个别现象。一位知青所在的生产大队在1970年至1971年之间接收了50名下乡知青，然而没有一人被选送上大学。邻近的一个大队有20名下乡知青，却有2名在1971年被选送进大学。
34. 耶鲁大学埃里卡·金所提供的情况，1974年金女士在北京大学度过一段时间。
35. 见1969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
36. 1974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提到，1971年一部分云南下乡知青被工厂录用。
37. 关于广东工业化落后的抱怨并不新鲜。见埃兹拉·F·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东》，第130页，纽约，哈珀丛书1971年版。
38. 1976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39. 武汉广播电台1976年7月24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45期，1976年7月27日。
40. 《中国新闻摘要》第528期，1975年9月10日。
41. 这位被采访者说她所在公社的800名下乡知青中有70人得到重新分配。她还说，

- 30 人被选送广州，40 人去了县里的工厂及商业单位。
42. 《农村小型工业》第10章。
43. 《知识青年在北大荒》，关于下乡知青在黑龙江军垦农场的一本影集，其中有工作在矿井和炼油厂的青年人的照片。他们可能是下放青年。
44. 昆明广播电台1972年2月6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29期，1972年2月10日；沈阳广播电台1972年3月2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45期，1973年3月6日。
45. 访问资料。好的身体显然也很重要。特别是象解放军。
46. 犯了罪的人当然要被捕，从而也就离开了农村。值得注意的是，据一位接受采访的知青说，他的一个同学偷渡香港未成，却被分配进工厂工作，他对此疑惑不解。
47. 1972年7月27日《光明日报》。
48. 1972年3月4日《人民日报》。
49. 然而，在军垦农场工作过的一位被采访者说，1970年农场有5位下乡知青被送往高等院校，他们的成绩平平。下放青年害怕的是，冒犯了上级会影响他回城的机会，这方面的事例，见1971年2月12日《光明日报》。
50. 1975年5月6日《人民日报》。
51. 见1972年5月17日《光明日报》报道的被选送往北京工业学院三位有较高成就的知青的文章。一位来自云南，曾是叶南县党委委员；另一位曾是黑龙江苏武县常务委员会委员；还有一位是山西禹城县的一名公社党委委员。其他例子，见注7及沈阳广播电台1972年3月2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45期，1972年3月6日。
52. 福建在1973年特别注意吸收下放青年入伍：“许多这一类型的学生从有大批知识青年落户的地方应招入伍。”福州广播电台1973年9月27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240期，1972年12月12日。
53. 武汉广播电台1974年消息，《中国新闻摘要》第527期，1974年7月24日；济南广播电台1975年7月10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35期，1975年7月14日。

54. 武汉广播电台1975年7月6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30期,1975年7月7日。
55. 地方和中层机关作出选择的复杂过程在《中国新闻摘要》第480期,1973年8月16日中有叙述。从湖北来看,公社和工厂通过的初选候选人名单应三倍于最后应征数。另见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文革前后》第362-63页,载《中国季刊》第58期(1974年4-5月),他说两倍至五倍的候选人得到推荐。
56. 斯蒂文·戈尔德斯坦教授1973年春的《访问报告》。
57. 这些攻击矛头指向入学考试的问题。虽然这些考试名义上已取消,但是学术机构仍然组织考试考核候选人的成绩,以此衡量他或她的准备程度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973年,这些考试掌握得相当严格。一位叫张铁生的候选人率先反对恢复这种“资产阶级”式的考试。1968年,张铁生初中毕业后在他家乡辽宁新城县的一个公社落户。1969年,他转到他原来的村,在同一个县。他表现很好,被选为小队队长,取得较高的资本。他被提名选送上大学,但必须参加物理和化学考试。他没有答题,却写下了一篇声讨这种白专道路的文章。他抱怨说,他的工作使他没有时间准备,他攻击那些不在农村好好工作,一心想上大学的青年人。他的声讨公开发表了,这引发了对他提出的问题的公开讨论。应说明的是,张铁生还是被辽宁农业学院录取了,而他的左的观点被继续广为宣传。见1973年8月10日和73年9月10日《人民日报》;沈阳广播电台1974年7月19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43期,1974年7月27日;《中国新闻摘要》第480期,1973年8月16日。粉碎“四人帮”以后,张铁生也碰到了麻烦。见本章最后部分。
58. 柏林自由大学B·奥萨德促克博士1975年访问过南京大学。他了解到学生的成份是这样的:28%来自工人阶级,20%来自职员,10%来自解放军,42%来自农村,但对后者的真正来源没加分析。他被告知,职员占20%太高了,而工人成分太低。
59. 例子见1972年8月9日和8月31日《人民日报》。
60. “渠道”在1975年5月6日《光明日报》中提到。其他引文见1972年11月2日《光明日报》和1973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

61. 北京广播电台1974年1月18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5期,1974年1月22日;南京广播电台1974年1月20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5期,1974年1月22日;北京广播电台1974年1月26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20期,1974年1月29日;北京广播电台1974年1月28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22期,1974年1月31日。
62. 南京广播电台1974年1月20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5期,1974年1月22日,报道他要求回部队;南京广播电台1974年3月1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50期,1974年3月13日,报道钟回到他所在的生产队。
63. 南昌广播电台1974年10月30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213期,1974年11月4日,报道钟参加了江西军区召集的一个青年集会。另见福建广播电台1975年9月18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83期,1975年9月19日;1976年7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钟可能与激进的领导有关系;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来,再也没听到过有关他的消息。
64. 北京广播电台1974年1月18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5期,1974年1月22日。
65. 有这么一件事,一名青年被吉林化工研究所录取,录取是“上级照顾到部队子弟”。见长春广播电台1974年2月9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31期,1974年2月13日。其他另有一些退回知青的例子涉及军人家庭,见长春广播电台1974年2月9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30期,1974年2月12日;长春广播电台1974年2月9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31期,1974年2月13日;沈阳广播电台1974年2月9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31期,1974年2月13日;济南广播电台1974年2月16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39期,1974年2月26日;兰州广播电台1974年2月21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39期,1974年2月26日。
67. 1975年5月6日《人民日报》,江苏祝塘县。
68. 1974年8月18日《人民日报》。
69. 1975年5月6日《人民日报》,江苏祝塘县。类似亲戚的这种压力的例子同时在福建蒲城县也有报道。



70. 杭州广播电台1975年8月12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第157期，1975年8月13日。城市男性娶当地妇女的事例不多见。
71. 1973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广东陆丰县。
72. 另一个家庭反对的例子，详见1974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北京广播电台1974年12月21日也作了报道，《国外广播信息社》第247期，1974年12月23日。见1973年3月15日《人民日报》，抵制上大学或进工厂的下乡知青遭到“坏人”的嘲讽。这引起一个县委反击对这一运动的破坏。
73. 1974年1月5日《人民日报》，1974年1月6日《光明日报》及《北京周报》总第17期，1974年第5期，1974年2月17日，第6、23页。蔡完全可以顶替其父，合法地返城当一名矿工；见罗斯·特里尔：《铁树开花》第151-152页。事实上，在城市工作安置中有某些世袭制的规定，即一旦某一城市企业出现空余职位，该单位职工的子女便可得到填补这一空缺的优先权，即便他们可能还在农村服务。正如在第3章有关株州模式的讨论中所提到的那样，城市单位介入知青插队落户管理工作进一步推动了优先分配工作制的实施。当某个城市单位或某一单位系统将知青分配到一个指定乡村点时，这种情况很可能发生，就象广东“纺织系统”的情况一样，该系统现为本系统职工子女设置了几处知青点，见1975年2月13日《人民日报》。
74. 见1971年10月18日《光明日报》“内蒙生产建设兵团”；1971年4月23日《人民日报》；河北武清县，1972年2月17日，江苏邳江县；1972年1月24日《光明日报》，福建龙崎县；1972年8月16日《光明日报》，内蒙乌兰查普盟；1972年8月16日《光明日报》，广东军垦农场；1972年11月22日《光明日报》，广西龙陵自治县；1974年1月16日《光明日报》，有关江苏扬州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的报道，以及1974年4月21日《光明日报》，有关湖南宁远县的报道。
75. 1971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广西琼山县。
76. 有关被采访者称，邻生产队有一个20名知青组成的小组曾有突出贡献，很多人也成为干部和当了教师。但文革以后因看不到重新分配工作的前景，他们的士气一落千丈，表现恶劣。
77. 1973年11月3日《光明日报》。

78. 有关教育标准问题，可参见前面的例子，也可参考哈尔滨广播电台1972年12月22日的报道，《国外广播信息社》第2期，1973年1月3日；1972年10月4日《光明日报》，有关吉林长岭县的报道，1972年3月22日《人民日报》，江苏武进县知青呼吁加强教育及与动据分子作斗争的读者来信，该读者来信同时还将进城重新分配工作看成是阶级斗争问题，认为应该与阶级敌人的煽动进行斗争。另见1971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广东龙门县，1975年5月3日《人民日报》，北京延庆县。
79. 《红旗》杂志第8期，第67页，1972年8月1日《支持和教育子女上山下乡干革命》。
80. 新闻报刊未曾报道过通奸行为，被采访者称曾听闻过数例婚前性行为，并导致非婚生子。根据1973年在香港访问一位来自北京的海外华人所获得的资料，1971年北京干部通过内部信息系统得知，延安地区知青道德败坏，明显的表现就是性乱交，新闻媒介对知青不满规定年龄结婚的情况时有报道，参见197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广西贺县。
81. 两位被采访者称他们知晓知青因偷窃而被捕的案例，另外还告知有关知青偷鸡、与农村青年打架等事例，报刊中时有知青不守纪律，有对抗性行为的报道，见1969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
82. 有关此类事件的报道，见《1971年大陆人民反共抗暴活动》第二章，第330—347页。这篇代表台湾当局观点的文章描述了有组织的反抗活动，包括反抗集团的形成及有知青参加的暴力事件。这些资料尚未得到证实，有被采访者曾耳闻广东省北部有一支知青游击队，但没有提供具体细节材料。
83. 这些被采访的知青中，虽然大多数都超了假，但有些人确实在广东一次度过3个月时间，可参考北京广播电台1970年12月18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0年12月28日第250期，对黑龙江上海知青的报道：“有人觉得目前正处农闲的冬季，因此可以回到城里去过冬”，197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有一则消息报道说，一名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知青未经批准回到家中，但后来经过动员说服即返回他所属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84. 报纸记者、外交家及一些参观者对大批知青非法居住在城市的状况有多种估计。

1974年，记者马克·盖恩引用一位驻留北京的西方外交家的估计说，在这个国家共有40万知青属于这种情况。见马克·盖恩：《乡村印象》第15页，载《共产主义的问题》第5期（1974年9—10月）。之后，多伦多《环球邮报》驻北京记者约翰·伯恩估计，1974年初非法返回北京的知青数达5万人。见1974年1月11日《纽约时报》。罗斯·特里尔认为1973年夏季“约1万名”知青“未经武汉官方同意逃回城里”，见《铁树开花》第274—275页。当然，上述预计仅仅是估算，同时也不明确，这些数字是否包括那些从一开始就不服下乡命令的人员。中国的新闻界对非法返城者也时有报道。在知青大量调动工作开始之后一年，一家广东报纸报道说：“他们制造各种借口回到城里，在城里滞留数月不归，有些人甚至下决心不再回到农村……如果你继续在城市里漫游，可能你正好掉进了阶级敌人的圈套……，有些知青贪图享受，厌倦劳动，追求城里的舒适生活；在阶级敌人的引诱下，他们已经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成为阶级敌人的工具。”见《广州工代会》，1969年9月1日，《中国大陆新闻综述》第26期附录，1970年2月2日。1973年6月笔者访问过位于北京郊县的“中阿友好人民公社”，有人告诉我，一些下乡知青已经自作主张，回到了城里。

85. 采访资料。

86. 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姚文中指出了青年犯罪，但并未提出知识青年犯罪问题。至少广东的犯罪问题，可参见1972年8月15日《纽约时报》，《中国新闻摘要》第407期，1974年2月24日。《中国新闻分析》1976年7月9日，第1046期，有篇专文讨论了广东的妓女问题（以采访资料为基础），文中提出回城的下乡女知青扮演了妓女角色。据报告人称，1972年底，广东的一些工厂和街道组织在讨论一份内参文献时特意将非法回城的知青列为盗窃、黑市交易和赌博的一个来源。
87. 有关城市民兵组织的资料参阅第3章和《中国新闻分析》1975年7月5日第1005期。关于惩罚，参阅帕尔·斯特劳斯的的文章《核准公开枪决》，载于1974年1月13日《波士顿环球报》；文中故事经由与广州的官员谈话得来。
88. 有关当时进行着的“扎根”与“拔根”斗争的情况参阅南宁广播电台1976年6月29日广播，《国外广播信息社》1976年6月30日第127期。

89. 这是被采访者的看法。另参阅本章下一部分。
90. 1975年夏天，某些决策者明显支持轮换制，一些知青显然听到了风声，欢欣鼓舞，并自作主张回了城。见1976年7月9日《人民日报》关于黑龙江国营农场的报道。
9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参阅联合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集》（以下简称《文革文件集》）第46页。
92. 即将出版的聂鸿云文革研究专著第二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分析之理论框架》一文对此作了精彩的分析。关于这场动乱的详尽历史参阅斯坦利·卡农的书《毛与中国》，纽约，威肯出版社1973年版。
93. 参阅中央政府1967年1月11日、2月17日和10月8日公布的有关经济主义和下乡知青的文件。这些文件载于《文革文件集》第165-167、301-302和560-563页。
94. 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国大陆新闻综述》第3983期。1967年7月19日，周恩来的批评参见海风：《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以下简称《广州地区文革》）第268、286-287页。
95. 《人民日报》社论，《中国大陆新闻综述》1967年7月19日第3983期。
96. 采访所得数据。另参考《支农红旗》1967年1月第7期所载《三年血泪史》一文。参阅《中国论坛》1968年5月27日第483期。从此以后，红卫兵小报上的故事的标题常被替换掉。撰写本部分内容可供使用的数据很少。
97. 1967年2月9日上海《文汇报》，《中国大陆新闻综述》1967年3月14日增刊第167期。
98. 有关这方面的例子参阅《知识青年英雄郭家红烈上永垂不朽》一文，载于《3211战报》1967年10月30日第2期。郭是甘肃一国营农场的知青，受过处分，坐过牢。在去北京要求平反的途中，因保护社会主义财产而献身，成为英雄。1967年3月18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该小报转载了此社论。同期上还刊登了另一个例子。
99. 《知识青年不可辱》，载于《革命青年》1967年11月10日第2期。
100. 同上。

101. 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国大陆新闻综述》1967年7月19日第3983期。
102. 《告城市革命人民书》,《支农红旗》1968年1月6日。
103. 参考理查德·鲍姆在《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载《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第三期(1971年7月))中的分析。
104. 威廉·斯基纳:《中国的农民和封闭社会》,加里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
105. 《三年血泪史》,载于《支农红旗》1968年1月第7期。
106. 《支农红旗》1967年11月1日第3期《海兰惨案》,《联合出版物研究处》1968年1月17日第44502期,《共产党中国的转变:政治和社会学的考查》(以下简称《共产党中国的转变》)第436期。
107. 参看1968年7月号《批修反霸》上的例子,转摘自马丁·辛格:《中国的知识青年和文化革命》(密西根,中国问题研究论文集第10期,1971年,第63页)。据报道,农民向广东英德县国营农场的知青发动了进攻,拷打了部分人,结果,有5人死亡,包括一位干部。前面已经讲过,被采访者并未经历过此类暴力事件。
108. 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国大陆新闻综述》1967年7月19日第3983期。
109. 1967年2月12日《文汇报》,《中国大陆新闻综述》1967年3月14日第167期增刊。
110. 除刺激知青回上海外,据称,新疆的官员和新疆建设兵团的官员将那些试图反抗当权者的知青置于“白色恐怖统治”之下,包括“政治上和人身上的迫害”。新疆的主要领导人王恩茂调动军队对付从北京来的红卫兵,认为他们是到乌鲁木齐煽动当地反叛的。显然,军队镇压了试图参与反叛的知青。新疆情况特殊,它与苏联接壤,又居住着时常闹事的少数民族,鉴于此,中央委员会、国务院和军委于1967年2月联合发布“规定”,严格限制边境地区(PCC)的文化大革命活动。中央划定出成立群众组织时必须按特别规定行事的单位。且禁止夺权,并指出,罢免官员必须经上级党委会批准。有关情况参见1967年1月25

日《文汇报》，《中国大陆新闻综述》1967年3月13日第166期增刊。另参考卡农：《毛与中国》一书第250—252页和1967年1月18日《文汇报》社论，《中国大陆新闻综述》1967年2月28日第164期。该社论挑动知青反对新疆的走资派。有关的中央规定，参阅《文革文件集》第258—261页。另看林恩·怀特：《通向乌鲁木齐之路》（1975年3月在旧金山召开的第27届亚洲问题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及琼·德莱尔的：《西去阳关》（1975年3月在旧金山召开的第27届亚洲问题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

111. 1967年2月2日《解放军报》社论，《中国大陆新闻综述》1967年4月24日第178期增刊。中央有关反经济主义的“通知”参阅《文革文件集》第165—167页；1967年2月12日《文汇报》社论，《中国大陆新闻综述》1967年3月17日第168期增刊。1967年1月26日和2月1日《人民日报》，《当代背景》1967年3月6日第818期。但是，在湖南的一些地区，下乡知青不得不打破据称是走资派设置的“封锁”，以便返回长沙市。1966年11月，长沙的下乡知青组织派出一个“平反调查组”以解救在醴陵地区的同志们。这些人曾在夏季被党的干部打成右派，而按照中央的指示可以恢复名誉。参见《雄关漫道真如铁》一文，《革命青年》第2期。1967年11月10日。文章标题选自毛主席诗《娄山关》中的一句。参阅聂华苓和帕尔·安格尔的译著《毛泽东诗集》第63页。
112. 摘自海风：《广州地区文革》第63页。
113. 1969年1月18日《南方日报》，《中国大陆新闻综述》1969年3月12日第246期增刊。
114. 有4个向我提供资料的人在文革前就已下乡。但仅有一位参加了文革期间的活动。
115. 1967年10月7日《支农红旗》第2期。当时还有一个“广东知识青年造反总部”，参阅《革命青年》1967年11月10日第2期。
116. 采访所得资料。另见《是流氓无赖的运动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运动？》一文，《支农青年》第3期1967年1月11日。参考《联合出版物研究处》1968年1月17日第44052期。另见《共产党中国的转变》第436页。
117. 参阅《雄关漫道真如铁》一文。

118. 《谭震林就插队工作的讲话》刊于《支农红旗》1968年1月第7期。见《中国大陆新闻综述》1968年2月21日第4123期。
119. 《每日电讯》1967年1月20日，《朝日新闻》1967年1月25日。
120. 《文革文件集》第301-302页。
121. 《北京市公安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管会公告》1967年2月25日。见《文革文件集》第670-671页。
122. 例如，1967年10月22日，来自广东和湖北咸宁专区的知青参加了在长沙举行的集会。参阅《革命青年》1967年11月10日第2期。
123. 同117。
124. 《旅行记事》，《中国论坛》1968年2月26日第465期。
125. 《武汉市‘9.7’血案真相》，见《3211战报》1967年10月30日第2期，《中国大陆新闻综述》1968年1月2日第4909期。
126. 采访所得资料。另见拙著《中国劳工不满之起源》。
127. 1967年2月11日《文汇报》，《中国大陆新闻综述》1968年3月17日第168期增刊。
128. 参阅聂鸿云：《理论框架》一书。
129. 毛泽东：《与张存桥、姚文元同志在三次会议上的谈话》，载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主席与人民的谈话》（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77页和《文革研究入门：以历史眼光看文革》，特别是后者的第85-108页。
130. 同128。
131. 同上，另见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东》第339-345页，《中国劳工不满之起源》和聂鸿云：《文革期间广东的激进学生》。
132. 但周恩来称，下乡知青不仅仅在激进团体中有，在其他各个团体中都可以找到。见海风：《广州地区文革》第287页。
133. 《是流氓无赖的运动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运动？》。
134. 参阅《文革文件集》第560-563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紧急通知”不仅是发给下乡知青的，也是发给原是城市居民，后来到农村务农的所有人的。
135. 见《雄关漫道真如铁》一文，文中列出了支持他们的团体的名单，以此表明“我

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另参阅《驳知识青年造反无理》一文，刊于《支农红旗》1968年1月第7期。

136. 周恩来在1967年11月说，在3万回广州的下乡知青中，只有1万人没有听从要他们返回农村的10月命令。见海风：《广州地区文革》第287页。如果这是真的，这便显出从命的比例很高。但知情者对此存有争议。
137. 《驳知识青年造反无理》。
138. 海风：《广州地区文革》第268页。
139. 1967年1月25日《文汇报》，《中国大陆新闻综述》1967年3月15日第166期增刊。
140. 《在阶级斗争大风大浪中茁壮成长》，刊于1968年7月26日《北京周报》第30期，第22—25页。
141. 《支农青年何去何从？》刊于《支农红旗》1967年11月第3期，见《联合出版物研究处》1968年1月17日第44052号。另见《共产党中国的转变》第436页。
142. 《广州地区文革》第287页。周恩来提到了中央关于支农青年的一个通知。
143. 《支农青年何去何从？》是篇缴文，刊于下乡知青的小报《支农红旗》，但同期又刊出一篇驳文，题为《是流氓无赖的运动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运动？》。另一篇攻击下乡知青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文章见《农村青年》1967年10月25日第20期，载于《中国大陆期刊文摘》1968年1月29日第612期。
144. 参阅《是流氓无赖的运动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运动？》及《驳知识青年造反无理》。
145. 采访资料。另见怀特：《文化大革命中上海的政策》第339页，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
146. 《我们在唐山地区的所见所闻》，《革命青年》1967年11月10日第2期，载于《中国论坛》1968年2月26日第465期。另见《三年血泪史》。
147. 《谭震林关于安置工作的讲话》。
148. 《中共文革文件》第560—563页。
149. 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国大陆新闻综述》1967年7月19日第3983



期。

150. 参阅注释146。另见陈永春的例子，刊于《支农红旗》1968年1月6日第6期，参阅《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1970年春夏合期，第140—148页。另见《她为什么自杀？》，《支农红旗》1968年1月6日第6期。
151. 《广州地区的文革》第287页。
152. 这三篇文章刊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105页及第4卷219—220页、316—318页。
153. 1968年2月25日《文汇报》，《中国大陆新闻综述》1968年3月26日第4146期。
154. 马丁·辛格：《中国的知识青年与文化大革命》第50页。
155. 1967年9月3日的长沙集会曾高呼此口号。参阅《雄关漫道真如铁》一文，“可耻的”一词是“茶岭来信”特色，见《革命青年》1967年11月10日第2期。载于《中国论坛》1968年2月26日第465期。
156. 《愤怒声讨刘少奇》，《革命青年》1967年11月10日第2期，《中国大陆新闻综述》1968年1月5日第4093期。引文根据原文改写。
157. 《我们在唐山地区的所见所闻》，引文据原文改写。
158. 《知识青年不可辱》。
159. 《周总理的重要讲话》，刊于《小兵》1968年2月17日第22期，《中国大陆新闻综述》1968年3月8日第4134期。
160. 《中国何处去》，刊于《广影红旗》1968年3月第5期。载于《中国大陆新闻综述》1968年6月4日第4190期。另参阅辛格：《知识青年与文化大革命》第54—56页。在广州曾出现过同样的极左团体，它们提出“天下大乱”，并反对革命委员会。见辛格专著第60页。据被采访者讲，其中有一个叫“8.5公社”的极左团体是由“所有名无实的高校——农工大学的学生组建的。另参阅海风：《广州地区文革》第330页。
161. 王亭（音译）：《中共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6册，第43—54页。但是，应该指出，在1968年春确实发生过另一次左派高潮。一些领导在谴责极左团体时显然是半心半意的。见卡诺：《毛与中国》第420页。
162. 有个这样的团体受到了《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茁壮成长》一文的赞扬。见

注释第 140。

163. 被采访的知青中赞成上山下乡政策的基本上是出于经济原因，但只有一位称，他支持这一政策还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至少一开始是这样。他以前是一个红卫兵战士。布朗大学的高英茂教授曾在 1973 年与下乡知青交谈，他们告诉高教授，防止修正主义是制订这政策的重要原因。
164. 有本重要的著作是理查德·所罗门著：《毛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71 年版。
165. 《目前知青运动的现状和任务》，《支农红旗》1968 年 1 月 6 日第 6 期。为什么红卫兵在文革中会使用暴力？这也许能用理查德·所罗门的假设来解释，即依赖统治集团权威的社会会产生不满与愤恨，这时就会爆发动乱。被采访者和中央文件都称，一些参加动乱的下乡知青不仅参与武斗，也无目的地滥用暴力，并有犯罪行为，如“打、砸、抢”。参考《中共文革文件集》第 561 页。不过，如果下乡知青进行不适当的暴力行为是事实的话（此情况难以考查），那也只能说，这是他们感到没有前途而灰心丧气的结果。
166. 《茶岭来信》。
167. 采访资料。一位被采访者将下乡各知青团体分化的原因归结于：依照中央的政策和规定，一些下乡知青比另一些更有资格参加文革，或更有资格回城。
168. 要弄明白这些概念的精确含义，请参阅西德尼·维伯和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合著的《公民文化》第一章，波上顿，小布朗出版社 1963 年版。
169. 《告革命同志书》，《支农红旗》1968 年 1 月第 7 期。
170. 卡西的研究报告：《中国的文化革命》第 20 页。
171. 卡诺：《毛与中国》及琼埃斯梅：《中国的文化革命》（加登城，爱克丛书 1973 年版）都未着重注意他们的活动。一位被采访者称，下乡知青约占广州红旗派组织成员的 10%。
172. 采访所得资料。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东》第 341 页。
173. 采访所得资料。1968 年前未被送下乡的、阶级背景好的人仍认为，上山下乡主要是针对阶级背景坏的人的。
174. 卡诺：《毛与中国》第 264 页。及拙著《中国劳工不满之起源》第 8 页。据报道，

毛认为使用临时工是不光彩的，但文化大革命后，仍在用临时工。见《农村小规模工业》第3章。

175. 《中国劳工不满之起源》第16页。

176. 聂鸿云：《广东的激进学生》第681页。

177. 据报道，林彪也曾指出：“在文革早期，红卫兵受到欺骗和利用，被当作炮灰，但在后期，他们受到了镇压，成为替罪羊”。参阅高英茂：《林彪事件》第84页。另见米里亚姆和伊凡·D·伦敦：《中国之迷茫的一代》，1974年11月30日《星期六周报》。

178. 当然，并不是所有1200万人都还在农村，因为一部分人已被重新安置。

179. 王洪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第31页。他在1976年10月遭清洗。

180. 同上，第30页。

181. 《谭震林关于插队工作的讲话》。他是在1965年2月8日举行的一次插队工作会议上讲的。当时，中国密切关注因美国干涉越南而面临的威胁。

182. 威廉·欣顿1975年3月15日在新泽西普林斯顿的讲演。他是一位农场主和作家，是美一中友协的主席，与北京关系密切。在“571工程纪要”中，林彪说，上山下乡是“变相的劳改”。参阅高英茂所编《林彪事件》第84页。

183. 谭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184. 南昌广播电台1977年1月10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7年1月14日第10期。

185. 南昌广播电台1977年1月12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7年1月18日第12期。这种指控意在表明，“四人帮”在各地都进行此类活动，不仅仅在江西。

186. 参考注释第57。

187. 1976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

188. 1976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189. 1976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尚不知道7月份在谴责邓小平的信上签字的另18个人怎么样了。他们中有一个叫柴春泽，此人在本章开头提起过。他放弃了回城的机会。

190. 石家庄广播电台1976年12月7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6年12月13日第

240 期。

191. 1977年1月4日《人民日报》，该团体208人中包括回乡知青和当地知青。
192.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支持还是反对》，《问题与研究》1976年11月第12期，第105—106页。
193. 1977年1月19日《纽约时报》。
194. 《党是领导一切的》，1974年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
195.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首次作了系统的阐述，现在它被广泛引用，如1975年初通过的新宪法就引用了它。

## 第七章 是第三世界的榜样吗？

评估中国安置城市知青到农村去这一作法的一种方法，是看其它第三世界国家能否效仿它。城市人口失业和农村地区不发达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近些年来，研究人员带着日益增长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长，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国家人口的高出生率，部分原因则是因为农村人口不受限制地向城市迁移。后一个原因又根源于城市生活的吸引力和农村普遍存在的就业不足和贫困，可是，城市并不能给所有来到这里的人提供就业机会。“在许多地区，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是其工作职位增长速度的两倍。”，在象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菲律宾这样一些国家，知识青年中的失业者尤其呈现出“一种惊人的比例”并“具有爆炸性”。，知识青年失业不仅是教育与社会实际需要不相适应的结果，而且也是工作职位特别是城市职位普遍短缺的结果。，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所有不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它的年轻人是否必须在无所事事和从事没人想干的工作之间进行选择？”，在绝大多数国家，政府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来妥善处理这个问题。它们与中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而有趣的对照。我们在本书中考察的方案，是中国人寻求解决城市知识青年失业和农村落后问题的方法之一。按照这一方案，从1968年以来，有1200多万城市知青被送到了农村，其中大部分人要在那里呆一辈子。（1979年大返城后，知青绝大多数返回了城市。——译注）比较而言，这种迁移方案是对第三世界国家所共同面临问题

的一种大胆的、富于想象力的和独一无二的反应。

其他国家应该仿效这个方法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无疑要考虑一个仿效能力的问题。对中国情况的考察提醒人们，中国所具有的落实这个方案的能力往往是其他地方很缺乏的。这个能力的关键在于能使个人的选择服从于国家的选择。只要人们还留恋城市，只要有物质享受，及存在农村人口向较高层次地区流动的前景，便不足以激发众多的人服从国家向农村移民落户的计划，国家就必须动员组织机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去实现这一计划。然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组织的力量都很软弱，象中国那样的将个人束缚于其中的组织的约束和意识形态限制网络，在其他地方几乎是完全不存在的。坦桑尼亚一直试图在许多方面效法中国模式，可是，当它将城市的失业者迁移到农村工作时，那些被强迫迁到农村落户的人绝大多数在一两天内就踏上了回城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中国那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组织力量，也没能阻止某些下乡知识青年的逃避行为。

意识形态力量与组织力量同样重要。在中国，意识形态价值观既包括建设国家，也包括建立一个新的、消灭了“三大差别”的平等社会。这种意识形态价值观提供了一个“奋斗神话”，它以发展的必然性来证明要求城市知青做出牺牲是合法的。这种意识形态价值观提醒下乡知青及他们的家庭必须与旧的价值观做斗争。意识形态是实施知青下乡计划不可少的一种功能因素，尽管只有很少人真正从内心接受新的价值观，但它的作用的确存在，并且具体体现在那些所有城市知青都要学习的榜样身上。这种意识形态给城市知青下乡运动注入了必要的灵感、推动力和理想主义色彩。而且，正是这种意识形态，证明了对下乡知青施加组织压力和禁令是合法的，而如果没有这些压力和禁令，就不能保证人们的服从。然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没有适当的合法意识形态来赢得对诸如移民这样一类计划的支持。的确，拥护社会主义的意识

形态及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伦理道德实际上是十分盛行的，但是，能够象中国那样使这种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既适应于农民又能与组织力量联系起来的国家却没有几个。

中国的组织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是其独特的革命历史的产物，因而，它很难被复制。尽管如此，仍然值得重申，为了实施知青下乡计划而动员组织和意识形态力量，并不是中国对这个问题的一种自动反应。实施这个计划需要强大的政治压力，这种压力是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的形成相联系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是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变种。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文化大革命”前，城市知青下乡运动规模较小，因为那些“修正主义”政策的制订者们怀疑它的可行性。他们认为这个计划太激进了，他们不相信人们固有的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对生活的期望能够被改变。即使他们相信有可能实现这种改变，他们也并未感到实现它的紧迫性。因此，他们寻找了一种至少是部分解决问题的方案，例如通过发展街道工业给城市知青提供就业机会。换句话说，那些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发展计划制订者们似乎希望采取较少具有革命性的方案来解决城市失业问题。在中国，思想和社会的激进化发生在毛泽东领导下的60年代后期，这种激进化为大规模贯彻落实城市知青下乡方案提供了原动力。因此，城市知青下乡运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独特产物。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毛泽东思想是在寻求适合中国需要的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产生的，而是要强调指出，由这种意识形态引伸出的价值观和社会目标影响了城市知青下乡战略的产生。

我们不仅必须考察实施移民计划的组织和意识形态的能力，还必须考虑到落实广泛的相关政策和措施的能力。对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来说，诸如移民之类的计划属于第二位的考虑，只有等一定的前提具备之后，才会采纳此类措施。例如，将

城市居民迁移到农村以减少失业的逻辑前提，就是农民向城市的迁移得到控制。这一点，中国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已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做到了。而且，的确有一些研究亚洲和拉美的学者现在也认为，为限制人口向城市自由流动而采取极权措施是合理的。但是，人们还认识到，农村地区的状况必须有一个根本的改变，以使它有可能为大量的失业者提供工作，从而减少造成向城市迁移的刺激因素。中国在农村部门进行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和采用劳动密集型农村发展战略正好取得了这样的效果。从中国对人口迁移的持续控制，我们可推断出，农村的发展并未消除城市生活的吸引力。但是，使农民留在农村的物质条件至少已经具备了。然而，人们怀疑，能有多少个第三世界国家具备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能力去实现基本的农业改革呢？

移民计划的辅助政策还包括那些旨在缩小城乡差距的措施。虽然移民计划本身就对缩小城乡差别有一定作用，而那些旨在使城乡收入均等的措施为移民计划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点也是可以得到证明的。当然，现在还不清楚这些措施是否已实际上促进了迁移计划的实施和有助于使农民“安心务农”。但是，我们有理由指出，对于城乡关系的处理不当，例如，当市场力量的运作导致收入差距扩大时没有采取行动，会使移民之类的计划的实施变得更加困难。而且，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乡收入存在着巨大的并且往往是仍在加深的鸿沟。”，因此，人们也怀疑，能有多少第三世界国家，包括那些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具备必要的再分配能力，\*

---

\* 对于那些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获得权力的方式有助于确定他们将来是否会采取有利于农村的再分配政策。与那些奉行以城市为基础的革命战略的领袖人物相比较，奉行以农村为基础的革命战略的领导人可能会更倾向于采取这样的政策。



也可能有人认为，如同在中国那样，这种移民计划是由于一些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文化因素而得以运行的。例如，在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里，农民阶层的地位在身份等级制度中处于商人之上，而且，农民与其他阶层并没有被象等级制度这样一些樊篱分离开来。与那些以封闭的农民共同体为特征的农业社会相比较，这种相对开放的传统在今天可能促进他们对外来人的融合。唐纳德·芒罗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中国人的柔顺观念根源在于他们的传统，因此，他们可能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易于接受引导和仿效榜样，这有助于使他们接受移民计划。<sup>\*</sup>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某些传统不可能对移民计划造成特别的困难。例如家庭纽带的凝聚力。<sup>\*</sup>

在评估中国的发展模式对其他国家的适应性时，必须分清政策与实践之间的界限，这些政策和实践甚至可以在不具备或不充分具备它们在中国运用时所需要的条件时也得到实施。毫无疑

- 
- \* 虽然有些人明确地反对移民计划，他们把这个计划看成是对家庭延续性的一种威胁，但到目前为止，这项计划对中国家庭的实际影响还不完全清楚。这项计划并没有直接破坏家庭纽带，相反地，它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还试图动员和利用家庭纽带。但是，长期分离的后果难道不会不可避免地削弱家庭的凝聚力吗？本书中的某些资料表明，城市知青下乡计划对家庭的考验实际上加强了家庭的凝聚力，至少短期内是如此。但是，也有相反的情况。对有些年轻人来说，上山下乡能使他们从父母和亲戚的权威之下解放出来。我们在第6章中提到的那位青年，显然就是因为她父亲为她包办婚姻而拒绝从农村返回城市。我们在第5章中引用过这样一些惊人的例子，有些女青年在农村扮演着有效的领导角色。这些例子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对于上山下乡计划所提供的锻炼自主精神的机会，女知青的反应是否更为积极？但是，这个计划的总体影响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问，仔细考察中国在农村发展、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我们可以找到许许多多有价值的政策和实践例证，这些例证可以在其他地方得到卓有成效的运用。可是，安置城市知青下乡计划似乎并不包括在这些政策和实践之中，这是因为城市知青下乡计划的实施要依靠一些独特的能力和相关条件。从中国动员城市资源帮助农村地区的政策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其他国家可能会发现，效法中国那些较和缓的实际措施要比效法知青下乡的计划容易很多，例如派医生或技术人员到农村提供短期服务等。对于我们提到的知识青年失业问题，有些国家，例如伊朗，一直在尝试组织“扫盲队”和“发展队”以作为知青参加军事服务以外的替代办法。”这种动员知青为国家服务的办法也比中国那样的移民计划容易实施，但它当然只是一种暂时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假设第三世界国家具备了永久安置城市知青到农村去的能力，那么，它们会采纳这个方案吗？鉴于本书提到的阻碍这一方案的那些困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矛盾的。一方面，这个方案对解决城市知青失业问题有显著的作用，同样对于实现一些诸如降低城市基础结构成本之类的发展目标也有显著作用。在农村地区，下乡知青通过各种并且常常是重要的途径为农村的发展做着贡献，从而有助于国家发展农业的重要努力。另一方面，尽管的确无法精确计算出它的得失，这一方案的成本确是很高，其中有一种代价体现在发达的国民经济部门，它以一种人才浪费的形式体现出来。这是因为，有些本应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却由于被送到农村而没能受到这种教育。更广泛地说，这些代价与教育革命的结果相关。在农村地区，下乡知青对农村发展的实际贡献和他们可能做出的贡献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这种差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咎于不适当的计划和管理。这就是说，城市的学校应当更加密切地适应农村的需要。如果资源分配合理的话，应当有更

多的青年被送到那些对他们所受的教育需要更为迫切的地方，而不是象过去出现的情况那样，并且，在那些地方，他们也有更多的在农业部门内流动的机会。进一步的补救措施无疑能够缩小差距，但是，这种差距在相当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上山下乡计划本身的前提条件造成的。许多下乡知青完全不接受在农村终身服务的观点。由于缺乏动力，他们将下乡视作一种负担而不是去做出贡献。一个较少依赖革命价值观念变化的计划可能会较好地避免这种人力浪费。

在涉及到诸如向上流动、家庭延续或者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等问题时，官方的价值观和倾向性与社会的价值观和倾向性之间的差距是清晰可见的。由于这种差距的存在，实施知青下乡计划的代价很高。为了动员知青下乡并使他们安心留在乡下，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此外，这种差距有损于新的价值观，即有损于意识形态目标的实现。例如，有些干部对倡导下乡计划的革命价值观阳奉阴违；有些知青下乡时表现出崇高的理想，实际上却是为了去“镀金”；还有些知青表面上是因为政治信仰而自愿下乡，实际上却是为了实现对自己有利的目的。所有迹象表明，人们的公开行为和个人信仰之间的差异并不是一种无足轻重的现象。这种差异似乎必然会导致对于人际关系的不信任和对人们的行为动机的怀疑，并且会使我们怀疑人们真的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与这种现象相应的社会风气几乎不可能有助于形成官方意识形态所要求的那种团结和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的其他生活领域，统治需要和群众选择之间保持了更大的协调性。例如，在农业领域，小块自留地的存在对集体所有权起到了平衡作用；同样，以生产队作为分配单位的规定也限制了平均主义的倾向，从而避免出现贫穷村庄和富裕村庄之间的平均化。这些折衷办法有可能增强人们对公有制的拥护和接受。安置城市知青下乡计划中的问题是，在国家需要和

群众选择之间显然缺乏上述折衷办法。某些知青得到的返城机会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折衷办法，但是，对大多数必须永远留在农村的知青来说，差距仍然存在，代价仍然存在。然而，永久性迁移计划并非仅仅是没有放弃塑造一种新人的乌托邦幻想的结果，它也是由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所决定的。

在评价这项移民政策时，人们应该注意到，任何一项发展计划，无论是基于对必然性的直觉，还是对新社会的憧憬，抑或是二者的结合，都不可能是没有成本和代价的。当然，还不能确定较少激进色彩的计划——例如在农村提供有限服务——必然会更有成效或者成本更小，尤其在涉及到为回乡者提供工作的时候。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不采取行动有效地对付城市知青失业问题，我们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我们必须考虑到那些在拥挤不堪的城市勉强生存的人们的失望和沮丧情绪，正如我们必须考虑到他们非生产性生活的机会成本一样。而且，还存在着发生暴力行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有时会变成现实，例如1971年发生在斯里兰卡的“青年叛乱”。<sup>11</sup>因此，也许可以这样说：中国为寻求解决办法和采取行动而付出了代价，而其他国家则为没有这样做而付出了代价。鉴于第三世界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坚持认为政府绝不能象中国那样严厉地压制个人愿望的观点似乎是不现实的。与成本相比，这样做所带来的收益应该比中国的迁移计划更加显而易见。

由于中国某些政策制订者对上山下乡计划也持有矛盾的结论，所以，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项计划会无限期地存在下去。这项计划的前途有三种可能性，即：象现在这样延续下去；转向轮流服务制度；或者被废除。

移民政策象现在这样延续下去取决于下述假设，即，在达到工作年龄的城市知青数量和能在城市就业的知青数量之间的巨大差额仍然存在。有人设想，为满足就业需求，工业增长率应当超

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然而，如果确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提出的那样，城市人口出生率从1970年前后开始有所下降，那么，到1980年代中叶，对城市就业职位的需求量似乎也应当下降。如果城市人口下乡定居计划到那时终止实施的话，可以将它部分地归因于中国的城市人口统计转向低出生率。并且，这似乎的确符合至少是一部分中国人的愿望。“在上述假设之外，继续实施上山下乡计划的合理性将不得不取决于该计划对于农村地区发展的贡献。然而，我很怀疑这项计划会象过去那样能在此基础上存在下去。维持这项计划还取决于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但是，许多观察家预言，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将会降低意识形态的热情，诸如将城里人改造成农民一类原教旨主义的目标似乎将逐步失去其紧迫性。

随着城市就业问题对上山下乡计划理论上解释的重要性的衰落，轮流下乡服务的制度似乎得到进一步重视。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这项计划在其存在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包含轮流服务的成份，并且围绕其程度有着重大的分歧。要求城里人到农村临时服务比要求他们永久落户要少一些革命性，但它与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与大众相结合的要求仍然是一致的。它也是与激进的意识形态信仰可能出现的衰落相一致的。从农村的角度出发，我们在许多地方发现，农村人似乎感到，如果城里人不永久地留在农村，他们的作用将是有限的。但对城市知青来说，轮流服务制度可能会使下乡计划更容易被接受，他们因而会对农村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在轮流服务的基础上继续实行上山下乡计划必定会使许多城里人面临农村生活的现实，从而有助于使人们广泛地意识到农村面临的发展挑战。

彻底废除下乡计划似乎是最不可能的选择。因为即使城市有可能全部吸收其年轻人就业，我们还会面临数百万仍呆在乡下的知青问题。废除这一计划会产生对于他们的重大的公平问题。的

确，轮流服务制度也会产生类似的问题，但是，轮流服务制度能为细心的管理者提供机会，以避免公开废除下乡计划而引起的混乱。废除这个计划还意味着对毛主义原则出现了急剧的、极其明显的背离。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很可能会援引毛泽东思想而使其统治合法化，因此，他们更有可能细微而不太明显地改变毛主义的较激进的原则，而不是立刻放弃它们。

1977年初，中国的领导人做出了继续实行上山下乡计划的决定。1976年12月，华国锋主席接见了参加第二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下乡和回乡知青代表，他似乎决心继续实行这项计划并提高其对于农村发展的重要性。<sup>1</sup>传播媒介也谈到了“开始知青下乡运动新高潮”的必然性。<sup>2</sup>然而，由此断定这些措施会确保城市知青“上山下乡”计划长久地存在下去将是轻率的。新的领导人还可能会出现，旧的领导人也可能会复出，他们对于这项计划的支持可能缺少坚定性，他们的怀疑态度可能会增大，因此，这项非凡计划的前途仍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观察。

#### 注释

1. 德里克·希利 (DeYek T. Healey):《发展与失业》，第10页，引自世界银行主席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报告。
2.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一百个国家，二十亿人民》，第54页，纽约，普利杰出版公司1973年版。
3. 穆哈莫德·萨姆苏·胡克:《南亚和东南亚的教育、人力和发展》，第16页，普利杰出版公司1975年版。
4. 希利前引文，第20页。该文引用了一项有关斯里兰卡的研究，该研究表明，失业程度随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例如，在1971年，未受过教育的20—24岁青年有29%失业，而相同年龄已通过“零”水平考试的青年中失业率高达45%。
5. 纳撒恩·凯菲茨:《青年追随者的回归》，载于霍华德·赖金斯和詹姆斯·盖厄特



编辑的《南亚的人口、政治和未来》，第255页。我要感谢霍华德·赖金斯使我注意到这一材料。

6. 《纽约时报》，1977年1月17日，第3版，有关那里社会主义改造文献的评论文章，参见米歇尔·洛弗奇：《第三世界的农业社会主义：坦桑尼亚个案》，《纽约时代周刊》1977年1月17日出版。
7. 希利前引文，第42页。又见弗里德里克·特纳：《拉美人口向城市的涌入》，第14-15页（未出版）。
8. 这一点在麦克纳马拉的报告中得到了强调，见该书第3章。
9. 同上，第63页。
10. 唐纳德·穆罗：《人、国家和学校》，载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主编《中国的发展歷程》，华威顿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
11. 胡克前引文。
12. 有关这一差距的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参见肯尼恩·乔伊特：《关于马列主义制度的政治文化研究的组织性研究方法》，美《政治科学》周刊第3期1974年9月。
13. 霍华德·赖金斯和杰伊沃德恩：《斯里兰卡（锡兰）的青年抗议活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73年版。
14. 在中共于1977年2月在广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进一步批判了“四人帮”鼓吹的“城市计划生育做好了，知青下乡的压力就减轻了”的观点，广州广播电台1977年2月20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7年2月22日第35期。
15. 1976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
16. 南京广播电台，1976年12月4日消息，《国外广播信息社》，1976年12月8日第238期。